

黑色文库 第十集



廖亦武 著

中国冤案录

(第一卷 2001-2003)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十集

中国冤案录

第一卷

(2001—2003)

廖亦武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5

目 录

前言	吴弘达.....	7
出版缘起		9
序言 1：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	郑义.....	13
序言 2：廖亦武的肉体意义	王怡.....	27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35
冤死者杨继年		47
百岁和尚灯宽		63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80
上访诗人老陆		92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103
花案魏西		117
同案犯李齐		130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144
反革命分子刘德		156
上书者蒋朝才		170
“盗墓贼”田志光		184
戒毒者木邸		198
村民谢明		210
被收容者李明凯		221
筑路人刘世昌		233
美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249
偏三轮胡小松		263

破产企业家吕钰	273
采购员霍海仲	285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294
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306
戍边女兵之子刘思湘	316
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328
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339
被抄家者廖亦武	349
附录一：冤死者杨继年	363
附录二：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 上善若水	368
附录三：反革命分子刘德	378
附录四：上书者蒋朝才	382
附录五：村民谢明	385
附录六：筑路人刘世昌	388
附录七：破产企业家吕钰	403
附录八：采购员霍海仲	409
附录九：1970 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	412



出狱不久，廖亦武即离婚，光棍一条回到故乡。摄于1994年4月。



出狱时的廖亦武与两位侄儿合影。摄于1994年2月。



廖亦武与蒲勇在劳改车间。蒲勇因六四原因被判刑10年，出狱不久，即患胃癌不幸去世。



蒲勇在监室外。摄于1993年1月。



四川省第三监狱的六四政治犯。
后排左起：蒲勇、雷风云（12年）
廖亦武；前排左起：赵明洪（5年）
李必丰（5年，出狱不久再次因政治
原因判刑7年）、许万平（8年，
出狱不久再次因政治原因被劳教
3年）。摄于1993年大年初一。



廖亦武（前排右一）与他的同案
犯们。摄于1989年8月。



探监合影。摄于1993年1月。



四川省第三监狱的六四政治犯集体照。摄于1993年大年初一。

前 言

吴弘达

劳改基金会的《黑色文库》自 2003 年发行以来，已经出版了九本，都是身历苦境的个人用心血写下来的血泪斑斑的个人历史。这次推出中国大陆著名独立作家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却有些不同，它不是受迫害者、受苦难者本人写的，而是作者通过探访的形式将底层百姓的冤案记录下来。今后《黑色文库》中，部分来稿可能将不再是被迫害人亲笔撰写，而是由像廖亦武这样的作者编写。原因就在于：许多被迫害的人、劳改的幸存者并不具备写作的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勇气将自身的不幸遭遇诉诸文字保留于世。但他们的故事是不能被遗漏、不应该被忘却的。

劳改营中的人大部分是中共所谓的“刑事犯”，其中很多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政治动机和信仰原因，犯案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社会的各个层次，每个人有不同的“阶级出身”及职业背景。其中有些人确实犯下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容忍的罪行，这些罪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因素。然而廖亦武书中所描写的众生，毫无例外地，全是冤案苦主。他们是在全然荒诞的原因和“罪名”下，被投入劳改机器中的。不论“冤”或“不冤”，我们不能放弃一个根本的原则：即他们都是人，一个犯了罪的人也是人。他们拥有人权。

在中共的劳改营中，强迫劳动是基本手段，再搭配上改造思想这种特殊的洗脑方式，二者结合就是所谓“劳动改造”的宗旨。任何人犯下了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罪行，都应该用剥夺自由在内的手段予以惩罚。但每一个服刑的罪犯还应有基本的人权，即

他们还应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及政治信仰的自由，并且他们不可以被虐待、凌辱及践踏，他们还应有人人的尊严。

一定强度的强制劳动及文化道德教育帮助这些犯罪的人改邪归正，这是相当不易的一项社会工程。虽然，中共一直在宣扬它的劳动改造就是这个目标。但是，从廖亦武的探访中可以看到狱中不人道、非人性的待遇，反映了劳改营——中共的统治工具，完全罔顾这些基本准则。

在中国大陆，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刑事犯罪是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共的劳改营（包括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收容所）是专政的工具，是维护统治秩序、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机器。这两点表明了中共的劳改制度（监狱）的本质不同于一般自由国家的监狱。

在伸张人权时，不仅要为受到社会尊重的那些政治犯、良心犯的权利呼吁，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那些犯了刑事罪的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忽视了这些小人物的权利，实际上忽视了人权的基本准则。

斯大林说过：杀一个人是一个重要问题，杀一批人是一个数字问题。我们应该把“数字”重新还原为一个个血肉之躯的人，“数字”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说过：杀人要按比例数，农村按千分之五，城市中不要超过千分之五。我们应该把千分之五这个数字中的每一个人的故事记录下来，我们不应把他们看作数字。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同你、同我一样，是一个人。

《黑色文库》向所有的劳改幸存者开放，您的经历，或许就是下部书的素材。让我们来共同为历史作证。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

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5年2月于华盛顿

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

——为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所作序

郑 义

我本来是许多血腥事件的目击者、追查者和记述者，读完这本书后，仍然产生了某种神智恍惚。我需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看看自己种植的小红花，还有远处那些在阳光下显得分外明丽的绿地。我觉得我的神经应该还是比较坚韧的了，但仍然有些受不了。我还是需要再次确定这些讲述不是迷离梦境，而是我们中国人身在其中的现实。这本书由二十几位受难者的自述构成，从中共建政到今天，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残忍、难以置信的残忍、冷血，文字未加雕琢，与作者的诗人身份不符。我就不一一介绍那些可怕的故事了吧。就像医生对死亡的冷漠，我的心也相当麻木。最刺激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证词的记述者竟然是一位诗人？那些数以千计万计的记者、纪实作家和历史学者呢？都死绝了吗？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否则有失风度有失厚道。

但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一位诗人？

最方便的解释，是命运使然：命运先使他深具文字功夫，命运再把他投入地狱，并引导他在那里转了一圈又活着回来。于是，作为幸存者他责无旁贷。我相信这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全部。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先驱者——亚·索尔仁尼琴，他也走了同样的一条路。索尔仁尼琴十岁就读了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发誓要写出伟大的作品。青年时代，还特地选修了大学的文学函授班。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他的梦想不会是将来去做一名“古拉格群岛”的记录者。从劳改营出来后，他写的也是虚构性作品。他

轰动俄罗斯的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一部中篇小说，写作和出版纪实性作品《古拉格群岛》则是后来的事情了。当然，他是幸存者，他责无旁贷。但据我猜测，更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过于残忍，超出了人类想象力所能抵达的那种高远神奇的境界。那里的一花一草一人一事都绚烂魔幻，超出了一切艺术虚构。在那种魔鬼式的无以伦比的创造力面前，任何伟大的幻想天才，都只能由衷赞美，而低下骄傲的头颅！多年前读《古拉格群岛》，记得一个小小细节：劳改营向靠近中国的方向迁移，囚犯们都祈求离边境再近点，再近点……索尔仁尼琴写道：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中国更坏！你说对了，老索，但还不够，你看见的是岛屿，古拉格群岛，我们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是大海，浩瀚无涯的古拉格大海！

对于廖亦武在本书中所记述的二十几个案例，无须一一加以转述。挑一篇不太魔幻的《冤死者杨继年》看看。

杨继年的案情实在简单：偷一只羊，坐牢 34 年。是不是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我们中国人大约还不算很悲惨。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 5 年刑，我们的杨继年仅仅是——对不起，我搞错了：杨继年没有偷那只羊，是他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 10 年。自然，一只羊比起一块面包是多了点，判 10 年还算不得冤。但接下来全家七八口都成了“偷羊贼家属”，被“管制劳动”4 年，这就有一点冤了。后来，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夜里，弟弟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在“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的口号声中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那一年，杨继年刚刚 11 岁。

这就严重挑战了我们对一般事物的认知能力。怎么可能呢，11 岁？是的，11 岁。法院刑事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被告人：

杨继连，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初识字，贫农家庭成分，盗窃出身，住高粱区奉天乡二联社，汉族。”如何，你打算相信还是不相信？如若不信，下面还有两张加刑的法律文告为证：1963年发出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18岁，推算回去，1958年杨首次判刑时应为13岁；而另一份文件，1970年发出的加刑判决书则称杨为21岁，也就是说，1958年进监狱时，杨竟然才9岁。白纸黑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门一致认定“偷羊贼家属”杨继年是少年入狱。不管是11岁、13岁还是9岁，反正离成年还很有些日子。也许，11岁或13岁入狱应该算是创记录了。但就这个政权之毫无人性，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更加极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在《红色纪念碑》的序言里写道：“……这七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同过去的和正在酿成的各种冤案的受害者接触中间度过的，因而，我便自以为再不会有什么中国人的悲苦和不幸令我惊异了。然而不久我便有机会纠正我的自满。那是到美国以后的事，偶然遇到一位患有精神抑郁症的江西来的留学生，听他的太太说起他的病因——六岁时（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以及那前前后后辛酸而痛苦的情节，我才发现我对于中国人的苦难的了解还远远没有穷尽。”

我们再来看冉阿让。偷一块面包，判刑5年。四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计刑期19年。杨继年没有偷一只羊（我们就算他偷了一只羊），判刑10年，因抗拒改造等罪名，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如此看来，很有一点魔幻的味道了。

更加匪夷所思的还在后头：在不停申诉了三十来年之后，1991年法院终于有了一个答复：“判刑时年仅11岁经查不实。”那么，法官老爷认为应该是多少岁呢？便再无下文了。杨继年说：“当时气得我自己搥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杨继年生于1946年（即被捕时11岁），是有出生证明和村

民证词的。其实，杨继年能否成功地证实自己 11 岁被捕入狱并不重要。他手上的三份法律文件（两份判决书、一份起诉书），已经铁定地证明了他首次判刑的年龄分别是 9 岁、11 岁或 13 岁。出现了矛盾的三个年龄是法院的渎职，而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执法者明目张胆的残暴。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成了大富翁，而且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不具备发财掌权的想象力，而仅仅是想重新开始一种微贱贫穷的生活。

杨继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了。耕地和宅基地已被瓜分净尽，家乡不认他了。乡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九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杨继年问：“你开玩笑么？”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于是乡政府就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的狗腿”。此时的杨继年，

左手左腿已然残废，要再打估计就是右面的狗腿了。待他再次手捧乡政府的路条回到监狱，监狱也对他恩断义绝，绕大墙转了一星期，也无人理睬。他到省里告状，劳改局再次“介绍”他回乡。孰料小小乡政府横蛮依旧，终于把杨继年逼上了“上访作家”的惨痛生涯。“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如此艰苦卓绝，不过是求一饭一榻一瓦一立锥之地耳！

杨继年是良善之辈，经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坐牢的唯一好处”，那就是为了写认罪揭发材料，人人都必须学文化。他说：“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威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由此，杨继年先生又创造出另一伟大业绩：他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两年前，他终于含冤而死，这几百万字所记述的荒唐与残忍，就成了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总是摆脱不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猜测：杨继年和冉阿让之间存在某种合谋。最后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居然大字不识，而共产党的牢房竟然把杨继年从文盲变成“作家”。冉阿让因持假释出狱的“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在中国，所有的杨继年从出生起就持“农村户口”而严禁脱离农奴地位……倘若雨果真有在天之灵，不知当作何感想？

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旋踵被警察抓获。主教称那是送给他的礼物，而且还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为何忘记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自此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杨继年所遭遇的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位主教，更没有那一对慈悲

年，四次加刑共 24 年，累计刑期 34 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向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他没有能力搭救芳汀、柯赛特。他被捕时所有人都拍手称快。他从来不敢想象革命，圣丹尼街上也没有起义者的街垒和旗帜。而沙威警官，则指挥着由教授学者和警察流氓混编而成的党卫队，早就把可能构筑街垒的一切物件焚之一炬。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 11 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 10 公斤炸药，10 支铜雷管，1 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充满诗意的巨著？

雨果的悲惨世界，被我们中国的冉阿让彻底颠覆了。

于是，嚎啕大哭之后，我们有望成为中国雨果的诗人廖亦武放弃了史诗的建造而转向记录证词。

我早就痛彻心腑地说过，在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一钱不值。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象。遍地魔幻，遍地魔幻！当所有的人都浸淫于超现实的迷离梦境中时，想象还有什么价值呢？你只须据实以录。

如此，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超现实主义。我们与布勒东们一样，都承认了想象力之枯竭。他们喝醉了酒“自动写作”，试图在一百个句子中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奇组合。或者拓印木纹、叶脉，然后在长久的凝视中发现令人感动与震惊的幻象……我们

中国人比他们棒。不管喝没喝酒，随便抓住一个“上访者”就可以开始“自动写作”。我们也玩拓印法，不过拓印的家伙比较大。我们拓印中国社会，每一幅画都是“令人震惊的一连串幻象”。

同布勒东们一样，我们也认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们也部分地承认艺术创作如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但我们有所发展：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极权社会的深层潜意识，即在表层意识（共产主义理想、三个代表等等）之下，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藏匿于意识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和原动力、支配力，比如残忍、自我毁灭的渴望。我们终于成为弗洛伊德最杰出的隔代传人：我们回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病例纪实的源头。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证词的写作者竟然是一位诗人？

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是富于想象力的现实，是超级的现实。在这种魔幻现实面前，最伟大艺术家的想象都黯然失色！说过了雨果，再来说说与毕加索齐名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达利。他玩的超现实主义，最令人难忘的不就是那几块像生面饼一样软瘫的钟表吗？这种超现实的钟表首创于他的名画《永恒的时间》，此后多次在其他画作中出现，时而摊在桌边上，时而挂在树枝上，时而垫在马背上。无论人们作何解释，时间之变形、相对大致是错不了的。达利对自己这一杰作非常得意，宣称：“我能将非现实的事物表现得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我的挂钟会一直滴答滴答地走下去……”错了，杨继年一出生，达利的超级想象力就应该抹脖子自杀了。杨继年的钟表瘫痪在他 11 岁入狱那一年，虽然他与别人一样每年增长一岁，依次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的全部人生阶段，但他的整个生命皆凝结于 11 岁那一年。达利粘乎乎的“生面饼”、“挂钟”不像是能走动的，尤其不可

能“滴答滴答”地走动。而杨继年，他的人生之钟不仅始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而且至死也走不出 11 岁那年。达利，还敢说你的“生面饼”比杨继年的“现实世界还要真实”吗？

于是，在神奇的超级现实面前，绝望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绝望的诗人廖亦武放下了雄心万丈的艺术抱负，谦恭而无奈地开始记录原始案件。当然，还有绝不自我欺骗的良知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派。这是集圣徒、苦难代言人和行吟诗人为一身的那种大文豪的基本素质。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他还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

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为了展开阿多诺的话题，有时我会不加区分地使用“奥斯维辛”这个关于人类残暴的代名词。）

索尔仁尼琴、廖亦武们的写作正是受刑者的一声尖叫。尖叫的权力是不应被剥夺的，但尖叫不是诗。《古拉格群岛》和《中国冤案录》等等纪实著作不能称之为诗。那么，奥斯维辛之后可以写诗吗？

阿多诺只说对了一半。在他的语境中，诗大约是指回避超级残忍的浪漫美文。奥斯维辛之后写这种诗，显然是可耻的。这种过于轻佻的美，将再次杀死受难者，而成为与凶手共谋的音乐伴奏。阿多诺认为，人们必得在“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跟“被

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但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问：“奥斯维辛之后，连《神曲》也不能写吗？”阿多诺，你将如何回答？你会喜极而泣吗？除了“软弱的审美”和与兽性同流合污，在人类心灵深处，还存在一种强大的审美。

有人如此强有力地补充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说得多么好！

但问题在这里：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共产主义世界性崩溃，整整几个世代的诗人作家，为什么没有产生一部无愧于奥斯维辛苦难的《神曲》？

我没去过奥斯维辛，但去过达豪，还常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与杰弗逊纪念堂相邻的二战大屠杀博物馆。在那一排排营房前，在锈迹斑斑的焚尸炉前，我确实听见了受难者对上帝的疑问和抗议。奥斯维辛确实强有力地扭转了艺术史，几乎在一夜之间。敏感深思的艺术家们，在奥斯维辛不可抗拒的巨大冷酷面前，体验到自创世记以来从来没有的绝望。哪里还有什么“理性的动物”、“万物的灵长”？满目皆是人性的黑暗！他们说“上帝死了”，那是绝望，是抗议，是愤懑，是不甘。但后来，许多艺术家再说“上帝死了”这句话时，已经失去了前辈们当年面对奥斯维辛时的那份痛苦与真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敢正视我们饶有特色的红色奥斯维辛，却也满脸深刻地走上了无主题、无意义、无故事、无情感、无英雄、甚至无聊无耻无赖的“先锋”之路。当然不能说他们的探索毫无意义，但他们的自恋自怜胜过了真诚。上帝没死，是他们的心死了。在需要以大爱大来对抗大丑大恶的艰难时代，他们审美的能力和爱的能力过于“软弱”。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是一种对诗的误解。诗既是生活的美好装饰，有如恋人明眸里的晨曦、荷叶上滚动的雨滴；诗也是苦难的拯救，如惊涛骇浪中可靠的锚链、长夜孤旅

的遥远灯火、沙漠戈壁中的点点绿洲。是的，诗绝不仅仅是华丽的饰物，诗更是对于苦难与死亡的抗拒。说在奥斯维辛上帝缺席，上帝死了也是浅薄之论。比如，在威塞尔的《夜》中，上帝不仅在受难者彼此的抚慰和救助里，在拒绝出卖的坚守里，在出生入死的逃亡里，还在那些绝境中惊人的美丽——诸如悲哀的微笑、晶莹的泪滴、一小块留给孩子的面包和尸堆边的小提琴声里。还有，上帝也在那些在诺曼底、在台儿庄、在伏尔加河、在中途岛浴血奋战的反法西斯战士心中。我猜想，上帝在造人时肯定盘算过：应该把什么东西设置为人之根本？即应该把什么设置为生命最可靠的基本程式或原逻辑？上帝选择了感性、情感，即美与爱这种原始能力。上帝把它们存储于人类心灵最深处，使之成为理性的基础、规范甚至禁忌。每一个人，无论贤愚贵贱，也无论是否拥有知识和逻辑的能力，美与爱的原始本能都是你漫漫人生中最可靠的向导与依恃。黑色的和红色的奥斯维辛，不是理性的灭绝，而是荒谬的理性压倒了自然的感性。人种学说和共产学说不仅道德缺陷，也存在逻辑错误。但美与爱这种情感本能是永远不会错误的。

美与爱，这就是诗的本质。

这就是诗所凭借所赖以对抗黑暗的力量。

所以，不是欢乐幸福最需要诗。恰恰相反，是苦难、深重的苦难，是奥斯维辛的苦难最需要诗。所以，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

我在前面说过，在我们中国红色奥斯维辛无以伦比的魔幻现实面前，我们自愧弗如。但我没有说文学仅仅是想象力。与之相比，审美能力和爱的能力是艺术家更为基本的素质。如果想揭破、展示黑暗，你只须从旁纪实。如果想对抗黑暗抚慰灵魂，你就必须“进入”，要有光，创造一个情感的世界。遗憾的是，在极权社

会连续几代的残酷调驯下，我们变得越来越怯懦、猥琐、冷血、自甘沉沦，已不知美与爱为何物。我们的时代，已经被驯化到难以产生可以和苦难相匹敌的大作家。

正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神曲》充满挑战。这不是争勇斗胜，不是试图超越大师的功业心，而是命运之驱使，是无以推托的责任。

最后我仍然想回到《悲惨世界》。冉阿让问米里哀主教，为何要送给他那对贵重的银烛台。主教回答说，我要用它来赎买你的灵魂。那末亦武兄弟我问你：

拿什么去赎买凶手们残暴的灵魂和杨继年们仇恨的灵魂？

唯有爱。

但爱与美来自诗，而不是纪实。

这就是雨果及其光辉著作《悲惨世界》、《九三年》存在的价值。

亦武兄弟，你应该成为可与红色奥斯维辛相匹敌的大尺寸的诗人作家。换言之，你应该具有足够的审美能力和爱的能力。你要用心倾听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声音。

奥斯维辛以降，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大空白。因此，这是我们的时代。

我总是劝那些不乏担当和勇气的年轻作家不要无休止地与那黑暗贴身缠斗。要多少保持一点审美距离，要善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种缠斗中我耗费了太多的生命。当我终于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时代”之际，气力也许不够用了。

旧约创世记起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与其理解为创世纪实，毋宁说这是关于爱的隐喻。新约则整个在讲述由耶稣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救赎之爱。现代艺术所丢弃的，恰恰就是这种拯救之爱。他们不厌其烦地说“上帝死了”，却有意无意忘记了

一个遁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然他也死了，早在奥斯维辛一千四百年前，被人们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但他复活了。

我确信，奥斯维辛的罹难者，在他们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际的最后愿望，是祈求他们的后代拥有一种美和爱的生活，即富于诗意的生活。

我的朋友，多年游学波兰的诗人一平，曾创作了长诗《奥斯维辛、春天与复活节》。在这首一千三百多行的长诗里，他庄严地表达了一位中国诗人在奥斯维辛所感觉到的悲悯、谴责、控诉、慰藉、祝福、祈祷、希望……他把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春天和复活节连接。在长诗的尾声，他站在残雪刚刚消退的松软潮湿的奥斯维辛土地上，眺望着迎接复活的队伍由教堂走向苍茫旷野……

“……又是雪/寒冷中给人温暖和慰藉/告别吧 奥斯维辛/无论我多么悲哀/我还是要祝愿/人总是要走出这里/即使你再次来临/死亡为复活提供开始……复活的钟声/震荡残雪 青绿的枝条/和飞回的鸟群/复活的日子 世代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忘记悲哀/准备酒着上新装/牵著孩子喜悦地走向教堂/草篮、面包、鸡蛋/冬青叶围绕黄油雕刻的小羊/弥撒 祈祷/管风琴的乐声/由开化的冰河拥抱大地/神圣的水滴 祝福/家庭、生活和土地/穿越苦难 死亡/那涌现的光、爱/融化黑暗/大地升起广阔清洁的歌声/诞生黑暗的也诞生光明”

那些关于土地、春天、残雪、农舍炊烟、发绿的草芽以及放在废墟上的黄雏菊的柔软的诗句，都打湿了我的眼睛。

2004年感恩节 于华盛顿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

王 怡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评述被遮蔽和被损害的当代知识分子。我说，廖亦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肉体意义，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曾和一群碎尸犯、强奸犯关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书生像他那样在底层卖艺挣扎多年之后，依然拥有一个如此强悍的肉体，依然在每个夜晚下楼去长跑 5 公里，依然坚持为活在底层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立传，为一个时代写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证词。廖亦武的存在，向着孱弱的知识分子发出这样一个拷问：你的思想的强度，是否能够支撑你的肉体的强度？

在一种自由的政体下，肉体的强悍之于知识分子，显得并不必须。但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就像金钱不能支撑的部分，不是公共生活中的有效需求。这个看法来自廖亦武的显赫存在对于我长年的刺激和震撼。

在评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文章中，艾晓明从身体的角度理解林昭。与我对老廖的理解方式非常相似。艾女士下面这段，是我认为迄今最精彩的对林昭的解读。现摘录下来，作为阐释廖亦武的一种互文。

（影片）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

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铐 180 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多年前我还不认识老廖，在深夜的“自由亚洲电台”里，有幸听他朗诵诗歌《屠杀》。那一个深夜颠覆了我对朗诵的全部概念。因为那正是一种肉体的实践，是写作的继续。是用肉体的强度去抵御苦难，是生命往外面哗哗哗的倒。相比之下，金斯堡的嚎叫距离自己的肉体就显得太远。就像更早时候读老廖的长诗《三城》，读一遍下来已接近虚脱，心中就想这和诗艺无关啊，这种文字不知要多强横的人才写得出来。后来我替老廖找人把他朗诵诗歌《情兽》的磁带转成 CD。录音师也说，这什么人啊，听得我一个人在录音室毛骨悚然，觉得天地都垮了，差点要自杀。

《屠杀》是廖亦武在六四当天写作、朗诵、灌制和拍摄的一首长诗，加上一年后的另一部《安魂》，使他被判四年的反革命徒刑。但这却是国内知识分子在六四时期的恐怖中，几乎唯一的一场喊叫。廖亦武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从此被政治裹胁的写作者。老廖喝酒时常说自己胸无大志，是对于政治和关乎政治的言说不感兴趣的人。据我偷窥也确乎如此，譬如他在朋友们开始讨论民主法治的话题时，逐步就会睡着。这似乎会有碍他的斗士形象，但并不妨碍当真正的政治苦难降临，当那些侃侃而谈民主自由的教授们闭门不出，老廖就惊醒。就以他的强悍的肉体粉墨登场。这是一个我至今不能完全解释的人物。不能解释到底是他思想如此粗糙而强悍，他的自由渴求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支撑了这一具反复受难的肉体。还是他的肉体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埋伏能量，暗藏杀机，能让他的写作即使呆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牢房，也能获得最大可能的解放。

老廖常说，如果可能，宁愿出去吹箫卖艺，和一帮搞音乐的朋友混，也不做这个冤案访谈录了。但大家就开玩笑，说老廖啊，人家抓你、抄你、搞你、日你，你还天天半夜起来长跑5公里，你娃也太狠了点。这能让人家放心吗，能不严防死守你一辈子？这时候老廖就现出一副苦相，仿佛长了一身贼肉，就要如此，是没办法的事。这让我觉得老廖的良知，不是从脑子里养成的理性，是从肉体中生出的一种意志。因此廖亦武真的不是什么斗士，他就是一性情中人。一个血气和良知拌在一起的、知书而不达理的家伙。

这不是贬损，而是一种赞美。何谓良知，看老廖出狱之后，再历经磨难，对比他的写作历程，与充斥着中国知识界的各种犬儒式的写作，你会发现良知其实很简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良知是不会从养尊处优的肉体中生出来，良知是不会在高头

讲章之中获得辩护的。对官方学者和作家们来说，写作是职业，是特长，是精神的按摩。但对老廖，写作的意义几乎只有一种，就是挣扎。

2002 年秋的一个夜晚，老廖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完了各自回家，他去取自行车，被等候了几个钟头的警察带走。深夜宋玉给我打电话，随后反而安慰我，说没什么，都习惯了，一般过两天就会回来。第二天果然放回。然后一周后的凌晨，闪电般的抄家。这一次起因，是我们都有参与王力雄发起的关于阿安扎西活佛案的公开信的签名。之后我在关天茶舍转贴了他《中国冤案录》的第一篇《严打幸存者左长钟》。许多认识不认识的的朋友都来帖子后面发言。如作家冉云飞、汪建辉、唯色、杜导斌和律师秦少华等。当时我在帖子后写道：

在 83 年严打中，还有许多依然幸存或待在牢里的人，能为他们做一个访谈，将具有极高的价值。可惜也只有像廖亦武这样被当道者打入另册、在底层和当局的蹂躏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才有这样的勇气来从事这样的真正有良知的写作。在一种频繁地被独裁者打断、监控、绑架、抄家、遣返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有良知的写作，令人流泪的写作。

老廖与左长钟一样，是被羞辱者，被践踏者。老廖的意义早已和诗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的生活早已全无诗意可言。他甚至根本已没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断地遭遇当道者留下的大粪和罪恶，不断被当道者强行插入，不断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带走。不断地在亲人眼前无端地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消失。他在无力为继的生活中所坚持的底层访谈和冤狱访谈，是令那些以社会底层的保护神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令那些空喊与失败者、与穷人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的

写作。

对曾经的诗人廖亦武而言，活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灾难。

像狗一样地活着。然后写作。写作仅仅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我庆幸、有时候惊讶，上天把这样一具肉体给一个中国当代的知识受难者。祂要做什么？我想神是需要一个见证人。我有时觉得廖亦武就是神的选民，不是选他为万世开太平，不是选他为这个卑微的国度做到什么，这种宏伟叙事会严重超出廖胡子的理解能力。神只是让他受难，给他一副像我这样孱弱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强大肉体，让他受难时还有力量抬头去观察和他一样的难民，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就当共产党不存在，就当共产党没有统治这个国家一样记下来。正如老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活下去》第四卷的名字——证词。老廖在 90 年代之后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为一个时代提供部分被遮蔽的证词。从最浪漫、最湿润的诗歌，退回最纪实、最干燥的文字。老廖的真正的肉体写作，最尖锐地证实了，在一个极权的时代诗歌是如何消失的。

后来结识老廖，他说自由亚洲电台那个朗诵是电话线上即兴的，不够好。以后我果然听到了更令人窒息的哀号，和着他的“箫与啸”。许多年来，老廖每年都要制作一次《屠杀》的朗诵盘。理由似乎是形而下的。就是拿来验证自己经过一年的磨难，生命里剩下的能量还够不够做这个朗诵。看看这具肉体还有没有弹性，还有没有废掉？这个理由曾经令我震吓。我从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思想一样的自信，也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的思想一样的要求。因为我想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用思想而不是用肉体思考的，也是靠思想而不靠肉体去谋生。曾有一个同道的

朋友开玩笑，说到了监狱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我，我信得过我的精神信不过我的肉体。身上的苦不能捱啊，一打我就什么都招了。我说我想来也是。

但看廖亦武，和看林昭，让我觉察到一个残酷和尖锐的事实。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必须首先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你不是仅仅用笔或电脑，更要用你的肉体去思考，去表达。在这个时代，仅仅用笔、或仅仅只准备用笔来表达的人就是犬儒。这是今天一个思想者、一个准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的命数。你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要把自己的肉体放进现实，就要先问，我的肉体是否足够支撑我说出和坚持真理，支撑我必要的勇气。

不是说我们必处在监狱生涯或刑讯逼供当中，才能考量肉体的张力，也不是说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就要随时准备丧失肉身的自由。对一个文弱书生而言，肉体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维度。譬如老廖对自己肉体力量的虚弱，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诚实。他讲起在北京上访村采访，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真是过好了。若是5、6年前，可以和上访户们睡在一起呆个把月没问题，但现在呆几天就受不了。你思想上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理性告诉自己应当如何如何。没用。你的肉体先就有反应，产生抗拒。老廖说那里整个空气，对理性而言是弥漫着冤屈，但在肉体而言弥漫着的却是一种病毒。住久了就让自己不适，甚至会生病。

老廖的写作和我不同，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同。因为他的写作历程就是赤裸裸的肉体历程。他在写作、访谈和受难中不断彰显着他之于知识界的肉体意义。当老廖说自己在上访村待久了要生病，我想当代中国没几个知识分子有脾气说：我就不会。廖亦武之肉体尚且如此啊，当我说我同情那些上访者、同情那些乞讨者时，我也许仅仅是基于理性，基于观念的力量，而在强迫

和说服自己同情。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一般强度的同情他们吗？我想起去年在遂宁步云乡调查农村选举的那段日子，不隔天到镇上吃顿肉，真是受不了。尽管我也一身贼肉，但我缺乏的显然还是某种肉体的力量，一种能够与思想的强度相般配的力量。

这并非一种民粹式的、对于卑微者的肉体崇拜。不是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要和上访者一样衣裳褴褛，才够政治正确。但肉体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处境，使我们的肉体得到彰显，漂浮在精神世界的上空。肉体的强度支撑着我们对自由的坚持，但这一点却是知识分子很少敢于承认的事实。第二，正是意识到肉体的孱弱，肉体对于普遍正义的天然抗拒，使我生出一种强烈的自省。以往，自由主义总强调面对理性时的谦卑和知识者的道德自省。但这却是另一种自省，不是出于对理性的怀疑，是出于对肉身的怀疑。

如果说哈耶克式的谦卑，更多来自前一种，廖亦武式的谦卑则主要来自后者。尽管他拥有这个时代几乎最强悍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肉体，尽管他尚未完成的《中国冤案录》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最显要、最杰出的非虚构文本之一，但老廖摸着他的光头，坚持认为吹他的箫，更让自己觉得自信，觉得无愧。而写作，写作不过是一种苦难。

如果你像廖亦武一样把肉体放进来写作，你的确很难把写作当一种值得炫耀的才华，甚至很难把自己的作品声称为一种成就。因为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有了苦难你就喊，之间实在差得太远。

——当我此文中说廖亦武，我指的就是作家老威。就像我说极权主义，我指的就是共产党。

2004年9月29日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采访缘起:1983 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

今年 54 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 2002 年 4 月 1 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

“严打期间，司法从简，”他说。我追问“简”到什么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

左长钟：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老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长钟：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老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分，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长钟：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老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长钟：听说您也坐过牢？

老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长钟：哪您一定晓得 1983 年的“严打”。

老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 1983 年“严打”进去的。20 来岁关到 30 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姓钟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某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长钟：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老钟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 80 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老威：你也犯“花案”？

左长钟：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

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78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80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像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14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

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分，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80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厮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33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像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像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嘭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1983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

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64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20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像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么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瘍，脓滴到哪儿就烂到哪儿，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1983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20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咔咔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

20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肥蛆。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老威：明明是冤案，怎么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

“乱打”么！

左长钟：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老威：请您接着讲。

左长钟：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83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勺，从锅里舀铁水，像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矽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哨密布，插翅难飞嘛。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

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厮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 12 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当值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1986 年 1 月 3 日下午 5 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 20 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么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 20 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80 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 7 点，还要等 1 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有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

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

“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像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踹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刹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站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铐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像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像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么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老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长钟：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老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长钟：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了，罢了，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4年，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哐啷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

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20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老威：你咋回答？

左长钟：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老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长钟：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老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长钟：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老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用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长钟：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拄着拐下地。

老威：有后遗症么？

左长钟：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 53，已相当于 70 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

老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长钟：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么？

冤死者杨继年

采访缘起：2002 年 1 月 13 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一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杨继年。

出于慈悲，老陆立即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 2 月 5 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强制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仅 5 天，就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作为遗产，杨继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所以，他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我在去年秋天听人提到这一头衔时，不禁嗤之以鼻，并反问道：“11 岁坐牢？您在编小说吧？”

2001 年 10 月 12 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 3 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来写，折腾得焦

头烂额，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杜撰有何意义？还是让冤魂开口，用自己的原声告诉读者吧。

老威：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 11 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 1946 年 12 月 8 日，1957 年 11 月 5 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 10 年；1958 年 1 月 10 日又被加刑 3 年。老威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威：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威：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威：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懵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 34 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50 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 1998 年 6 月 23 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威：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 700 多次。

开始，地方法院赖帐，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懵头懵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1957—1958”，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埋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梁上牵网都不晓得。“1957”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1958”，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醒豁，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

——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威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张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威：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四川省二监狱的黄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3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威：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57年4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服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威：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1953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

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 10 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 4 年多。到了 1957 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办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

“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磕磕写几笔，当众宣读：

“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

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像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双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馋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像蒸笼上气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了，一头扎过去，转眼间包子和汤就下肚了，连滋味都没尝出来。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气，将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个馒头。我兴奋得连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脚举上我的脑壳，敲了两下说：“切莫胀死迷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楞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威：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威：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11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中共1955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您……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1946年，千真万确！

老威：莫激动，老杨。

杨继年：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13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吓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威：疯了么？

杨继年：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老威：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继年：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1957至1991，我关了34年才出狱。坐牢唯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威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11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1991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11岁经查不实。”

老威：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继年：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煽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

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老威：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继年：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老威：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察院的“手工”起诉书——“……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62年6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62年7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7月14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犯人之笔误——老威注）经常来往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62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两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犯人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杨继年：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嘛。

老威：是您写的么？

杨继年：直到现在，我都没把“反动词句”的意思弄明白。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有美蒋特务在沿海地区登陆的报道，监狱结合形势开会讨论，警告囚犯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对反动派心存妄想，否则将“加倍从严处罚”。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顶风作案，写“打倒毛主席”这样挨枪崩的反标！这次我被加刑两年，您想想，收听一次敌台（指港台、苏联及西方电台——老威注）都判10年以上，写反标哪会轻易放过？

老威：咋回事呢？

杨继年：我因为不服罪，被树为反改造典型，那边美蒋特务一登陆，我就被控制起来，打入小间。谁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

“反标事件”。我被脱得赤条条，吊打几天几夜，只好承认是“反标”主谋。狱方整理材料，正准备上报，反标真凶暴露了，原来是本队的“风水先生”。他妈的，他被枪毙时，我还被弄去陪杀场，就在老矿井旁边的空地。监内犯人开了大会，他就插上亡命标，送县城示众。快到晌午，我也被五花大绑，与他碰头，同赴鬼门关。那一瞬间，我和“风水先生”都反绑着跪在一个土坑边，间隔才一米，老实说，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栽的，枪一响，我就闭上眼睛，只感到一盆滚水兜头浇下来。我打了个冷战，裤裆就湿了。接下来，绳子松了，我一抹汗，半边脸和半个肩头，都是他的血，胡茬上还粘着脑浆渣子。回到队里，我洗了个澡，打肥皂使劲搓，还感觉他就附在身上，我晓得肉皮是搓不白的，煤矿的油已侵进去了，连内脏都黑了。

才加两年！我当场松了口气，感到太便宜了。然而5年以后，我又以“反标罪”被加刑！事情是这样：1968年5月15日，我在煤矿严管集训队打扫厕所时，发现蹲位边有一大把纸条，我用扫帚理开一看，竟然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推翻共党专制”的反标，共50多张。我见四处无人，就没管这事，盘算着搞完卫生后再汇报敌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来，反标不见了。

岂料一星期后，中队管教付某亲临监舍，半夜一点钟将我从床上拽起，拖到饭堂背后的臭水沟，踹进去，挥棘条把我抽得死去活来。然后叫来犯人组长，给我钉脚镣，镣链上还加几十斤的大铁砣，双手则戴马蹄土铐。我连叫：“冤枉！”付某说：“我让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来，命令人轮番乱打。我熬不过折磨，只好写交代书，承认犯有写反标、无理申诉、破坏刑具，企图私藏凶器杀害审讯干部、企图逃跑等罪；另外还检举揭发李星明、厚大文、谢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云等人的“犯罪事实”。由于我无中生有的检举，致使厚大文加刑3年，谢丕安加刑12年，王

月西因“反标罪”被枪毙，王清云被判无期徒刑。

大会开过了，我蹲在小间等待处决，头顶双岗管制，不放风，不洗澡。手脚被铐死，一动弹，就叮铃咣啷闹地震。唉，真是命不该绝，还和上次一样，骨节眼上真凶暴露了：经查证，“反标事件”系本中队犯人王春林、刘永龙、谭永照、华超群四人所为，与我无关。王、刘、谭三人很快被枪毙，华被加刑四年。知情不报视为同谋，我加刑七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与他们不是同一张判决书。

老威：文革中还有法律么？

杨继年：公、检、法统统砸烂了，代替专政机构的是“××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我的判刑单位属以上两家。判决书抬头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老威：这东西让我复印一份，也算历史文物。

杨继年：历史文物？它可把我气疯了。大概怕我陪杀场时喊反动口号，那天狱医朝我嘴里打麻药，还塞了棉花。有过一次体验，我就不闭眼不尿裤子，听一声枪响转一下头，盯着身边三人的脑壳开瓢，栽下土坑，双脚还朝天连蹬几下。有个人连挨几枪都稳住不倒，刽子手就使枪筒将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当夜梦里，我都在无边无际的乌红色里爬不出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明明看见那三个死鬼提着脑壳追我，围我，骂我害了他们，可一转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某害的。

老威：您要报复他？

杨继年：我现在还想整死他，我神经彻底错乱了。加刑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写“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骂。我还主动找付某汇报思想，我说：“我要杀人。”他问：“杀哪个人？”我说：“杀

你。”他问：“啥时候杀？”我说：“吃完饭就杀。”他问：“用啥子刀？”我说：“砍甘蔗的刀，或者铡刀。”他问：“刀在哪儿？”我说：“铡刀埋在你过路的地方，切掉你的脑壳老子就逃跑。”

思想汇报完毕，付某叫来犯人，打断我两根肋骨，还撬开嘴塞大粪，验证我是否装疯。随后，我被关进小间，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像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四年。1975年春天重见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老威：您逃跑过么？

杨继年：我三次弄烂刑具，把小间的墙戳了一个大洞。我要自由，要阳光。提讯时，我装着起身看口供，把一个手印盖在付某脸上，转身就跑。一大拨解放军脚跟脚撵，赶鸭子一般。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我不理，继续喊叫着逃跑、撞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都没伤着我一根毛。我折腾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嘻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老威：这样下去您只有烂在牢里。

杨继年：所以我心灰意冷，从此停止写申诉信，见干部和红毛犯人就点头哈腰。我尽量不说话，不瞒您说，除了学习发言、汇报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课，16年来，我没主动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扬我脱胎换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闭症。

我减了两次刑，1991年1月30日释放时，左膀子吊着，永远抬不起来了，左脚也跛了，幸好内脏没大毛病。

老威：之后您就开始上访？

杨继年：没有。我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路都不认得了。我两眼抹黑地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治保主任就带着人捉贼。

我忙掏出“释放证明”，治保主任说：“什么杨继年！这儿没这个人。”我说：“我离家时你还没出娘胎。”

后来到了村委会，村长叫来几个 70 岁以上的老辈子辨认，都确定我就是当年的“杨小娃”。但老辈子们说，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 61、62 年被活活饿死！由于绝了门户，家产就归集体。我问：“宅基地呢？父母的坟呢？”村长回答：“旧社会的事，我咋晓得？你走嘛，我们要关门下班了。”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你得按政府规定安置我。”村长生气说：“人民公社垮杆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喊：“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几个人把我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好心老人的指点下，找到我家原来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11 岁的我被肖民警从这儿抓走，父母钻山洞，房子被扒……而现在，一切都没影儿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厂，我稍微靠近一点，紧闭的铁门里就炸起狗叫。

接着我想拜祭父母，可村头村尾瞎窜了一天，也找不着坟地。后来才晓得，当时饿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单独起坟。能够掘一大坑，十几具尸混埋就不错。坟头也垒得浅，日晒雨淋，荆草猛长，翻两个春天就辨不出原样了。

老威：村里绝情，您还可以找乡（镇）政府，国家有“两劳人员”回家落户的政策。

杨继年：我去了，可凤天乡政府的答复是：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无钱无粮，也无房无生产工具。

老威：那要政府来干啥？

杨继年：乡长和书记都让我滚远点，我说我要告他们，乡长说：“你尽管告，告到江泽民那儿也顶速用。”我说：“我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请大人们给我指条生路。否则饿死在政府门口也不光彩。”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我说：“你开玩笑么？”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我说：“那你们出个证明。”

于是凤天乡人民政府就给我开了回监证明，也算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落款是1991年3月4日。

老威：您真回监狱了？

杨继年：走投无路嘛。

老威：您好不容易才熬出头啊。

杨继年：自由不能当饭吃，与其流落街头，不如回去继续劳改。于是我沿途乞讨着走了几天，靠拢监狱时岗哨森严，根本进不去。我只好绕到犯人家属接待处，嚷着要见监狱政委。里头的人回答政委没空，我就轰地双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没空，我非见不可！否则我就跪死在这儿！”

这一闹，围观者就朝屋子里涌，狱方害怕影响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狱政科，还问寒问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一会儿，狱政科长出面，我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口头表达了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科长皱眉说：“这咋行，

你又没重新犯罪。”我说：“我在里头习惯了，我愿免费为牢友们服务。”科长说：“你想留监再就业？更不行，你的户口已迁回原籍了。”我绝望了，又跪下磕头说：“科长，劳改单位管了我三十几年，凭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长说：“杨继年，就我个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监狱大锅饭，添一副碗筷不算啥，但国家法律摆在那儿，留你就是渎职、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随便去哪儿，你是自由人了，谁也没权利再抓你。”我说我真的没地方去。科长说：“我们协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乱来你就告他。”

监狱又给我开回乡证明，狱政科长还亲自给当地公安局、乡政府打了电话。我被“请”出门，第二次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上户口，办临时身份证都顺利，但乡政府仍以“无钱安置”为由，拒绝我落户，还说：“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无奈，我只好再回监狱。这次，乡政府开的证明写着：“你省级监狱释放杨继年回家，房子、生活生产用具的钱应该负责，你们不解决，我乡不收。国家的房子壹佰贰拾元钱一个平方米，我乡人民政府、民政没有一分钱，是空架子，所以杨继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候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凤天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1991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凤天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83）公安部文件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老威：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是吧？

杨继年：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那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老威：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继年：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老威：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继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1998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50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老威：欺人太甚了！

杨继年：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嘎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个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老威：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继年：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

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 10 公斤炸药，10 支铜雷管，1 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百岁和尚灯宽

采访缘起：2003 年的一个阳春下午，我随友人王海文到离成都 60 公里左右的崇庆凤栖山游玩，不禁被树荫深处的一座源自隋代的千年佛庙深深吸引。

俗称“古寺”的光严禅院依山势而建，分上古寺和下古寺，信众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殿宇恢宏、香火兴旺的下古寺，而佛法的魂魄却在断柱残塔、荒草凄凄的上古寺。

晚钟低迴，天色朦胧，我在恋恋不舍地出门之际，听说了 103 岁的灯宽法师的故事。从明朝永乐年间的法仁法师往下数，历 600 余年，他是寺里的第八代住持。

老人家在成都治病，一直没回来。而我被内心的冲动所驱使，一次次盲目往返，对寺中掌故逐渐烂熟于心。

2003 年 9 月 18 日下午，我领着来自法国的摄影师高磊，第五次到古寺，拍了许多与环境水乳交融的个人照片，准备用在即将出版的法译《中国冤案录》里——缘分却悄然而至——我们在即将离开时遇见灯宽和尚的侄儿陈全。我随便问了声：“灯宽在么？”陈全答：“在。”

大喜过望，我们随陈全居士入“四法界”院内的一间普通僧室，拜望了正坐沙发上看电视的灯宽，他戴着毛线帽子，小眼睛，长相平凡，由于年老怕冷，还用着电热烤火器。

在为我们摩顶祝福后，高磊迫不及待地拍了几个胶卷。灯宽耳背，提问需贴着他的耳门大声呼叫，所以第一次访谈借助了陈全的“翻译”和解说。一个多星期后，我再次登门拜佛，由于已混成熟脸，就不再顾及礼数。

在我一声声贴耳呼号中，灯宽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的一生，其间抽了两次叶子烟，吮了一次牛奶。我喜欢他吸烟叶、磕烟灰的举动，这个乡下老头儿，我几乎忘了他是个蒙冤多年，几乎万劫不复的高僧。

他在自己的佛堂里，供奉邓小平的像，他说没有邓小平，古寺的香火就绝了。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也点头称是：“佛法在心，你说得没错。”接着，他像许多和尚一样，宣扬积德行善。“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和睦地理，”他说。“还有爱护众生。比如蚊虫要吸你的血，就让它吸个饱。千万莫打耗子，耗子是吉祥物，它要吃点喝点，你就用个碗喂它嘛。嘿，耗子经常钻我的被窝，贴着我的下巴睡，它冷嘛，它缺亲情嘛，它是我的儿女嘛。有一回，这个淘气的儿子，把我用了多年的佛珠拖跑了，我就吓它说：‘耗儿耗儿，佛珠又吃不得，你偷它干啥？再不送回来，我就用灭鼠灵毒你了。’耗子在洞里听见了，一会儿就把珠子还回我脚边。”

我哑然失笑。并在合十祝祷之际，再次敲定下次访问的时间。我明白，百岁老人的故事流逝得太快、太快……

灯宽：施主来自何方？

老威：成都。这位摄影师从法国来。

灯宽：哦。

老威：我到过五次古寺……

灯宽：哦。

老威：天擦黑，庙门也快关了，我正在说：“今天见不着灯宽老和尚……”

灯宽：哦。

老威：您的侄儿陈全出现了……

灯宽：哦。

老威：您的气色不错……

灯宽：哦。我在成都春熙路住了两个月院，刚回古寺。不算啥病，就是岁数太高，躯壳有点不听使唤。前列腺肥大，堵塞尿道，小便不出来。

老威：目前还正常吧？

灯宽：下面接一根导尿管。过一晌，精神养得足些了，再去开一刀。

老威：饮食呢？

灯宽：随时想起就吮两口，都是稀的。稀饭、鸡汤、鱼汤、菜汤、果汁、牛奶，外加输液瓶，有时一天最多 8 顿，像婴儿吃奶。

老威：婴儿吃奶？老还小嘛。

灯宽：阿弥陀佛。如今我腿脚不灵便，每日除了床上躺一躺，就是坐在这儿，一边数珠子念佛，一边想着自己这一生。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竟不知身处何地何时？何人在身边？哦，我灯宽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公历 1900 年，俗名陈锦荣，7 岁就到上古寺出家。我的师父祖润法师是远近闻名的高僧大德，他不仅教修行，还请秀才到庙里教小沙弥们识字读书，历时几年，替我打下了牢固的文化基础。

民国 17 年，师父让我步行 100 多里，到成都文殊院受戒；随后入禅安大和尚主办的空灵佛学院（又称四川佛学院）做学生；民国 19 年毕业，到新都宝光寺修行，师父师爷爷都当过本寺方丈。再后来，转入草堂寺、昭觉寺研修佛法，与众多高僧大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逐渐心明眼亮。

民国 33 年，我结束游学回到古寺，任知客师，抗战胜利的次

年，升任主持，直到解放。

老威：您是世纪老人，以 1949 年划线，您的一生被裁成了大致对称的两段。而你就这么三言两语，把前半生给潦草打发了？

灯宽：从 100 年的这头望那头，三言两语足矣。要不，三天三夜，这口气落了，也说不完。一位师父就够写一部书，使我终身受益的有几十位师父，写不了，也没法说。

老威：怪我多嘴，法师您随意吧。

灯宽：1950 年解放，接着闹土地改革。有一天，工作组和村里贫下中农们突然涌进庙门，召开群众大会，我被揪出来，划为寺庙大地主和四类分子，接受批斗。他们剥下我的袈裟，一个接一个上台揭发我的罪行，除了不劳而获和封建迷信，还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工作组长不时插话，上纲上线，群众的情绪就越发激昂，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仿佛不杀我这吃斋念佛的出家人不足以平民愤。

全寺几十名和尚也受我的连累，被宣布为地主，押出来陪斗。后来，批斗会变成了打斗会，几百贫下中农轰地揪住几十个和尚，吐唾沫、煽耳光。我被民兵捆绑起来，一直拷打到深夜。根据当时的政策，庙里所有的财产没收，寺产（包括庙宇以及周围近千亩原始森林和几百亩土地）收归国有。

老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寺庙地主”。

灯宽：我当时也懵了，因为出家人四大皆空，地方上改朝换代的俗事，不会去过问。况且这川西平原有上百座佛庙，都是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衣钵传承，没有哪一个住持、方丈认为寺庙是自己的财产。

老威：对，既无私产，哪来的地主？

灯宽：单道这古寺，就始建于隋朝，隋文帝在青城山脉敕封了三十六庵，以常乐寺（古寺原名）为主庙，有上千僧人的规模。

后经历代沧桑变故，至明朝，才被朱元璋、朱棣两代君主正式敕名为“光严禅院”。自朱元璋的幺叔悟空和尚往下数，经 600 年，我是本寺第八代住持，可谓因果轮回。

老威：您能想得通？

灯宽：你只想自己，肯定不通。因为在旧社会，当和尚的绝大部分是穷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干脆就入庙念佛，图个六根清净。可一转眼，成了地主！一天福没享就受这个报应，冤不冤？佛事取缔了，别提念经，就是你的眼睛一闭上或嘴巴一咕嘟，就会被检举上去，当作“封建迷信屡教不改”，挨斗挨打。从土改前到 61 年遣返回原籍，我起码被斗过几百次，有时白天种地，晚上挨斗，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老威：您这头“死老虎”被打了十多年，有啥劲？罪状数来数去就那几条。

灯宽：后来就不数罪状，上来就打，就吊，寒鸭鳧水可晓得？就是把衣裤刚光，手脚反剪着吊起来。熬不过十分钟，人就昏死了。我的右臂吊脱臼过，至今抬起来都吃力。大冬天，一桶桶冷水从头顶往下灌。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那年头就这样子。

老威：您是高僧，能熬得住不偷偷念经？

灯宽：只能在心里念。太难了，袈裟、衣袍、经书都没收、烧毁，连钵也砸了。他们强迫我交 100 个金碗，因为有个和尚揭发我私藏金银财宝，其中有 100 个金碗。我连吃饭家伙都是寺里的，哪有一寸金？交不出，他们就吊打，于是我只好领他们去斋房找金碗，果然在墙角码了 100 个，原来是土海碗，一个能装一斤大米，和尚们因此叫“斤碗”。

老威：善哉善哉。

灯宽：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前世的孽报，我

不承受，总会落在别人头上，所以到后来，我就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放弃内心的善念。立地也能成佛。

老威：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知道与您经历相似的高僧，仅四川就有好几十。成都文殊院的宽霖法师，在土改中被“革命群众”严刑拷打，手脚砸断，牙齿脱落，直到被折磨得瘫在地上，昏迷不醒，幸而抢救及时，才捡得一条命；昭觉寺的清定法师，因早年投奔黄埔军校等历史问题，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度过20年的铁窗生涯，1975年出狱时已73岁；重庆狮子山慈云寺住持惟贤法师，因创办佛学院，于1954年蒙冤入狱，坐牢近27年；崇庆县永圣寺的普云法师，土改时被撵出寺院，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直到21年后方重着僧衣……随着住寺高僧的“沦入凡尘”，几乎所有和尚都弃庙还俗，并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灯宽：这是孽报，从50年解放到78年宗教政策落实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孽报，整整28年，寺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和尚。

老威：可是佛教协会还在。

灯宽：和尚归生产队管，不归佛协管。和尚扫地出门，农民住进庙，世相颠倒了。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不管是和尚还是农民，都不准私自开伙。公共食堂设在半山腰的梅花寨，全生产队的人都去吃。吃完了，就上山挖铁矿，我听天由命，积极报名，生产队长就批准我和十几个和尚参加炼铁。庙里的残垣断壁间也架起了土法上马的高炉。从古到今，这凤栖山上就不产铁，所以当地人不晓得辨认。上面派来个巡回技术员，按图索骥教了几口烟功夫，社员们就摩拳擦掌上山，胡乱捡些沉甸甸的黑石头回来朝炉膛里添。家家户户的锅、铲、瓢、盆、锁、环都搜去炼。和尚没家，为了不当落后分子，就像狗一样，自己耸着鼻子，嗅庙里的香炉、化钱炉、钟、磬、锁、香案的镶边、飞檐翘角上的古

铜色，总之，凡是沾点金属的东西都撬的撬、刮的刮、砸的砸，入炉为净。架炭猛熬几昼夜，结果出来的都是怪头怪脑的砣砣。

老威：什么砣砣？

灯宽：有点像粘了许多石头的马蜂窝，凝固冷却以后，用锤子一砸，就全散成黑铁渣渣。大伙就劳神费力做这种事，一个个像喝醉了酒。我呢，被民兵押着，背石头，背炭，呼哧呼哧拉风箱，就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哑巴。由于从小师教很严，站如松，坐如钟，有童子功护身，所以经得整。其他人都累瘫了，饿绵了，我还能弓步扎在高炉旁，一来一往拉风箱。

老威：当时你快 60 了吧？

灯宽：可二、三十岁的人都不如我，社员们私底下给我封了个绰号叫“无根山上的钢铁战士”。

老威：这么说，你已经适应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灯宽：我是追求进步的，但别人不答应。铁炼完了，食堂又只能吃个小半饱，于是生产队就开会斗四类分子作为消遣，没时间没章法，想起就斗。中国这么大，可有户口管着，没地方逃。每次被打得无缝可钻时，我就记起古寺的一段掌故：朱元璋的重孙，明朝的建文帝推行削藩，四太子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由，发动了长达四年的皇位争夺战，结果朱棣夺位登基，成为明成祖，国号“永乐”。而失势的建文帝却转眼失踪，数年后，摇身变为这凤栖山中古寺的和尚。

又过了数年，明成祖派出的东厂特务暗访出废帝下落，火速回报。可就在其下手前夜，建文帝再次失踪，只在其禅房墙壁留下一首诗：“沦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河无声水自流。常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气收；青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东厂特务把壁上遗诗抄下，回禀明成祖；成祖吟罢，不禁潸然泪下，随之挥挥袍袖道：“任他去吧。”于是东厂停止了追杀。

老威：可叹可叹。

灯宽：明朝苛政严刑，东厂和锦衣卫遍及天下，可废帝仍能乘乱藏身于古寺；而如今，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和尚，却想躲也躲不开，孽报嘛。

老威：共产教就是要灭佛灭心，灭一切宗教。

灯宽：灭佛？不可能。谁也做不到。因为佛是水，是空气，是善，是忍让，是人的慧根，国灭了，佛也灭不了。否则我灯宽活不了这么长。

老威：是么？

灯宽：有个姓汪的贫农老太婆，就住在这半山腰，她接济了我好几年。我是敌人，她不敢公开接近，就在地边或田坎假装歇气，用镰刀敲几下，这样，正埋头种地的我就晓得啥意思了。她前脚走，我后脚就扑过去，抓起留在那儿的包谷馍馍就啃。那是60年正月，生产队已经饿死人了，她却从牙缝里抠下口粮给我，观音菩萨显身嘛。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念经超度汪婆婆。到了61年，四类分子饿死大半，政府干脆将我遣返，隔房侄儿接我回原籍崇庆县锦江公社，名义上是还俗了，可每日仍不忘着僧衣打坐、念佛。如此虚度似水光阴，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干农活、受改造，做没有庙的野和尚，不料山水一转到了1978年，就有个外乡人跑来对我说，宗教政策已经恢复，可以公开信佛了。

虽然半信半疑，但眼前刹那亮了一道光，这是佛祖在开悟我了。白天不敢露声色，因为阶级斗争还在搞，生产队一旦晓得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肯定又要开批斗会。只好半夜三更爬起床，把脑壳伸出门打探一番，才上路。我跑一阵，走一阵，一百多里，第二天中午就到成都。直接投文殊院，里面已聚了几十位破落和

尚，都是川西坝子各寺各庙的方丈、主持，各自提起九死一生的“农禅”改造经历，唏嘘不已。

我在文殊院住了几年，任金刚上士，主持佛事。由于放焰口（超度灵魂）的本事过硬，在信徒中逐渐有了感召力。1984年阴历7月15，我被迎回光严禅院，重继香火，山上山下，聚了一万多人，鞭炮响了一阵又一阵，那炮烟像雾一样罩住古寺，久久不散；更有唢呐、锣鼓助兴，真比过节还要隆重热闹。

老威：这一年，您已经84岁，算一位能洞穿世相的高僧了，从辉煌的云烟中回首过去，您的得失如何？

灯宽：来不及想，因为我已风烛残年，而古寺处处残垣断壁，荒草凄凄，连一间不漏雨的屋都没有。我和师弟灯可领着几十和尚、居士，三个人挤一张床，或者就铺油布睡地下，蛇和耗子经常钻进来，有弟子害怕，我就说：“耗子也冷嘛，让它拱进被窝睡。”我从小与耗子有缘，哪怕是脱了毛的老耗子，我也经常用心窝暖它，用我的饭碗喂它……唉，这辈子挨了几百次批斗，各种苦头都吃了，可人还在，慈悲心肠还在嘛……人还在有啥用？无力回天嘛。

老威：法师不必感叹，这千年古寺能恢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灯宽：施主你误解了。你这个年纪，当然不晓得原先古寺的规模。上古寺去过了吧？

老威：去过了。

灯宽：接引殿、韦陀庙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在燃灯殿上头，是历代祖师的塔林。塔林正中是悟空祖师——明太祖朱元璋的幺叔，他早年就看空红尘，虔心向佛；在永乐皇帝登基，废帝朱允文潜逃以后，他从印度、西藏云游至此，豁然开朗，遂剃度出家，法号“法仁”，赐号“悟空”。由于法仁住持的密宗修行博大精深，

在他成正果、盘膝圆寂后，肉身被供入“悟空灵塔”，历 550 余年，不朽不坏，为光严禅院之头号镇寺佛宝。

老威：我在悟空灵塔前至少站了一刻钟，神龛是空的，塔身颓败，连两边的对联都模糊了。

灯宽：两边的对联是“从今日回头大悟，是浮云过眼皆空”，联隐“悟空”。土改时，村上的民兵连长率领一彪人马进庙破除迷信，从下古寺砸到上古寺，最后来到灵塔前。民兵连长举起日本三八枪刺刀，喊了一声杀，照准悟空祖师的肉身捅过去。这中了邪魔的可怜的人连戳了几十下，肉身就烂了。一伙人糟蹋够了，留下满地零碎在塔前就走，到了下午，当他们押着和尚去“胜利成果”跟前受教育时，肉身早风化成一滩水，浸入了地里，一些干干净净的碎白骨摆在哪儿。我强忍着眼泪，在下半夜上山，收拾祖师的遗骨。据说祖师有西藏人的血统，身材高大，骨头比普通入长得多，旧社会，当地人都称他的肉身为“蛮娘娘”。我心痛，但不能说，只能偷偷用青篾筐把遗骨一点不漏地装好，没法藏，就花了很大力气吊在观音殿的梁上，以为万无一失。

不料到了文革，天下都在造反，破四旧，古寺的大雄宝殿、观音殿、财神、韦陀、接引、燃灯诸庙，全遭毁坏。由于悟空和尚主持本寺，他的侄孙——明朝永乐皇帝敕封了诸多佛宝，其中包括《洪武南藏》孤本经书一部，共 678 函，7000 多卷，总重量有三吨多；皇锅一对，永乐帝亲赐，为生铁铸造，高约 1.65 米，直径为 2.1 米，可供 2000 余和尚吃饭，此皇器只在传戒或重大佛事活动时使用；半副鸾驾，为皇后、王爷出宫时开道的标志之物；龙凤旗，帝、后出宫的开道之物；琉璃瓦大殿 5 座；明太祖朱元璋的御书“纯正不曲”等等。

老威：都毁了？！

灯宽：除了《洪武南藏》被崇庆第一任县长姚体信组织人马，

在解放初期运到成都保存外，其它都难逃劫数。生铁皇锅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砸烂，送去回炉了，皇锅太大太厚，砸它时，一窝蜂上来几十个壮劳力，在灶台上下，抡起二锤，像开山打石头，那一阵阵回响，隔几座山都能听见。

要炼化这些古铁，不容易，满山遍野的人，把树砍运回来，烧成炭，才能炼钢铁，因为炭火的温度比柴火高几百度。这周围的古林子，从小陪我念经学佛，都是些名贵树种，银杏、楠木、红豆木、古柏、古杉等等，近千亩，都砍的砍，伐的伐，弄来炼铁。现在你能看见的那棵千年古楠，就因为长在峭壁上，人够不着，才没砍成。来的人都夸它漂亮，千载难遇，却不晓得在寺中七棵三人合抱的古楠中，它是最丑最不成材的。

接着是文革，连摆摆样子的和尚都不准存在了。观音殿被拆，我吊在正梁上的祖师遗骨自然摔下来，失踪了。有一次，我跑回来躲在山上，远远望见几座琉璃瓦盖的殿顶，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啥子“战斗队”的红旗在迎风飘扬，那些人排排坐着，一脚一脚朝下蹬瓦。还唱歌，仿佛那些皇帝亲赐的几百年古瓦的破碎声在伴奏，令他们越蹬越高兴。

瓦蹬空了，殿顶就亮了出来，人们又坠下地砸佛像，用绳子套住大雄宝殿的柱子，一根接一根地拉。几十百把人，喊着号子，舞着小红旗，一起使劲，从上午拉到天黑，把8根柱子都拉垮了，摔在台阶上，断成好几节。这些石柱都是古迹，现在都摆在山上，柱身有各朝各代名家题的楹联，最晚的是四川第一代督军尹昌衡的对联，看以后能不能恢复。

柱子倒了，大雄宝殿轰地塌下来……我再也看不下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还有数不尽的鸾驾、御书、楹联、佛偈、诗词都没了。上古寺整个没了，下古寺只剩些残墙断壁。直到84年以后，才靠上万皈依弟子出钱出力，重塑菩萨，建庙宇，一点点恢复，

总算成了些气候。据说恢复半座古寺也要 2000 多万。

老威：您肯定能功德圆满。

灯宽：众人添柴火焰高，寺里功德碑上，已添了几千名字，都捐 100 元以上，有个当公司老板的居士，为请接引殿的玉佛，捐资 30 万。其它收入，如香火钱、茶点钱、长明灯钱也过得去。

老威：和尚纳税么？

灯宽：如果是正常的税收，古寺也给得起，可世风日下，大小贪官都想到和尚脑壳上拔毛。我们归宗教局管，而宗教局又是统战部的下属，这些当官的，看见别的部门生财有道，早就眼红了，你不上供，他就威胁要开除你的和尚资格，甚至卖掉庙子。不少规模小的寺庙，就被他们以十几万的价格承包给私人。

老威：您是百岁高僧，他们未必敢到您头上拔毛。

灯宽：无神论者啥都敢。告诉你，连统战部的轿车，都是和尚出钱买的，一个庙至少捐 5000 以上。有一次，县宗教局长驾到，我亲自把他请到客堂，奉上茶点，不料他把门一关，就跟我拍桌子，指头都戳拢鼻子尖了。他吼：“你马上给我拿 10 万元出来修路！”我心里明白，修公路的钱国家早已拨了 200 万，被他们分掉大头，如今添不满亏空，只好打和尚的主意。

老威：你可以告他。

灯宽：出家人慈悲忍让为本。我只好先答应说：“等化到缘再说。”他立马命令：“给个期限！”我说：“今天化齐今天给，明天化齐明天给，永远化齐就永远给。”局长一听，下不来台，就要日我妈，结果惊动了门外的几十个居士，他们冲进来，和局长对骂，赶他走。罪过罪过。

其实，只要贪官胃口不是太大，我都会满足，比如一伙人到寺里打麻将，输了钱，就找我老和尚借，两百嫌少，起码 500，或者 800、1000，借了就借了，从不提还。闹得乌烟瘴气，临走

前还对我双手合十，念声“阿弥陀佛”。唉，罢了，宗教局管佛庙、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一手遮天，局长就自称是“所有神仙的父母官。”

老威：岂有此理！

灯宽：历朝历代，官再贪，皇帝再昏，也没听说要在和尚脑壳上拔毛。

老威：我也是头次听说。

灯宽：所以除掉寺里的各项开支，到底能拿多少钱去重建庙子，我实在没数，唉，随缘吧。

老威：只能随缘了。

灯宽：施主是有心人，我送你一张悟空祖师肉身照片。拍这张像的人法名“续空”，家住山脚古镇街子场。40年代，他扛着街子场的第一台箱式镁光相机去灵塔拍回这张法照，立即轰动一时。以后，他把法照当作通行证，经打箭炉（康定）入藏区，往来多次贩买鸦片烟，均畅通无阻。因为藏民笃信佛教，尤其崇拜密宗高僧，一见照片，立即五体投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断有人追查，审他，打他，吊他，一关黑屋就是好多年，可他宁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直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才让家人去锦江公社找“师父”。待我气喘喘地赶到，他瞪着眼，就是不落那口气。直到我捏住他的手，叫声“续空”，他的泪水才扑簌簌地下来。慢慢松开拳头，把那张包了许多层棉花和绒纸的小底片交给我，连师父也没喊一声就去了。孽缘呀。

老威：阿弥陀佛，愿这位摄影师的在天之灵安息。

灯宽：一转眼，连这张法照也有60多年了。

老威：但是上面的悟空祖师，面容慈祥，两耳垂肩，双目炯炯有神，超凡入圣。再添上这个摄影师的故事……这就是不朽。

灯宽：阿弥陀佛。

老威：阿弥陀佛。法师，这几个月，我进出了五趟，古寺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看了，恢复得不错，特别是您，称得上这方圆百里乃至川西平原的第一件佛宝。

灯宽：施主的玩笑开得过了。藏经楼看过了吧？

老威：外观看过了，白粉壁，稚朴的瓦盖，有些像唐代或日本京都的建筑风格。壁间“藏经楼”三个字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题，算古寺的一件上乘文物，从书法的风骨上，远远盖过朱元璋的“纯正不曲”和康熙帝的“光严禅院”两件御书。

灯宽：于右任先生是民国34年在青城山里，听佛门中人偶然提起《洪武南藏》孤本的下落，才兴致勃勃地赶到古寺的。他上藏经楼读了几天经，几乎足不出户。右任先生美髯齐胸，二目不怒而威，俨然一副大儒的风范，他应前任住持之邀，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写下“藏经楼”三个草字，口称“难得！难得！”在他之前，国民党省主席林森也坐滑竿来古寺检视过楼中《洪武南藏》。

老威：若蒙法师应允，我也想步后尘入楼拜拜经。

灯宽：如今经书已不存寺中。

老威：毁了？！

灯宽：阿弥陀佛。1951年初夏，崇庆县首任县长姚体信根据县志上的记载，亲临古寺，直奔藏经楼，出来就表示：在众僧人面临遣散，住持灯宽已在土改中划为大地主，遭受管制的无序情况下，寺中已无人力财力保存如此卷秩浩繁的国宝。姚县长是知识分子，他当即命令封闭藏经楼，将经书打包装箱，随之派人请省里的文物专家鉴定。那时无公路，县里就征召了上百挑夫，把这重达三吨的佛典一路担到成都，入省图书馆存放，至今已52年。

老威：幸好搬走了。

灯宽：这姚县长是护法金刚转世吧，一般当官的可没这种觉悟。《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

（1372）敕令刻造，至洪武 36 年（1403）完成。历时 31 年，共 1600 部，7000 余卷，有几百人参与了点校、分类、刻印和装帧，大功告成后却只印了两部。一部在永乐年间毁于金陵的一场火灾，而另一部，直到 1930 年，才被外界披露出来。古寺因悟空肉身和此经，一时名气远播，徒步来寺中求开眼界的文人骚客，源源不断。

老威：古寺条件简陋，如何保证这经书几百年不蛀不霉不变质呢？

灯宽：几百年来，每年翻晒一次，动员全庙和尚。我 7 岁出家，只要在庙中，就年年参加晒经。方法极原始，不能用手，只能用竹片，一页一页地翻，不能重，也不能漏。晒透后，再将防蛀的叶子烟夹在书中。这是寺里代代相传的礼拜仪轨，仅叶子烟就要耗几百斤。

老威：现在没有毁经灭佛的危险，可以把藏经请回来了。

灯宽：从前是镇寺之宝，而眼下是国宝，任何转移都要请示国务院。

老威：看一眼也不行？

灯宽：有管理制度，连我都无缘重温，但出过意外。彭县一个贼和尚，竟花 12 万买通省图书馆，把《洪武南藏》一次性盗版，偷运到海外，赚了大钱。为这事我和弟子们找过许多政府部门，包括省委办公厅，我一再声明藏经的传统主权在古寺，但没人耐烦听。

老威：我晓得省图书馆搬过几次家，那些管理人员既不信佛，又不会往书中夹烟叶，几十年没人翻晒的藏经命运到底如何，迷雾重重啊。

灯宽：万物皆有因果，罢了。

老威：虽说“罢了”，但法师您在这百余年的光阴中，似乎坡

坎多坦途少……这到底是谁造成的？恐怕不能单用“孽报”二字来了结吧？

灯宽：直到如今，我也不能说成了正果。佛法无边，我只能学，只能战战兢兢去接近那轮回之道。学佛就得戒嗔，戒怒，戒怨，把众生当作活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活佛，因为他们是皇上。历代皇上，有兴佛的，有灭佛的，还有逢佛杀佛的，何解？民国时期有个普钦法师，曾经在观音菩萨成道日晚上，割开胸脯肌肉，把灯芯草插进去，并用面团做成茶碗大的灯柱，灌满菜油，然后点燃。这就是所谓“燃心供佛”。在大雄宝殿内，火焰霍霍有声，窜高四尺许，直达佛晓。普钦法师被烧焦了，肺腑都裸露出来，却居然被抢救活了，康复如初；后来，普钦又发愿刺舌血书写《严华经》，刺了7年写了7年，终于大功告成；到最后，他干脆在大殿僧众的面前，燃指供佛，将左手无名指烧成灰烬。

老威：这是自虐。

灯宽：舍我供佛，与佛主舍身饲虎一脉相承。毛泽东在另一端，灭佛存佛，他不灭佛，现在会有这么多人信佛么？我当地主时，许多人打过我斗过我。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儿孙穷，念不起书，我就布施，拿钱供他们念书；病了，拿钱去看病。反正我的钱也是别人供奉的，留在手里就是祸，佛主要怪罪，但不会说。我与和尚们在斋堂，谁做错了，我心里清清楚楚，但我不会说，不会嗔和怨。

生从何来，死归何处；无名无处，去西方极乐，极乐又归何处？所以，众生也，父母也，打我斗争我，相当于父母教育我。

你打了，嗔了，怒了，疯狂了，佛报就落在你身上，你代我受了。比如那个民兵连长，用日本三八刺刀捅悟空祖师肉身，头一刀戳在胯根，几个月后，也就在胯根，在同一个地方，生了一

个大疮，奇臭，并且越烂越深。他求遍天下名医，没治，整个下身烂掉了，人也死得很难受。又过了几年，连长的老婆娃娃也接二连三地死，最后包括亲戚舅子都死光了，绝户了。

我听说连长一门几代都绝了，并不高兴。我怜悯，为他们念超生经——他们不绝，这孽报或许就落在我这儿。因为我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做过啥，我不清楚。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采访缘起：2002年6月28日下午，星期六，我与妻子搭长途客车去崇庆县回龙沟躲避酷热，黄昏在沟头红纸村某农家大院投宿时，认识了山野散步归来的郑大军先生。

郑老72岁，原籍河北，宽身板，亮嗓音。一望便知颇有来历。他是县团级离休干部，但目前已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当其回首几十年前，自己初涉仕途，任县委下乡工作组组长的历史，不禁悲从中来，几番欲潸然涕下，“大冤案啊，”他叹道，“饿死几千万人，可至今没个正式的交代。”

老威：老人家好逍遥！

郑大军：穿了一辈子制服，再不逍遥一点，黄土就埋齐脖子根了。告诉你年轻人，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十年，每年都要来这回龙沟，找一农家乐（接待外来客的农家院子，包吃住，月费约450元人民币——老威注），避暑几个月，连世界观都住变了。

老威：除了党报，现在可没人在乎世界观了。您以前做啥工作？

郑大军：48年参军打老蒋，50年转业到地方，搞土改，学文化，从此步入仕途。算啦，提这些老皇历没意思，而今无官无职一身轻，正好为自己活两天。

老威：率性而为？难得难得。

郑大军：年轻人，你的马屁拍得肤浅，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能“率性而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千万共产党员

中也只有一个彭德怀“率性而为”，上书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为人民鼓而呼”，其下场如何？相比之下，我这种多如牛毛的县团级芝麻官算个屁。

老威：您算个屁，我就只能算个跟屁虫，嘿嘿，扯个笑话。老人家，彭德怀的冤案早已昭雪，而今，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不是天灾是人祸，已不再属于国家机密……

郑大军：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老威：我是 1958 年大跃进出生的，60 年春天饿出水肿病，差点都没命了。您当时呢？

郑大军：58 年我 26 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当时，反右斗争刚刚结束，中苏关系即将破裂，毛主席、党中央认识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初、高级社会主义过渡。形势逼人，共产风在上下一心的运动激情中越刮越猛，终于不可收拾。放卫星成为时代潮流，各行各业，钢铁卫星，轰麻雀、拍苍蝇的除四害卫星，诗歌卫星，犹为恐怖的是粮食卫星。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在造假方面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比如上面一推广“合理密植”创高产，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们因怕戴“保守落后”的帽子，竟当着参观团的面，把秧苗像开大会一般热热闹闹地密插。小麦、玉米也如法炮制，结果青苗倒满眼绿，就是季节到了不抽穗、灌浆。那时候，只要敢吹牛，一不小心就上报纸，还配大幅图片，紧接着，各级检查参观团如潮水般涌来，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亩产上万、几万”的示范田，赞不绝口。所谓示范田就是把山上沟边的几十亩水稻连夜

抢收，并移植到大路旁的一亩田内，那光景真是密不透风，记者把娃娃抱上去拍照，谷穗竟纹丝不动。

58年秋，“钢铁元帅”升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达到白热化。男女老幼都上山，不是秋收，而是砍树、捡矿石。当地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铁矿，乱捡回来的黑石头，与挨门挨户搜缴的锅碗瓢盆，甚至锅铲、火钳、门扣、门环一起投入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没日没夜地架柴禾狂熬一气，最终炼出了嵌着些碎矿石块的废铁疙瘩。造孽呵，山砍秃了，庄稼烂了，颗粒无收，连苞谷杆也被秋雨给泡垮了。面对冬天，发高烧的社员们冷下来，日子没法过了。

老威：往年存的余粮呢？

郑大军：大办公食堂时征用了，一平二调嘛。

老威：一平二调？

郑大军：就是以公社为单位，实行全面的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任何财产，为彻底铲除私有制，走向人类大同铺平道路。说得简单些，就是一切归集体。每家的灶台都拆了，碗筷也上缴了，因为有了公共食堂，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小家庭就不用开伙，否则违法。猪、羊、鸡、鸭统统进了集体的笼圈，有的社员甚至从家徒四壁中搬出来，住集体茅棚，好让人民政府放心。

开头几天食堂还挺红火，大锅饭嘛。我们工作组一进食堂门，大伙就全体起立，放下饭碗鼓掌，并齐唱“社会主义好”。我问：“伙食好么？”大伙回答：“好！”我又问：“吃得饱么？”大伙更响亮地回答：“饱！”此时，有个豁嘴老头还出场打了一段赞美快板，大意是从今以后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共产党端碗了。

我们在大队党支书的陪同下检查了厨房和每张饭桌，红苕稀饭敞开供应，玉米窝头在笼屉里堆成小山。我惊讶地问：“这也

敞开吃？”支书回答：“无论大人、娃儿，每人限吃四个。”我说：“这窝头足有三两吧？小孩没撑着？”支书说：“农村娃儿撑不着，蹦两蹦肚子就瘪了。”我厉声批评说：“要有计划，不能浪费！”支书连连称是。

由于准吃不准揣，农民们顿顿死撑，稀饭锅里的红苕没人舀，窝头皮满地扔。大队干部五、六人簇拥着我们进小饭厅，桌子上已摆好两脸盆红烧肥肠和回锅肉。我问：“这是咋回事？”支书答：“前天公社批准杀猪，经支部研究决定，留了些下来慰问工作组，这也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我和其他同志都拒绝搞特殊化，命令把肥肠和肉加菜烩了一锅，在晚餐时按人头分给社员。

那年头，我们常下乡，对农村干部的阳奉阴违深有体会，但时代风气如此，谁不识时务，就要犯错误，所以没人对公共食堂的浪费现象提出异议。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老威注），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椿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

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九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砰砰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

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 82 户 491 口，仅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 7 岁以下的女童 48 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

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 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度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

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

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屙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扑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

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3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噉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

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老威：人命关天，居然敢不上报？

郑大军：我们当年审讯王解放时，也这样问，连口吻都一样。可他反问：上报了又能咋样？国家都那么困难。

老威：还忧国忧民呢。

郑大军：我说上报了就能刹住吃人歪风，人民政府再困难，也会发放救济粮。王解放说：我们队已经领过救济粮了，一户人70斤陈谷子，管一年，牙缝都不够塞。

老威：我在图书馆查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些原始材料，的确艰苦，连毛主席都穿打补丁的衣裳，自己在屋前开地种菜；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去郊外拣野果，琢磨饥荒中的粮食替用品。中央领导们都纷纷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郑大军：这些报道我都清楚。我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头上，他一直瞒着中央，搞统购统销，都饿死人了还搞，还吹嘘风调雨顺，粮食吃不完，能调拨多少多少援助兄弟省。罢了，扯远了，总之那年头人命如草，不仅会计王解放，连吃人生产队的队长也抱我们的腿，痛哭流涕。

老威：干部也吃人？

郑大军：“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

一滩血浆了。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名字和作者都忘了，谈到三年大饥荒中，某地发生过贫下中农围剿地主和富农，当场宰杀，放入露天大锅内煮熟分肉的事，那欢欣鼓舞的场面，令人久久难忘。您经历过类似的“阶级斗争”惨剧么？

郑大军：没有，并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得已而吃人的主要原因是饥饿，而不是阶级斗争。土改伊始，剥削阶级在历次运动中都受打击，吃人并不光彩，哪怕吃坏蛋，也只能偷偷摸摸，让人民政府晓得了，一定会追查到底。

老威：您是工作组长，政策水平高，但您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水平。

郑大军：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

老威：那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郑大军：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老威：后来呢？

郑大军：啥子后来？

老威：饥荒还在继续么？

郑大军：一直到62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

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草、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搅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老威：您们真是些廉洁的好干部啊。

郑大军：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61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它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老威：您们咋处理新一轮的吃人案件？

郑大军：这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

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

老威：啥子意思？

郑大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样子。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刍，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

老威：真是命贱如蚁。

郑大军：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上访诗人老陆

采访缘起：2002 年春节后的某天中午，有个陌生人来电话，自称“上访专业户”老陆，并受我的记者朋友老张的引荐，想找“老威”谈谈。由于怕国家有关部门设陷阱，我十分客气地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后，就借故推脱了。

接着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陌生电话，逼得我急匆匆找老张核实。“无误，”老张说。“人家可是上访名人，曾两次告赢地方公安局，一度成为‘民告官’的热点。”我说：“报纸上热过的东西我不感兴趣。”老张说：“你还有不感兴趣的东西么，同志？”

一时语塞，我只好转头去拜访老陆，接着又拜访了几次，拎回一蛇皮口袋上访材料。老陆最先住四川省高级法院后墙陋巷内的一家下等旅馆，这是省内上访者聚集地，每晚收费 10 元，条件极差；而最近一次——2002 年 8 月 1 日我与他联系见面时，此人已干脆沦为露宿街头告地状的乞丐诗人矣。

可敬可叹的是，老陆仍旧长发披肩，举手头足，豪迈之情溢于言表。“陆某某，37 岁，四川蓬安人，”他作罗圈揖，朗声告白道，“我给大家当场作诗一首。”

老威：这段日子跑哪儿去了，老陆？我到你原来的住处找了好几次，都说你搬家了。

老陆：我被收容了，5 月 18 日进去，昨天刚出来。本来打算上京，火车才拢广元就被查获了。听说中央下了死命令，严防死

守，不准法轮功和我们这类人出川。半夜1点钟，几十号牛鬼蛇神被押拢，黑压压一片。我背着铺盖卷，一点不在乎，反正作为长期的上访专业户，一年要进局子报几回到，让政府的脸面添些光彩，让警察的腰包添几两贿银，才算给社会作了贡献。

老威：此话咋讲？

老陆：现在开放了，表面上不像毛主席时代那样搞政治运动了，其实暗地里，运动一个接一个：扫黄打非，清理外来人口，整顿市容，严打，年复一年，运动名目越搞越多。收容所的生意好惨了，平时，关百把人，运动一来，百把人的空间就像发洪水，一夜就能涨到七、八百口，比猪笼子还挤。赌、嫖、非法同居、没办暂住证的民工、小偷小摸、沿街叫花、占道经营、下岗闹事、抗拒城管，等等，真是五湖四海，五花八门。特别是大热天，大伙肉贴肉，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直冒人油。屎尿没法屙，也不见人屙，我估计是汗出得多，蒸发了。老哥你想，一入这鬼门关，谁撑得下去？可你急警察不急，先熬你一天半晌，才慢吞吞地露面，像训兽员一般隔着铁栅栏，一个个核对名字。里面的人炸锅了，拼命伸手朝外递纸条，上写亲人好友的电话和地址，哀求警察尽早联系，好带罚款来保释自己。嫖和赌的，罚得快走得快，因为沾这两样的家伙经济都宽裕，警察张口要几万，都拿得出。一般人至少罚500元，底价400元，我这等吃百家饭的穷人，也必须交够底价。没人保释？对不起，你就一月两月地坐吧，过了三个月，再用闷罐车将你遣返回乡。他妈的，这和土匪绑票有啥区别？抓人换钱嘛。

老威：你没犯法呀。

老陆：我上诉上访几百次，不认输，这就犯法了。我还喜欢写诗刺激政府，是上访这堆人中名气很大的诗人，这就更犯法了。

老威：你是诗人？真没想到，我在这儿还碰见一个同行。老

陆，你的作品发表在哪儿？也让我拜读拜读。

老陆：我的诗经常发表在大街上，有时也自己印成传单，到处张贴，我还给省高院、全国高院、人大、国务院信访办、《民主与法制》，以及一些报刊投寄过。今天早上，我在省高院大门发表了一副对联，挨了几枪托，差点又被抓了。我念一遍：上访户，排排站，盼青天老爷击鼓申冤；人财尽，一场空，这高级法院是猴戏院。横批是：来一个耍一个。

老威：不错，请再背诵一首你的代表作。

老陆：我送给你一份诗稿，我念，你看，这样也可以替我纠正错别字。我只有小学文化，靠着这8年官司，写上诉，翻字典，也算得到了锻炼。后来倾家荡产，沿街乞讨，就试着把心里的想法编成诗，写在地上，过路人读着新奇，就有了社会效应。

老威：你这头一句就有两个错别字，政府不是“正腐”。

老陆：没错，政府就是“正在腐败”的意思，还有法院滑头，所以叫“猾院”。

老威：原来如此！老陆，高明呀。

老陆：我献丑了——当今正腐真是好，舞台清官个个高，冤民血泪谁知晓，活该坐牢官难告。铁脚磨穿走京城，沿街乞讨来维生，客官问我何原因，官官相护路难行，人民猾院缺人性，五年六审搞不清。如今清官哪去找？繁荣娼盛是正道。宋朝奸臣包公斩，今朝贪官谁来管？婊子牌坊给人看，百姓头上三座山。有道是，贪官不怕烧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拿按摩浑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有道是，舞台包公比天高，毕竟宋朝过去了，今朝冤狱管不了，饥寒交迫命难保。替人擦鞋为求生，城管撵得到处逃，哀告求援为治病，凄风苦雨讨不成。巡夜恶犬来咬我，身上心上有伤痕，捡张报纸当被盖，没脸回家见乡亲。光

棍汉，一个人，无国无家无双亲，申冤申到黄泉路，见了老毛和老邓，毛邓变鬼叹口气，平反要找江泽民，学好“三讲”讨公道，花钱买通看门人。绕来绕去还是钱，所以敬告好心人，施舍在下钱几文，有钱保命讨公道，无钱都市做冤魂。善心做了善事情，子子孙孙保太平。

老威：好，比很多正儿八经的诗人写得好。老陆，可惜你的文化低了些，否则这个时代的杜甫就是你了。

老陆：你莫挖苦我。

老威：这类诗适合用你的家乡方言念。再来一首咋样？

老陆：刚才的调子太低沉，我弄首好耍的活跃气氛——上级领导来开会，“三个代表”天天背，忙了公事忙酒会，水平越高越开胃，只有上司说酒话，下属工作才到位，人民不醉公仆醉，喝空国库无所谓。醉鬼才好打醉拳，违法乱纪乱收费。假如胃肠出了血，医院里头来相会，革命同志不后悔，舍命为了本单位，有人乘机来送礼，你吹我拍为了谁？二奶三奶加三陪，齐心协力花公费，利益均沾官官有，百姓哪个敢反对——判他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罪。

老威：你写过多少诗？

老陆：记不清，有些东西，一时冲动就写，过了就忘了。但记在本上或心中有数的总有几百首吧。去年我在北京上访，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当地歹徒毒打，造成脑震荡，经常头晕、呕吐，记忆力不如以前了。也可能是止痛片吃多了，记忆神经麻痹。我得抓紧写，否则将来成白痴就惨了。

老威：至少目前还没这种迹象。老陆，讲讲你是如何成为上访专业户的，也好替你的诗作个人生注脚。

老陆：关于我状告本地公安局胜诉的事，全国各地媒体都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报道，大概经过是这样：1996年5月16号，我

在本组清理阴沟时，发现了蓬安县烟厂几年前因改道而废弃不用的大半截锈水管，就捡回家。此时有过路人对我说，前面不远的荆棘丛中还有些废水管，可以挖出来卖钱。19日上午，我拖了辆板车去挖水管，由于是废弃多年的破烂，开挖过程没人干扰。可当天下午，自来水公司以“失主身份”找到我，要求退回所挖水管，因所有权的争议，他们又改口要钱，并承诺只要给钱就可以长期照顾我的废品收购生意。

第二天，我主动到自来水公司业务科，与科长老熊达成付钱60元挖废水管的口头协议。5月23号，我刚挖出半根水管，业务科就迫不及待派人追钱。明明说好卖了废品再付，况且我身上没一文钱。这就惹毛了他们，说好话也不顶用，他们马上以失主身份去派出所报案。

我被抓进派出所，家也抄了，发现了“与我身份不符的赃物”：破自行车四辆，电动机两台，烟丝筒、排风扇等等，统统没收。当时正“严打”，我成了有重大盗窃嫌疑的典型，当日的本地电视新闻这样播的：“自三月以来，陆××趁夜深人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大肆盗窃……”

我被收审了20多天，由于“死不认罪”，被反铐，被拳打脚踢，更恐怖的是为两名死刑犯陪杀场。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朝我扔石块，吐唾沫。我叫了声冤枉，武警就把我踩跪下去，并且同死刑犯一道，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毙人时，我也跪在旁边，脑壳随枪响一开瓢，我就吓晕了。

6月14日，由于没查出任何真凭实据，我这个县城里赫赫有名的贼被解除收审，无罪释放。回到家中，所有的财产都被村里强制没收、变卖，我一下子成了自己家门口的流浪汉，悲愤之下，为了洗清贼名，我向法院起诉公安局并索赔。

两次都败诉了，派出所所长还上门威胁我：“你再告，看老子

今后收拾你。”既然地头蛇放了话，我只好连夜收拾行李，上省城申诉。由于“民告官”具有新闻效应，所以全国多家媒体都找我采访，进行报道，终于惊动省高院。1998年元月12日，南充中院按照高院旨意重审此案，我胜诉了。可3月26日，公安局竟答复我“不予赔偿”！

没办法，我只好再次起诉，要求公安局赔偿关押23天的误工损失、家庭财产损失、名誉损失共计几万元，我有自己做人的标准，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漫天要价。7月15日，我再次胜诉，得到5662.35元的赔偿。这与我的实际损失相差太大，况且几年官司下来，我已欠债8万余元。

我再次上诉上访，跑成都，跑北京，成了一个打赢了官司的乞丐，一个上访专业户。我一度靠擦皮鞋为生，在擦鞋的同时，向群众背诗，诉说冤情和对社会的看法，但鞋箱一次次被城管和巡警没收。后来，我没钱买谋生工具了，就写诗告地状，每天乞讨20个小时，借以糊口和交上诉费。有一次，我病倒在大街上，两个110巡警赶来，竟把我当盲流暴打一顿……

老威：你这种饱一顿，饿一顿的上访何时有个头呢？说不定哪天就倒毙街头了。老陆哇，我看你还是回家种地算了。

老陆：你读书读呆了吧？而今不是古代，你想种地就种地？我妈改嫁过两次，79年，我才14岁，就因不堪忍受继父的歧视而离家出走了，我还被人贩子卖到了河南，后来四处流浪打工，早成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了。就这命，在哪儿都生不了根。以前还有成家立业的想法，现在，啥都显得渺茫。只有上访能提神，能使我活得像个人样。我已经穷惯了，欠债欠惯了，这辈子，怕是还不清，所以经济赔偿倒是其次，我的第一要求是：公安局必须在县、市、省三级电视台上，20天以内以循环滚动播出的新闻方式，公开向陆某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

响。

老威：这可能么？

老陆：不可能，我就耗下去。大不了——一进牢门心惊肉跳，二人同行一副手铐，三顿糙饭准时送到，四季衣裳只有一套，五花大绑陪了杀场，六亲不认闭目修道，七根钢筋把天分割，八条监规条条霸道，九肉没有口水滴哒，时辰一到该你报销。

老威：又吟诗了。

老陆：狗屁国法早失灵，腐败官僚已成精，天公若有分身术，化作万千江泽民，一个单位派几名，双手倒提机关炮——共产共惨党员们，哪个还敢起贪心？

老威：你真是出口成章。

老陆：活鸡活鸭活王八，好烟好酒好贡茶，请来请去请公仆，吃垮私家吃公家，不怕报应就怕罢，乌龟王八是一家，只有人民输定了，因为官帽比法大。

老威：打住吧，老陆，别激动过头了。

老陆：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吟诗到世界末日，激动有啥不对？脑溢血死了还痛快些。下面一首是……

老威：我们换个话题。让我看看你这条蛇皮口袋，装的都是上访材料么？

老陆：你不想听诗了？

老威：实话告诉你，我 80 年代也写诗，发表过不少，后来因诗惹祸，进了监狱。我已经十来年没沾诗，没和过去的诗友交往了，没料到，今天不小心听了这么多好诗，一时消化不了。

老陆：你太谦虚了。其实我的蛇皮口袋有好几条，随身带着，除了上访材料，就是诗，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替自己写，也替别人写。由于我是民告官的赢家，所以许多有冤屈的上访者找到我，咨询法律，联系媒体，求写申诉状。我的生活规律是：白天

乞讨时凭灵感编诗，晚上接待上访者，并熬夜写材料，我瞌睡少，实在累了就身体一歪，闭闭眼睛。当然，每月一次的高院院长接待日不能错过，那天半夜就得起身，赶去排队，几百人的长龙，去晚了，连领导的面都见不着。忙啊，累啊。你是文人，能不能帮我分担一些？

老威：怎么个分担法？

老陆：这只口袋你提去，里面有四、五个人的申诉材料，你分类整理，凭着良心拉他们一把。这个杨继年，11岁就判刑坐牢，恐怕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劳改犯。他被关了34年，释放回乡时，竟又被当地踢回监狱。监狱当然不能再收留，他去哪儿呢？无家无地无任何亲属的孤人！我第一次遇见他流落成都街头，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充饥时，就心酸落泪了，我带着他乞讨，上访，去北京。他的冤屈比我深，所以写东西比我勤，都堆成山了。可惜去年在北京，他遭遇了一场火灾，身体大面积烧伤，被抛在街头。我赶过去，与几个好心人一道，送他进陆军总医院，没钱，医院只作了简单的处理，就放弃抢救。我在守护他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毒打，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乘我昏迷，杨继年被弄出医院，终因溃疡感染，不治身亡。他全部遗物都在这儿，一个人惨到这地步，你不会没有一点感想吧？我准备在他的老家为他立个碑，刻一首祭诗在上面，也算对这个申诉了700多次的冤魂的安慰。

老威：这需要多少钱？

老陆：起码500以上。当地让不让立碑也是问题，他同我一样，是个被冤枉的贼。世人只习惯给革命英雄、名流、大官、德高望众的长老竖碑立传，给贼立诗碑就过分了——这算我许给死者的一个遥远的愿。

老威：我和我的朋友老张都访问过杨继年，我会尽力去写他。

老陆：还有个比杨继年更惨的，叫胡显林，1957年，他家喂养的一头黄沙耕牛因病死亡，被当地县法院以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口袋里，有他的亲属提供的原判材料。你猜都猜不到，这个姓胡的自逮捕之日起，就失踪了！他的家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和申诉，要求依法探监，可公、检、法三家都说不清犯人的下落，档案内既无解往何处劳改的记录，更无逃跑或意外死亡的记录。

这有点像侦探小说了，可不相信“失踪”的家人们终于上访到北京，惊动了某位政府要人。1986年10月20日，原判法院以（1986）蓬刑监字第169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胡显林无罪，可无罪的大活人早已蒸发掉了！

老威：哪有这等怪事！当年承办此案的人呢？

老陆：都健在。

老威：找他们要去。

老陆：50年代错判误判的多了，没人能回忆起来。一位法官说，我们一年成百上千地判，累瘫了，也忙不过来，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大形势逼人嘛。公安局也曾几次发函给看守所，让协助查询胡某去向，均无结果。

老威：蒸发一个大活人索赔多少呢？

老陆：当时只有关人毙人的国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一分钱不给。

老威：那“宣告无罪”有啥意思呢？

老陆：心理安慰嘛，老百姓善良，政府承认整错了，也就算了。如果你想不开，提进一步的“无理”要求，政府的脸面就撑不住。就像我，虽然告官告赢了，但沦落街头，一屁股烂帐，可谓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为啥？就为了争这口气！

老威：有意思么？

老陆：有意思。每次进收容所，我的腰都挺得直直的，没偷没抢，就为了争气！我这条腿已被打残了，我只能拄着棍，慢慢走，前景不乐观。只要共惨党不垮，老百姓的前景都不乐观，但我这辈子活得不冤。从 50 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要弄死弄废多少人，加上饿死和自杀的，至少几千万上亿吧？大家都算了，只要新政府上台，宣布上一届政府的某些作法不对，大家就够满足了。只有我老陆，天生的犟牛，我就要你公安局以整我的方式公开消毒！全中国，就我这么个不起眼的破烂王，赢了两回官司还不放过他们。当然，如果几十年来这些被整、被冤、被杀、被饿的全学我，国库掏空也不够赔，推倒北京城也不解恨，所以老陆只能出一个。

老威：口气大啊。

老陆：口气不大，能做诗人么？我本想以失踪的胡显林为题，编一首长诗，但又觉为难。人没下落，碑都没法立。算了，我今后还是多关心没失踪的人。这儿有一份《冤民申诉》，上呈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省长、政法书记和主任，省高院院长，全国高院院长，在上面联署签名的一共 105 位，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状告四川省内 181 个法院、789 个法庭的司法腐败，办案不公，走后门，贪赃枉法，造成 10000 多起冤、假、错案，致使多位涉案人含冤而死。高院法官经常拖压申诉案件，有的甚至拖压长达十年，十几年。法官×××公开回答申诉人说：我们只有五个人，要看全川一万多起案卷，看不过来，就烧掉，你们有意见去省人大反映……

老威：这东西递上去有结果么？

老陆：结果就是好几个人又进了收容所，唉。

老威：你是上诉群体的社会活动家。

老陆：我的案子上下都清楚，就耗着嘛，多关心别人，眼界

就宽了，这也是诗人灵感的来源。正是——华夏古国谁乐土，贪官污吏大老鼠；民脂民膏搜刮尽，太平盛世冤民苦。初院中院又高院，法律游戏弯弯曲曲；露宿街头梦清官，惊醒方知警犬毒！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采访缘起：认识刘圣诗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正闹文学革命，狂人辈出，而她作为××主义诗派的当家女将，风华正茂，一张利嘴所向披靡。但后来，她舍弃诗歌，投身天主教，从此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红颜尽失。

我恍惚记得 89 年六四之后见过她一次，黑衣黑裙从墙根边闪出，吓我一跳。她说自己曾经去人民南路广场看望静坐示威的学生们，给饿晕的人灌糖水，“可怜极了，都是上帝的孩子啊。”

然后是 2001 年某个深秋下午，我与朋友在成都西门栅子巷的三一书店喝茶，天气晴朗，敞地上人很多，当黑衣黑裙的她又突然出现在跟前时，我都傻了。她压低声音说：“你有门路么，老威？”不等回答，她又说：“我在国内待不下去，我要逃跑。”

我打了个寒战，开始与她窃窃私语，不知为什么，她竟泣不成声了。同桌朋友诧异地盯我，好在进出三一书店的家不少，见怪不怪。

最近一次见面是 2002 年大年初三，我约她在××露天茶园传教，在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因为天天祷告，我平静了不少。”她说，接着不紧不慢地讲述了圣徒张神父的故事。

老威：三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没多久，你就失踪了，咋回事？我起码给你打过十来个传呼。

刘圣诗：你真顽强，老威。

老威：你比我更顽强。不过你是信教的人，应该讲信用。

刘圣诗：三言两语无法跟你解释清楚。

老威：那就算了，我们还是接着上回的话头继续吧？

刘圣诗：我忘记了，你先提个线索。

老威：我凭印象说说你的家庭履历——刘圣诗，祖籍河北，家庭成分革命干部。1950年底，其父作为一名师部宣传队长，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摧毁了旧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成都。大规模的本土战争结束，其父同许多浑身硝烟的军人一道转业，投入地方新政权的基本建设。受组织安排，其父参与遣散国民党所属之“三民主义共青团”，以共产党所属之“共产主义共青团”代之，并出任团市委秘书长。

刘母家庭成分工人，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认识了刘父，改造完资本家，作为纱厂女工中的首批党员，她与他在工作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爱及家庭关系。1960年春，刘圣诗呱呱坠地且茁壮成长，这太稀罕了，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饿鬼遍川，中华民族的婴儿出生率几乎下降为一千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刘圣诗：打住吧，老威，你适合干间谍，脑子和录音机一样，有用没用的乱录一大堆。不过，无意间你已提到了原罪，我与生俱来的原罪，我后来接受天主的安排，走上传播福音之路，大概也同我的家庭，我赎罪意识的苏醒有关。

老威：请继续讲。

刘圣诗：我是革命家庭的叛逆，与父母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一岁半就进托儿所、机关幼儿园，跟着接受填鸭式的共产教育，直至考上大学。我的父母热衷于工作，并把这种热情传染进家门，所以，他们与儿女的每次相聚都挺正式，像探监一般。后来他们

离休了，党连余热也不需要他们发挥了，他们突然感到作为一个人，这辈子活得多么贫乏，业余爱好没有，连家庭生活也不会过，七十多岁的老俩口，整天吵个没完，毫无理智，把对方当敌人来攻击。

老威：他们的信仰呢？

刘圣诗：信仰顶个屁，共产党开了张空头支票，把几辈人都耍疯了。现在许多老干部迷上了法轮功，九条牛拖不回头，其原因就是心灰意冷，早年投入了青春、热血的支票缥缈得永远兑不了现。我父亲一提起江泽民就破口大骂，他们那批革命老人还在暗中串联，约定×年×月×日×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师，着军装，戴勋章静坐，抗议现政权背叛革命传统，把军区和政府都骇坏了。前一晌天天派人上门慰问、做工作，父亲犟着脖子与他们辩论，总算英雄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老威：你们父女都成了政府的敌人。

刘圣诗：我错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洗时，我请求张神父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因为我在 80 年代写过现代诗，算颇有名气的××主义诗人。我结过婚，走过相当长的弯路，命运才开始出现转机，引领我找到了主。

老威：我与你的原夫是朋友。

刘圣诗：我晓得。我们住轮回巷时，你曾经来过。你忘了，我们还一起尝试过潜意识写作？灌得烂醉之后，就打开录音机，一伙人硬撑着，你来我往地胡言乱语，以为这样能诞生“杰出的诗歌”，结果就一句“酒里的红狼滴着口水”算过得去。到了 1986 年，诗歌流派最火时，我家里像客栈，一拨接一拨疯子进进出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购买，各种酒，各种熟菜，再后来，我就在一个深夜把自己关在厨房，开煤气自杀。

老威：为什么？

刘圣诗：这些男男女女的，竟然在我家里群交！×××也躺在他们中间，丑恶极了，这就是他们艺术的目的和境界！我气得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视幻听。唉，罢了，我不想再提这种事。

老威：好吧，回到信教的正题上。你是怎么找主的？

刘圣诗：六四之后，情绪极为消沉，与“诗人”们分道扬镳，与学校同事也没交流，于是我经常独自一人逛街。我既不化妆，也没购物习惯，只是无目的地乱逛。有个星期天上午，我路过走马街的天主教教堂，里面隐隐约约地传出歌声，出于好奇，我就穿过大门进去了。高而缥缈的教堂穹顶下，笼罩着大约几百人，整整齐齐地站着，跟随着台上的唱诗班吟诵圣歌，一曲终了，台角的管风琴就奏出下一曲的前奏，然后又是几百人的齐唱。我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嘴唇不出声地蠕动，突然感觉有只手肘轻轻碰我，我侧目一看，是旁边的一个老婆婆，沟壑密布，皱纹比千年老树还多，她冲我微笑，边唱边示意我挺胸抬头，大胆出声——我太惭愧了，30岁之前我从没听过圣歌！没接触过如此圣洁、美好的天堂之音！我摇头，眼里充满了泪水，老婆婆把她的歌单递给我，挺着干瘪的胸脯，特别卖力地唱，她已经只剩一颗门牙。整个教堂只属于耶和華，没杂念，没杂音，明亮，洁净，我永远铭记着首次望教时的圣诗：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上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一边流泪一边用心唱，仍不敢出声，怕影响了整体的和谐，那种感觉，就像迷途的孩子走上归途，我凝视着台上的十字架，架中挂着为人类受难的耶稣，我体内触电般涌起诗歌的激情，但是，我此刻已不是过去那个××主义诗人了。

老威：你描述的教堂我去过，门口似乎挂着“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的招牌。

刘圣诗：我不是冲招牌去的，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除了三自爱国会外，还有地下教会。望过教，我走出教堂，找到爱国会主席，一个矮个字神父，向他咨询信教问题，我问怎样入教？每个月有哪些活动？能不能购买《圣经》？神父却十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宣传了一番党的宗教政策和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爱国宗旨。我粗略了解点常识，就提到“梵蒂冈”，神父居然回答：“跟我们没关系。”然后又说：“你想入教，首先要持单位介绍信，经过会里审核，再报宗教管理局同意备案。”我觉得太离谱了，有些生气地说：“不是人人平等，信教自由么？”神父说：“当然自由，但手续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你先买本《圣经》回去看看、想想。”

我捧着《圣经》回家一翻，更加失望，原来是三自会编印的删节本，附页还有自办教会的组织结构：中共宗教局→三自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一级管一级，顶头上司还是共产党！一气之下，我就找回去退货，不料“主席”外出，我却在门口碰见白老师，她后来成为我的代母。

白老师对我说：“退什么货，这种伪劣产品，扔了！”然后把她的《旧约全书》送给我。白老师说：“如果您是上帝的孩子，

以后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啥子三自会，魔鬼！地狱！”

白老师引我到她家，那儿正在举行家庭弥撒，快近尾声了，白老师对大家介绍说：“来了一位受难的新姐妹，大家一起为她祈祷吧。”于是十多位姐妹一起默祷“通功玫瑰经”。从此，遇上厄运，我就念“玫瑰经”，并约定许多教内姐妹在同一时刻于不同的地点一起念，直到九天，叫“九日敬礼”，我们可以没有公开的教堂，我们的教堂是超越时空的，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是主的疆域。

老威：你现在还跟着代母么？

刘圣诗：没有。1993年复活节我在西北××县××村的地下教堂朝圣时受洗，由富有传奇色彩的张刚毅神父施洗。张刚毅神父，当年87岁，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老威：你的代母呢？

刘圣诗：被抓后，判了七年刑，罪名是从事非法的宗教活动。1993年，成都的家庭聚会被搅了几次，敕封的神父都关起来了，据说与梵蒂冈的“遥控”有关，说来话长，我还是先讲讲张神父的故事吧。

老威：为什么？

刘圣诗：他是影响了我一生一世的圣徒。

老威：我晓得的唯一一位天主教圣徒是龚品梅。1991秋天，我在监狱里学习《人民日报》，瞅见国际新闻版上有中共外交部的“严正声明”，抗议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宣布任命某某监狱的在押罪犯龚品梅为红衣主教。龚品梅50年代因传教被捕，关押了30多年，出狱不久就去世了。有人根据道听途说，还编了本《大墙内的红衣主教》，摆在地摊上卖。

刘圣诗：这几十年，由于国家的压制、迫害，以身殉教而鲜为人知的圣徒较多，所以前不久，梵蒂冈举行封圣，向天下广为

传扬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不幸死难的传教士。龚主教有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为“反面教材”，这点与许多人通过《人民日报》认识了张神父及××村相似。

话说 70 年代末，党报上刊登了一篇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通讯，以陕西××村为例，论证封建迷信的危害。文章用嘲讽的笔调叙述道：××村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人都染上了，于是坏人趁机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胡说是“不信上帝的结果”。×月×日夜半，在被铲平的外籍传教士的墓地原址，突然浮现出巨大光圈，圈内有手握十字架的圣像，于是，一位自称神父的劳改释放犯召集少数落后群众蛊惑说：“主最后一次行圣迹，使愚昧的人迷途知返，皈依耶和華，否则世界末日真要降临了。”这个所谓的神父还以“使徒彼得”自居，并带头喝脚下阴沟里蝇虫衍生、散发着阵阵恶臭的污水。转眼间污水变清，阴沟蔓延成哗哗流淌的小溪，得病的人闻讯纷纷前来瞻仰“圣迹”，取水治病，结果立刻就痊愈，身体比患病前还好。如此一来，污水变小溪的骗术被越传越神，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每天都吸引受骗群众涌进××村，可当记者也前往实地调查时，臭水沟还是臭水沟，什么“圣迹”也没发生。

文章借此告诫大家，要破除迷信，普及科学卫生常识，发现规模较大的传染病要及时向政府报告，通过医疗手段诊治；要警惕制造谣言的坏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张神父和××村就这样出名了，朝圣者手持党报，源源不断从省内省外赶来，直到 90 年代，张神父每年复活节仍要在当地教堂主持大弥撒。

老威：这算非法集会吧？张神父没被抓起来？

刘圣诗：他有些来历。大约在 1944 年，张神父作为神学院的特使，受派遣，在抗日烽火中穿越多重封锁线，从香港出境，绕道去梵蒂冈朝圣，报告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满世界都在打仗，所

以他颠沛流离了好几个月，才进入意大利边境。当时的意国是个大兵营，层层设卡，不管张神父如何乔装打扮，但中国人的黄面孔，人家一眼就能辨出。他被抓起来，投进靠近梵蒂冈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在走过场的简短审讯时，他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是传教士，不是战俘。”可人家回答：“你来自敌国，所以是战俘。”他争辩说：“除了撒旦，天主无敌国。”人家笑道：“目前战时状态，除了撒旦没别的，梵蒂冈已划为禁区。”

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墨索里尼政府临时构筑了多座战俘营。大墙、铁丝网、报警器加探照灯，一个中国传教士挤在上千名英美联军战俘中间，那情景有点像拍二战电影。张神父不久就出名了。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屈辱处境，整日吟诵《圣经》，全身心地为大伙祷告、服务。他陪伴伤兵，任劳任怨，还每周在监舍主持弥撒，祈祷上帝让战争结束，让战俘归乡。据说连墨索里尼也对“中国神父”产生了兴趣，接见了。他。总之，命运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被放出囚笼，成为整座战俘营的专职神父，主管在逆境中的人的灵魂问题。他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囚犯交谈，让其暂时摆脱可怕的现实，接近天堂，接近纯精神的快乐。最后，连守卫都信任他，尊敬他，有时还把监舍的钥匙交给他。

终于在一个雨夜，上帝的雷车轰隆隆地压过云层，张神父在闪电中打开了牢门，对战俘说：“你们是上帝的孩子，除了耶和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你们的自由！跟我来吧，逃出这人间地狱，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吧，众生平等，主与你们同在。”于是他率领战俘们依次缴了守卫的械，断掉电源，沿着事先勘查好的路线，成功越狱。

战俘们四散了，张神父换了一件当地妇女的袍裙，裹着花头巾，重新踏上朝圣之路。他终于越过边境进入梵蒂冈。通往罗马的列车早已停开，火车站一派萧条，张神父在封闭的铁轨上趴了

半个时辰，确定没巡逻军队，方一跃而起，冲过站外的开阔地带，从后门闪入圣彼得教堂。他躲在廊柱后张望，刚巧一位助祭进来，他就偷偷跟在身后，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助祭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张神父却猫着腰，气喘吁吁。教堂与西斯廷、图书馆、寝宫等连成一片，内部犹如迷宫，所以助祭一拐入大厅旁边的廊道就消失了。张神父不禁张皇失措，正没主意，斜刺里一只人腿横扫过来，将他绊倒——原来助祭早就发现自己被一位荡妇跟踪了，他不动声色地“诱敌深入”，却意外发现摔在地上的“荡妇”本色。他扯下他的花头巾不解地问：“难道东方的男人都戴这个？”

张神父却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站起来，已热泪盈眶。他尽可能平静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使命，半个小时后，助祭也热泪盈眶了。他们拥抱了很久，他将她妥善安置在紧邻圣彼得广场的营房里，让他沐浴、更衣、用膳，而自己却匆匆去禀报教皇。

当天晚上，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式召见了张刚毅神父，并与他促膝交谈至深夜。教皇也热泪盈眶了一回，良久，方抚着张神父的肩说：“张，您就留下来侍奉主吧。”

张神父起立向教皇致礼，然后说：“感谢教皇的赐恩，但是张的使命只完成了一半，请您允许张回到祖国，向蒙昧中的同胞宣扬主的福音。”

教皇说：“杰出的张！在梵蒂冈服务也是使命啊。”

张神父回答：“那我就遵从圣命到战争结束，我会日以继夜地学习。而我最终得回去，梵蒂冈不仅仅是一个城池，它的精神疆域遍及西方和东方。传教士走到哪儿，圣迹就会出现在哪儿。”

张神父谢绝了教皇的几番挽留，在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当月，即收拾行囊准备回国。教皇亲自敕封他为七品神父，地位相当于司祭，并赠与大量的经卷和藏书。岂料刚抵达梵、意国界，意大利的战后政府早已派车迎接，由于他在战争中义释战俘们的壮举，

张神父被意政府授予了“国家一级英雄勋章”，他还被邀请到罗马市中心大教堂作了一场弥撒，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不同肤色的人们祈祷、安魂。

1947年初，张神父载誉而归，受到国民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一番热闹之后，他仍旧回到××神学院，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949年岁末，内战将息，国民党败局已定，流亡台湾。张神父谢绝多方去台或去欧美的游说，在兵荒马乱中同一批神职人员一道留在了祖国。他说：“我的内心充满狂喜，因为我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天父为多灾多难的汉民族，为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乱世，选中了我。”

1950年，在改朝换代的首次镇反运动中，“被选中的”张神父落入法网，银铛入狱；1953年6月，××法院以间谍罪判他无期徒刑。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复出，国内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张神父才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得以释放。

他回到原籍陕西××村，意外地收到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信函，原来在漫漫几十年中，教皇始终在关注和查找他的下落。意中建交后，更是通过外交渠道致函中方，均未得到具体答复。随着毛泽东逝世和大批传教士的暗中探寻，梵蒂冈终于得到张神父被秘密关押在××监狱的信息。

曾留学西方的邓小平不仅承诺开释张神父，而且亲自批准他前往梵蒂冈朝圣。1979年冬天，失去自由28年的张神父踏上已阔别35年的梵蒂冈城领土，朝圣者络绎不绝，与二战时期与世隔离的萧条形成对照。物存人非，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庇护十二世已驾鹤西去，而新教皇登位不久，日理万机，仿佛是为了考验对上帝的忠诚，老态龙钟且风尘仆仆的张神父并没有受到特别召见。他挤在人流中，三天三夜，司祭才出宫领他到秘室进行试探性谈

话。司祭说：“我全权代表教皇，张，这几十年您受难了。”

张神父缄默着。

司祭接着说：“但您的处境马上会改善，会越来越好，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有独立于教廷之外的‘三自’爱国会，您完全可以加入，并且为它服务。”

张神父困惑地抬起头问：“这是教皇的意思？”

司祭点头说：“邓小平主政后，红色中国的宗教活动合法公开了，所以您应该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一个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教会。”

张神父再次追问：“这是新教皇的意思？”

司祭又点点头：“约翰·保罗教宗是波兰人，而不是意大利人。”

张神父倏地站起，拍案大骂：“假教宗！”

司祭大吃一惊：“您骂谁？”

张神父一字一顿说：“我骂这个波兰人是假教宗！您去告诉他，教皇可以是波兰或其它国籍，但教廷只有一个，并且只能在梵蒂冈！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之都只能在梵蒂冈！”

司祭愣住了，旋即拥抱了张神父：“我向您道歉！并代表教皇欢迎您回家！”

张神父老泪纵横之际，保罗教皇召见了，并坦率地说：“张，我们以为您被共产主义洗脑了，没想到呵！”

张神父以《圣经》中的耶稣箴言作答：“为我增添荣耀的人，我必将荣耀赐与他。”

“教皇召见中国神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使张神父再次成为社会名流。但此时的他，年届古稀，内心澄明，在对梵蒂冈和意大利进行短期访问后，他再次谢绝了宗教和世俗首脑的盛情挽留，毅然踏上归程，走上了在大陆仍被视为异端的传教之路。

回到××村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用意大利政府对“战时国家英雄”的金钱补偿，修筑教堂和道路。张神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党报也著文要“破除迷信”了，然而，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指令地方政府“必须宽容”。

80年代初，被禁绝多年的“帝国主义精神鸦片”的天主教可以公开活动了，当时在上海某某大教堂，全国300多名主教和神父举行首次瞻礼日会议。然而，此会始终在中共宗教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宗教自由”的前提是爱国主义，连梵蒂冈指派观察员的外交要求也被大会拒绝。张神父在愤怒之余，为了捍卫传统天主教的纯洁性，竟不避危险，向主席团提出“在梵蒂冈城国的教皇是全世界，也包括全中国各教区天主教徒的身体、精神之领袖，是耶和華无上权威的体现，任何世俗政权不得以任何世俗的借口予以改变。”

此案一出，满堂哗然，张神父成为众矢之的，大家纷纷发言，指责张神父为“祖国的叛徒”，要把中国天主教引入邪途，教堂成了文革式的批判会场。张神父手持《旧约》，反驳众人为“撒旦附体”，他引用《提摩太前书》说：“上帝在肉身里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纳在荣耀里——宗教局的官员们懂其中的含义吗？他们连《圣经》都没读过，他们，也包括你们不知道篡改主的教义是怎样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由于张神父的“国际背景”，大会没将他革除教籍扫地出门，还就其议案进行集体表决。当大会主席念出“赞成梵蒂冈教皇是中国全体天主教徒之唯一精神首脑的请举手”时，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条孤零零的手臂举起来，袍袖自手腕滑落，犹如死海里的孤帆，在没有一丝风的空寂里降下。那手臂，那青筋徒露的桅杆就这样一直高举着；它被“351对1”的绝对优势迅速否决，主席

宣布进入下一个议题，但它还是高举着；接下来，大会开了四个小时，那条手臂就举了四个小时。

老威：这会还能开下去吗？

刘圣诗：既然张神父没被警察抓走，会就必须开下去，这是强权下的游戏规则。你可以对张神父的手臂视而不见，以此应证自己的罪孽、恐慌和虚伪。

老威：后来呢？

刘圣诗：张神父是举着手臂走出教堂的，天已黑尽，满目尘世繁华，他仰天叫了声“主”，就昏倒在台阶上。

老威：圣人啊！相比之下，我这种怀疑论者显得猪狗不如。好吧，您下次去××村朝圣时约上我，让我也瞻仰一回圣迹。

刘圣诗：张神父已在前年去世，终年 93 岁。他曾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并且在上千人的弥撒中，为死难者祈祷、安魂。1997 年，他在××村召集地下 12 主教秘密会议，被当局抓捕，囚禁 42 天，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

老威：您在张神父身上受到了什么启示呢？

刘圣诗：一言难尽。

老威：您愿意像他那样历经磨难而坚持传教？

刘圣诗：我尝试过，我知道，我永远达不到他那种境界，这是天意。我下过农村，去过矿区，甚至在漆黑一团的矿井底传播过《圣母福音》，矿坑坍塌，险些就出不来了。我在坟前为夭折的农民孩子祈祷，还没完，警察就来抓人。我坐了几次牢，最长一次，8 个月。狱警让同监女犯盯死我，不让祷告，连喃喃自语也不行，否则就扑过来上刑。

老威：女人也互相摧残么？

刘圣诗：许多肉刑我根本讲不出口，例如用筷子夹奶头。总之，出狱那天，我一下子跪在太阳地里哭了。我忏悔说：“主啊，

饶恕一个普通传教者的软弱！我动摇了，我怕得要死，我不能死在中国！”

老威：您有门路？

刘圣诗：我的门路就是祷告，关在家里，与两个姐妹一道念《玫瑰经》，一日三次。我相信九十天后，我能如愿以偿地摆脱恐惧，抵达上帝恩宠的国度。我还买了一本韩国人写的《千万别学英语》，照书上写的七个步骤，反复听，反复练习，凭本能抓突然涌入脑海的单词。我的理想就是去西方教堂里打义工，侍奉主。

老威：我想不出您用何种渠道出国，办护照没问题吧？或者通过中外婚姻？

刘圣诗：不知道。

老威：我由衷地祝您顺利、幸福。

花 案 魏 西

采访缘起：魏西是电影怪才。

魏西生活作风过硬。

魏西有阅历，有地位，算这个时代受人尊重的人物。

然而，魏西却犯过花案。

花案这个字眼，在阶级社会的民间辞汇里近似流氓，却比流氓还贱——这大约是受“万恶淫为首”的传统礼教的潜在束缚。

2003年8月22日下午和晚上，天气阴沉无雨，有隐隐雷声，我和魏西在北京土城西路一带，从川菜馆食盅汤到赌徒周忠陵的租房，再到大街以及电影学院的宿舍，入迷地连续交谈10小时以上，意犹未尽。接着又是23日的下午和晚上。

魏西讲述了自己在1983年严打运动中的偷生经历，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这段花案入狱拍成电影。89年夏天，外景选好了，监狱也搭起来了，演员都是一流的，统统剃成秃瓢。可是，这头正要入戏，那头突然开枪，军心浮动，厂里接令不准拍了，50万人民币连个水响都没听见就泡汤了。

老威：我最早晓得你的名字，是在康正果悼念诗人胡宽的一篇文章里，你们三人都是大个子，扎在一堆儿，肯定引人注目吧？

魏西：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个子，老康你已经熟悉了，被大学开除的反动学生，文革前就犯下给莫斯科大学写信，索要俄文版《日瓦戈医生》那样前卫的罪行；老康的爷爷，西北佛教界的大

人物，旧社会与戴季陶等人传书往来，新社会成了政协委员，红了一阵儿，终于被打入尘埃，含冤死去。我和胡宽在文艺单位，也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和惊世骇俗的冲动，所以三个破落子弟凑一处，一拍即合。

老威：胡宽的诗我读过，比朦胧诗走得远，有人称他为“西安的食指”。

魏西：胡宽的爸爸是老诗人胡征，他有家传有天赋也有高贵的哮喘病，但他既不顾城也不食指，他很健康，很帅气，很讨女人喜欢。他最后的遗嘱是在杭州的医院里，对守护一旁的漂亮女护士说：“宝贝儿，我要窒息了，可很想和你亲吻。”你想想，这种连死都要标新立异的人物，在汉民族里有几个？

老威：所以你们要开风气之先了？

魏西：80年代初，生锈的国门刚透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都进来了，大伙没有思想准备，就跟着感觉走。党组织和居委会老太太也守不住防线，资产阶级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老威：当时成都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夜晚滨江路的夹竹桃缝中，埋伏着一对对情侣，而电影院是谈恋爱的上好场所，人们在暗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神仙似的。

魏西：你参加过家庭舞会么？

老威：跳贴面舞？太超前了，过分超前就是犯罪。我记得派出所和居委会曾挨门挨户地调查，提醒大伙注意“新动向”，有流氓舞会的敌情，要及时告密。

魏西：我们的黑道教母，人称“老马”，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就悄无声息地聚到她家，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

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老康务农多年，也没在文艺团体混过，像头手足无措的大棕熊，善解人意的老马就主动上前充当他的舞蹈教师。其实，不需要任何技巧，所谓贴面舞，就是借个舞的名目，男女搂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我和胡宽如鱼得水，只有老康勾腰驼背，勉强让垫脚的老马吊住他的脖子，显得吃力而滑稽。

老威：没闹出风流韵事？

魏西：绝无当场出轨的举动，跳出感觉了，就自个儿约会去。你笑啥？真的，不值得笑。因为到了1983年8月，严打第一战役开始，凡是跳过舞，被人检举的，都栽得惨。可怜的老马，就这么糊里糊涂给毙了，胡宽和老康大约嗅到了风声，先溜了。我呢，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就跳跳舞，没做别的，犯不着跑。8月15号夜里11点，西安全城戒严，警车扎住每个街口，拉网清剿。我还傻B呵呵地待在宿舍，突然听一个小孩在窗下喊：“老魏老魏，日本鬼子进村啦！”我探头问：“在哪儿？”小孩答：“刚才还打听你呢，我乱指路，他们就杀过去了。”我连声道谢，小孩说不用谢，你快躲起来。

我正犹豫是跑，还是当面跟政府交代清楚，公安局就折回来敲门了。转眼间屋里和身上都搜遍，因为我穿着工作服，相貌也朴实无华，公安局还怀疑是假的，连问几声：“你就是魏西？”我一再点头，正要开口解释，带队的老公安却挥挥手：“到局子里去说。”

我被揉进一辆面包车，里面像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地圈了二三十号，“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如肉楔子一般嵌入。窗外的手电光扫来扫去，终于，车发动了。在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时暴吼：“老实点！挤紧点！人肉是有弹性的！”

那晚到底抓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在路上，我听见两公安

聊天，一个发愁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依我看，把这伙子整编成一个师，送到老山前线来一个大冲锋，把啥问题都解决咧。”

老威：这警察没一点法制观念。

魏西：严打就是乱打，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敞开，只见房沿、墙根，一溜溜蹲着的全是人，也不晓得我们是第几批。一个老公安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把臭脚丫缩上椅子，起劲地搓着，并眯缝着眼，一边办交手续，一边从纸上抬头对号。当轮到这时，他将搓脚丫的手拿起来，直戳我的脑门：“你就是魏西？你在社会上名气大啦！”

我吓得一哆嗦，暗叫：“糟了！”不料过了一刻钟，又进来一车人，那老公安在对号时，又用臭手戳了另一个倒霉蛋的脑门：“你就是张京？你小子在社会上名气大啦！”

在凌晨5点开审前，老家伙起码重复了上百次“名气大啦”，每次都唬得人屁滚尿流。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已把“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的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小时，不料，5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家庭舞会”，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

6点钟进收审所，7点钟再次登记，更简单，令人觉得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对话内容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我才知道我犯的是流氓罪。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人，磨蹭了许久，雾散了些，地上蹲的脑袋才慢慢显豁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老威：哪有这么大的收审所？90年3月，我在重庆被收审，

里面虽然热闹非凡，但也超不过 500 人。

魏西：你说的是正常时期，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发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西安市××劳教所腾出来，改成收审所，这地方在郊外，老康早年曾在里面战斗过。

老威：也塞不下几千人。

魏西：你忘了人肉是有弹性的？至理名言呀。连老公安都傻眼了，他们也没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说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这样塞下去，闷死人是谁的责任，如果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局面就不好收拾……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说关多关少是方法问题，关不关是个立场问题，扛过热天，秋凉就胜利了。

先剃头后进号，这程序你清楚。我蹲在地上，那推子连续作战，弄光了上百颗头，已钝得像锅铲。狗日的用这发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西一块，留下些撮毛的同时，扯掉了若干头皮。这大约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怖的理发匠，搞得我猢猻一般猛眨眼睛。终于，一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生了——“花砂”是西安号子的黑话，你懂么？

老威：牢里每个月必须剃头一次，我经常成“花砂”。

魏西：入了号子，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像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揉：“朝里走！朝里走！”

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朝里卷。一抬眼，发觉满目人肉，在蒸腾的肉雾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二只穿个裤衩，稍不注意，一根或几根锤子就甩过我的脸或嘴巴。“朝里走！”的鼓噪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我终

于抵达墙根。尿骚熏得人热泪盈眶——原来 9 个大尿桶贴墙排开，每个桶都满得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来放尿。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点动静。

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尿桶里扔。若有人反应迟钝，屎弹就在身上爆炸。开始我感到这太过分，还愤愤不平，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发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发泄一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

老威：据我所知，号子里行规严酷，哪会这么一团糟？

魏西：俗话说“监有监规”，指的是老犯众多新犯孤身的情况，可严打是春秋战国，没有规矩。你想想，几天内卷去那么多人，谁也不摸谁的底，连公安都是懵的，咋整？

老威：只有开打。

魏西：单凭两拳头打不出结果，搞不好啥没打着，自己先散架。

老威：这么说，你就从新贼朝老贼，一步步熬去吧。

魏西：我睡最里面的板。200 多人就一个窗户，透不过气，我也将自己剥光了。拉铃了，两犯人一组，搂腰，一个把腿插入另一个的裆里，喊“一二三”，人扑通下去，肉和肉就贴得没缝了。整个号像超级沙丁鱼大罐筒，沿走廊两边码过去，热汗犹如红锅里的猪油，化开了，烟雾腾腾。我个子太高，加上扑通摔板时，动作生疏，脑袋一下子悬空。回缩无缝，就只能吊着头打盹。一天一夜没合眼，才犯迷糊，就见侵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密密匝匝地俯冲。我下意识地哆嗦，一巴掌抽醒自己，原来是从一尺开外的尿桶群直扑过来的绿头苍蝇，蚕豆大的几百只，嗡嗡叫嚣着袭击人肉。我刚才那梦中一掌，已将五、六只苍蝇拍扁在右脸颊，顺势一抹，蝇尸就坠落坑下。

这一夜，我在似醒非醒中不知道抽了自己多少耳光，蝇尸碾碎在脖子周围，犹如出水痘。啪啪声此起彼伏，四周好些手臂有气无力地坚持作战……终于，天折腾亮了，离起床还有几十分钟，我一下子睡死了。

老威：以后呢？

魏西：以后，当然是动心思，向上奋斗，谁也不想过满脸苍蝇的日子。号内花案大约十几个，有文化有智商，一会儿功夫就串通上了。互相一报名，要么是熟脸，要么“相见恨晚”，因为那年月，与贴面舞有缘的，几乎都是有点背景的前卫青年。大伙马上抱成一团，要弄出一片天下。

机会说来就来，管号老公安王叔在早饭后驾临，隔着铁栅叫“大专文化的举手”。雾腾腾的房里有五、六只手举起，我虽然是初中生，也麻着胆子举手冒充。王叔点完数，接着命令“举手的出来”。

这个王叔吃了 20 年公安饭，心肠不坏，所以犯人以“叔”相称，他把“知识分子”们唤出，意在提拔重用，文明治监。我接受的任务是发馍。

老威：美差吧？

魏西：鬼知道。监狱的定量是每人每天 9 两，经过剋扣，每人每顿就一个黑面蒸的馍，外加一勺老菜汤。刚进去的人，肚里还有油水，感到这黑馍像锯末，一嚼满口钻；三四天后，这锯末就顺了，不刮喉了；再过一两天，饥焰熊熊燃烧，锯末一入口就化了，你吧嗒着嘴，回味无穷。

我刚到，肚里有些油水，所以发起馍来就显得小人得志。我双手提箩筐，从靠门往里发，一人一个，铁面无私。可发到老犯大老蔡的跟前，那家伙一欠身，叉开十指，叼去四个馍。这大老蔡可是个人物，十几岁开始，就踢破公安局门坎，如今 30 多岁，

就已有十几年牢龄，连管号公安也得依他两分。我懵里懵懂，小鬼不认阎王，居然又把他叼去的馍抢回。这下惹了祸，大老蔡的手下，都是行窃高手，转眼之间，我的馍筐就被挖出一大坑，我还挨了一顿乱打。

我大吼报警，王叔赶至，将大老蔡客气地唤出，好言相劝一番。又吩咐补够失踪的馍数。好歹完差，大老蔡狠狠地瞪着我，号内众贼蠢蠢欲动，都传言：“这小子得罪了大老蔡，死定了。”

我暗中作了提防，不料大老蔡阴沟里翻船，被几个小娃治了。这些娃是晚上进号的，炕上挤得插不下腿，几个瘦猴样的娃东瞅西溜，见大老蔡等七、八个都是大平躺，一人占了三、四人宽的地盘，自然就朝那儿凑。可屁股蛋才怯怯地挨着炕沿，就叫大老蔡闪电一脚踹翻。那个娃跌倒时，后脑勺撞得鲜血迸溅，顿时晕头转向。

几个娃都才十五、六岁，比狼崽还毒。第二天我发糊糊，大老蔡和他的手下，排在十几颗脑袋后，远远地冲我冷笑。眼看要豁出去，我抄着铁勺，手心正冒汗呢，却见原先焉在马桶边的破头小娃从地上爬起，反捏着盛糊糊的洋瓷缸子，游泳一般向前挤……终于接近了仇家，小娃一猫腰，呼地蹦起，双拳握洋瓷缸子猛击大老蔡。号内大乱，人事不醒的狱霸被抬了出去，跟着，几个娃也转了号。

老威：天下自此太平？

魏西：在王叔的纵容下，花案犯们颠覆了老盲流集团，睡上了第一块板，靠门，大平躺，真他妈舒服！我们的花案联盟肃清了每个企图造反的贼，越战越勇。人肉太恐怖了，笼罩在其中，谦谦君子也会被改造成暴徒。特别遇进新犯，大家都恨不得让他立即消失。我们曾收拾一个扒窃火车的大块头，三个打一个，两分钟全趴下了，因为他刚来，体内油水足，有劲，而我们已饿极

了，拳头过去，比棉花还软。

老威：牢头总有些特权吧？

魏西：饥饿面前人人平等，哪怕号长，也不能多吃馍，只能多喝几口菜汤。

老威：这同我坐过的牢不一样。

魏西：按平常的号规，公安之下，号长就是班房老大，由下面供着。可严打是春秋争霸，没号规，连法律也不讲。比如看守所超员，腾不出空间，大量进去的已决犯人也同我们搅一块，死刑犯就关隔壁。本来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人绝不迷信，可某个半夜，我突然被一阵阵猫头鹰叫惊醒，寒毛直竖。我坐起来，号里的犯人已醒了大半，都支着耳朵，听那一声声长唳。大伙议论说，明天肯定开杀戒啦，从古到今，猫头鹰一叫，必有人死。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仅猫头鹰，连蝙蝠、老鼠、猫和狗都仰天叫得格外凄惨。

我又倒头睡，心跳却敲鼓一般。迷糊了片刻，大约凌晨三点，旱了一冬天，居然下起了飘飘大雪，却听见隔壁铁镣响。有经验的老犯马上说，开始“验明正身”了，5分钟一个。7点钟，我们起床，隔壁的法律过场刚走完。一老犯倒抽一口气，吃惊说：“我的妈，今天要飞62颗头！”

果然，西安市在严打运动中毙了3批，第1批45颗，第2批62颗，第3批记不得了，估计要少些，因为批量杀人的间隔太短，人民群众再怎么“拍手称快”，血腥气也太浓了。

老威：真是“彭老醋一到，砍头如割草”。

魏西：你嘀咕啥呢，川耗子？

老威：83年流行过的顺口溜，当时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憋着一股恶气主持政法工作，这叫驴日的山西人，好喝醋。

魏西：一口醋缸淹死好几万。我们号里有个娃，几根骨头加

几根筋，看上去，比秤杆高不了多少，却犯了暴力强奸罪，死刑！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喊冤，烦透了，我就问他咋回事？他说，逮的暴力强奸，那是我女朋友，我们好了几个月。我说，好得再久，女方不同意，也不能硬搞。他说，谁赖我搞啦？我没搞。我说，没搞？谁信？他说，本来嘛，十六、七岁的人嘛，骚得起火，可是她家里有人，我家里也有人，没地方搞。青天白亮，我拉着她，坐公共汽车，四处窜，累得呼哧呼哧，就是找不准地方。人嘛，高等动物嘛，又不能像畜牲，想搞，就拿出锤子搞，没谁监视。她家管得严，天一黑，就必须回家。

老威：憋成这样，到旅馆吧。

魏西：你忘了，80年代，旅馆都要证明。况且每个房间都有监视孔，从里面不能上锁。因此那娃继续说，我们窜了好多天，总算在郊外寻见一块麦子地，立刻就倒进去抱上了。摔跤一样翻来翻去，我从她的衣领使劲掏奶，吃了几口，奶就滑进去了。我又扒她的裤子，拿锤子往里塞，我以前认为很容易搞，结果呢，她不会，我也不会。这戳那戳连洞都没挨上，腰杆子一麻，流水了。我跪起来一看，成泥锤子了，刚才搞的是土嘛！我和她又是土又是麦穗，抖衣裳就费了半天功夫，还要一根一根拣她头发里的穗芒！划不来，搞几秒钟，锤子都抵肿了。从郊外等公共汽车，朝回赶，天就黑了。她急哭了，骂我流氓。我说都流氓，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回家以后，她爹三审两审，她就招。于是她爹娘向公安局报案，我就落网了。审了两回就开庭，法官在上头念完《判决书》，我一听是“死”，急得当庭叫唤：“我干了个咋么？我没搞嘛。向毛主席保证，我就吃了两口奶。吃奶也判死？”可是法官把判决往桌子上一搭，语重心长地教训我：“娃呀，人一辈子，就你娘的奶能随便吃，别人的奶，你一吃一个死！”

老威：这法官在演话剧呢，后来咋样？

魏西：这娃不服上诉，改判死缓；再申诉，改判 15 年；第 4 次申诉，改判 10 年，最后，原告翻供，证据不足，放了。

老威：闹着玩么？

魏西：刚才说到的大老蔡，是郭××抢劫集团的二被告，此案一死两缓，多人判有期。据说在法庭上，法官边宣判，郭××边叫骂：“我弄你妈！劫了点浮财，你就判死！”法官憋了一肚子火，坚持念完文件，方吐口长气，一摔卷宗，起身指着那贱骨头回骂：“你死都死迷，弄得了我妈？我弄你妈！”

老威：这叫法庭？分明是庄稼老汉在野地斗嘴。

魏西：玩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所以金圣叹的断头遗言是：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滋味；老子则言生命如水。到了两千多年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人多命贱，水就变成尿了。

老威：一段充满了尿臊味的高见，请继续。

魏西：那好，我来提供“水尿说”的依据。在收审号中，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一缸子开水，排队打进来，晾在那儿，慢慢匀着喝。天气酷热，虽然人人都想敞开肚皮灌个够，但坐牢既是熬磨，你就必须掌握节奏，不急不躁，一次吸两小口，润润喉咙，舔舔嘴唇，就该满足了。

老威：你们一天放几次风？

魏西：一次，主要是倒尿桶，上茅坑。那茅坑是露天的，分两排，大约十五、六个坑。这坑里的蛆和苍蝇肯定上亿，屁股一下去，轰地一声炸营了。放风时间只有 10 分钟，两百多号人，必须在 10 分钟内卸完包袱……你想想，这是多么繁忙的景象，一个坑，蹲三、四个屁股，白白地凑到一处热闹，连苍蝇都顾不上赶，因为旁边还站着提裤腰，数秒催命的家伙。

老威：便秘者咋办？

魏西：时间一到，提裤子滚蛋。

老威：除了尿尿，可以在院里接自来水喝吧？

魏西：水管早堵了。人太挤，容易爆发痢疾，甚至更严重的传染病，因此所里不准犯人喝生水，逼大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老威：挺人道的。

魏西：是挺人道。有一次，牢里锅炉坏了，断水三天。大热天断水，不要人的命？事后想起都觉得奇怪，怎么熬的？不渴死，也得憋死，因为号里的空气全是尿。不仅仅是尿，是提炼出来的尿素，就筷子头那么一点，就能熏熟一分地的庄稼。我都恍惚了，一昏沉，就梦见喝尿，越喝越渴，越渴越喝，直到醒来，觉得嗓子眼已结了一块尿碱，又咸又苦又涩，一咳，刺痛难忍。

人缺了水分，明显地干瘪下去，好在第二天，屙尿的只有十来个，接着就没人亲近尿桶了。第三天，号里鸦雀无声，连打饭都如梦游，个个两眼笔直。就在这关口上，我听见有声音叫我，凑近门栅，才认出是王叔。“拉水。”他这么说。

犹如导火索拉燃弹药库，就在我眼冒金星的瞬间，号内轰隆一响，200多人全都手提瓷缸站起来，向前扑。王叔开锁放我出去，然后说：“你们等着。”

顺着走廊，一股新鲜空气迎面袭来，我连抽几口，直达肺腑，整个人几乎飘掉。我醉氧，一钻出房顶，过分充足的氧气压得我胸部巨痛。缓过了劲，我才拉起了载了几个汽油桶的板车，跟王叔去监外拉水。终于，我见着了开水笼头，烫，喝不了。有人指了指旁边的温开水笼头，我立即拧开，双手捧着渴饮、狂饮、朝死饮。我大口大口地抽气，喉管像哨子丝丝响，然后又往死饮……最后，一股水从胃里反刍，直逼口鼻，憋不住，喷涌而出。

接着拉水回监，刚拢号子，里面全疯了。几十只、几百只瓷缸哐当、哐当哐当在墙上、炕上、地上砸，应着这刺耳欲聋的节

奏，几十个，几百个喉咙一齐吼：“给水！给水！给水！”唉，20年过去了，这恐龙一般的声响还在回荡，令我在夜深人静时寒毛竖立。

老威：你应该把它写成个剧本。

魏西：谁来演？谁来拍？像《辛德勒名单》里的那种裸体犹太人排队进毒气室的大场面拍摄，谁不梦寐以求？类似的中国场景许多，比如打预防针，病人排着队，用同一根针头扎屁股，五秒钟喊一声：“下一个！”转到我，针头扎弯了，狱医就咬牙切齿地用手掰直，瞄了瞄，继续使用；吃药也一样，排长队，上百张嘴巴得到的是同一颗治拉肚的黄连素。狱医身旁站一位端水的劳改犯，待小药丸一抛进嘴，就配合灌水，并命令你张口受检。

老威：太离谱了。

魏西：最离谱的是王叔溜耗子。我们敬爱的无聊的王叔，20多年的老公安，整天捧个大黑茶缸巡视，东瞅西看。有一天，我们捉了只一尺长的老耗子孝敬他。

老威：这牢里的粪耗子能吃么？

魏西：他没吃，而是溜。用个项圈套住鼠颈，每天牵耗子出门散步。王叔说：“有钱人没事溜狗，咱公安人员没事就放放老虎吧。”

老威：听这故事，就晓得你已熬成老贼了。

魏西：我关了近一年，被判两年劳教。我的运气好，在节骨眼上检查出乙型肝炎，劳教所不要，只好退回原单位，由群众监督执行，并扣发工资，每月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

94年，我花了3万元治病，好了，没留后患。

同案犯李齐

采访缘起：我曾在长篇纪实《天劫》之开篇里写道：“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城市，二十多位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次年11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案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并录制配乐诗歌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003年3月2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同案犯”。我下楼赴约，却见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走进社区大门，老远就向我张开双臂——此人的确是为《安魂》剧组跑过龙套的前诗人李齐，目前的职业为二渠道书商。

昔日的翩翩少年已荡然无存，嗟叹之余，顺便致歉，因为在《天劫》里竟忘了提到他。“无所谓，”他笑道，接着又谈起若干同案犯的近况。“发小财的居多，但也有意外，例如×××，还住在县城，娶了个吸白粉的老婆，瘾一发，就闹割腕，最终整得家徒四壁，成了你老威的访谈对象；还有×××，十年中死了两任老婆，只得醉生梦死打发日子了。”

“那么你呢？”我问。

41 岁的李齐哑了一杯酒的功夫，方恢复常态。

李齐：我们有近 10 年没有见面了吧？

老威：对，大约 94 年，我刚出狱一两个月，去重庆找过你。就像做贼似的，我俩站在你家巷尾说了几句话，你就突然塞给我 200 元钱，然后借故匆匆离开。当时我很沮丧，坐十几个小时火车从成都过来，你居然不请我进屋歇口气，喝口水。

李齐：你的记忆力真好，老威。

老威：这是我几经折腾剩下的本钱。不过我不明白，你们为啥要躲着我？你我好歹还见了，X X 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李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咋还像个怨妇似的。告诉你老威，我们虽然是同案犯，但谁也不欠谁的。

老威：我没别的意思。

李齐：该知足了，拍一个片子，这么多哥们垫背坐牢，就你一个人当首犯出名。

老威：如果在 10 年前听这话，我准和你打架，你晓得六四血案死了多少人？

李齐：莫唱高调，莫说你背后站着成百上千的冤魂……不要打断我！那是历史，是文学，是该放在永垂不朽的文章里去大书特书的。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桩反革命案的内幕，也许永远不为人知的内幕。你是首犯，走完了整个司法程序，有罪名，有判决，虽说关了四年，但值得呀。六四迟早得翻案，那时你有当英雄的凭据，有为了自己的苦难向国家进行道义和物质索赔的凭据——这个未来多诱人，想想都过瘾！然而我们这些同案，关押了两年、一年、几个月，遭一样的罪，却被“教育释放”，

没结果，没凭证，也就没未来。

老威：这不是我能选择的，没人愿意为一两首诗去蹲四年嘛。

李齐：我为啥？

老威：我都莫名其妙。当时拍《安魂》，我从你那儿借了几件“戏装”，还有，你捐献了几百元钱，并陪我们一道去四川外语学院舞厅物色女演员。

李齐：我连正式的剧组成员都算不上，顶多在外围跑龙套，却因此被抄了家，进了收审所，一关大半年，吃尽了苦头。

老威：除了被正式逮捕的6位同伙，我真不晓得还株连了多少人。

李齐：监狱里的情景，你比我更熟，所以就不用多嘴。总之，我被轮番审讯了十几天，还吃过承办人的耳光。我彻底交待，写了一沓有关你的揭发材料。我一心想早点出去，收审所太恶劣，虽是政治犯，不过“手续”，却睡在马桶边，惹了一身虱子。当时，我的孩子刚一岁，老婆正需要人照顾。唉，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现在理起来，也一团乱麻。

老威：像你这种境遇的，多如牛毛，我身边好几个，都因为领呼口号，鼓动学生上街等等进去“受教育”。按警察的说法，书呆子血热，降降温。川师教授高尔泰叛逃，他的学生也受株连，关押数月，放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我估计，因六四进局子接受短期审查的，在全国有几十万。

李齐：本来在人的一生中，有点这种体验不算坏事，可我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老威：听说晓晓和你离婚了？

李齐：90年10月25号我出狱，已秋凉了，之前，我曾托人带信给她，并通知了几个好友，准备聚一聚。我想，虽然自己不是什么英雄，但至少没做亏心事，应该因受难赢得大家的尊重。

我记得当警察打开铁栅门，喊“李齐，收拾东西”时，我的腿都抽筋了，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是笑。我连说：“不要了，啥都不要了！”

出大门爬了一个坡，就来到大街，太阳明晃晃的，汽车穿梭一样，弄得人头晕眼花。过街时我像个大山来的傻农民，一溜小跑，到了对街，还站着喘了半天气。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到晓晓的百货公司，让她回家等我，她居然说：“我还在上班。”我生气的命令说：“请假，马上回家。”她迟疑了几秒钟才说：“好嘛。”我没有意识到有啥不对，晓晓很温柔，结婚三四年，家里都是我作主。

我挥手打的，可好几辆出租车都一踩油门过去了。终于拦住一辆，拉开副驾门，司机却让我坐到后面去。此时才醒悟自己青面獠牙，还刮了个大秃瓢，标准吃牢饭的。

拢家，进屋拿车钱，狗日的司机还跟着我。付帐关门后，晓晓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我走过去，想弯腰亲亲她的脸，她却站起身，指着旁边的换洗衣服吩咐：“你先洗澡吧。”

我木偶一般进了卫生间，在牢里温习过若干遍的久别重逢的激动场景顿时化做泡影。不过，几个月没洗热水澡，泡一泡，搓一搓，我的挫折感就缓解了。我以为晓晓在赌气，丈夫这么久没在家，她带孩子太难了。

晚饭没吃出啥滋味，我的眼睛隔着饭桌，贼溜溜地盯着她不放。我太想抱她了！太想亲热了！一个久憋的囚犯最大的渴望就是彻夜搂着老婆，不停地性交，不停地诉说衷肠，可是晓晓始终平静，不起一丝波澜。每当我妄图越轨，她就把孩子挡在胸前，像圣女贞德不放下自己的盾牌。

老威：我记得原来孩子是在你岳父母家。

李齐：我教书，她上班，没空带孩子。80年代工资偏底，也

请不起保姆，所以孩子断奶后，就让他外婆带。后来我晓得，她是故意把孩子领回来对付我的。当夜深人静，她没有理由再磨蹭时，就只好上床了。孩子已睡熟了，我低声说：“把兵兵弄回小床去吧。”她却回答不，并把孩子放在两个大人中间。

我几乎就趴下来哀求了，她依然回答不。熄灯躺倒，孩子在腋下，犹如一道战壕，隔开了硝烟四起的肉体 and 灵魂。我一次次伸手，摸她的头发，挽她的脖子，她却躲躲闪闪，并说：“莫惊动兵兵。”终于，我忍不住起身，越过“战壕”，压住她。两人无声地搏斗，从床上滚到地下，孩子惊醒了，大哭着要妈妈，她却在我的身体下一再叫唤：“兵兵莫哭，乖儿，莫哭嘛。”

我欲火攻心，啥也不顾了，我扯开她的衣裤强行顶入，她起不来，就掐我，骂我流氓，她还哭了。他妈的，床上床下，孩子闹大人哭，败兴透了。我真没料到重逢就像地狱，充满罪孽。草草完事，我就扎扎实实煽了自己两大嘴巴，吼道：“我有啥子错？有啥错？！”

晓晓说：“你没错，是我和孩子错了，我们拖累了你，让你干不成大事。”

我解释说：“我也不想坐牢，不想离开你们嘛。”

晓晓说：“我已经受够你们这些诗人了！我庸俗，我市侩，我见钱眼开，我想过平静的日子。你如果看不惯，就马上走。”

我说我死也不走。我赌咒发誓，这辈子追求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还日了你老威的祖宗八代。天蒙蒙亮时，我见她情绪缓和下来，就趁机求欢。这次晓晓没挣扎，而是如一块木头，任我搬来搬去。刚完事，她就立即推开我清洗去了。我太傻了，还跟前跟后陪笑脸，惹得她转过头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真可怜啊，李齐。”

老威：她在故意刺伤你，唉，晓晓咋会变成这样！

李齐：都跟你有关系。还记得六四以后我俩的通信吧？

老威：不太记得了。

李齐：你受了刺激，简直疯了，不仅把《大屠杀》的磁带拿到我家放，而且在信里骂共党，号称要用世界上最高最粗的烟囱去操邓XX的屁眼儿。你还说要逃跑，宁愿抹一把锅灰充黑奴，被卖到非洲砍甘蔗，也不做耻辱的中国人。后来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包括你用整页信纸画的一根冲天大鸡巴都到了警察手里。我栽进去没话说，可晓晓也受到牵连，蹲了十来天牢房，几乎每天都接受审问。你想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人，读大学，受文学熏陶，嫁我后，几乎天天写爱情日记，但一夜之间，梦全毁了。关进女号房周围都是妓女、贼、皮条婆和吸白粉的，折磨起新犯来，比男人更不择手段。什么火烤阴道，筷子夹乳头等等，把个晓晓吓得整日以泪洗面，差点成了精神病。

经历这一劫，她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她恨我，更恨你这祸根。女人这种动物真是难以捉摸，她居然动了改造我的念头。首先，她把我过去当诗人穿的奇装异服统统搜出来，处理掉，然后领我去百货公司买西装、领带加皮鞋，如此从上到下装扮起来，我浑身不自在。说实话，打出娘肚子，我就没有这么光鲜过。更无法忍耐的，是她把一顶打了蜡的假发扣在我的光头上，吓得我虚汗直淌，却不敢摘下来，只好皱眉毛。晓晓却极为认真地拉我到穿衣镜前，端详半晌，满意地笑着说：“这才有个正常人样。”

老威：你太惨了，李齐。

李齐：当时没觉得惨，因为我欠晓晓的。接着，我就一身虚假去学校，方知被除名了。教书饭碗砸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去街道派出所查找户口，兼办临时“身份证”。户籍警当众向我宣布政策：每月来派出所报到一次，汇报思想动态。

老威：凭啥？你又不是罪犯。

李齐：我认了。这就是六四后的社会环境，没鲜花，没掌声，没游行和口号。眨眼间风向转了，人们把一切忘得干净。晓晓约我回娘家，亲戚们都来了，岳母弄了一桌子酒菜，大家就在饭桌上开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帮助我，什么“李齐，你已是30岁的人了，汲取教训，好好过日子吧。”什么“你老婆多不容易，自己受委屈，还拉扯着孩子等你回来，换一个势利的女人，早趁机攀高枝了。”还有什么“读书人聪明，肯定能发，咱们为未来的富翁李齐干一杯！”

我一个劲地灌酒，终于趴下来。大伙把我扶回床上，朦胧中还听谁在说：“翻过这坎，轻装上阵，把你写诗的机灵用在挣钱上嘛。”

老威：这倒言中了，你现在算成功的书商。

李齐：逼良为娼嘛。

老威：80年代文学，90年代商业，这也是大势所趋。

李齐：对，六四一开枪，惊醒了众多梦中人，这国爱不起，思想和文学也爱不起，只有钱能够超越祖国、阶层和文学，可以尽情地爱。

老威：听你的口气，还有点愤世嫉俗。

李齐：谁都不是生来就充满铜臭。开始，我找不到工作，九一、二年，人们观念没有这么开放，一听说有动乱背景，就不敢要。我费尽口舌，解释“冤情”，人家就说除非公安机关出介绍信。重庆这地方，有地下党的传统，人们喝酒时，你一杯，我一杯显得耿直，但真要把酒话落实到行动上，就谨小慎微了。这样磋磨了大半年，晓晓建议写东西赚钱，因为我过去写诗投稿，有些老关系旧名声。于是我分别给全国各地二、三十家报刊去信联络，结果许多当年的编辑还没挪窝，其中一些还混成了副主编、主任什么的。

昏天黑地的写手生涯就这样拉开序幕，我化了七、八个笔名，利用过去写诗训练出来的文学功底，写各种文章。起先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字斟句酌，并限定在文化范围内，例如抒情散文、思想随笔、书评、短篇小说等等。一个月顶破天写两三篇，万把字，还吃力不讨好，屡遭退稿。晓晓提意见说，你别老盯着纯文学刊物，那是赔本买卖，你呕心沥血，一千字才三十元，这样下去，孩子没长大，你就累死在阵地上了。我说自己就这本事。晓晓说，你编时尚故事嘛，给滥杂志写嘛，时装、化妆、男欢女爱、撕心裂肺一齐上，只要给钱。我说这活儿干不了。晓晓不愧是我的启蒙老师，当晚她就一口气创作了三篇一两千字的化妆文字，什么“我为什么不担心岁月流逝？”“对付皱纹的12条秘诀”“香水与情绪的调动”之类，令我惊叹不已。按如此一日三篇的造文神速，干三年我不就大发了？

但是，这种粗制滥造的激情只持续了几个月，我就受不了了。进帐倒快，因为滥杂志比纯文学稿费高两到三倍，我一个月能挣七、八千。93年的七、八千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万了。

老威：那你的小日子应过得相当不错了。

李齐：晓晓也对我改变了态度，并且一再强调，我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读了那么多书，完全可以把书中的内容改头换面，再加些时尚的佐料；并且还该把一稿三投弄成一稿十投、二十投。记得92年底邮局征订杂志时，她就专门跑一趟，把征订目录买回家，划了一夜的勾。

老威：你就按既定方针办吧，据说武汉的《知音》和广州的《家庭医生》都是千字千元。

李齐：我不是机器，我他妈烦了。那时，我和你一样，内心还残存着一些精神的东西。我追求了多年的纯文学，读了数不清的名著，还为梵高和高更的艺术经历流过泪。我晓得什么是垃圾，

我一下笔就是垃圾，我已表达不了我自己。

老威：你别逗了。

李齐：你居然不相信？

老威：我不相信，你现在也没回头是岸嘛。就像X X，多优秀的诗人，而今已做了近十年的写手，在成都买房定居，封妻荫子了。人家把码字叫做劳动，很坦然。

李齐：我不是X X，一手造垃圾一手写诗。我试图逃避，就同晓晓商量换环境，把孩子丢给岳母，一起到成都打天下。因为成都在80年代被称作“现代诗的延安”，有几代著名文人，积淀比重庆深厚。我们在磨子桥一带租房，一打听，方知这延安也不是圣地，诗人们百分之百下海了。办公司、开夜总会、做书、行骗，可谓各显神通。晓晓很快就在《商情咨询》找到工作，干得春风得意。这是一份由第三代诗人任主编和副主编的半月刊，内容除了各类时尚就是信息和广告，其编辑部就设在同样由第三代诗人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大音棚夜总会里。这是本市最早的大型娱乐场所之一，以鸡多客少而臭名远扬。

老威：晓晓在里面你能放心么？

李齐：从90年10月出狱算起，她已支配了我三年多，这次她编刊物，第一约稿对象自然是我。至于放不放心，提都别提，免得惹翻河东狮子。

老威：又为老婆打工了？

李齐：我已烦了。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并且骗晓晓说，要调整心态，挣更大的钱。她追问咋挣？我随口就敷衍：“弄电视剧。”我记得她笑咪咪地出门前，还夸我跟得上潮流。

我歇笔彷徨了一个冬天，睡懒觉，读文学名著，渐渐，有了创作的冲动。我开始写我坐牢的经历，因为出来这么久，我还是不踏实，连做梦都在号子里。老威，我虽然不是主要被告，但内

心的刀痕比你们深。你们是注定要入文学史，至少是诗歌史，将来提到六四的文学，《屠杀》《安魂》是绕不过去的。可我，大半年的牢白坐了，自己不写，就没人注意了。

老威：这是历史恐慌感吧。

李齐：历史就是湮灭大多数，留下几个人，但人人都有折腾的权利。弄一本书留下来，给子孙看，说不定将来一畅销，我就成为历史中的一段不可缺少的插曲了。

老威：向上之心可贵啊。

李齐：我觉得自己挺悲壮的，都啥年月了，还像耗子一样躲在地洞里描述监狱，为六四鸣冤叫屈。

老威：我在你的书中是啥货色呢？

李齐：一个裤裆燃火的疯子，把鸡巴当作机关枪无目标地乱射。审讯时，承办人把你描绘成老谋深算的反革命，认为你有高的组织领导才能，我都听得傻了。你有领导才能？那我就可以当部长了。

老威：这么丑化我，倒值得本人认真学习。

李齐：你学习不成了，稿子已经毁了。

老威：可惜可惜。

李齐：我写了一个半月，近六万字，晓晓都没察觉。她早出晚归，一副职业白领的派头；而我蜷在家中，洗衣、拖地、做饭，成了标准的家庭妇男。她偶尔也问电视剧弄得如何，我都答正在编个多集的。她说能不能让她看一下，鉴定有没有卖相；我说弄完了再看。她见我神神鬼鬼，就指着电视中正在热播的王朔的连续剧（好像是《过把瘾》）说，如果哪一天你成为王朔第二，我就待在别墅里当李太太。

坐过牢的人处事小心，那一段时间我每天 11 点起床，随便吃点东西就开写，直到下午 4 点半钟，才收拾稿纸，锁进抽屉里，

接着做家务。也活该出事，那天我居然忘取抽屉钥匙，就下楼买菜了。碰巧晓晓提前下班，进屋环视一周，就直扑书桌。她大约怀着发现新大陆的激动打开抽屉——我的违禁文学立即被家庭警察查获。

记得我提着一刀猪肉和各类蔬菜进屋时，稿纸已满天飞舞，落了一地。“这就是你的电视剧？！”她歇斯底里地大叫，震耳欲聋，充满金属质感。“你这个骗子，害我还害得不够？！”

她像个小女孩，一屁股坐在那些乱纸中，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一声声拖得极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悲惨这么绝望的哭声！我六神无主，像个罪犯一般跪下去，求她宽恕；她却推开我，随手抓起一页“罪证”揩眼泪和鼻涕。她反反复复地念叨：“晓不晓得，警察要上门了，要上门抓你了，晓不晓得？！”

一闹就是深夜，晓晓站起来，到梳妆台前擦脸补妆，然后要提包出门。我急忙抱住她，无论怎么打怎么踢都不松手。她说：“我们离婚！”我回答不离。她说：“我怕你了，李齐。”我一咬牙说：“烧了！”其实内心想的是：“我藏起来不行么？我挖个洞把稿子埋了不行么？”

老威：你真烧？

李齐：真烧。晓晓守在卫生间，盯住我一页一页地点，然后把黑灰搅进抽水马桶冲走。一百多页啊，我两眼血红，面部肌肉在抽搐，但是我爱晓晓，这个暴君。我这辈子真的完了。

接下来的许多天，我心如死灰。晓晓不跟我说话，只是把一个个时尚题目扔给我，限时完成；而我满脑子都是销毁的原稿，飞扬的纸灰像癌细胞一样沾满我的脑髓，所以写不了别的。晓晓说：“你要自食其力。”我点头。她说：“点头顶个屁用，你得劳动。”

老威：这日子怎么过？

李齐：不晓得。

老威：还记得《王子复仇记》里的著名台词么？

李齐：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老威：离婚，还是不离，这是……

李齐：不用思考，我不离。

老威：活得像条狗。

李齐：别那么斩钉截铁，你没爱上过谁么？你不明白一旦爱上一个人，所谓脸面、自尊、理想都狗屁不值么？

老威：这不是一码事，既然相爱，你就应该给晓晓解释清楚：第一，绝不拿出去传播或发表；第二，只是对那段经历的回忆、记录；第三，六四是抹不去的，会有许多人在私下干同样的文字活；第四，仅仅写作不会有麻烦，因为不构成犯罪。其实在互联网上，现在有关六四的文章已多如牛毛，其中最突出的，当数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搜集的死难者家属及目击者的证词。

李齐：93年还没有互联网，我也不懂电脑。况且，女人横起来，就不听任何解释。糟糕的是，我明明知道她已变了，俗了，我还爱她，我对她的欲望日益强烈。

老威：受虐癖。

李齐：我有受虐的资格倒还好了，整整一个月，我们没有一次性生活。我像一头狮子在房里乱转，巴不得她找我岔子，抽我一顿。有次下半夜，我又憋醒了，就忍不住把手伸进她的被窝。我心惊胆颤地在乳房停留了一会儿，见没动静，就向下移，至小腹时还没动静，指头就插进内裤，触及到敏感区域，不料已湿漉漉的。我不禁狂喜，继而血脉贲张，泪如雨下——原来晓晓也不好受，她的肉体已春情激荡，却压制着、憋着，夫妻之间的冷战真是薄如一张纸啊！于是我擦开被子，信心百倍地进入……

老威：都是过来人，就别讲这么具体了。

李齐：你挺兴奋是吧？演春宫戏？看毛片？可接下来的一幕是，晓晓，我同床共枕多年，并养了一个儿子的老婆晓晓突然掀起一只腿，顶住我膨胀的下身说：“我不想和你做爱，身体有感觉也不想。”

我气急败坏地叫：“你都湿了！”

晓晓说：“我再重复一遍，湿了也不想。下去吧。”

我终于咆哮了，两人撕打着翻下床，我扯烂了她的衣裤，强行……

老威：够了。

李齐：是够了，完事后，彻底无话可说了。接着分居两个月，协议离婚，财产和孩子都归她，我按月付抚养费。就这样，我光棍一条，分文不名地流落到江湖上。

老威：你现在还爱她吗？

李齐：感情是有极限的，翻过这极限，世界就变了。

老威：你是变了。

李齐：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精。我给书商写了一年多，赚足两万块，就自己试当书商，很快亏光了本钱。接下来就借钱，连我妈的养老金也连骗带借，老人家一悔悟，竟追出门来，在大街上找了我一下午，幸好没出车祸。

我第一本赚钱的书是关于印度粤修的，发了七、八万，那钞票来得猛，淹死人啦！此书号是著名老诗人XX帮我搞的，他是我的恩师，从50年代到而今，出了几十本诗集，因此同出版社形同鱼水。那天他打电话约我晚饭后去他家洽谈，不料我一进门就是乌烟瘴气下的两桌麻将。他头不抬，眼皮不翻，只随口问声：“来啦？”又继续搓他的牌。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陪着笑脸，直到长夜将尽，东方即白。

他老先生伸个懒腰，与麻客们一一道别，剩我一人在客厅里，

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硬着头皮拽住欲进卧室的主人，道明“正事”。

他不耐烦了：“再说嘛，下午给我打电话。”

我一身酸痛地回家，心里把他的十八代先人日了个遍。可出乎意料，书号顺利到手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老威：你现在钱也挣够了，还有写回忆录的打算么？

李齐：我感到离那种东西越来越远，就像一个孩子，把心爱的玩具丢在水里，漂走了，再也捞不回来了，但这个孩子依旧站在岸上，或沿着岸边跑着，追着。当然，我不会如小孩说哭就哭，但灵魂的痛，摸不着的无处不在的恐惧带来的痛，依然是坐牢和离婚。今天对你说出来，也算一种缓解或释放，因为二渠道没人相信这个。

老威：二渠道书商嘛，就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

李齐：等以后我谁也不欠的时候，我再隐居，学习写字。目前呢，我除了数钱啥都不会——这大约也是前妻晓晓最愿意看到的吧。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采访缘起:关于清代庄园“陈家桅杆”的新闻,本地媒体早几年就已经炒过,至今却加速破败到倾废的地步。

“你再不去,就永远看不到了。”学者朋友李亚东在去年的某一天叹息道。我当时没怎么在意,因为比这更有价值的传统民居也因无钱维护而在消亡之中,“眼不见为净,”我敷衍道。

2003年6月13日下午,雨没下透,天气异常闷热,有着浓厚考古兴趣的李亚东死拉硬拽,领着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位于成都远郊温江县寿安镇界内的陈家桅杆。大门紧闭,墙上有“正在抢修,谢绝参观”的木牌,而传得挺神的双桅杆和圣旨碑已没了踪影。

李亚东轻车熟路地敲开圆墙旁边的农家小院,露头者就是65岁的周开里,他身材高大,知书识礼,因祖上与陈家是世交,所以从小随意出入庄园,有一肚子桅杆背后的掌故。

历史血腥一页就这样揭开了。

2003年7月2日下午,我也领着朋友,轻车熟路地去了。同样花20元钱买通看门人,由一狗洞似的缝隙鱼贯挤入;也同样由周大爷充当现实和历史的三重导游,流连惆怅,不觉天色已晚。

周大爷恋恋不舍地送行,回望他以废园为背景的孤寂的身影,我耳边还回荡着他绘声绘色的讲述:“我爷爷周志远与陈地石在竹林盘里赌刀,他们互立了《生死状》,二话不说就亮出大刀片子,嗖嗖砍了起来。月亮刚升时开砍,直到第二天

太阳出头，两个人才歇手。两个人都血淋淋的，衣裳成刷把了，居然都没倒下……”

然而共产党来了，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豪绅倒下了，众多无辜的冤魂在改朝换代的枪炮声中呼喊、哭泣，直到消失，直到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老威：大约几年前，成都几家媒体曾经有“抢救川西传统民居陈家桅杆”的报道，当时我溜了一眼，没怎么在意，因为在中国，值得抢救的旧东西太多太多，新闻再如何呼吁、鼓噪，没人出钱，旧事物最终的命运也就是逐渐消亡。

周开里：陈家桅杆不是一般的民居，它大有来头。

老威：来头？至多相当于大邑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吧。

周开里：名气没有地主庄园炒得大。

老威：建筑规模也不如。

周开里：那可不见得。当然，现在破败成这个样子，已看不出当年的辉煌了。

老威：老人家，就请您从头讲起吧。

周开里：陈家桅杆占地十几亩，修了8年，据说是清朝同治8年完的工。原先的地形为三沟两渠，将庄园和外界隔开，成为一座虎踞龙盘的岛，现在沟渠早填平了，一点痕迹没留，庄园也只剩不足两亩，断墙破瓦，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今天塌一角，明天垮一方，所以政府已挂牌封闭，不准人参观了。

老威：今天算沾您的光了。

周开里：沾陈宗典在天之灵的光吧。他是陈家桅杆的第一代主人，祖籍重庆璧山县，在清朝做了多年的翰林，一品大学士，专门为皇上起草诏书。晚年衣锦还乡，因信奉道教，就举家西迁。

本想一直去青城山脚下，不料刚进温江寿安境内，就感觉神清气爽，风景如画。找风水先生一测，风水绝佳，于是陈翰林就定居下来，建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宅子。

陈家桅杆有 24 座院落，不是报纸上介绍的 12 座。照壁、堂屋、正院、偏院，一环扣一环，陌生人乍一进去，稍不注意就迷了路；更有雕梁画栋、金壁石嵌、歌赋诗词，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来历，紧系着道教的掌故。陈翰林还把青城山微缩下来，从安徽和湖北专门运来特殊石材，请能工巧匠垒了一座两层楼高的青城山全景盆栽，并将道教观庙融入其中。

老威：这可是典型的道家园林，比大邑地主庄园境界高出许多。

周开里：刘文彩、刘文辉、刘湘，当时都是土绅、军长、司令，修宅子可以，尾巴翘上天可以，就不敢立桅杆，而且是双桅杆。陈宗典的儿子中了武举，封为边关守将，于是由同治皇帝特许，在陈家庄园大门外，立一文一武两根十几米高的斗座桅杆，天晴时，两里外都能望见；同治帝还亲书斗大的“圣旨”二字，让陈家父子刻成石碑，立于宅外大道旁。你是文人，晓得一见这圣旨，文官要下轿，武将要下马，叩拜之后，方可过路。

老威：了得！

周开里：后来，陈翰林彻底看破红尘，上青城山当了道士。而这宅子一代接一代往下传，倒也人丁兴旺，到了民国，以陈家桅杆为轴心，散布在寿安乃至温江境内的陈氏后代已达数百。那时候，四川军阀派系众多，拉锯式的混战，只为抢夺地盘。胜者为王败者寇，杨森、邓锡侯、唐敬尧、刘湘和刘文辉俩叔侄等等，风水轮流转着，但所做的头等大事都是抓壮丁征粮，盘剥老百姓。多亏有陈家桅杆在，寿安地方才有安宁的日子过。

老威：是么？可我听说地方军阀都是天王老子，连中央政府

的号令都不认，哪还认得清朝的死翰林！

周开里：在这方圆十里，陈家桅杆是天王老子的老子，势力大，气焰旺。陈翰林的末末（玄孙）陈地石传下令，在各保各村都竖起保境安民的大旗，并且自己出钱出枪，组织团练，农忙耕种，农闲演兵，一遇乱兵犯境，快马就四处出动传讯，一呼百应。后来，“保境安民”叫响了，周遭地区的旺族、士绅、袍哥都上门来拜帖，寻求保护和相互声援。最后，军阀也纷纷找陈家巴结，给陈地石封官。陈地石不愿受制于谁，一概谢绝。只是解放前夕，国军兵败如山倒，他才于危难之际，一拍大腿，出任“反共救国军司令”。

陈地石治下，本地不抓丁，不横征暴敛，因为陈家桅杆就不怎么纳税，连省主席亲征的税也不交，所以那时的寿安，官民富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本地人都以陈地石为榜样，彪悍尚武，男女老幼玩枪弄棍。一遇赶场，必有人山人海的比武大会，得胜者有奖，并选入陈家桅杆的卫队。

老威：这陈家桅杆是个由地方豪绅统治的独立王国。

周开里：四川都是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手一直插不进来，好不容易借打抗战把山大王刘湘骗出省去干掉，其它军阀马上就搞割据，四分五裂。连成都都划了势力范围。以驻军为界，东城姓唐（敬尧）或姓邓（锡侯），西城姓刘（文辉）。老百姓也习惯了，哪怕猛追湾在两军混战，枪炮声隐约可闻，皇城坝的小吃摊和茶铺依旧热闹，人们吃喝得面不改色，川戏票友还在唱《风波亭》或《秋江》。

老威：那陈家桅杆是独立王国内的独立王国。

周开里：差不多，从同治皇帝到解放初期，这宅子风风雨雨，也算有 100 多年的基业。也许是命数至此，共产党打来了，覆巢之下终无完卵。

老威：听我的朋友李亚东说，你对这宅子的末代主人了如指掌？

周开里：我们家和陈家世代交好，我从小就喜欢在庄园内玩耍。当时正面有大门和侧门，平常侧门开着，由人进出；大门一般在贵客驾临时才敞开。而陈地石骑快马，打双枪，拢了门前，就马上一纵，空中翻个筋头，即落入几米高的墙里了。陈地石的三姨太生一脸大麻子，比东北大汉还魁伟，也是要双枪，不瞄准就开火，百发百中，她是老公的贴身保镖；另外，还有“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腿快枪快，所谓腿快赛过马，枪快比过风。这三员虎将，人人见了都喝彩。

陈地石的卫队有九九八十一人，个个都是神枪手。有一次，卫队里的一个镖头在家里与老婆角逆（当地土话，意为打架），那婆娘也不是吃素的，隔着灶台，连飞去两把菜刀。镖头一闪一蹲，只听得耳边嗖嗖两声，好险！他顿时毛了，就从腰后摸出双枪，崩崩开火。那枪打得蹊跷，不中要害，却像泼水一般贴着皮肉，密不透风。婆娘吓瓜了，从灶房跑到睡房，又从睡房跑出来，站在院坝中央跳脚。镖头射完了几匣子弹，才停下来吹枪筒的烟，再定睛一看，婆娘的衣裤却已碎成渣渣，几乎成了光身子，却毫发无损。

老威：老人家，这有点评书的味道了。

周开里：这样的事儿还多，你不信，我就不深说。总之，解放军、工作组刚到时，正是考虑到陈家桅杆的影响，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才使软绳套猛虎，通过谈判，劝陈地石投诚。陈地石晓得大势所趋，就在共产党承诺不动他家一草一木的前提下，答应接受收编，解散团练，只保留八十一人的贴身卫队。

接着闹土改，工作组挨门挨户访贫问苦，阶级斗争的大道理讲了一筐又一筐，但群众就是发动不起来。大伙哪敢到地主家去

分东西？陈地石不发话，乡上村上的会都开不起来。工作组只好去庄园请“开明士绅”到场，陈地石一去，会场就挤得满满的，明明是斗地主的忆苦会，却开成对陈家的歌颂会。政府的脸挂不住，解放军荷枪实弹，一个营围住了会场，却不敢对陈地石轻易动手，因为他带了十几个挎双抢的保镖一道赴鸿门宴。

陈家和新政权周旋了近两年，私藏了大量枪支弹药。解散了的三万多人，明里回家种地，暗里却仍是招之即来的兵勇。解放军曾调查到陈家缴过窜至本地的胡宗南败兵的械，得了上千套军事装备，但陈家百般抵赖不上交，省里市里来人做工作，也软硬不吃。

老威：胳膊哪拧得过大腿啊。

周开里：拧不过也得拧，因为土改是国策，深入不下去，就得拿拦路虎开刀。陈地石“保境安民”的祖宗规矩要破了，他晓得日子长不了——连卫队中，也安插了党代表，今天找这个，明天约那个，一心做陈家桅杆的反水工作。

陈地石觉得自己的一再忍让，不仅换不来共产党的信任，反而受尽窝囊气，被逼入死胡同。“撕破皇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于是他在亲信们的怂恿下，发动叛乱。

那是1952年正月初十晚饭后，卫队集合，党代表站在石碾上，正发表革命形势大好的演说，只听崩的一声，他就中弹栽倒，并且至死不明白从哪儿开的枪。

干掉党代表是个信号，陈地石全副武装，登高训话，接着快马传书。寿安地方的青壮汉子个个揭竿而起，重返陈家桅杆，领取枪支弹药，恢复团练的番号。几个钟头就聚集了三万多人。当时正值清匪反霸，崇庆、彭县、大邑、邛崃等地的袍哥大爷，正在山里与剿匪部队周旋得苦，突然接报，像快淹死的人捞到根稻草，立刻突围，急行军几十百多里，增援陈家。

陈家的旗号仍是“保境安民”，所以大本营设在庄园里，沿东西南北，连夜挖了几层战壕。眼看要打仗，老百姓就携小搀老，连夜逃难。只见田野道路，密密麻麻滚动着人脑壳，陈家沿大道设了几线马灯作路标，指示人们出境，不料人河淌得过于缓慢，凌晨四点钟，剿匪大部队开到，有一万多人。昏天黑地，民匪难辨，双方就不问三七二十一交上了火。当时我才十几岁，也夹在逃难人群中，只见往还的炮火，像马蜂窝炸营一样嗡嗡，搞得人不晓得该朝何处跑。

我亲眼所见，周围十几个人倒下，有一个腿炸没了，还在炮弹坑里乱刨乱抓，喊救命。有个背娃娃的婆娘，脊梁上血糊糊，娃娃已经被子弹崩开膛了，她还不晓得，一会儿朝左跑，一会儿朝右跑，躲开了炮弹躲不开子弹，她就在我前头栽下去，不知是绊倒还是挨了打。

还有人扯我的裤脚，可我也爹啊娘啊地乱叫，几乎路上的家庭都失散了，因为在暗中，躲子弹，人是慌的，见坑也跳，见坎也跃，比畜牲还不如。直到天色麻麻亮，我才发觉夜里逢上鬼打墙，又绕回到陈家外面。

我趴在一条田埂下，只听得机枪声嘟嘟的，像开了锅的水，而且一直不间断。解放军的武器好，有正规作战的经验，所以占了上风。天大亮时，几条防线都突破了，包围圈缩小到庄园附近。陈地石的大部队都打散了，只剩下铁杆卫队还在顽抗。

老威：我在成都生活了几十年，还从未听说过这么惨烈的战斗。

周开里：当时那硝烟，像起浓雾一样，把太阳都遮没了。好几里罩着雾，陈家桅杆周围的空地、竹林盘、圣旨碑底，那子弹壳铺满了，双手一舀，就一大棒。血啊，脑浆子啊，碎布片啊，挂在枝上，混在泥里。人都没了，地遁了，所以不觉得惨，只是

过后想起来，觉得害怕。这寿安，村村户户，青壮年都去了大半；而解放军阵亡了一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老威：死了一千多？有没有夸张呢？

周开里：没夸张。土匪的阵亡数字还要翻几番，田坝地头随便捡，拖到一处，堆成一匹山。然后由解放军挖坑，耗了一整天，坑才挖好，把尸体丢下去，填平了，种了些树。而解放军则烧了，名字刻在县里烈士陵园的功德碑里。

老威：是纪念碑吧？

周开里：意思和皇上赐的功德碑差不多。

老威：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战斗场面？

周开里：太多了。陈地石的卫队，八十一人，每个平均都欠了共产党好几条人命。双方交火前，村民都看见他们把一男一女两个共产党干部绑到水渠边，用脚踹跪下了，就崩崩两枪，两个干部叫了声“妈呀”，百米外的人都听见了，还感到蹊跷。因为干部给农民的印象不应该叫“妈呀”，而是宁死不屈，喊两声其它的。

已过去五十几年，我这一闭眼，还能感觉到机枪嘟嘟嘟的，开了锅，压得陈家抬不起头。眼看庄园要攻破了，却见陈地石的镖头跃出墙，眨眼间，连翻跟头，就在地心滚碾子一般旋着双手开枪，把机枪手撂翻，接着一口气撂翻了八个兵，再夺过机枪，箭步射了回来，一查验，自己身上也挂了好几个窟窿！

就这样对阵到中午，解放军吹响冲锋号，浪头一般涌上来。陈地石中弹死了，卫队死伤大半，陈家桅杆被占领了。之后，园里的巷战又进行了大半天，直到肃清残匪，园内几乎没剩下活物。

这仗打了十来个小时，这边是团练、家丁、庄稼人、乌合之众，那边是炮火先进的从延安一路杀过来的正规军，能扛这么久不错了。那时交通也落后，邻近几个县来汇合的土匪在瓢把子老大的率领下，紧赶慢跑，不料在半路就打探到已平叛的消息，只

好折返回去。

接下来就是将陈家桅杆充公，骡马车在路上牵成线，搬运庄园里的粮食、财物、金银细软，搬了好几天。拦路虎崩掉了，政府就放胆开展清匪反霸，寿安一带，凡是跟着陈家桅杆，与解放军交过火的，管你是啥子阶级成分，都定为土匪，统统脱不了手。工作组在解放军的护卫下，走村过户，进行清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群众口头揭发检举，马上拿麻绳绑人到乡上关押。当时的公审大会是一个星期开一次，主要是毙人，少则5个，多达32个，眨眼功夫就报销了。群众挤在主席台下，谁讲话谁宣判都不留意，只垫脚打望五花大绑跪在台下的坏人，他们或许昨天还在种庄稼，还在田埂上与你对火抽叶子烟，说不定就是你的邻居，你舅子的舅子，今天就被绑来吃枪子了。

陈家桅杆外面也开过许多次公审大会，四乡八邻都赶来，看毙陈家的人。陈地石的三姨太，打双枪的大麻子，挨了一梭子弹。开枪的兵边射边骂，还呜呜地哭，可能是战友死多了，解放军要报仇。沟里的水都染红了，地也被人肉蚀得特别肥，抓一把起来，油浸浸的，泥巴的汁水是土红土红的，直到几十年过去，这周围的林木、庄稼还是长得快，比其它地盘快。

陈地石的叔伯弟兄×××，本来没参与打仗，却被定为“恶霸地主”。由于他吃斋念佛，在乡里人缘好，所以几次批斗会都没开起来。为了逼他向人民低头认罪，工作组派人将其按进一个石头水缸，整个人泡着，只露半个脑袋。然后抬来一架风斗，几个人轮换着绞，将一阵阵夹着糠壳的风直吹过去。这个刑叫做“养金鱼”，寒冬腊月，水面都结冰了，体质再好的人，都经不住水泡，更别说又泡又吹了。可说来奇怪，这人连养了三天金鱼，出水时只打了几个喷嚏就没事儿了，也不晓得他练的啥子功。

此人是陈家桅杆命最大的，第一次押他去乡上接受公审时，

突降瓢泼大雨，会开不成，只得半路返回；第二次，政府铆足了劲要枪崩他，不料又是瓢泼大雨，并且一下一整天，连个停顿都没有，据说大道小路全淹没了；到了第三次，你以为肯定该死了吧——上面毙人的政策又变了，只有区政府以上才有权批死。这位老兄捡了一条命，被改判有期徒刑 17 年，最后死在劳改队。

老威：陈家桅杆还有后人么？

周开里：这一带，陈家后代好几百，但都属于远亲，不是直系。

老威：这么漂亮的老宅子，如此破败，怪可惜的。

周开里：这是个土匪窝，又没像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那样，竖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所以过去没任何维护。53 年，这儿是棉麻仓库；54 至 56 年，倒还辉煌过一阵，成为军政学校，国共两党的许多退休将军进进出出，讲课、休假，优哉游哉；58 年大跃进，这儿又成为公共食堂的粮食仓库；61、62 年生活紧张，庄园里的集体财产几乎被偷光了，连房梁也差点让人锯下来卖；接下来就破落了，有几户人在里头养猪，屎拉得到处都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重庆开来十几卡车红卫兵，据说是陈翰林祖籍重庆璧山县的“反到底战斗队”，乒乒乓乓砸了一整天，梁上墙上的雕刻被当作四旧铲了，字画、对联粉碎了，连喷水池的蛤蟆头也被斩下。这次毁得彻底，园里显得空荡荡了。在 1985 年，陈家桅杆定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前，院墙外都是猪圈，臭气熏天。后来国家强令拆除，这墙至今还有好多搭猪圈留下的插洞。

老威：既是“文物”，政府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

周开里：前两年，报纸上登了陈家桅杆的大幅照片，认为这样有价值的民居毁了太可惜，应该开发利用。省市领导多次来视察过，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也来过，一个车队乌啦啦的一片官，可也就热了一泡屎的功夫。时过境迁，政府把恢复工程包给了私

人，一个文盲老板，弄了三年，修了座大门，结果完全弄错，成了一座烧香拜佛的庙门，而侧门就干脆省略了。刚才你们进去看过，地基多，断墙颓壁多，能遮雨的房子几乎没有，满园子杂草、污水坑，维修的木板堆在那儿，都朽了。

老威：乱整一气，跟破坏没区别。

周开里：维修老板曾拿着图纸来拜访我，我费尽口舌，一点点指出毛病。他发火说：“大爷你也太挑剔了，政府不出钱，我做的可是赔本买卖。”我当场揭穿说：“政府咋没出钱？省里市里都拨了钱。”他承认上面是拨了款子，但是到了乡里，就被当官的吃掉了大头。他说：“大爷你不晓得现在的乡官胆子多大，连皇帝买马的钱都敢花！再从牙缝里抠点零头，硬要承包给我，摆摆抢救文物的样子。所以，水泥、木材、砖瓦都只能选便宜货，请的工人也是便宜货，哪能与清代的上等建材和能工巧匠相比？！”

老威：上面没追查么？

周开里：问题多，查不过来。大前天，乡里的书记大白天被人砍了，群众拍手称快。这路面不太平，专抢公共汽车的毛贼好几拨，公安打掉一拨，其它就逃到邻县。所以，时代变化太快，天天有热点，陈家桅杆迟早会被忘得干干净净。可惜满园的诗词歌赋、楹联妙对……只好让孤魂野鬼们去慢慢消遣。

附：陈家桅杆偏院内遗诗一首——

春花开得早，
夏蝉枝头噪，
黄叶飘飘秋来了，
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
倒不如早清闲，

乐逍遥，
虽不能成仙了道，
亦不至混俗滔滔。

了一居士题

反革命分子刘德

采访缘起：刘德这个名字，我最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那是 1992 年隆冬的某日黄昏，我与老李一块在大墙内兜圈暴走，不料他突然刹步发问：“晓得刘德么？”我边摇头边继续赶路，他只好追着我叫道：“此人是 1985 届反革命，因为一堂课，判了 7 年刑。”

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李必丰没头没脑、独往独来的艺术家脾性，你若较真，他反而会前言不搭后语。直到 2002 年隆冬的某个夜晚，我再次听诗人雨田提到刘德，内心不由一震，赶紧打探，得到此人仍在绵阳本地做临时工的确切信息。

圣诞节前夕出了点事，我家受到警方突袭，散失了部分冤案资料，但我始终没停止追踪刘德。几经周折，我终于在 2002 年 2 月 21 日下午从成都出发去绵阳，约见一位刘德的故交。经四处联络，方在天色黑尽时探明刘德的大致去向。

我们找了辆车，在城郊十几公里的路段来回跑了三趟，终于在一加油站旁边发现一鬼火闪烁的土路。车缓行几百米，在一派凄凉中抵达新华书店储运料仓库的门。叫门，无人应答。我们才注意到在车灯照射中的楹联：“祥云普降意欲达；金光高照气如虹。”原来是座无殿无香火的弃庙。

我们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到底感召了守门人。“刘德？”他将我们上下盯了好一会儿，方接过我朋友的小灵通（一种类似手机的区域性通讯工具，因单向收费而备受用户青睐——老威注），给一个双方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得到不是匪类的担保后，就给了我们不确定的指点。跟着，我们就驶入了迷

宫中的村庄，并迎着寒风探出头，撕心裂肺地叫“刘德”。犹如一个梦，所有的房屋都相似，脑袋一个接一个从二楼或三楼窗户探出来问：“喊啥子？”这儿没刘德。”

车再次撤退回来，载上守门人进村。我们停在一个路口，守门人下车，七拐八弯，消失了大约半个钟头。终于有一只手在黑暗中向我们招摇，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墙根蹦出来说：

“我是刘德，你们跟着我，绕过两根土埂和一个大坑，就到家了。”

老威：刘德先生，总算找到你了。

刘德：这荒郊野地，真有点难为你们了，没跌跤吧。

老威：我们从成都出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快车，抵绵阳天已快黑了。没顾上吃饭，就赶到新华书店宿舍，在大门收发室，那位仁兄一个个联络与你沾点边的人，小灵通都用得烫手了，才打听到你在这离城十几公里地租了间农舍。

刘德：农舍？太雅了。你当我是晋代陶渊明躲在这儿隐居么？

老威：你没电话，没呼机，也没有门牌号码，相当于隐居吧。

刘德：原准备安个电话，想想又算了，白交几十元话费，图个热闹，不好。热闹要惹祸。

老威：这房实在太简陋，还是毛糙的水泥墙面，连钢筋都露在外头。家徒四壁，你空荡荡的朝里一站，倒像个搞建筑的民工。

刘德：我就是民工，不过一般民工都这个地那个地流动，我这个民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钉在新华书店库房里捆书、码书、装书、卸书，月工资 500 元左右，所以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跑这么远栖身。难啊，老婆是农村户口，一家三口的嘴都拴在我的裤腰带上。

老威：不容易。

刘德：像控诉旧社会的歌里唱的，星星满天就出门，走出一段村子里的黄泥路，去赶进城的头班公共汽车。我是临时工，饭碗没保障，所以不敢迟到。好在干体力活不费脑筋，人一累瘫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老威：你一个四川大学的老牌高材生，曾经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如此安于现状？

刘德：这是命。

老威：那我们今晚就从你的命谈起吧，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你的大致情况：出生于四川安岳乡村，1977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不愧为天之骄子……

刘德：以我当时的成绩，可以上全国任何大学，但我出于乡土观念，最终选择了川大。77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多叫人羡慕呀！不仅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瞩目。我们中文系，102位同学，大约30%为高干子弟，另60%有家庭背景及知识渊源，只有6位同学来自农村，我呢，就是这6位中年龄最小的。

老威：不简单。我晓得77、78、79，连续三届高考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因为65年后，由于“教育要革命”，致使高考中断，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从学校涌入“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政治方面早熟了，可青春和学业却被耽误了。

刘德：老三届的特点是年龄偏大，自学能力强，思想活跃并超前，加之教材滞后，经常在课堂上，老师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无所适从，无法照本宣科。因为稍不留意，就会受到诘难，下不了台。这可是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呀，当红卫兵，造反，武斗，上山下乡，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要说辩论演说的口才，随便抓一个都比老师强。但是，历史的错位使他们成了学生，在

当时，也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在一夜之间鸡犬升天。回忆起来，我对课堂印象不深，激动人心的好时光都在课外，例如参加锦江文学社，写诗、小说和评论。伤痕文学很风行，文学社自筹资金创办的《锦江》文学杂志影响相当大，在校内发行一部分，我们就成群结伙，拿到校外去卖，春熙路、总府街、校门口、锦江宾馆周围都是发行点，一元钱一本，抢购一空，没买着的还不甘心地追着我们问这问那，场面火爆。那时，文学社最有名的才女是徐慧、龚巧明，一诗人，一作家，诗文的特点就是伤感，叫人读着读着，眼里不知不觉有点湿润。她们毕业后，都分配到作协，徐慧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干了一段，不久就出国了；龚巧明一腔热血进藏，写了不少好小说，却死于一次翻车，太可惜了。另外，评论界的名人王岳川，北师大教授，我在中央电视台还看见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老威：解冻之后就是文学的繁荣期，毛死后的中国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些相似吧，民间的各种压抑已久的情绪都想借文学发泄出来。好了，长话短说，你毕业后就分配到绵阳吗？

刘德：先准备到《四川日报》内江记者站，因名额被会拉关系的一位同学占了，只好再分配到绵阳地区文教局。84年，文教分家，我就到文化局所属的《剑南文学》杂志当编辑。现在这份杂志属文联，还在办，不过主要刊登中、小学生的作品，发行渠道也主要是中小学。

老威：记得80年代，我还在《剑南文学》上发表过散文诗。

刘德：文学时代嘛，所有的杂志都火，名家稿子也多。绵阳地区不少作家都是通过《剑南文学》走出去的，赵敏，女诗人；郭同旭，气功大师严新的专职吹捧作家，一本书卖好几十万本；还有雨田，得过两岸很多奖的本地大诗人，过去跟我在同一张桌子编稿。绵阳是省会成都的卫星城，文学青年一浪接一浪，在学

校，文学社团更是雨后春笋，密密麻麻地长势喜人。为了适应社会，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剑南文学》的编辑或作家、诗人经常应邀去学校讲课。

老威：多少钱一课时？

刘德：完全免费。那年头有一点上延续了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蔑视金钱，至少不重视金钱。特别是以普及文学为己任的文化人，一说钱，自己都觉得该煽自己两个嘴巴。我敢说，当时所有的杂志编辑都讲过课，而不像现在，编的编，写的写，分得很清，举手投足都要经济效益，所以就只有文学垃圾而没有文学。

《剑南文学》小说编辑耕夫是我的朋友，他与本地各中专混得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课讲，忙不过来，就摊派些“任务”给我。1985年5月17日晚饭后，一辆大货车开到我的住处，车上跳下一群绵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热情洋溢，不由分说，将我“请”上货车就一阵风驰电闪，驶向该校礼堂。

老威：这么说，全校师生都出动喽？

刘德：没有。开始礼堂内就20多个学生，因为那年头请校外文人讲课很风行，跟日常生活一样，我又不是名家。但是我年少气盛，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比许多名家更有名堂。果然，我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续讲了三个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而听众也由稀稀拉拉的20多个增加到好几百，不仅座无虚席，最后连过道、窗台、门口都挤得不透风。许多人挤不进来，就一堆堆地趴在窗外，我边讲边用眼角环视左右——连一人多高的护窗，甚至树上都有人。

老威：你也算超水平发挥了。

刘德：现在这副倒霉的小老头模样，你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刘德了。《列宁在1918》，记得吧？如果让我继续发挥，我能讲到天亮，那场面说不定比老电影“1918”中的领袖演说还要壮观。

我的题目是《今天和今天的文学》，作为例证，我评论了众多当代作家及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故土》、《花园街5号》。由于解放军作家李存葆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受到官方推崇，风靡一时，我就拿它作为靶子，阐述了我与正统的“主旋律”相左的观点。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就该反对一切战争，包括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也反对。

老威：现在的所谓反战同你80年代的反战可不太一样。

刘德：总之，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堪称战争英雄的将军，他的双手肯定沾满了鲜血，古往今来都如此。可《高山下的花环》却从正面肯定，渲染了非正义的战争，鼓励战士们去送死。

老威：这叫爱国主义。

刘德：中越、中朝过去都亲如兄弟，因为要并肩作战，打美国鬼子；后来美国鬼子跑了，人家要搞人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要投靠苏联了，我们的脸面下不来，两兄弟马上反目为仇。先是老山的边界摩擦，然后投入野战部队，终于一口气打到越南重镇谅山。深入别人国土几百公里，还叫“自卫反击战”么？当然，这是国家行为，小人物奈何不得，但总可以发发议论吧？兄弟邻邦打来打去太没意思了，而文学对一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有另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

老威：《高山下的花环》我也读过，还拍成了电影。但是现在，我几乎全忘了。这种按中央文件打造的应命文学，虽然名噪一时，但留不下来。花环飘零后，花环下的累累白骨就再也引不起后人的兴趣。

刘德：我的话还没有你说得狠。

老威：我恍惚记得魏京生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也就是说，他在中越之战打响前夕，同一位西方记者聊到当时路人皆知的时

局，并阐述了与你相似的反战观点。他因此坐了十几年牢。

刘德：我不晓得魏京生，但同老外侃国内敏感问题总有不妥。

老威：除了文事，你还涉及到哪些方面？

刘德：我谈到改革，中央雷声大，地方雨点小。比如绵阳，人事机构越改越多，越改越浮肿庞杂，编一份文学月刊，两三个人就够了，偏偏十几、二十个人，从科级到处级，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还谈到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历史倒退，百姓遭殃；我还点评了“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抵触。因为说到底，执政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合法性就值得怀疑。

老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 1985 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 1984 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 1983 年 1 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 1985 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德：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

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60%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老威：你在骂我？

刘德：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老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德：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1985年5月26日，也就是9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人士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7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8月26号，我入狱刚满3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

王剑。王律师 30 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11 月 6 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老威：真他妈胡扯。

刘德：接着宣读了证词，即工业学校 50 多位师生写的揭发材料。我的脑袋嗡地大了，因为证词上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老威：比如哪些话？

刘德：就是《起诉书》《判决书》里引用的“我要看到共产党垮台”，“新的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新的政党代替共产党”之类。

老威：有证人出庭吗？

刘德：没有任何证人露面。我当时情绪反应强烈，一再要求揭发者出来与我当众对质，都被法官喝断了。什么群众揭发？公安局和校领导往师生跟前一站，再启发、动员，谁还能不写？文革中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夫子弄成一家子，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写了批判文章吗？

老威：有演讲录音吗？

刘德：我的律师也质疑过，没录音，没证人，所谓证词也是学生们事后根据回忆提供的，这就不能排除诱供，受唆使作伪证的可能；甚至证词提供者是否在场都值得怀疑。公诉人回答不上来，律师就趁势申明我无罪，并强调不能把过激的政治言论或政治错误与犯罪混为一谈。眼看公诉人招架不住，法官却赤膊上阵，

连吼住口，并威胁要把律师赶出去。

老威：这幕闹剧太有意思了。

刘德：公诉人有法官撑腰，缓过劲来，又继续出示东拉西扯的证据，《剑南》负责人谢××、刘××创作的“我一贯对党不满”言论，连玩笑话也记录在册，什么“犯了毛病你要改，你不改，要劳改”等等。连我谈恋爱也被斥为“流氓罪”，警察还调查审讯了我的对象×××，与我保持通信的×××，×××，指称要流氓也同反革命有前后因果关系。我的律师气得脸都变色了。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奈何？终于，法官看了看表，宣布休庭。整个过场走了一个多钟头，稍后接到判决书，徒刑7年，剥权3年，我不服上诉，被驳回。原来我的刑期早就定了，开不开庭都是一个结果。

老威：你咋晓得刑期内定了？

刘德：律师透露的，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离开了绵阳。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案不由公、检、法说了算，而要上报政法委员会。省里管政法的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主任。

老威：我明白，政法委属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它既管法院，又管律师。不少案子，连当事人的律师及辩护口径都由政法委安排。

刘德：关于我的事，海外报道很多，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都做了醒目的标题，如“共产党培养的反党大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据说四川方面把我作为反动典型报到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乔石还签了字：“此案全国少有。”并把四川的刘德反党反人民与上海的杨巍投敌叛国相提并论，要杀一儆百。

老威：听李必丰讲过，你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

刘德：铁案嘛，翻不了。随后去四川广元荣山煤矿投入劳改，编入掘井队，没日没夜地陷在几十米深的井下。不过，我的个头

矮，腿软皮松，只能跟在打巷道的屁股后干些杂活，修修水沟，调调水泥。一年多后，时来运转，我上地面当起了教书先生，教文盲劳改犯识字，瞎混了四年余。

老威：你被整服了？

刘德：我申诉了五年，每年至少申诉 10 次以上，每次我都把申诉状同时抄写六份，中央、省、市各相关部门一份，同时投寄出去。

老威：有回音？

刘德：石沉大海。最后两年，大队长找我谈话，暗示只有停止申诉才能减刑，于是我照办，监狱就给我减了两次，让我提前一年半出狱。

老威：按常规，政治犯是很难减刑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刘德：你指国际压力吧？我承认，自判刑以来，海外媒体一直关注这件事，西方各人权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坚持追查我的下落。但是他们和我的立场、情感不一样，他们只会干扰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

老威：我不明白。

刘德：我出来后收到不少信、杂志、书以及贺卡，寄自英国、荷兰、挪威、美国，有普通的同情我的市民、学生；也有各个国际笔会中心，他们一直想帮助一个叫刘德的在狱作家。可惜劳改时，我蒙在鼓里，政府对内对外都封锁了消息。这是毛时代的传统，你施压越凶，他反弹得越厉害，就像大墙内的红衣主教龚品梅，关了 30 多年，西方年年都在呼吁，连罗马教廷和政府要员都数十次出面交涉，要求放人，可咋样，牌在我手里，想押多久就押多久。幸好我不够资格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张牌。

老威：你这种心态有问题，你冤枉坐牢，别人关注还有错？

刘德：邀请信不少，挪威、德国、美国，组织和个人都请我

去，人家把我当成历尽沧桑的作家。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会外语，除了早年给《锦江》投了几篇幼稚习作，几乎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所以，在所有的邀请中，我只选择性地给英国笔会中心回了一封信，大意为：1、我本人不是作家，因此不会接受对一个作家的邀请；2、我没有作品，因此没资格，也不会考虑成为国际作家笔会的会员；3、作为中国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应当爱国。当然，如果能去西方旅游观光，我很乐意，可是没钱没护照，去不了。

老威：你倒诚实。

刘德：老实人吃亏吧。鲁迅先生说：一个人说真话，就不被别人理解。

老威：被人理解是两方面的，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寻求别人理解你嘛。

刘德：啥意思？

老威：你先是被动坐牢，到后来，你不知不觉放弃了前半生那种闪光的青春冲动，自我封闭太久，灵魂就成监狱了。

刘德：一个人的命是有定数的。

老威：知识分子也信命？

刘德：我老家安岳乡下，出了个算命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19岁那年，这位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以及腰间的一颗大红痣，就掐指算出我22岁要离乡外出，读书升学跳龙（农）门。当时没人信，因为1974年，老毛没死，文革还在搞，城里人出差还要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证明呢；一个农村娃离乡去升学，更是天方夜谈。于是我妈就请求作进一步解释，先生爱理不理地抛了句“天机不可泄露”。

果然，这天机就是唐山大地震，中国连死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接着粉碎四人帮，再接着恢复高考。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

那可是我老家几十年出的第一个状元。

老威：这么神？也许是撞上的。

刘德：更神的是 1985 年，我出事前的半个月，一向不太出门的妈妈到绵阳来，硬要拉我回家避祸。我年少不懂事，就嘲笑妈妈迷信。可老人家说：那神算先生推断我有牢狱之灾，要离开绵阳这是非之地，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先生还说：要老实，少说话，少动气，切忌跟人吵，这一劫要持续到 1987 年阴历 8 月间，不出事，方免。

我不信这一套，妈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总算回去了。唉，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第三次是 1992 年，我新婚燕尔，就趁回门，把妻子的生辰八字给神算先生看。先生把我的八字重新翻出来，对照着，边掐算边念念有词地“合八字”。结果，脸色刷地变了，连命金也不收。我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不死则离”四个字。我像挨了一闷棍，晕乎乎地回到家中，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我前妻真从二楼摔下来！当时她正搭凳子，垫脚往阳台上晾衣服，不料旋头风一刮，她就倒栽下去，脑壳戳在铁桩上，头盖骨都稀烂了。

老威：你就整日生活在一种无休止的不祥预言里？太可怕了！

刘德：这位算命先生是我的隔房亲戚，前妻亡故时，他又对我说：再婚，改变个性，融入这个世道，学会巴结，讨好大家，哪怕一泡屎也要当饭吃了；要提醒自己，一天至少笑三次，开头不习惯，不自然，渐渐就习惯成自然了，笑得把啥子苦事都忘了。直到时来运转，突然变天，我平反了。

老威：你能做到么？

刘德：做不到，所以要慢慢磨。我是一颗灾星，从读书升学开始，就注定了劫数不断，还连累家人。妈妈死了，是被我气死的，她患有风湿心脏病。我坐牢，家里一直瞒着她，瞒了两年，

到底露馅了。她喊着我的小名，突然就倒在地上抽搐，造孽啊。

我爸爸是老革命，1950 年在天灵山武工队剿匪，立过功，与他同时代的人，起码都当地委书记了。可他恋家乡，怕出这门，就留在村里当生产队长和会计，20 多年了，德高望重。可这一来，成了反革命的老子，威信一夜之间就扫地了。乡里乡邻指指戳戳，干部就当不成了。连两个弟弟也受到歧视，被迫退学。

老威：跟他们有啥关系？我坐牢时，我爸为了打探儿子的音讯，还养成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呢。

刘德：大城市和乡下，一个天一个地。我两个弟弟读书都是第一名，升学没问题的，但是同学都不理他们。后来，老师找他们谈话，说为了不影响学校名声，你们自己离开吧。

老威：后来呢？

刘德：他们和妹妹都外出打工了，听说在新疆和浙江的啥地方。总之，已经多年不回家了，一个乡间的旺族就因我而衰败了。

老威：你没想过离开这地方？

刘德：到哪儿都这命。

老威：你一边在算命，一边在下意识地抗命。

刘德：那就到此为止吧。

上书者蒋朝才

采访缘起：2002年11月30日下午，天气晴朗。我在四川省高院接待室门口，撞见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农民，当时他正被两个武警战士从里面架出来，扔到街上；一个上访群体中常见的装材料的蛇皮编织袋也被甩出来，并擦过我的肩头。我急忙去扶摔跟头的人。两武警骂道：“傻B上书？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

农民回骂道：“老子照得很清楚，给胡锦涛的书上定了。”

武警道：“再闹，就送你进收容所。”

农民道：“进阎王殿老子也要上。”

武警作势抓人，围观者急忙劝架，我揪住这高烧不退的家伙撤进僻巷一家茶馆，几杯滚水下肚，双方就有了相间恨晚之叹。我当即奉读了自学成材的乡间文人蒋朝才先生的《致胡锦涛总书记暨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书》，虽文字谬误极多，可也算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于是我一手持蒋先生大作，一手持笔作访谈，不觉天色将晚。可惜接近尾声时，老蒋对我的身份和谈话目的频频质疑，我闪烁其辞，他就“为安全起见”而收回了我准备据为己有的蒋文原件。

幸好访谈已成，在此，将它与蒋氏上书中涉及到的李玉英婆婆之《求助书》一道，公开于后。

老威：听说您给中共中央16大上了一道《万言书》？

蒋朝才：这叫“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上台掌权，这是我一个沿街乞讨三年的特殊公民献给他老人家的第一份贺礼，至于他有没有度量消化这份礼，我们就等着“以观后效”吧。

老威：您在《万言书》里写了什么？

蒋朝才：我列举了发生在四川地区的 10 大久拖未决的冤案以及社会影响，指出这是由于前几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腐败，高耗低效，执法犯法，不顾人民死活造成的，希望这一届领导能够把平反冤狱提上议事日程，向古代的包公学习，用虎头铡斩一批公、检、法系统的败类。否则，难平民愤，就将造成以暴抗暴，天下大乱，亡党亡国的后果。

老威：您的忧患意识令我佩服。

蒋朝才：我也佩服您这样的作家，如果老陆早介绍，我就会把《万言书》的草稿交给您修改一下。我只有初中文化，言语表达上不太顺手，律师又看不起这些东西，认为是“开玩笑”。

老威：既然已经递上去了，您的心意也就尽到了。

蒋朝才：我向中央、省、市各级部门投寄了 100 多份，大街小巷还张贴了一些，真奇怪，一直还没有人来收容我。真名实姓和地址都落在《万言书》上，找我很容易——这要在前两年，我早就进多宝寺（成都郊区有名的收容所，据说一年羁押南来北往的三无人员达几万人次——老威注）了，从这一点看，胡锦涛还是比江泽民有人情味。说不定，共产党内部正在议论我的上书，考虑部分接受我的建议呢。

老威：这么有把握？

蒋朝才：我读报纸很细，胡锦涛提出“政治文明”，这和江核心的物质、精神两文明是有区别。

老威：您最盼望上面采纳您的哪些建议呢？谈具体点。

蒋朝才：我提出解决冤案的具体措施是，从全国各地秘密抽

调出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干部，共产党员占一半，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一半，集中到一个绝对保密的地方受训。每天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包公、海瑞、狄仁杰的语录，讨论这些先贤是如何办案，如何体察民案，如何身先士卒，两袖清风，用他们忠君爱民的头脑代替自己贪财贪色的现代头脑。然后，由胡总书记亲自提口袋，亲自授给钦差大臣们独立行事的金牌一面，再分别派向各省、市、区、乡、镇进行微服私访。当然，众钦差大臣都要严守总书记御定的纪律，不能惊动当地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具体方案是，化装成身份不同的人，特别是流落在外乡的社会底层民工、妓女、上访人员、乞丐、收荒匠、买血的、耍把戏的、跑江湖的、做小生意的，深入到各地上访群体、建筑工地、垃圾场站、城乡结合部以及居民小区、乡村集市，平等地调查了解当地民冤和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真实地位和形象，找出原因及对策。对于有影响的案子，要及时升堂处理。当然，由于冤情遍布，民间有许多过激的言论，例如因“阚定明聚众闹事案”在南充地区影响太大，川北许多的农民称共产党为土匪党、贪污党、侵华日军等等，钦差大臣们大可不必计较。应该看到老百姓胆小、善良、爱国忠君的主流。狗急了跳墙，兔子憋慌了要咬人。千万不能做贪官污吏的同党，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持不同政见者、达赖喇嘛、法轮功和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那么“三个代表”就将泡汤，千古之罪名……

老威：您不愧为上访人士中的演说家。

蒋朝才：您觉得我的设想如何？

老威：耳目一新，虽然操作起来有难度。

蒋朝才：您听我讲完……

老威：这个话题太大，我们改天再详细探讨，现在说说您自己，咋样？

蒋朝才：我是四川省威远县蚕马镇 10 村 3 社农民，28 岁，初中文化，因弟弟蒋朝坤被逼致死，所以倾家荡产打了这场官司。1999 年元月 8 号深夜，我弟与本村的几个小青年躲在村东头水冬瓜家里搞小赌博，用扑克牌押金花，一元钱一注。正玩得高兴，屋子外看家狗老黄突然狂叫，大伙立即藏牌灭灯。水冬瓜从窗帘缝朝外瞅，不料嘣地一响，老黄被一片满天星放翻，狗嘴顿时裂成几瓣了。大伙吓得人腿变狗腿，抽个不停。正愁没有地缝可钻，门砰地被踹开，十来支大手电乱晃，随着，电灯拉开了，房内房外都是人。原来是镇长、执法大队长、派出所所长率领执法队伍抓赌，已在村里挨门挨户搜了七、八家，终于由举报人员带路，瓮中捉鳖，将六、七个参赌人员围在屋中。

赌资没收，又抄家搜身，抽掉每个人的裤腰带，准备把这一连串的倒霉蛋押回派出所，拘留罚款。执法大队个个喜气洋洋，因为又可以分奖金了。一年到头，他们抓赌抓嫖越勤，奖金就分得越多，所以“执法”这项肥差，人人都想沾，但必须同镇政府、派出所勾兑，多上供，菩萨才会点头。我弟生性顽皮，20 来岁的人，就喜欢凑个热闹，不料撞在枪口上，几十元赌款泡汤，还要罚钱。按惯例，至少 500 元以上，否则就拘留 15 天。我弟提着裤子，越想越怕，家里本来就穷，500 元，够乡下人吃一年了，说不定，你累死累活，扣除各种税费和几级提留款，还剩不下 500 元呢。

老威：既然如此，为啥要赌？

蒋朝才：快过年了，又是农闲，乡下没啥玩的，所以年轻人就凑一块赌点小钱。我还念叨着过了这个年，就带弟弟进省城打工呢，没想到他命里只该长这么大。傻东西在路上，撞开执法人员，撒腿就跑，一大拨二警察（群众对联防队员的戏称——老威注）脚跟脚撵，追到一座水库边，我弟无路可逃，就一头扎了进

去！你想想，寒冬腊月，水库里都结冰了，我弟在下面搅着冰碴，哇哧哇哧，至多扑腾了十几米远，就被冻住了。据在场的人说，他喊了几声救命，嘴里就进水了，他举着双手乱抓，脑袋隔几秒钟，呼地向上猛窜一下，逗得坎上的二警察哈哈大笑。有两、三根手电射着他，直到他冻成冰砣子，沉下去了。手电还钉在那儿。

天亮时，我弟被打捞上来，光着屁股，肛门的屎都挣出来了。而棉裤还缠绕着脚脖子，他当时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想回到坎边，可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伸手救他，哪怕伸一根竹竿过去，他都活了。我能咽下这气么？二十几号人，都站在四周，用电光照着他笑，笑，好像在看猴戏。

老威：真是禽兽不如，你应该向他们讨个说法。

蒋朝才：事发后，镇党委和政府还是高度重视的，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考虑到我父母年迈，且母亲因重风湿半瘫，长期卧病在床的特殊情况，决定破格对我家一次性困难补助 3000 元人民币，条件是先埋葬死尸，就此了结，今后不得再找政府的麻烦。这太过分了，不仅是我，连邻里群众都聚在一块，议论纷纷，说如今超生一个娃儿，政府的罚款都是万元以上；一个 20 来岁的活鲜鲜的生命逼死了，却只给了 3000 元，并且还要从中扣除打捞和安葬费用，最终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天理何在？难道我弟就白白送命了？

这对于我父母，尤其是晴天霹雳，他们天天守着我弟，唠唠叨叨，都有些疯了。我一怒之下，就领着同村的几十名群众，抬着死人，去镇政府交涉。镇长和书记都躲了，只叫一拨二警察出面，威胁说：“你们借死人压政府，就触犯了国法，奉劝你们先埋尸，再提进一步的条件，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说：“如果是乾坤他自己落水淹死的，我家就自认倒霉；可是他被逼死在结冰的水里，你们不仅没抢救，还用手电射他，还围着边笑边看热

闹，人心真他妈被狗吃了。”领头的二警察说：“我们的嘴没有长在你的下巴，你咋晓得我们笑了？况且，一个赌博犯自寻死路，没啥大不了的，政府解决 3000 元，也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如果你们得寸进尺，性质就变了。”

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公愤，群众把尸体停在政府门口，并且骂：你们收了那么多的税费，死一个人，就出 3000 元！请镇长出面说话吧。

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没结果，这边群众越围越多，而那边也调兵遣将，公安、联防全体出动。傍晚，镇党委书记在警察的保护下，站在台阶上宣布了最新决定：经法医鉴定，我弟弟蒋朝坤属畏罪自杀，与任何人无关；而我率众抬尸到政府门口聚众闹事，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使其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已触犯了《游行示威法》。

群众不服，立即起哄，书记继续宣布：撤消对我家 3000 元的困难补助，勒令抬走尸体，马上处理掉，否则将强制火化。

群众齐吼：“坚决停尸到底！”书记却冷笑着命令二警察抓人，双方发生了一阵抓扯，枪托子乱捣，我和帮忙抬尸的几个乡邻被当作罪魁祸首按翻在台阶上，五花大绑地进了派出所。

我被吊上房梁，由所长亲自审案。这手脚反悬的寒鸭？水太厉害，熬不过，我只好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画押。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被放了，所长说，本想按《治安处罚条例》治罪，但考虑到我家有丧事，就从轻发落。若再闹事，就送去劳改。

我回到家里，面对父母的眼泪和弟弟的尸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经过昨日的威吓，群众也不敢上门了。接下来的几天，派出所不断派人来催促埋尸。无奈之下，只得用白布将弟弟裹了，草草下葬。随后，我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到县法院告状。由于无钱交手续费，法院不受理。我就披麻戴孝，举着“为民作主”的

大纸牌，在法院门口站了两天两夜。此事造成轰动，每天都有数千群众围观，有人打电话给成都的报纸，提供新闻线索。我是豁出去了，哪怕毙了我，也要出这口恶气。

春节期间，成都某某报纸有记者来采访，跟着，法院免费受理了我的案子。刑事案够不上，法院说没人谋害蒋朝坤，他自己跳的水，我只能要求民事赔偿。我提出赔偿 3 万元，法院开庭，判定蚕纸镇政府赔偿人民币 4000 元。

一条人命 4000 元，况且，我在派出所挨打挨吊，膀子几天回不了原位，医药费也花了近 1000 元。欺人太甚哪！我又不能学梁山好汉提刀去砍这帮狗官，于是上诉，被驳回；我就到省高院上访。父母丢在家中，没吃没喝，就去县城作了乞丐；而儿子我，要高级些，做了省城上访的乞丐。

老威：从您的《万言书》看，上访三年，您的确长了不少见识，与当年的你不可同日而语了。同老陆一样，您除了自己的冤屈外，还挺维护上访群众的权利。

蒋朝才：过奖了。

老威：被您列入 10 大冤案的杨继年，阙定明，王翼，老陆等人我都写过，接下来的案子，有的我手里有材料，但一时找不到当事人；有的没材料，只是听说，而您又写得过于简略。

蒋朝才：《万言书》的重点是平反冤狱的措施，而不是案子本身。其实我提的 10 大冤案在全国，甚至在四川省都算不了啥，比这更惨的还多，我不过顺手捡来些案例。

老威：这个李婆婆是咋回事？您把她列在冤案的首位。

蒋朝才：这个李婆婆在南充市可谓路人皆知，她原有很幸福的晚年，3 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而自己跟着大女儿蔡素碧居住南充市区某黄金口岸的一栋祖传的三层楼房里。大女儿头脑灵活，就利用自家祖屋底层铺面开了个眼镜店，由于生意红火，几

年下来，就积累了包括房产在内的上百万资金，其中流动资产就达 60 多万。

大女婿是现役军官，很孝顺，而眨眼间，孙女又上小学了。李婆婆过着要啥有啥的蜜糖日子，成天笑哈哈，见人就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她解放前读过女中，所以闲着还作些打油诗，歌颂盛世。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94 年 12 月，由于城建需要，她家所在地段被规划为拆迁范围，可在尚未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之际，对黄金口岸早就垂涎三尺的房地产开发商就伺机动手了。有一次，大女儿去重庆进货，几天不归，李婆婆就去二女儿家暂住。但她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家中无人的空隙，她家的三层私房就已被开发商雇佣的民工大队撬了门窗，砸掉了部分墙体，并大模大样的住了进去。

大女儿进完货赶回家时，已一片残墙乱壁，床、桌子、柜台等家产被捣毁，全部扔到大街上。而锅碗瓢盆则扣下来，供民工们自己开伙之用。大女儿痛哭一场，拿强盗没有办法，只好报案。派出所接报，来人进行一番实地调查核实后，就给蔡素碧出了一份“报案属实”的证明，并建议她上告法院。

蔡素碧代表李婆婆全家，向法院状告当地开发商违法侵权擅拆私宅，并要求赔偿。但法院由于同开发商的黑幕交易，一直拖着不开庭。与此同时，开发商又通过市政府拆迁办公室施压，并以逐步全部赔偿损失为诱饵，迫使缺乏官场经验的蔡素碧与他们签了《拆迁停业协议书》。尔后，此协议成了废纸，李婆婆一家不仅没有得到应按面积返还的新房，甚至连“通知”也没有。在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处境下，李婆婆家屡次找到房产公司和政府拆迁办，对方均狗仗人势，不予理睬。从此，李婆婆一家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地、市、省、中央，四处上访，官司一打就

是 8 年，不仅耗光了原有的积蓄，而且债台高筑，一家人终于流落于街头巷尾。生活唯一的来源是女婿从部队寄回的工资。

老威：这案情并不复杂，咋就断不下来呢？

蒋朝才：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表面挺简单，可背后关系网就像地下的树根一样，缠来绕去，一言难尽哪。

老威：后来呢？

蒋朝才：后来就是一场横祸。

老威：李婆婆一家全死了？！

蒋朝才：2002 年 9 月 27 日半夜 12 点多，大女儿正在北京上访，孤零零的李婆婆饿极了，就拄着根棍子，市内大北街正阳火锅店门口，在垃圾堆里刨捡些食物充饥。她埋着腰，正全神贯注地把一块什么东西朝嘴里塞，不料被一辆无牌照的小车从背后撞翻在地。

肇事者正是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巡警队长李华平，他们一行 5 人吃完火锅，醉眼朦胧地出门开车，竟撞倒在街沿上拾垃圾的老人。李婆婆当即大叫“救命”，将姓李的吓出一头酒汗，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即熄火停车，下去察看受害者的伤势，履行一个警察救死扶伤的起码职业道德，而是倒退几米，猛踩油门，向倒地的李婆婆碾压过去！后者本能地朝旁边一滚，躲过车轮，更凄厉地呼救，惊动了过往群众。火锅店的吃客们也纷纷涌出来，靠近李婆婆。可接下来的一幕令围观者膛目结舌，小车再次倒档，加油冲往受害者，终于将其卷入无情的车轮底。

老威：这像港台黑帮片里的镜头，不过，将一位老人连压数次，也太狠毒了。

蒋朝才：按照交通肇事法规，因过失或机械故障碾死一个人，赔偿五、六千元，加上其他费用，也就付万把元钱；可把一个人撞残了，或弄得半死不活，肇事方就得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精

神损失费。总之伤者一天不康复，你就一天脱不了干系，这是个大把扔钱为他人当孝子的无底洞。所以，作为巡警队长的李华平，各种法规背得滚瓜烂熟，他当然清楚撞残一个老人该承担的后果，为了下半生的幸福，他必须变成畜生，狠下杀手，一次干不成再干一次。没想到，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婆这么命大，眼见不可能一次性了结一条人命，只好在群众愤怒的谴责声中仓皇逃跑。由于事情闹大了，满街都有人围追堵截，姓李的才在逃出几百米后，面对人墙倒车回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将李婆婆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

经医院检查确诊：1.胸部双侧 7 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并形成畸形；2.胸部双侧内胸腔积液并广泛粘连；3.冠状动脉有钙化；4.胸腰尾椎骨压缩性骨折并形成畸形；5.手肱骨骨折并肩关节脱位。当晚，受害者失血 3000 多克，医院发了三次“病危通知”。

老威：李婆婆去世了？

蒋朝才：终身残废。她虽捡回一条命，但住院 11 个月，由于无钱支付医药费，停药 9 个多月。2001 年 3 月 29 日，肇事者利用职权，背着受害者办理了出院手续。由于被遗弃，医院于 2001 年 7 月 20 日将李婆婆送还给交警一大队，再由区公安局和姓李的将其直接拖往收容站。李婆婆目前趴在街头乞讨，无法起立，无法行走，大小便失控，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生不如死啊，她多次想自杀，都动不了。

老威：政府不管吗？

蒋朝才：政府管了，交警大队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判定李华平负全部责任。2001 年 7 月 31 日又发出《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由于李华平拒绝给医疗费，李婆婆一家万般无奈才把他和公安局告上法庭。拖了半年，顺庆区法院下达《民事裁决书》，责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医治费用 10000 元。被告抗法拒付，还出

警抓捕原告蔡素碧，扇她耳光，抢走并销毁大量医疗票据，逼得她走投无路，切腕自尽，幸被家人及时发现救起。李婆婆悲愤交集，向法院呈递了“支付令申请书”，但石沉大海，至今也没有得到一分钱。

老威：怎么是交通肇事呢？这是公开故意杀人啊。

蒋朝才：官官相护，古今同理。但可恨可叹的是，国家之大，竟没一个衙门为小民讨公道。到后来，公安局的人竟放话，快 80 的人了，早该死了，与其活在世上占地盘，碍眼睛，不如死了，一次性了结痛快。

老威：我设法将李婆婆的“求助书”向外界公布，看能否对她有所帮助。唉，她哪是栽在官府手里，纯粹是被土匪毁了。他妈的，遍地黑社会，我们活在怎样一个乱世！

蒋朝才：您说“遍地黑社会”？在哪儿？您指出道，我马上就去入伙。这上访太累了，跑来跑去，乞讨几个钱，没脸面，更没个结果。耗嘛，这上访群体吧，虽然彼此都面熟，也有老陆这样的热心人互相牵线，弄些集体签名什么的，但不算个团体。人嘛，得有个团体，香港影视中把黑社会演得不错，穷人可以去投奔，受了气，挨了打，才有人为你出头。

老威：您的《万言书》里还在盼望中央派钦差为民作主，怎么一转脸就向往黑社会了？

蒋朝才：钦差和黑社会，一上一下都渺茫。我也是气糊涂了，才说这没水平的话，谢谢您点醒我这个梦中人。

老威：还继续往下谈吗？

蒋朝才：下面这桩案子也是一桩车祸。大约在 8 年前，四川威远县境内发生过一件千古难逢的怪事——大货车上了房顶，碾塌了半边农家大院，造成死亡 14 人，重伤 20 余人的惨祸。

当时已夜深，居住在公路拐弯山坳中的范姓和罗姓农户已入

睡，不料哇的一声炸雷，一辆失控的巨兽从公路上俯冲而来，几秒钟就滑过斜坡，弹上房顶，再晃着大灯压下来，撞开两面院墙，一片树林，最后卡在了一道石缝中。司机江某某从摔扁的驾驶室里爬出来，满鼻子酒气，一脸血，他愣在那儿，似乎自己也不相信眼前的情景。还好他没有受内伤。

他在漆黑一团中逃进草丛，目睹四方农民敲着锣，举着火把聚拢。尸体一具接一具从废墟中被刨出来，无论男女老幼，都半裸着。有两三具尸都压成肉饼了，脑袋剩一个大窟窿，不能看，只好用被子盖着。亲属要扑上去揭，几个人就抱住。地上又是泥又是血，人脚又跑来跑去地踩。唉，我听受害者范正根讲了一下午，难过，恶心，连饭也不想吃了。老范当晚睡得不踏实，总是做梦，所以屋顶哗啦哗啦砸下来时，他抱住老婆打了个滚，刚翻到床底，房梁就把床打裂了，他从碎瓦中探头，墙倒了，砖头雨点般乱砸，他老婆顿时成蜂窝了。他在一扭一扭的蜂窝下面，才捡得一命。不过，后来他被埋住，一点也动不了，直到被人刨出来，才意识到腿已经断了。他被连夜送到县医院抢救，腿锯掉了。

14条人命丢在梦中，虽然死相难看，倒也没受活罪。可怜的是老范这样苟延残喘的残疾人，不断腿，就断胳膊，或者受了内伤。老范的侄儿，胸口受了压气闷，吐了两年多的血，也一命呜呼了。按照有关交通法规，一条人命赔了一千多元人民币，而由于雇佣肇事司机是私家老板，早已闻风而逃，所以这堆残疾农民至今为止，每人只得到两三百元的公家赔偿。

老威：人命贱如草啊。

蒋朝才：是草就好了，没知觉，没痛痒，割了还能长。

老威：肇事司机呢？

蒋朝才：判了三年，早已刑满释放了。

老威：这么便宜？凭什么？

蒋朝才：没凭什么。抓了送监狱，避过了风头，否则，这家伙早晚要叫受害者亲属给吃了。还有，人蹲班房，也就失去赔偿能力，一了百了。

老威：牢房成了避难所？《责任认定书》怎么说？

蒋朝才：交警大队实地勘察了，却没给受害者出《责任认定书》。都是农民，光顾哭去了，克制一点的，也忙着给死者洗擦换衣，给伤者送汤送药，都没有想到还要这个东西。受害者罗文礼说：“事情明摆着，汽车从天上掉下来，把我们给压了，还赖得掉？”

老威：我恍惚记得《责任认定书》应在 35 天内送达当事人，这也是法院判刑的依据。

蒋朝才：20 多个受害者奔波呼吁 6 年，国内媒体也陆续有报道，威远县一位副县长才出面接见大家，并拍自己胸脯承诺，请死者家属放心，要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2000 年 9 月 27 日，也就是在惨案发生了 6 年之后，县交警大队才在这位副县长的监督下送达了《责任认定书》。

老威：没有《责任认定书》，当年肇事司机判刑的依据是什么？

蒋朝才：这正是受害者的律师要问的。他们因此将县交警大队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执法机关不作为，使他们错过了索赔的时间和机会，导致伤情恶化，残废多人。不到两个星期，受害者接到县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判定县交警大队已经作为了，受害者的诉状不能成立，所以不受理。

老威：本该 35 天内办的公差，拖了 6 年，这也叫“作为”了？还有，国家有哪条法规限定一条人命只赔一千多元？

蒋朝才：山里农民懂啥法，还不是你咋解释，他咋听。狗日的就蒙一个算一个嘛。现在这些受害者没钱没能耐建房，就原地搭一个棚，一住这么多年，有一顿没一顿，靠八方乡亲周济着赖

活。我曾跟老范回去过一次，老远就闻到一股股屎尿味。残了没有人服侍，就原地拉撒，绿苍蝇嗡嗡钉人，一头扎进脓疮中，死活轰不去。命啊，只能认了，把眼泪当粮食往肚里吞。人的善心也有尽头，残疾人，走动艰难，出门讨要吧，路一长就拖垮了。

老威：您在《万言书》里也为他们呼吁了。

蒋朝才：但愿中央能够听到，派钦差下来调查，处理。这个世道，当官贪一点也没啥，老百姓不敢有意见，但是你得让人活；死了算了，残废了也认倒霉，但是你不能丢下不管。不管还不准人揭短，还要说太平盛世，影响了安定团结。

老威：这种事太多，靠您一人也呼吁不过来。

蒋朝才：对，我天天喊破喉咙都不行，除非换一个大人物，比如胡锦涛，刚上台，阳气旺，就把 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的耳朵揪住不放，连续朝里头灌一个月的血、泪、大粪、金元宝和民冤。

老威：啥意思？

蒋朝才：整傻当官的，工农就翻身做主人了。

“盗墓贼”田志光

采访缘起：33岁的田志光尖嘴猴腮，在上访群体中以“盗墓贼”闻名。其实他连墓的边都不沾，只是曾经从自家屋基下挖出过两坛金元宝而已。按他引述的算命先生的说法：“农民嘛，世世代代就这土命，老老实实一分一文挣血汗钱，没事；可一双茧疙瘩手一摸贵重东西，准出事。”

2002年11月22日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不断在成都文武路省高院一带兜圈儿。秋风萧瑟，上访人员几乎都回住地，连擦皮鞋和乞讨的都离开了这条背巷，去热闹的地方了。

田志光却冷不防冒了出来，招呼我，并对我的身份提出质疑。依我的经验，并从田某脸上明显的饥色中就能辨出，此举不过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搭话方式，其真实目的为借机讨两个饭钱。

于是直奔小面馆，田某三大碗汤面下肚，就开始愤世嫉俗。我以“盗墓”挑之，他拍案叫屈，并讲起了进出收审所的“还魂记”。

我数次头皮发麻。

田志光：这一段日子，我老是看你在高院周围窜来窜去，说你是记者吧，可从不见有啥报道弄出来；说你是别有用心的坏蛋吧，也没有煽动、挑拨的行径。你到底是做啥的？

老威：你觉得呢？

田志光：大家觉得你的身份挺神秘。

老威：你更神秘，据许多人介绍，你和我们这类伏案的文人一样，白天睡觉，夜里上班。

田志光：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老威：我家住二环路以外的黄忠小区，以前是黄忠大队，据说《三国演义》中蜀汉五虎上将之一的黄忠死后就葬在这一带。你若要找我，或提供进一步的冤案线索，就打这张纸上的电话。整个黄忠小区，上千户人，就我一户，半夜三点以后还亮着灯。另外，我提供一点与你相关的信息，就在我楼下，就在一大片臭水沟交错、垃圾困绕中的农舍底，最近有震惊世界的发现——继广汉三星堆之后的最大的巴蜀石墓葬群，短短几个月，已从这儿挖掘出 3000 多年前的珍贵文物 200 余件……

田志光：我看过报纸，就是金沙遗址嘛。这跟我有啥关系？

老威：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你想，在遗址上面住了几辈人的农民们多后悔，本来价值连城的宝贝就睡在自己的床底，可一转眼，连房带床迁了，宝贝叫国家给掏了……

田志光：老威同志，你拐着弯儿套我干啥，有屁就放吧。我不是盗墓贼，虽然上访人士都这么开玩笑，但国家的东西，哪怕烂在地下一万年，我也不会去沾一指头。

老威：这么说，我把玩笑当真了？对不起。

田志光：不是我不想发财，而是没本事，没财运。上一次，你和老王聊天时，我在旁边，给过你申诉材料。我是宜宾江安人，夕家山二村六组，世代务农。我们那一带，清朝时出过举人，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修大宅子，传了几代，现在都全国闻名，叫夕家山民居。几千只白鹤栖息在民居中央的村子里，所以又叫仙鹤山庄。我家在鹤庄的西北角山坳里，父母健在，兄弟三人，老大已成家立业。1993 年，我 24 岁，按农村习俗，早该成亲了。我和对象好了一年多，因夕家山是远近闻名的富裕之乡，附近乡民

每年捡幼鹤和鸟蛋都要弄不少外快，所以她也想尽早嫁过来。总之，那年秋凉农闲，家里凑足 5000 元钱，就请齐匠人，准备接老屋一角建新房。我和弟弟亲自领人挖基脚，不料紧挨着老屋地基，竟挖出两个大坛子，抱进屋揭开封口一摸，里面全是黄灿灿的金元宝！

倒出来洗干净，排在桌上一数，足足一百锭。一家人一下子晕了，眼花缭乱，以为这一来，下半生不愁了。谁料隔墙有眼，匠人见我们抱着坛子进屋，就趴过来透过墙缝认了个准。

这三个狗日的，见财心头来火，也不打招呼，就直接去乡派出所报了官。一溜烟功夫，警察就来了，把警车停在公路上，穿过小路，从四面包抄。当时我一家 5 口正围着金子，头碰头的看，欢喜得气也粗了，浑身抖个不停。正在做梦呢，门窗和房顶哇啦一声全亮了，犹如天兵天将，屋里全站着端枪的警察和联防。二话不说，人赃俱获，金元宝入坛抱走，爹妈、我、弟弟和一个小侄儿全用一根绳串着捆了，解往派出所。

在派出所审了一夜，爹妈和侄儿与金元宝案无直接关系，就取保候审了。我和弟弟被转到宜宾城里的收审所。审讯人员换了一拨，三班倒，对我们进行突审，逼着承认“盗墓”。一个姓白的主审官还拿出一锭元宝让我仔细认，原来上头刻着“大清同治六年夕氏”几个米粒大的字，出土时由于太高兴，竟没认出来。

我连喊冤枉，并咬死是在自己屋基下挖出的。主审官冷笑说，这明明是举人墓里的东西，难道金子自己会长腿，跑到你家里去？他还说，我老家周围有不少明清时的古墓，可百分之七、八十都被盗过，这次查获的金元宝只是一条线索，政府一定会顺藤摸瓜，一查到底，把有组织的盗挖文物的集团全部消灭。

我完全懵了，绞尽脑汁也弄不清是咋回事，主审官说，你就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交待，争取从宽处理。我们晓得你不是

主谋，连得力的喽啰也算不上，那背后的指使人是谁？除了金元宝，还有哪些更为贵重的文物？例如瓷、玉、陶器等等。出手没有？没出手，又埋在啥地点？我云里雾里，想编都编不出来。主审官说，没料到你一个看起老实的农民，反侦察经验还挺丰富，你不说，就永远在这泡。况且，你们集团里的人太多，总会有人抢在你前头坦白立功，到时你就死定了。

老威：这些办案人员的想象力很丰富。

田志光：看来这金子一半是福一半是祸，贪不得啊。

老威：你也承认贪了？万一是你某个远祖埋的呢？

田志光：当时一家子都乐晕了，来不及起贪心，也来不及想金子的来历。之后落入火坑，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农民嘛，世世代代就这土命、贱命，老老实实一分一文地挣血汗钱，没事；可一双茧疙瘩手一摸贵重东西，准出事。

我在收审所关了三个半月，度日如年，被整蜕了几层皮。开头，承办人员以为捉住了盗墓大鱼，就给舍房里打招呼，免过入房手续，没挨打，天冷了，所里还借了床公用被子给我。后来，他们榨不出啥干货，就示意管房政府要给点“颜色”。于是，房中老大命令打手补过手续。刚光我的裤子，按趴在地，房里 20 多个烂贼由老大领头，每个人上来冲着我的光屁股吐一口痰，踩上一脚。这一招叫“封帮主”，据说是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丐帮那儿照搬过来。接着，两个贼扶起两尺多高的塑料大马桶压住我，这一招叫“乌龟驮碑”，我手趴在马桶底，稍一动弹，马桶歪斜，打手就拿出踢足球的劲，朝面门踢，满天金花，鼻涕、眼泪和血突突直喷，一会儿就淌了一滩，脑袋只能像龟头出壳那样向上硬扛着，脸、嘴才不会淹没在血水里，可是颈项硬久了，撑不住，就栽埋下去。

老威：俗话说“毒如蛇蝎”，我看该改成“毒如人蝎”了。

田志光：这才开个头。牢里每日放两次风，倒一次马桶。我刚垫底时，桶是空的，接下来，上面八位加打手、闲客，一共有十几个人朝桶里拉撒。每个人解手都要踩我，温柔点的，踩肩和背，狠的就直接踩脑壳，叫“上马石”。熬到晚上，桶重了，压得我连连呼唤、求饶。可老大偏偏在这时要屙屎。别人屙屎都两脚叉开，坐在桶口上，虽然增重，但腿毕竟要撑部分力。这老大，踏住我的龟头，把两个马桶贼的肩头当扶手，嗖地整个蹲上去，压得我一声惨叫！我双手一顿猛抓，狂喊：“整死人了，整死人了！”

老大立马下桶，把我弄起来封嘴，可值班政府已经听到了，忙打开铁栅门提我出去。浑身上下都被尿浸透了，好在值班的黄管理刚从警校毕业，人年轻，还比较正直，他吩咐劳改人员提了桶热水，让我洗澡，换衣，再询问我咋回事。我痛得只能勾着腰，抱着肚子，但就是不敢说实话。黄管理见状，把老大提出来，命令蹲在楼道上交待。老大满脸堆着假笑说，可能是胃病犯了，田贼就突然抱着肚子在房里打滚。黄管理转头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只好含着泪点脑壳。黄管理松了口气，给了我两片胃舒平，然后警告老大：我晓得你诡计多端，下一次，房里再发出这么恐怖的声音，你就啥也别解释了，自己把双手背过去捆一绳子。

老威：任何行当都有好人嘛。

田志光：我也认为到底挺过来了，因为回房时老大破例扔给我一个烟屁股，说：“你没翻水，算有种，休养两天，去擦地吧。”

老威：这有啥讲究？

田志光：房里最底一级是倒马桶，除了睡觉和放风，两个贼都面无表情，一左一右，全天候立在马桶边，上面几位要大便，他们就自动肩并肩挡在前面，做扶手和屏风，上面咳嗽有痰，就直接牵开他们的衣领朝里吐。我当时想，长痛不如短痛，我虽然

驮了一天多的碑，死去活来，但总算升了一级，不用当人工厕所了。

老威：你倒会自己开解。

田志光：活地狱，只要栽进去，就是龙盘着，是虎卧着。你没听人讲过，在当今社会，不蹲大牢成不了人。

老威：牢里的玩意儿，我也略知一二，可这“乌龟驮碑”倒头次听说。看来，医人的法子有限，整人的套路无底啊。

田志光：所以，我刚撅着屁股擦了几天水泥地，收审所的坦白检举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场了。九个班，两三百名贼都到放风天井集合开动员会，公、检、法、司的领导由所长陪同，坐在桌子后。我们像军人一般，盘腿而坐，挺胸抬头。横排竖队，整齐得犹如刀切。领导们按照官帽子大小，一溜唾沫横飞地演讲下来，总体意思是号召众犯抓住时机，坦白自己过去隐瞒的罪行，检举他人的罪行，因为在坦检运动期间，党的政策很宽大，很仁慈，只要争取主动，政府经过调查，属实的，该杀头一律刀下留人；该判无期的，就减为有期；该五年以下的，就酌情考虑监外执行。所长还特别提醒，坦检及其宽大优惠政策只限两个星期，过时不候，哪怕你跪着求政府要交待也来不及，该从重还得从重。

我们竖耳恭听，不敢出粗气、咳嗽和放屁。周围三层楼布满岗哨，两挺机枪架在二楼窗口，正对着我们。原以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低档人犯，不料，会快结束时，那位公安局领导突然叫：“田志光！”我回答：“到！”并站起来，啪的一个立正。局领导似笑非笑地说：“坐下吧！好好交待问题，懂吗？”

几百个贼中，只有我被公安局点名，于是转眼之间，我就成所有“重案在身”的名贼，回舍房后，管房政府隔着栅栏门跟老大单独嘀咕了几句，就吩咐送信纸和圆珠笔，每两个贼一套，分发下去。我被叫到墙角，老大单独对我说：“你娃鸿运来了，

今天公安局的处长开金口，只要吐了渣，包你明后天就回家。”我说：“没有渣可吐。”老大说：“脑壳咋不开窍？坦检一年才搞那么两三次，许多人想碰还碰不上呢。”我不明白啥意思，老大悄悄说：“这些承办人，个个都是骗人精，要在平时，你若中套招了，刀把子就捏在他手中了。坦白从宽，脑壳飞上天嘛。只有在运动期间，他们已向社会公开承诺过了，所以不能反悔。”我被弄糊涂了，老大不耐烦地把纸笔塞给我，还唠叨：“我晓得你案重，吐嘛，把责任推给在逃的同案嘛。如果够朋友，也把某个漏网之鱼分点来，我去检举立了功，也好减点罪。”

没法子，我只好像其他贼一般咬笔杆，把地基中挖出金元宝的事再写一遍。上面几位和打手像古代考场的监视官，在众贼前后绕来绕去。经过半天的煎熬，结果，大半的卷子合不了格，老大大怒，命打手挨个猛踢“考生”的背部；接着坐着作文的资格被取消了，大伙跪了两排，把纸铺地上，弯下腰重写，好像电影演的古代公堂中犯人都这么在巡抚跟前签字画押，这不是一两秒钟就完事，而要耗几个小时！

写晕了两个岁数大的人，拖到马桶边，舀水泼醒，就拳打脚踢，然后再把纸笔塞过去。老大审卷时，就从上往下溜几眼，马上就下评语：“不够重大！”“不够刺激！”“简单了！”“轻了！”“妈×还是轻了！”

整到后来，大伙为了过关，只好凭想象胡编乱造，奸杀、偷抢、黑社会、爆炸、生劈活人、盗国库，应有尽有。我出生农村，编不来，涂来涂去就那么点货，终于把上面惹毛了，老大坐在被子叠成的“真皮沙发”上，边抽烟边宣布：“你要我？老子背后是人民政府，晓不晓得？”接着就拿烟头直戳我的左眼，我一闭，烟头就烫着眼皮，吱吱直冒烟，我痛得刚喊出声，打手啪地用橡皮胶布封住了嘴。老大说：“又想学黄牛叫？整。”

我抱着脑袋在地上滚，像一只超级足球，被 20 多个贼踢了 10 来分钟，老大撕开我的封口胶：“招不招？”我爬起来向他磕头说：“我的爷爷，我已经招了嘛。”

打手用两根竹筷撬开我的嘴说：“这根舌头还顽固嘛。”就一一接过上面递过来的五、六颗烟头往我口里扔，我烫得要吐，但脖子和下巴都让人卡着，吐不了。我口鼻冒烟，不，我浑身都起火了。老大问：“招不招？不招，就把这一盒烟吞下去！”

屈打成招，我马上承认我盗了墓。打手问：“共几次？”我伸出 8 根指头。于是拿过纸笔开写，不，开编，人急了，虽然文笔不通，也能编得活灵活现。从 15 岁开始，我盗了 9 年墓，工具是铁钎子、撬棍、二锤和手电筒。每盗一个古墓，我就把到手的金银珠宝和大量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就近埋在一个地方，作一个标记，过一年半载，待风平浪静时再挖出来。

我甚至想起老家的阴阳先生，并把他择坟地用的风水罗盘也写进交待中，我就是用罗盘探明“货的多少”，以及方位。

开晚饭前，老大眉开眼笑地把材料上交，作为补偿，我得到一份辣椒回锅肉，肚子饿极了，但满嘴燎泡，每嚼一下，都钻心地疼，这顿饭，我一口血一口泪地吃了两个钟头，这是所里特别吩咐的，让我填饱了，才有精神应付夜审。

第二天，政府晾了三碗稠稀饭，很有耐心地劝我吞完，才把我拷上警车，一路朝江安县城开，接着又出城送我回老家。在车上颠簸了四、五个钟头，过了夕家山，继续朝我材料和口头交待的藏宝地点去。翻了几架山，我就胡乱指了指公路岔道，于是两辆警车离开公路下坡，进入一条机耕土路。天黑了，找不到店吃喝，政府们就一人一个面包，我也用戴铐的手捧着慢慢啃。车亮着灯又开了几公里，终于在一家农户门前刹住，没路了。

好几支枪指着我，他们一再追问：“到底在哪儿？”我都支

支吾吾往前奔。车停在山脚下，七、八个人陪我上坡，深一脚浅一脚地乱走，我已被整瓜了，脑壳啥都没想，就晓得见沟跳沟，逢坎跳坎。快到山尖了，斜坡上是一片收割了的包谷地，地的尽头，有十来座野坟。

政府连喊“慢点”，并前后左右包抄着我。我已累瘫了，就坐在一个坟包上。政府队长忙问：“就埋在这儿？”我慌忙用两手比划个大圈，队长就叫其他人从背包里取出短把的军用铁铲和一个圆圆的夜光仪器。我背脊骨发凉，开始意识到欺骗政府将带来什么后果，就吓哭了。

我边抹眼泪，边沿着那些野坟兜圈儿，假装低头在寻找。队长叫端仪器的人跟在我后面，不晓得绕了多久，恍恍惚惚听见鸡都叫了，队长终于忍不住，一把揪过我的衣领喊：“到底埋在哪儿！”

我像一泡稀屎淌在地上说：“我不晓得。”

队长气得当胸一拳，我顾不上痛，急忙爬起来磕头作揖：“我该死！”

有个政府扬起铁铲，队长拦住冷笑说：“我看你是在找死。”

回到车上，天已蒙蒙亮了，一路上，我都解释、打抖。可政府再也不愿听了，到最后，竟然拿枪抵住我的太阳穴吼：“再哆嗦就毙了你！”

老威：你也把人家戏弄得够惨了。

田志光：我不乱招，过得了关么？

老威：你这样照样过不了关。

田志光：总可以缓口气，否则吞一堆烟头，我就烧成火炉了。

老威：接下来呢？

田志光：扔回舍房继续坦检，又驮了一次碑。天气很冷，却刚光衣裤，赤条条地站在马桶边做人体雕塑，24小时不准合眼。

然后，点火烧腋毛、阴毛和腿毛。最毒辣的还是烟头。其它部分烫得不过瘾，就叫人把鸡巴搓硬，烫龟头。我痛得筋都缩了，大张着嘴，粗气直喘，却不敢出声。

烫到第五下，鸡巴软下去了，打手把它扯出来，又抹又搓，也硬不了。最后，缩得就一颗胡豆大。老大说：“想当太监？那就成全你。”就把烟屁股整个戳进去，我一下子就晕了。

醒来，烟薰火燎的阴部肿得犹如一个大皮球，打手建议：“给这狗日的来点更细的活儿，烧耳毛、鼻毛和肛毛，再往里头放花椒。”我一听，急得连喊：“招！招！全招！”

老大问：“还敢耍花枪么？”

我喊：“再乱说，我妈就偷美国人！”

房内爆起哄堂大笑。老大拉我起来，让打手给我敷消炎止痛药，又放软口气说：“田贼你是一条汉子，但你不招，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嘛。”

我立即要过纸笔又写。老大审阅了，又传给上面几位看。临报告上交前还不放心地问：“这次肯定是真的？”

我说：“上次也是真的，不过一时迷糊，把藏宝地点搞错了。这回千真万确。”

老大说：“那你在材料末尾写上：‘若说假话，任凭人民政府处罚，枪毙也无怨言。’”于是我就一字不漏地添上。

老威：你胆子够大的。

田志光：房里的刑太阴毒，最坚强的共产党员都熬不过，更别提我这样的农民。我明白，一带上政府去寻宝，来回起码得耽误一天一夜。在这期间，我至少不挨打，不受刑，还有好吃好喝，至于后果，我没功夫考虑。况且有啥后果？考虑了又咋样？反正都进了鬼门关，我已经是最惨的鬼了。

老威：你应该借坦检机会，重申你的冤情，也不至于在地狱

里越陷越深。

田志光：没人信，写了白写，连老大一关都通不过。所以我只能主动积极地领着人民政府去寻宝。这样反复了三个回合，去的时候，我啥也不想，啥也不怕，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可空手而归时，我怕得要死，每迈一步腿都抽筋，政府都快气疯了，沿途又打又踢，还把钢铐子朝手腕里死掐，但不算啥，同烂贼的整法相比，小菜一碟罢了。

刑罚一套套搬出来，我在房里昏天黑地过，每次醒来，我都想，快死了，这次怕撑不到头了；弟弟就和我关在同一收审所，也不晓得他咋样了。每次醒来，看见烟头，看见竹签子，看见马桶和那一张张阴笑的贼脸，我都大喊：“招！招！全招！”可没人听我的。有个值班政府从房外过，我就不顾一切地扑向铁栅门，伸出手去抓那裤腿，结果又被拖回来，压腿，被几个贼架起来，一二三朝前直甩过去，叫“坐飞机”。

老威：没个完了？

田志光：我想也活不出去了。可某一天，坦检运动突然停止了。老大被管房政府叫出去，回来后就一声不吭。贼们见这势头，就盘腿稳坐。我习惯性地靠住马桶，等待新一轮折磨，但啥动静都没有。就这样闷了一上午，吹哨开午饭，睡午觉。奇怪的是，上面几位都没叫人服侍了，还对毛贼问寒问暖。本来按惯例，除了放风，毛贼是不准擅自在马桶解手的，再胀也憋着；但老大和打手扶我起来时，连问了几声：“解手么？”还有出房去天井开饭，本来该由毛贼替上面几位换鞋，老大也客气地宣布“免了”。

老威：有首长视察监狱吧？

田志光：有。到了下午，所里又召开全体人犯大会。规模和坦检动员会一样，上面照样坐着前次列席过的公、检、法、司的领导，只是头上的横幅由“坦白检举动员大会”改成“打击牢头

狱霸动员大会”。领导的讲话进行到一半，所长就叫“把触犯刑法的牢头狱霸押上来！”一共五个人，脚镣手铐，他们被武警战士摁倒在地，打开手铐，大扎了一绳子。这麻绳大扎非常厉害，扎完后，人的手脚反翘成一只船，只有胸部着地。不过，大扎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过了这限度，人就终生残废了。

原来在坦检运动中，6 舍整死了一个像我这样人人喊打的“老贼”，是某国营厂矿的车间主任，因盗卖设备嫌疑进来。承办人昼夜审讯，软的硬的都撬不开嘴，于是就交给房里的烂贼。此人命薄，先当胸吃了几份“熊掌豆腐”，脸就有点发青；接着被命令趴在地上，打手跳起来抓住一人半高的肋巴天窗的竖条，然后引体拳腿，向下一个“千斤坠”，落在那倒霉鬼的后腰。只听得哎哟一声，人就不行了，腰踩塌了，浑身发紫斑。贼们忙呼报告，送往医院抢救，半路上吐了几大碗血块子，咽气了。

两个打手成了一、二被告，老大名列第三。据说后来，打手不服上诉，说是受老大唆使，不打人则要挨打，可这样追下去，麻烦更大，因为老大又受谁的唆使？再说，有哪条法律规定在坦检中犯人可以审犯人？

老威：据说这是牢里的旧规矩，从清朝、民国传到现在。

田志光：犯人中传的牢规，哪怕年代再久，也上不得台面。所以，上面几位一回房，就跪下向天窗连磕三个响头，感谢老天爷保佑。老大说，这班房皇上不好当，火候拿捏不准，自己就栽了。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手下，往后尽量把活路做细，在感觉神经丰富的皮毛上作文章。他还拍我的肩膀赞扬说：“还是田贼经整，扛了十来天，都没出大事。”

打击牢头狱霸进行到第五天，房里的纸笔就收回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检举上面几位。我也不敢写材料，只求平平安安熬过去。老大对我还过得去，由于下身被整烂了，溃疡，流脓，

老大还叫人给我撒消炎粉。我尿频，站在马桶边，鸡巴又像针扎般不出水，老大也不催。

第六天早饭后，所里的电喇叭响了，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宣布狱霸们将在监内游行示众。上面几位立即挤满栅栏门，毛贼只好在二线垫脚参观。随着一阵叮铃咣啷，狱霸们被劳改犯们用竹竿前后赶着，吆喝着，双手提着 70 斤重镣过来了，经过铁栅时，他们就像演电影一般，一个个先站下来，面向大家高喊：“我是狱霸×××，作恶多端，死有余辜，这就是我应有的下场！你们千万莫跟我学喔！”然后，继续被一根颈绳牵着过场，再到另一个铁栅门前重复喊。

五个狱霸沿巷道来回走了十几遍，喊了十几遍，一旦跌倒，竹竿就如雨点般抽下去，直到打个滚，有爬起来。房里就像过节一样，有的毛贼不禁鼓掌叫好，老大回过头扫了一眼才制止住了。

我在收审所待了三个月，没等到枪毙狱霸，就释放了。我弟弟比我早放两天，也整出了一身内伤。回到家，妈被气疯了，整天坐在老屋门坎边，一动不动，屎尿就直接屙在裤裆里。爸被大哥接去了，只隔三差五回到这边，给妈煮一顿饭，让她自己慢慢吃一个星期。我和弟弟本来是年轻人，有体力，不怕穷的，但是一进趟班房，背贼名不说，身体也垮了，比鬼还瘦，干不得重活，一累，浑身都痛。

弟弟老是咯血，没钱检查，就慢慢拖；我尿频了 9 年，可能是“乌龟驮碑”时把尿包压破了。鸡巴被烫狠了，硬不起来，花梦倒做得不少，但遗精也不硬，唉，我不能传宗接代了，这笔债，得有人还。

老威：怎么个还法呢？

田志光：我干不得重活，只能到县城乞讨。有一天捡到一份废报纸，看上面有老百姓状告公安局的新闻，灵机一动，就换了

件干净衣裳，去宜宾市律师事务所咨询。我讲着讲着，想到自己原有的快乐日子，都准备建房结婚了，却一夜之间鸡飞蛋打，家破人亡。我还想到老屋门坎上的疯妈，本来我该尽孝养老，却弄得自身难保。新房的地基还在原地嘛，谁会晓得金元宝会害人嘛。我哭了，当着律师，一个劲地抹泪。

老威：律师咋说？

田志光：很同情我，但觉得没法告公安局和收审所，因为拿不出他们伤害我的证据。

老威：你本人就是证据。

田志光：没一处伤写明了是政府整的，但我气不过，仍然去告，法院却不受理。于是我一级级上访，告状，要求吃人的公安局和收审所共同赔偿我和弟弟 20 万元，罪名之一是诬陷好人，动用肉刑屈打成招；之二是唆使人犯整人犯，把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变成了活地狱；之三是在中央不断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地方上却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之四是金元宝的去向是否向人民公开了？没公开，承办人就有私吞的重大嫌疑。

老威：你还挺有条理。

田志光：边上访边学嘛。9 年来，我最恼火的是此案没有地方受理，这个党是个冷血党。

老威：令人发指。但老田，我也实在想不出办法为你讨个公道，文人无能啊。

戒毒者木邸

采访缘起：至 2003 年 12 月 6 日，我已在云南丽江古城待了 40 余天，除了与外来的和本地的流浪人群厮混，还意外地做了两三篇有些价值的访问。

我倚在太阳底下，翻弄着《易经》，盘算着行程，心中充满人生无常的文人的迷惘，却不料有个人已悄无声息地上了二楼阳台，站在我的身后——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木邸，住在离这儿 300 米开外的另一纳西民居里。

在纳西族中，木姓因世袭土司而门第高贵，可木邸却说，民国以后，木氏就衰落了，连土司府也曾改为公安局和看守所。所谓的高贵血统，就剩下对大麻的嗜好和耐药性啦。

木邸还说，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有过吸毒史，后来戒了，没留下后遗症；而他今年 35 岁，已吸毒十几年，戒毒 100 多次，并因此两度被劳动教养。

我见他恳切，就为之占了一卦，为“萃”之初六。大致吉利。

他的脸上泛出古铜色的健康笑容：“我刚死里逃生，当然吉利了。”

木邸：你能给我打一卦么？

老威：没问题。不过，无论卦象好坏，你都不必当真，游戏嘛。我又不是算命先生。

木邸：好的。

老威：你双手合十，闭眼默祷约一分钟，将意念灌注在一件事情上。注意，只能想一件事。然后，把掌中的三枚硬币向上抛出，连抛六次，卦就出来了。

木郎：这样就行了？我不用把心里想的告诉你？

老威：再次申明：我不算命。我只把卦辞或爻辞念了，把字面意思解释清楚。当然，我的水平有限，不一定就把《易经》这部古今奇书搞清楚了，歧义太多，书中的同一段话，甚至同一个字，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再掺上五行、四柱、季节、流年这些因素，就更扑朔迷离了。好啦，我尽力吧，心诚则灵。

木郎：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老威：好，卦成了，为“萃”，这是你命中注定的本卦。这下卦为“坤”，是大地，是母性，是归宿；上卦为“兑”，是顺从，是喜悦，是口舌。序卦传说：“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这意思是，你的本命是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聚集四方人气，做成一番事业的，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坤”卦赋予你的诚信、厚道坚守到底，不能一味沉迷于“兑”卦的口舌之乐。你看这初六变爻，“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你有诚信，并一次次下决心坚守，却因为过于顺从，贪图感官享乐，胡乱结交朋友，改变初衷，乃至于人生方向迷失，不能自拔……

木郎：不可救药了？

老威：这一卦，主体是“吉”，但“荟萃”须择友，否则就是狼狈为奸了。

木郎：谢谢老威的忠告。其实我已在楼下观察你好几天了，见你每天起床，都泡一盅茶，然后坐在太阳下看书，很少东张西望，显得有来头，有定力。刚才我鼓足勇气，上来和你搭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老威：你是房东大嫂的侄儿。

木郎：我吸毒十几年，戒毒 100 多次，今年 5 月才从华坪放出来。

老威：啥地方？

木郎：云南华坪劳教所，与四川接壤，大约翻两座山，就到攀枝花了。这也是一条买卖毒品的黄金线路，从全国最大的海洛因集散地下关，经过大理、丽江、永胜，过华坪，就进入四川地界攀枝花，全程 400 多公里，汽车一天就到了。而后转火车去成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老威：你看上去精神焕发，一点不像吸毒的。

木郎：按理，我的人生还算平顺，在丽江读完小学、中学和职业高中，然后进了商业局。那年头，这是人人羡慕的单位，没关系是进不去的。小时候，我染过伤寒，眼看没救了，一个当地的老中医却主动到我家，开了三帖偏方，吃完就好了。而且一直都好，20 岁以前，没得过病，连感冒也没有。

老威：你的福分不浅嘛。

木郎：人年轻，兜里也有钱，加之长得帅气，就容易受诱惑。人家几句吹捧你的话，就跟着到社会上去。歌舞厅、车站、麻将桌，一玩一个通宵，第二天，照常上班，不觉得累。我第一次落网大约是 91 或 92 年，记不太清了。我根本不懂得吸毒，也要规规矩矩地认罪，否则就出不来。因为当时搞严打运动，公安和联防拉网清剿，只要在舞厅或其他旮旯里逮住一个吸毒人员，带回去过堂，暴揍两顿，也会牵出来一长串。

老威：这也算数？

木郎：当然，人被打急了，就会乱咬，凡是平时一道玩过的，管他吸没吸毒，犯没犯案，都“坦白交待”。公安人员有句审案行话，叫“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至于倒出来的豆子哪颗有问题，

哪颗没问题，就不管啦，先抓了再说。

许多人跟我一样，稀里糊涂就栽进去。派出所关不了，就直接用闷罐车朝戒毒所送。我指给你看，顺着这些瓦房顶望过去，对面山顶亮晃晃的，是东山寺。喇嘛教的寺庙，外墙是白的，太阳一烤，就晃眼睛。从东山寺垂直往下溜，城边山坳处，有一些房子……看见了？那就是丽江市戒毒所。现在规模大了，设施也改善了，可当时就两排水泥笼子，一楼一底。一间20来平方米的屋，关100多人，挤得腾腾冒烟。

老威：吸不吸毒，应该一查便知。

木郎：96年以前，都没有检测方式，只要有人咬你，只要你在社会上与各类闲杂人员混过，就脱不了干系。你没吸毒？总做过其它不光彩的事，赌博，盗窃，嫖娼，走私。什么也没做？总到过舞厅吧？总在“四川帮”或“湖南帮”里出入过吧？不可能是清白的。幸好我爸爸是个老干部，解放初期的丽江地下党。家里托人把我保了出来。

老威：如果不保你，会是啥结果？

木郎：不管青红皂白，一律强制“戒毒”，完了，直接判劳教，一至三年。

老威：挺省事的。

木郎：对，劳教又不走法律过场，派出所和戒毒所都可以直接送劳教。单子就在他们的抽屉里，一大叠，瞧你不顺眼，就抽出一张。上头早已盖好公章和公安局长的私章，几秒钟，刷刷一填，你的一生就被葬送掉了。所以，十天半月，一阵风，几百上千的在押人员就处理完毕。

我在人前抬不起头，因为二十几就栽了，别人难免不指指戳戳。丽江原来是个小城，旅游者很少，不开化。我上班时感觉压抑，回家又被父母看管着，像做了贼一般，这样日子一久，再开

朗的人也会变的。我悄悄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又有了来往，感到在他们中间要自在些，至少人和人不会互相歧视。我第一次吸毒是92年，人家指点我把药（指海洛因——老威注）裹在烟卷里，抽一口，憋住不出气，否则就浪费了。我连抽两口，没憋住，烟一从口鼻漏出，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四下追着吞那残烟。我吸了小半支就不行了，趴在床沿上呕吐，和醉酒差不多。不过，酒醉了很难受，老半天缓不过劲；可尝药吐了比较舒服，人软绵绵的，骨架子都散开了。

我先天耐药性强，断断续续，吸了半年才上瘾，开始经济状况好，手散，觉得不行了，就一个电话，最多十几分钟，人家就把整方的药送上门。渐渐，经济吃紧，就只要得起零包。整方批发要便宜得多，但一次给好几千，越着急越凑不齐。古城这地方，不仅是入川进藏，去香格里拉的中转地，也是鸦片和海洛因的中转地。据说在以前，狮子山周围，到处都长着野生大麻，罂粟花鲜艳极了，纳西人采来当药用，家家户户都有麻袋装的大麻籽，炒熟了当瓜子嗑，当调味的佐料。后来，野生大麻被政府铲掉了，可适宜种毒品的地理，吃药的肯定比别的地方多。旅游开发之前，大研镇人口不足两万，吃药的估计上千，我知道的熟脸就有几百。那时，院子门一开，随时都能见到蜷在墙根的人，瘾发了，在那儿哆嗦。你稍不留意，他就会突然跳起来，边哀求边搜你的兜。

纳西族生性朴实，讲传统的伦理道德，什么“守孝三年”，“圣人不言商”之类，所以能经商赚钱的，一般都是外来人。毒品市场也一样，由“四川帮”和“湖南帮”控制。他们从下关或格里坪进药，转一道手，利润就翻几倍。毒品买卖也分几级批发，因风险太大，都单线联系，极少跳槽越级。一般人只能在四、五级批发以下拿药，我拿的是三级批发。

遇上严打，全城“熄灯”的时候，日子就难熬了。所谓“熄

灯”，就是地面干净，寻不出一颗药。原因是吃死人啦，帮派之间争地盘火拼啦，总之，公安一查案，几级批发都在一夜之间蒸发了。贩药的都跑光了，吃药的怎么办？又要熬瘾又要躲，日子不是人过的。

有一次遇熄灯，我缺药心慌，就雇了辆摩托，从丽江连夜狂奔400公里，去格里坪拿药。那时，路况很差，没柏油，没高速。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我俩个玩命一般，摩托一会儿蹦起来，一会儿跌下去，轮子擦得咔咔直冒火星星。我像一条癞皮狗，紧紧地粘在骑手背上。我不怕死，我已成为家里的累赘，摔死就一了百了。我们居然4个小时就到了。拿了药，买瓶矿泉水兑了打进去，精神马上就振作。也不腾云驾雾了，生命也显得有意义了。

老威：4小时400公里，还是石子路？真够悬的。

木郎：所以说纳西小伙子厉害。

老威：听说刚打了药不能马上走动，至少得躺一会儿。

木郎：因人而异，有的人吃药要躺，半小时，一小时，还要出现幻觉。我不用躺，药一吃，劲头马上就来了，随便走，干什么都可以。特别是抬头看太阳，深呼吸，特爽。

老威：你出现过幻觉么？

木郎：极少。吃过药，我喜欢劳动，喜欢抬东西，打扫卫生，帮别人干体力活，像活雷锋。只有一次，大概用药过量，我一时没爬得起床，心跳像落石头，又缓又沉，能感觉到血管的收缩。接下来，我变得特别大，手和脚都特别大，像一匹骆驼，不，一匹山。我曲了一下腿，就轰地打一声雷。而窗户啦，屋子啦，其他人啦都特别小，只齐我的指甲盖。

老威：你太能折腾了。

木郎：1996年2月3号下午，丽江大地震，死了100多人，古城房屋塌了一大半。当时，我正与中学同学聚会，打麻将，玩

得高兴。突然，我的心律加快，嘴唇发紫，一溜虚汗从背脊直爬上来，最后满头都是汗了。我明白瘾要发了，就借故告辞大家，赶紧躲到背静处，撩起衣袖扎一针，精神立马就复原了。去单位也没什么事，就出门买了份凉拌猪耳朵，和大家一道，边吃耳朵边看电视。猛地一下，我觉得电视和背后的墙都晃起来，我第一反应是瘾又发了，可自己吃药还不到半小时……

老威：打一针能管多久？

木邸：开始一天打两针就够了，随着瘾的加深，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厉害的时候，一两小时都管不了。大地震那天，我下午1点才扎过，4点就扛不住了。电视又摇又抖，咋的一声，自动熄火。旁边的一位女同事扑到怀里，我没稳住，就与她一道连滚带爬，被抛到左边窗下，而耳朵盘子不由自主从窗口飞往大街。直到第二天，还摆在街中心。

后来听说，我们打麻将的地方也成废墟了。这瘾发作得真是时候，因为我若不走，麻将会就不散，一伙人正在兴头上，哇啦一声天崩地裂……变鬼也糊里糊涂。

老威：你还成救世主了？

木邸：见笑了。

老威：不瞒你说，我也是通过地震报道知道丽江的。

木邸：地震一闹，人心惶惶，这儿就成了死城一座，外地人纷纷离开，连毒贩子也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瘾发心慌，却寻不着一家开门的店铺，买不到矿泉水或蒸馏水。我被逼上梁山，舀井水来兑药，抽入针管，自己扎了。结果，瘾倒是缓解了，整条胳膊却肿起来，渐渐像小腿一般粗，连衣袖都脱不下来了。去看医生，用剪刀裁开，一检查，确诊为血管炎。马上就给家里下《病危通知书》，施行抢救。我的命真大，一天一夜昏迷，危险期过了，居然没有并发症。

原来，这看上去十分清澈的井水也不干净，一地震，地心里就泛上来大量的硫磺，哪怕一头种牛饮一口这呛鼻的毒水也完蛋了，可我瘾一上，嗅觉麻痹，居然就……唉，人命真够贱的。

老威：这毒瘾真是无底深渊啊。

木郎：生理毒瘾其实能戒，十天半月，一个人关在屋里硬挺硬熬，就过去了。只是心里空落落的，就如转瞬间断奶的婴儿，找不到方向。整日无精打采，连吃饭都懒得下床，正当此时，莫说自己沾药，就是看见，甚至嗅着别人吃药，两眼也会立即放光。

至今为止，我劳教了两回，而进戒毒所的次数，我也记不住了。很多时候，都是我主动去的，我希望能被隔离，与“旧病复发”的老环境一刀两断；我希望能有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做人。但是，我在戒毒所总是碰见社会上的熟人，在外面是毒友，里面没药吃，就整夜整夜交流体会，过嘴巴瘾。什么戒毒所，狗屁，你想想，把一堆淫棍关几个月、几年，一旦放出去，嫖瘾不更足了？

戒毒所所长换了几届，都是贪官。你想进来，奉送几条好烟，塞点钱，就搞定了。若要出去，也送烟，塞更多的钱，他马上就签字：尿样呈阴性，过关。这个社会，有钱有势走遍天下，戒毒药也用最好的。

老威：你戒一次毒要花多少钱？

木郎：自己闷屋里戒不花钱。进戒毒所，自带伙食费，住房用药也根据经济情况。丽江有两处戒毒所，东山寺下的是老的，条件比较差；看守所旁边，是地区公安处戒毒所，设施好，有专门的医院。戒毒药很多种，下关生产的六二六较普及；而目前最先进的，是英国进口的“美萨通”（音译）。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戒掉毒瘾。可后遗症明显，你会形成对戒毒药的依赖，上瘾的程度轻于鸦片，和杜冷丁相似。

我花在戒毒上的钱有好几十万，把家里都拖垮了，还是不行；

第一次劳教两年，还是不行。我对自己太绝望了。我自杀过三次，我想人死了，毒也就戒彻底了。太阳刚落山，我就钻进狮子山的林子，找个背静处躺下。从手背到胳膊，密密匝匝的针眼，再扎，已不出血了，因为血管大概都萎缩了。大腿根也扎遍了，连小肚子都千疮百孔。我这个人，真废掉了，没孝敬一天父母，没出过一回远门，就被这药给圈定。

我在半个月中，超量注射三次，第一次1克，第二次1.5克，第三次1.5克，是正常药量的5到10倍。大象也被毒死了，何况一个人！朝大腿根一针扎下，猛推，还来不及拔，就晕厥了。我以为清账了，没料到下半夜居然醒转来，冻得牙齿咔咔抖。我拔了腿上的针管，扔得远远的，然后跌跌撞撞地下山。我在灌木丛中鬼魂一般晃悠，那晚的月亮我记得，红红的，脚盆那么大。

我几乎是滚下山的，进屋一照镜子，满脸满身是血，两眼直的，那凶光连我自己也害怕。我瘫了一会儿，又爬起来，对着墙，一下又一下地撞。我撞了个把钟头，山上的广播响了，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六点半了。夏天的六点半，天已大亮，我听见楼梯响，妈妈起来了。我的脑袋是木的，没一点痛感。

老威：惊心动魄。

木邸：惭愧。

老威：我写过吸毒者，也读过大量这方面的宣传报道，似乎与你的讲述不太一样。

木邸：是吗？

老威：毒瘾摧毁人的生命，而你却特别顽强。

木邸：我们被当作渣滓，比猪狗不如。我家里还有几个钱折腾，可周围大多数都是穷人，抓进戒毒所，没钱用药，只有锁起来强戒，太惨了。

老威：什么惨？你自己不也强戒过么？

木郎：我是城里人，营养充足，身体底子打得好，经得住熬；可大量吃药的是农民，连骨头都榨干了，一强戒，肯定垮。云南德宏州与缅甸、金三角接壤，那地方什么都贵，就毒品便宜，许多当地人砸锅卖铁，甚至拆房子揭瓦也要贪那一口。最后，家当吃完了，人也像狗一样东游西荡，想躺了，就不管身下是露天、屋檐、树下，或茅坑边，一坠就下去了。远看还以为是一堆腐肉，因为苍蝇嗡嗡地叮着。

德宏州的人，在所里一眼就能认出，那种黑，那种瘦！锅灰抹过的皮肤，二指宽的肋骨如钢筋捆在身上。我问过他们，都成这样了还有钱吃药？他们说，药要比米、比菜便宜，便宜到后来，根本不要钱，只要你替人家翻多少地，或者翻够几个小时，就能换到药吃。

唉，在人间是饿鬼，活得像个影子，有一点药吊着，兴许还不会死。可政府抓来一强戒，完了，两三天就死一个。特别是冬天，个把月就报销几十，那些人连折腾、撞墙的力气都没有，只把脖子一伸一伸地咽口水，喉包像个鸡蛋上下滑几下，然后脑袋一耸，出窍了。叫人来，将就他身下的破床单一裹，把这瘟狗抬走。

老威：家属不来认领尸体？

木郎：吸毒者无家属无朋友无祖国，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人员加国际主义死狗。

老威：你倒挺幽默。

木郎：自己把自己踩到底，别人就不屑于再踏上一只脚了。如果家里没门路，戒过毒后就直接送劳教，蛮干两到三年，看能否脱胎换骨。

我第一次劳教是在丽江范围内，家里有关系，罩得住，没吃什么苦头；第二次判三年，送几百公里以外的华坪，才尝到地狱

的滋味。那是在山沟里，地盘太大，我也说不清到底关了多少人。我所在的大队就有 300 多，戒完毒的占百分之八十；下辖分队就是清一色的药案了。

我们的主业是开矿。几架山都是石灰，在大太阳底下，从这坡望那坡，白茫茫的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天还没亮，吹哨起床，开饭，再集合出发。爬到半山腰，太阳刚刚把它的帽檐露出来，空气还凉滋滋的。犯人们分成几路下坑。这坑是长年累月掏出来的，足有月亮，不，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而深达十多米。我们把一架接一架的山“开肠破肚”，而肚子里的气温，起码比外面高四、五度，华坪是有名的高温地区，冬天还好，一入夏，我们就经常在摄氏 40 度左右的高温下刨矿。光着膀子，粉尘飞扬，一米外都辨不清人。汗水不断线，在白灰上碾下一条条汗槽，不少人刨着刨着就歪倒了，马上拖出坑去透气，冲脸泼一桶水，方能认出是谁。

老威：这活路哪是人干的！

木邱：畜牲也不干，牛马骡子一嗅那种呛味，也撒蹄就跑。特别是放炮，真叫玩命啊！一吹炸山哨，犯人都撤到对面，一人端起一辆翻斗车，全神贯注，准备冲刺。然后数秒，一、二、三！小红旗一下，轰隆！一大块山体粉碎了。拳头大、篮球大、桌面大的矿石被呼地抛起来，如雨点一般，从几十米的高处下落。说时迟，那时快，炮一响，犯人们就等不及了，一个个冒着暴风般刮来的烟雾，推着车，叮铃咣当朝上奔，争先恐后捡刚落地的热石头，装满车，而后往下俯冲一两百米，直接倒入一字形排在坡下的雾气腾腾的石灰窑。

那个场面太壮观了，十几米宽的坡，70 多个犯人发了疯一样，上下牵着线狂奔。如卓别林的黑白片，镜头比正常速度快一两倍，每个人的屁股都装有发条，扭紧了一松，就失控了。每天 90 车，

一两百米的来回，你算一算，卓别林也要累吐血。但这是强制改造，不完成定额，就是反改造典型，背铐，关小间，挨捆挨打，甚至加教，那就没盼头了。

老威：这种搞法肯定要出事。

木郎：经常出事。比如炸山，铺天盖地的石头还没落定，腿快的已经冲进去了，结果被砸了。有的连人带车，被砸翻几个滚，车把人扣在下面，那翻斗就硬生生切进腰里。我们去拖人时，还没咽气，鼻孔、嘴、眼睛都咕嘟嘟地淌血，腰下一条槽。我们赶紧抬起跑，才几分钟，就完迷了。

我们分队，每年被石头砸死的有三分之一，旧人去了，总有新人补充进来，所以坐牢的铺位永远不空缺。我的脑子灵光，眼看人命不如狗，就写信叫家里带钱来勾兑关系，千辛万苦才混上个教书的活儿。

老威：死了这么多犯人就没了交待？

木郎：据说劳改和劳教都有个非正常死亡的法定比例，百分之四还是五？不清楚。但华坪的管教认钱不认人，砸死、呛死、窑下事故而死的冤鬼，统统被认定为“毒发身亡”，谁叫你的毒瘾潜伏得这么深。

老威：戒毒所有检测鉴定嘛。

木郎：这扯皮的事没个完。况且上级部门只要一个“合法解释”。狗日的警察可捞肥了，小小一个分队长，月工资就 5000 多块，年终奖金一发就是一两万，还不算平时的油水。这人肉石灰的利润太高了。

今年 5 月，我上下使了银子，提前几个月解教，捡了一条命。

老威：掐指一算，你已经正常了大半年。

木郎：这华坪劳教所才是个戒药的好去处。不能再进去了，你说呢？

村民谢明

采访缘起：2002年4月30日下午，我第二次与来省城上訪的蓬安农民阙定明等人约定，在成都西玉龙街的××招待所见面。由于案件主角突然回避，只得转而访谈43岁的配角谢明。

为了大家阅读顺畅，我没能采用大量的地方土语，虽然这非常可惜，但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这件事。苛政猛于虎，所谓三农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许多。

应该说，冤案主角政治觉悟很高，信赖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所以他过分自负，竟要通过反映、举报、依法查帐来揭露贪官，减轻乡亲们的人头税费，却阻力重重，最终被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锒铛入狱。

“天哪，”据说他在法庭上仰天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天哪？”

老威：我搞了多年的底层访谈，这个旅馆，我进进出出了好多回，但是昨晚看完了你们的上访材料，还是失眠了，用一句书面语来形容，就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

谢明：谢谢老威同志为我们作主。

老威：我一个跑滩文人，作不了什么主。我只能保证尽量真实地记录这个案子，让更多的人了解阙定明的冤情，至于以后咋样，不敢说。

谢明：这几年，我们接待了几十位报社记者，有的还亲自跑

到中坝村走访，都说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转眼间，阙定明的四年牢也坐满了，也没见有啥报刊公开报道过。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通了天，可整人害人的贪官至今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贪官有利。

老威：想不到您还挺懂政治啊。

谢明：折腾来折腾去，中国人个个都炼成了政治家。

老威：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份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的申述状可是您起草的？我挨着数了3个钟头，大约有1100多人在上面签名画押，手印盖得密密匝匝，真是触目惊心！

谢明：您的心这么细？看来有些来头。不过，这文章我做不了，至于谁能做，暂时保密。

老威：那就算了。

谢明：我直接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口水话太多，上不了台面，还得麻烦老威同志您花几把力气加工整理。

老威：您放心吧。

谢明：您晓得，我们的申述状标题是“嘉陵江畔第一案”，为啥这样说？因为在我们那儿，自盘古王开天地以来，还没出过这种事。你说国民党坏，苛捐杂税多，但是听老一辈讲，也就是乡长、保长、甲长带几个民团、乡丁进村来走几圈，催催摊派款；情况严重了才背上几杆破枪，壮壮声势。可在共产党手里，在公元1998年4月14日上午，朗朗乾坤，竟有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驶着警车，冲进了我们长梁乡，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接着包抄了四面环水的中坝岛。这帮兵匪的总指挥是蓬安县的父母官，县长孙明君。

老威：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怎么得罪了县长？

谢明：因为上访和查帐。1996年2月以来，中坝村5组村民阙定明就多次向上级举报村社干部的贪污腐败，还就农民负担过

重问题多次上访，迫使蓬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到中坝村调查。阙定明在工作组驾临当日，抄写了《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央 1996[13]号文件，以及省农业厅对阙定明上访问题的批复意见，在村里张贴了好几处，还找了一面祖传的铜锣，边敲边喊，四方游走，通知大伙开会。他是个瘸子，一大拨娃娃跟着他，他喊一句“查帐啰！”娃娃们也跟着喊，直到全村 2000 多人都出来了，才挟着锣去接待副县长刘光福率领的工作组。

阙定明只有小学文化，可人耿直、仗义，见的世面多，所以他的口才在村里很出名。他当即走到刘副县长跟前，鞠个躬，代表村民汇报说：“我们长梁乡中坝村是嘉陵江畔四面环河的小岛，地势低洼，河滩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玉米、花生、烟叶、油菜。广柑本来是传统产品，但无资金改良，也老化了，变不成钱了。全村 2300 人，负担人口 1910 人，耕地面积 992.5 亩，人均不足 5 分地，有的社还不足 3 分地。人多地少，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只能维持温饱，更何况常年遭灾（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村舍淹没，地里颗粒无收，青壮村民就只有成群结队逃荒，出去讨饭、打工，把国家救济粮省给跑不动的老小吃。幸好苍天有眼，阶级斗争不搞了，中央和四川省政府都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积极性，把近百种税费砍掉一半以上，后来又出台了《条例》，政策透明，我们到底可以直一下腰了。虽然天灾难免，但人灾总能免吧？93 年中坝村的人均负担为 40 元，94 年 50 元，95 年 60 元，如果一直按这个增长度，我们没啥怨言，乡村两级有那么多干部拿工资、补贴，农民不出钱出血供着，政府班子就瘫痪了。没人管事，影响了安定团结肯定不行，我们能体会基层政府的难处，但你们也该为我们想想，农民的钱是一分一厘从这块不争气的地里挤榨出来的，总有一天，这地就荒了，就大家都没吃的。一人出 60 元，一户六口之家，就要出 300 元。花

生、玉米，几毛钱一斤，300 元要买多少？你们每天拿一分钟为我们算算帐，为土地算算帐，也就不至于在 1996 年，突然把人头负担提高到 170 多元，比上一年增加 180%！这就意味着六口之家要负担 1000 多元，而中坝村两年的人均纯收入才 483 元！砸锅卖铁也出不起啊。你们于心何忍？”

“当然，如果基层政府需要这么多钱来为老百姓办事，需要这么多钱去爱国爱党，去打击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我们也认了，卖儿卖女，卖房卖血都行。想不通的是，中央想减，地方却增，长梁乡好像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因此，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要依据法律、政策，要求查帐。全体村民都可以作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坝村就从来没有公开过帐务。”

老阕的语音刚落，掌声就打雷一般响起来，整整持续了几分钟；刘副县长也感动了。当场和工作组其它人交换看法，同意了村民的查帐请求，并且说：“这是民主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和蓬安县委为你们撑腰、打气。”

老威：关于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有什么具体的精神？

谢明：我这儿藏有 1997 年 9 月 1 号的《蓬安信息报》，上头全文发表了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蓬安县委、县政府为此公开表态，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3）号文件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并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主管部门的数额。

老威：那 1997 年的人头负担是多少？

谢明：180 多元。

老威：我明白了，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传达惯例，基层政府比你们预先知道了新政策，所以赶在实施期限之前，

把人头负担从 60 元猛提至 170 多元，这样，在高基数上再增加，自然就符合“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 5%”，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谢明：可人头负担增加了，纯收入并没有增加。

老威：那就做假帐，泡沫帐。

谢明：所以老阙提出查帐，可拖了一年多，不成。因为平头百姓查政府的帐，古往今来都没先例，虽然如今有法了，副县长也表态了，但县委班子调整，前任答应的事后任凭啥兑现？村民代表们乡里、县里，脚跑大了，人头负担还直线上升。老阙说：

“这样下去，农民吃不起饭，政府的税费收不上来，恐怕人心惶惶，要暴乱了。”就在 1998 年 2 月 20 日，邀约中坝村各社村民代表十几人，一道去乡政府请求查帐。当时政府里只有副乡长唐杰超执班，其它干部都到乡治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了。唐乡长晓得大家来意，就说我们没有会计证，无权查帐。老阙说：“都是农民，哪来会计证？只怕乡政府的会计也没证。但我们有《村民组织法》，还有中央（13）号文件，请乡长您依法办事，兑现县上允许查帐的承诺。”姓唐的又磨了半天，见溜不脱，就签了字，并带领我们去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 92 至 97 年的帐本。

我们喜出望外，就分头进行，各社代表查各社的帐。正上了劲，正乡长彭会昌吃喜酒回来，闻讯暴跳如雷，大吼：“反了！反了！搞颠倒了！”代表们不愿交回帐本，彭乡长又吼：“帐目坚决不许查，今天要打要杀，陪到底。”代表们气极了，就拉他上市里县里评理，争吵起来。闹了个把钟头，三个政府官员借故脱身，去乡治安员家汇合其它人，商量对策。下午，蓬安县委和政府接到密告，派调查组来长梁乡走访当事人，并在乡电影院召开大会，县委副书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都讲话，批评了乡政府，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卫县长说：“对反贪污腐败的人要重用、大

用；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拉下马来，依法惩治。”还宣布：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正式成立，县检察院唐联喜副检察长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任组员。

话音没落，全场鼓掌，大家都连叫“包青天卫县长”。于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帐务清理按部就班，先从群众反映最大的九社和十社开始。一上手，就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 2.7 万元；九社有数笔巨额款项跟县长孙明均有直接牵连（县里兴建马回水电站，九社全部房屋搬迁，时任马电公司董事长、总指挥的孙明均经手了国家下拨的巨额房屋街道重建款。马电计划投资 1.7 亿元，实际耗资 4.3 亿元）。谁也没想到，拔了萝卜带出一堆泥，一桩特大经济案眼看暴露——帐务清查被勒令终止。

父母官亲自出马了，村民代表不小心捅漏了天！1998 年 4 月 14 日，中坝村 2000 余位乡亲终生难忘，100 多警察带着枪杀了进来！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乡电影院，把骗到场的村民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打翻在地，反扭手臂，以十几支手枪和冲锋枪抵住脑袋。武警班长喝叫：“老实点，动就一枪崩了！”接着被拖出电影院，一顿拳脚。三人还被按跪在公路上，锁了背铐。当时在场有几十个村民，都骇炸了，四下乱窜着叫唤：“抓人啰！共产党抓人啰！”县委副书记兰坤发见了，命令鸣枪示警，并大吼：“今天接到密令，如有妨碍执行公务者，就地正法。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

在阙定明等三人被拖上囚车带走的同时，武警大部队已过河包围了中坝村九社，挨户进行大搜捕。大祸临头，许多村民房门紧闭，但都被踹开了。当然，农民家穷得叮当响，一眼就望穿了，于是兵匪们又驾着警车，冲进庄稼地，碾倒大片庄稼。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代表何文有，还没弄醒豁，就被枪托砸翻，嘴巴啃

泥，戴上铐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吕德良，只有 20 岁，血气方刚，质问了一句：“光天化日，你们凭啥……”话没落音，就挨了几拳，口鼻直喷血，跟着，也被戴铐扔进囚车。

一帮兵匪歪戴帽子，在宽阔的田野上施展威风，谁敢吭气就打就抓。受伤的村民横躺在地里，没人管，而警车却一路拉着警报，制造恐怖气氛，老人和妇女都吓得发抖，紧紧抱住自己家的强劳力，不让再出门惹祸。还在外头的村民，像受惊的鸡鸭，哇哇往家跑。警车不停地撵人，横冲直撞地耍疯了，村民代表吕功辉被撵到嘉陵江边，跳水逃命，差点被淹死。兵匪们耍尽兴了，就鸣着警报到县轮渡码头会师，命令俘虏们当众跪在河边，打得死去活来，群众远远围观，指指戳戳，还以为破获了一起抢劫杀人集团。

阙定明等五人被关进县看守所，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精神几乎崩溃，只能在审讯人员早已写好的定罪材料上签字画押。一个月后，除老阙外，其他“认罪态度较好”的四人均“取保候审”，作为释放条件，四人书面保证：“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违者再抓进来，罪加一等。”

“首犯”阙定明继续坐牢，在此期间，县太爷孙明均指挥的专案调查组进驻中坝村，拎着手枪、手铐，揣着《拘留证》“收取”已定证据。为了逃避作伪证，村民们纷纷在夜里外逃，十几个村民代表更是有家难回，20 多天在河边荒草地露宿，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投嘉陵江。天老爷，这是啥日子？蚂蚁都有巢，难道做农民连蚂蚁都不如？

老威：这狗日的贪官也太狠毒，贪了，不让查；不让查就算了，还要搞恐怖活动，封人的口，这和本·拉登有啥区别？老谢，您可晓得朱镕基总理说过“预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话？

谢明：中国起码有几十万贪官，见钱不怕死，所以几百个朱镕基也不够用。

老威：湖北监利县有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曾经为民请命，给朱镕基写信，他反映的人头负担问题同中坝村大同小异，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 80 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 500 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跟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涨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地哭。’”

谢明：这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可惜没生在长梁乡。

老威：接下来有：“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多么不公平啊。”

谢明：变了农民，脸朝黄土，就没啥公平的，我们从没要求公平，只要求能过得下去。

老威：没想到您还挺平静。

谢明：眼泪已经淌干了，老阚为中坝岛坐牢，大家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不是官，就一个农民，一个瘸子，却心比天高，非要拗这个劲。他和清官一样，为民请命，但写不了那么好的文章，小学文化，给市长、省长写信都不行，词不够用，不够用来形容当农民的苦。何况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总理，绝对看不过来。农民的眼泪只能把农民自己淹死。

老威：我理解，请您继续讲。

谢明：这是命，阚定明命中该坐四年牢，1998 年 9 月 14 日，蓬安县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10 月

7日，法院开庭公审，被告和辩护律师都作了“无罪申辩”。群情激愤，几百名当地村民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举着“阙定明冤枉”的横幅，多次从旁听席上起立发言，要求释放被告，惩治贪官。法官多次制止无效，就宣布休庭。因证据不足，11月3日，县检察院撤回起诉。11月5日，村民们聚集法院门口，要求依法放人，刑庭庭长刘××出面接待，并压低嗓门对大家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法院判不下来，可是县委主要领导一再施压，我们叫他们签字，我们判，他们又不签。”

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1998年12月1日，县检察院第二次提起公诉，罪名和罪证无一字改动。12月22日，县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一时的冤案，为了防止骚乱，县委书记谢发国亲自出马，在县邮电局设立临时指挥部，致使城内电话中断数小时；并出动大量警力，在城外拦截从成都、南充等地赶来采访的记者。

全城戒严了，岗哨林立，公路和水路交通被封锁，警车响着警报在街上巡逻，水上派出所出动汽艇阻拦从中坝岛过江的渡船，超载的渡船在江中摇摇晃晃，眼看要沉了，汽艇才网开一面。

而在庭上，检察官和律师嘴仗打得激烈，只听律师声音洪亮地说：“本来‘奉命起诉’，‘奉命审判’，权大于法已成为过去，然而在新刑法，刑诉颁行的今天，又重现这个问题，这将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悲剧。是蓬安县的悲剧。因为，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官，你可以镇压一个阙定明，而无法镇压百万蓬安人。一个阙定明被镇压下去了，千百个阙定明会站起来，历史将宣判阙定明无罪。历史将把蓬安的大、中、小贪官钉死在耻辱柱上。历史上的莫须有都是这样，可以压得了一时，却不能压一世，历史上的秦桧，至今还跪在杭州的风波亭外，受千人骂，万人打。”

老威：这律师胆够大的。

谢明：他是南充的律师，蓬安管不了，而且他实在被气毛了，

明摆着的冤案嘛，硬要开庭。到了中午，天阴得很，几千群众不断线地涌入法院，挤在旁听席，为阙定明和律师鼓劲；而检察官一开口，群众就起哄，喊冤枉，法官制止不了，就连连叹息。到最后，检察官就只擦汗，不说话，蜷在座位上，像受气的小媳妇；而律师穷追猛打，滔滔不绝，把法警和城里人都感动得热泪直流。阙定明在被告席上，边哭边冲着四面八方拱手道谢，连说：“我满足了，满足了！”

拖到下午 3 点，法官摸出事先拟好的官样文章宣布：判处阙定明有期徒刑四年。

老威：依据是什么？

谢明：前头已讲了，是因为 98 年 2 月 20 号的查帐。

老威：我看过南充市中院的“终审裁定”，纸上的罪名有：私立社员代表；聚众强行提帐；殴打乡干部，致使一人轻伤，两人轻微伤，共用去住院医疗费五千多元；致使乡政府当日瘫痪。

谢明：纯属造谣，律师在法庭上已逐条反驳：村民代表是根据卫副县长和工作组的指示，由各社自己推选，小社 2 名，大社 2—4 名；定期张榜公布帐目，允许村民查帐也是中央（13）号文件第 2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的；至于殴打乡官，在场的群众都写了证明，阙定明没动过一根指头。您想想，十几个泥腿子对两、三个乡官，若真要打，狗日的早爬不起来了，咋会只是轻、微伤？从古自今，只听说官欺民，很少有民欺官的。律师说，鉴定书是伪证，因为 2 月 20 日出事，伤者 24 日才住院，直到 4 月 29 日才通过法医鉴定，早过了“24 小时内验伤，过时不认”的期限。还有，破一点皮，就赖在医院不出来，花去国家 5000 多元，也太贪了。

老威：5000 多元是十几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吧。

谢明：这样下去，我们在本乡本土都待不下去了，98 年发特

大洪水，村庄淹了不少，大春农作物颗粒无收，但人头费还在提，管理费提得更高，老人和小孩都分摊。农民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可现在，地里出不了东西，养不了人，你不种地，跑了，可税费还得交，在外面打工挣血汗钱回来交。不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村、乡干部下来，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黑啊，太黑啊，我爸已七、八十岁了，他说还是毛主席好，毛主席至少不会让干部随便抢社员的东西。阙定明就是个例子，他只是想查帐，反反村官，他从来没想得罪乡以上，县以上的官，自己才几斤几两？但他的命太硬，一摸帐本就发现大问题，查下去，县太爷就下不了台。若在文革中，就把这贪官当走资派打了，现在呢，贪官一批比一批密，你垫脚后跟也数不到头，阙定明敢反，敢怀疑人头负担有鬼，就扰乱了社会秩序，就有枪杆子对准他。

老威：看样子您很悲观。

谢明：年轻人活不了，还可以去抢去偷，我已 50 多岁，没有身体本钱了。我陪着老阙上访，打官司，这条路再长也要走到黑。大不了要饭，当盲流。除了房子和地，农民已经没啥可失去的，要关要杀，他们看着办吧。

被收容者李明凯

采访缘起：2003年5月17日下午5点，我正在家中上网查看已传得颇为热闹的“孙志刚受虐致死事件”，不料门响了，跟着闯进个不速之客——好几年不见的瘦小的行为艺术家李明凯。

“电话里老是忙音，于是我就直接上来了。”他凑到电脑面前踱道，“又是孙志刚？当然，这一晌除了非典，只能是孙志刚。”

我关上电脑，沏茶待客。接着，有备而来的李明凯讲述了他在四年前的那段被收容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比较道，“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像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了么？”

但是，李明凯的父亲却受不了儿子出事的刺激，积忧成病，在半年后死于绝症。

从古至今，做中国人都需要铁丝的神经，钢板的皮肉，百毒难侵的心灵，方能善始善终。所以，作为蹲过大狱，并多次出入公安机关的过来人，我安慰李明凯道：“日子还长。”

并且，国家在进步。1997年，全国人大废除了暗无天日的收审制度；今年，因为孙志刚，虚拟世界里有几百万喉咙在怒吼，所谓收容遣送及《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再过一些时候，由于某个契机，就该轮到践踏人性的户口制度吧？然后，再轮到……

不知道还要“进步”多少年，不知道现在四、五十岁的

人还能不能看到比较顺眼的结果——脆弱的神经，敏感的皮肤，童言无忌的心灵也勉强能够在这儿存活并且生长。

李明凯：你还记得吧，老威，大约四年前，你像条猎狗，撵着访谈我？

老威：我当然记得你的反复无常，分明约好时间、地点，事到临头又变卦，害得我屡屡扑空。不过，我不怪你，也不怪其他甩了我若干次的访谈对象。

李明凯：我当时没心情，甚至有些反感你，因为你有文字窥阴癖。别人的伤口已经在淌血了，你依旧刨根问底，唯恐伤口撕裂得不够大。我记得你属木，木性人是最冷酷的。

老威：木性人最冷酷？那金、木、水、火、土的天下五行中，冷面人占五分之一喽？好啦，我不争论，不辩解，因为我这辈子，越辩越黑的时候太多了。《易经》之困卦曰：“有言不信。”意思是被认定有罪的人无法自己为自己辩诬，所以才有律师这一行当。

李明凯：看你扯哪儿去了。我晓得卜卦是你的强项，但也犯不着趁机卖弄嘛。

老威：对不起，失言了。今天的话题应该是你。

李明凯：非典时期，我在家里憋了十来天，感觉上过了十来年，差点疯了。昨天，试着给几个哥们儿打电话，约喝茶，都推有事。在成都×报上班的老汪，已被隔离到龙泉驿的度假中心，每天上下午都准时学习“三个代表”，众志成城抗非典。目前成都的新闻单位都两班倒，一拨人马上班，另一拨人马隔离学习15天，以防全军覆没，报纸瘫痪。

约不上人，我只好自个儿上街逛，路过磨子桥一家网吧，见里面空荡荡的，几十台电脑，才两、三个不怕死的铁杆网虫，就

贼眉鼠眼地进去找个位置。打开邮箱，通过无名氏寄来的最新代理服务器上了动态网，然后遍逛海外各大反动网站，嘿，真出事了。

老威：又是伊拉克战争又是非典，当然出大事了。

李明凯：我说的是孙志刚事件。他是个工科大学生，刚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公司任设计师。今年3月17号晚上，他和我，和许多内心骚动、渴望聊天的他乡网虫一样，没带任何证件就出门上网，结果在大街上走着就被治安警察当作“三无”或闲杂人员抓了。紧接着，又从派出所转到广州收容站，最终被警匪一家，齐心协力用乱棒活活打死！

老威：我读过有关的评论，孙志刚在三天中，挨了许多场打，尸体作解剖时，背部皮下淤了一大片黑血。幸好有互联网在，所以《南方都市报》4月25日一曝光，立即引起全国性的连锁反应，因为此类事件多如牛毛。不瞒你说，我刚出狱回成都，就因没办《暂住证》被警察在深夜从父母家抓走过。

我在白果林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补办了《暂住证》之后，才放出来。我当时一再强调，我在自己的父母家是长住，不是“暂住”，我生长在自己的家乡，大约在其他地方才算“暂住”。但“警察”充耳不闻，照章办事，“无《身份证》、《暂住证》和正式工作单位的闲杂人员必须接受收容遣返。”“闲杂人员”一词是李鹏在八九学潮期间发明的，一直沿袭到现在。

李明凯：可人家孙志刚是三证齐全，只是没随身带着而已。更恐怖的是，因为“顶了嘴”，警察不准孙的单位和朋友出证明出钱保释，直到扔出一具死尸。目前，专家、学者都钻出来写文章，要求追究真凶。网上一片叫骂，我也敲了个千把字的愤青帖子，狂贴十几个地方，我还在东海一枭发起的“关于取缔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老威：你是兔死狐悲吧。

李明凯：还是要绕回几年前的老话题？好嘛，趁孙志刚的冤魂给我的勇气，就讲一讲。我和他一样，来自农村。1993年，20岁出头，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与美术系学生密切接触，爱上了观念艺术，并参与成立了人民艺术公社。97年毕业，本来分配回甘肃老家教中学，我不干，就同成千上万应届毕业生一样，自己入社会闯荡。先是在文化公司打工，拉广告、当写手、装修设计，什么都做；后来，积累了两万多块钱的小资本，就同海南籍的两个同学搭伙，做水果汁生意，即把从海南岛运来的热带水果兑水机榨，定点推销给酒楼。半年之后，生意逐渐兴隆，我就在肖家河的居民楼里租了三居室，融办公、存货、寝食、会客于一体。当时，在此出入就两类人，一类助销小姐，一类行为艺术家，男女都长发披肩，这肯定引起居委会老太太的注意。

老威：成都的行为艺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吧。

李明凯：同诗歌一样，很热。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还拍了专题片。美国在华投资的贝特·达蒙西还出钱与艺术家们合作，在府南河搞“水的保护者”。我很热衷，在生意的同时，弄了大量作品，如果不是后来出事，我还会在艺术的大道上不歇气地狂奔下去，直到人生有一个结果。

老威：行为艺术赚不了钱，你能物质、精神两手抓，两手都硬，真不简单。我还欣赏过你的环保作品“抽刀断水”，整整三天，你举一把菜刀不停地砍都江堰的急流。

李明凯：看不出这是果汁公司经理吧？

老威：看不出。

李明凯：警察叔叔也看不出，所以他们在居委会和联防的带领下，于1999年一个夏日深夜，上门来了。插门声像爆炸一般，

把我从梦中惊醒，裤子都套反了，在我边答应边调整裤腿时，外头已抬出电动切割机弄开了防护铁栅门。

脑子一片空白，屋里一下子闯进来十几个警察和联防队员，像水缸似的，哗哗满了。出于应酬的本能，我拉开办公桌抽屉拿烟递过去，脸熟的户籍却挡开，厉声喝问：“暂住证？”

我松了口气，因为除了“三证”，其它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证照皆齐全。我为此花了1万多，几乎跑断了腿，图的是个保险。我打开文件柜，把七、八种证照批文都摊开桌上，还包括我的大学文凭、鉴定、人才交流中心的通知书等等。警察绕到桌后坐下，挨一查验，末了，抬起头，仍直戳戳地把手伸过来：“这些破烂没用，我们只要暂住证。”

我只好又在抽屉里翻找，浑身汗如雨下。我终于从一本书里找到，有两个，去年和今年的。按他们的规定，一个暂住证管一年，但半年登记一次，交一次钱。我如释重负地把这救命宝贝双手奉上。警察再一次仔细验看，然后宣布：“全部过期了。”

我争辩说：“没过期，今年才办的。”

警察一字一顿地说：“你下半年还没进行延期登记。”

我急忙说：“明天一早就去。”

警察又是一字一顿地说：“已经晚了。”然后当众把暂住证内页夹出来，撕得粉碎。联防受了警察示意，几间屋窜来窜去地搜查，水果踢得满地都是，鲜榨汁和助销的镀银盘子也踩烂了。我心里着急，就根据有限的法律知识，指出不能毁坏私人财产。警察说：“我们依法搜查罪证。”还命人把我的VCD机和一箱光碟全抱走。

他们还搜出了50盒避孕套，于是我看黄碟、卖淫嫖娼的嫌疑更大了。

老威：你用得了50盒避孕套么？

李明凯：你这口气跟警察差不多。本来“三无人员”就该直接送收容站的，那晚上，成都市拉网清查外来人口，肖家河出租房多，属重点，所以居民楼下，四周都停着警车，警灯跟夜总会的彩灯一样，闪个不停。后来听说，光肖家河一带，就抓了几百，面包车不够用，就弄了几辆公共汽车。天快亮了，才颠到郊外多宝寺。警察个个干劲十足，这是绑肉票啊，抓一个没暂住证的，要赎回来，至少 500 元。少了这个数，就得继续在里头挨打、挨饿、干苦力，直到油水榨得差不多了，才“降价处理”。我太倒霉了，平常受到居委会的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汇报到派出所，什么“小姐和嫖客频频出入，是个大白天也卖淫的窝点”啊，什么“毒品交易”啊，捕风捉影。其实，小姐卖果汁，艺术家搞行为，各干一行。

老威：你的避孕套与他们有关？

李明凯：放你娘的臭屁。我是艺术家，要做作品。我原准备亲口将 500 个避孕套吹胀，在车辆最密的傍晚，拿到春熙路旁边的天桥上去放，我将留在原地，观察人群和车辆的反应……

老威：你想制造交通事故啊？

李明凯：许多哥们儿都这样问。人群混乱还没啥，怕的是司机们突然见这种东西降落前窗，一走神，就撞一串，那艺术的性质就变了。所以我这名为“人欲横流”的妙作，只得因现实的难度而暂时搁浅。

老威：你可以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搞。

李明凯：行为艺术是互动的，没有受众的反应，还不如一个人躲家里扇嘴巴。我也曾这样对警察解释，他们的回答是：“那你就当众扇嘴巴，看我们有没有反应。”我不动，他们就找来个小偷，与我面对面站着。小偷又瘦又脏，可还在警察的鼓励下对我呲牙裂嘴地笑。这下热闹大了，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都过来围观，

警察说：“艺术家优先，动手吧。”我羞愤交集，浑身都哆嗦了，却不提防小偷恶狠狠地甩过来一耳光，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我本能地挥起右臂，要回敬，围观者却鼓起掌来，只听警察笑得气喘吁吁地说：“劳动人民先动手？没教养。”

我突然想起耶稣的至理名言：“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凑上去。”于是就听天由命地放下手臂。小偷劈劈啪啪扇了我20多个耳光，见我仍不还手，竟被激怒了。扑上来，揪住我的长发，兜两圈，就按趴在地下拳打脚踢。我晕晕乎乎的，一会儿抱头，一会儿抱腰，实在受不了，就往围观者的腿上滚，许多双脚把我踢出来，小偷已累得气喘如牛，最后干脆坐在我的背上，揪住我的脑顶盖，一下一下往地上磕。

围观者打着哈欠散开了，都说：“捶一头死猪，莫趣莫趣。”此时派出所所长装模作样地过来制止小偷，并演讲了一通依法治国、严禁刑讯的官话。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天一夜，他们仍然审不出“避孕套的真实案底”，就丢下一句“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掌握我嫖娼卖淫的证据，派出所出动警力，传讯了我手下全部的助销小姐，无结果，只得将我作为三无人员，与打我的小偷同锁一副手铐，送进收容遣送站。

老威：他们没有释放你？

李明凯：乔石任内修改《刑法》，取消了收审，警察失去了无限期地关押嫌疑分子的依据。幸好收容遣送制还在，24小时破不了“案”，警察就可以将你从公安机关“释放”到由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共同管辖的收容所。这里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妓女、嫖客、赌棍、上访人士、民工、下岗工人、乞丐、无照经营者、底层文人。总之，品种齐全，社会上有的这儿全部有。我一进去亮出身份，大伙都笑了，问：艺术家？画画、写诗还是唱歌的？我说搞行为。大伙说，那叫啥艺术家？我们都搞行为。

三层楼，20多间屋都关满了，我被塞进顶楼2号房，进门就一大马桶。我在看守人员的一再吆喝下，好歹背靠马桶坐下去，下巴正好搁在别人的后颈窝上，一转脸，又碰上了另一人的鼻尖。不过几分钟，我就被臭哄哄的热气给蒸熟了，衬衣粘在累累伤痕上，疼得我丝丝抽气。就这样磨了一会儿，有人划船一般从屋子另一头过来屙尿，我只好站起，待那人瞄准马桶颈方便毕，企图坐回原位，不料地盘已消失。

万般无奈，我垫脚上了马桶，高僧一般俯视众生。我总想在下一个屙尿的光临时，夺回坐位，可人太瘦小，臀部不丰，屡屡败北之际，还饱尝了阵阵老拳。坚持到天晚，我已上下马桶了十几次，幸遇开门领饭，众犯列队而出下三楼，才透了口气。

晚饭是两个夹生馒头，塞进嘴里粘牙，无法下咽。汤桶立在院子当中，我四处寻碗，没有，就问身边犯人，那人指出一个窗口，我去领，却被告之一个土碗五块钱。我搜遍裤兜，有十几元钱，就掏钱买碗，去院中舀汤。我闭眼硬灌了三碗，烂菜叶味直熏鼻腔。由于肠胃不敌这种猪狗食，当夜我就拉了三次，第二天大早，竟奇饿难忍。

我在顶楼号子里蹲了三天，与几十人一道苦撑苦熬，不刷牙洗脸。这世界上最臭的就是沤在一块的人肉，久了，连虱子也受不了，往颈窝、下巴、肩膀等明处爬。管理员每日早晚两次，收电话号码，通知外头来交钱赎人。市话一个5元，长话在原价的基础上涨5倍，暂记帐上，待解脱之日一次性结清。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递电话条子，所以三天后，号子渐渐松了。户口在本市的，走得较快，特别是嫖赌犯，进来就喊爹叫妈，顶多熬一宿，就不惜血本，也要让外头来赎人。干这勾当，警察高兴昏了，尽量把罚金往高处抬，1万到3万。我觉得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

像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么？前两年，《南方周末》曾登载一篇报道，重庆的水上警察为了逼良为娼，增加收入，曾把两位误抓的良家女子扣押三天，调戏拷问，注射毒品杜冷丁，使其上瘾。

老威：你在里面待遇如何？挨打没有？

李明凯：同派出所相比，我的待遇还是有改善，至少没刑讯。孙志刚是学工科的，脑筋转不了弯，嘴硬，激怒了警察。我做了多年行为艺术，见过些场面，要油滑些。不过，整整三天都没人来赎，我还是慌了。在外头，我的朋友都是艺术家，穷，听说要出几百上千赎我，就有些迟疑。无奈，我一咬牙，双管齐下，也把甘肃老家的电话提供了。这是个令人后悔终身的致命错误！

熬过 7 天，有点门路的几乎都走了，剩下的多是盲流。管理员说，政府没钱遣送诸位，你们得自己挣路费。过两天，就分期分批集合去搞基建，要么挖地基，灌钢筋混凝土；要么运鹅卵石，学做砖瓦。如此劳动三个月至半年，就免费遣送回原籍。

老威：这是法律么？

李明凯：不晓得，也千万别提法不法，否则哪天成了孙志刚第二，你还蒙在鼓里。总之，我的运气不算太坏，因为收容站里大队人马转移去做苦力时，我被留下来，看管法轮功分子。其实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挺老实，不用“看管”。底楼的号子比顶楼大许多，按照二比一，一个法轮功由两个人犯贴身守护，不准闭眼，不准动嘴，不准打坐。一见有盘膝的趋势，两人就一左一右，将法轮功的大腿掰开。我是文化人，还兼有高声朗读《人民日报》的重任，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都是钦定反邪教的狗屁文章。

咽喉都冒烟了，但法轮功们挺顽固，哪怕四五个人轮番读报也难干扰。半夜三更，乘人打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坐起来盘膝抱掌。此时困得不行，也就由他去，可一旦被管理员发现，我们

就得挨电棍受罚。

老威：法轮功也关这儿？不可思议。

李明凯：都是由北京遣送回川，据说是在天安门聚会，演示法轮大法时被抓的。其中还有教授、编辑、高级工程师等等。他们被关在这儿，等着单位领导来交钱领人，订保证。这有些像行为艺术，比如一察觉某个老头嘴唇颤动，我们马上就凑上去，贴耳朗诵《邪教头子李洪志》，直到他意乱神迷，停嘴睁眼，脸色熬白。这相当于美国对付伊拉克军队的噪音炸弹。

老威：你还干得上瘾呢。

李明凯：没人赎我，不上瘾，我怎么活？在收容站熬了 11 天，最后都怪罪爹妈不该生我了，才被一个助销小姐弄了出去。她花了 600，我还了她 1000。这娘们同我耍了三个月，曾哭着要嫁给我，怕失去单身的自由和乐趣，我没干。

这个小赵人不错，她不计前嫌，还为我父母安排了食宿。重逢的那一幕就别提了，经历这场惊吓，父母死活要我跟他们回甘肃，我却私下打定主意去北京漂几年。

老威：故事就这样结尾了？

李明凯：大约半年以后，我爸爸得了胃癌，住进兰州××医院。我变卖了所有的东西，筹到 8 万块钱，赶回去尽孝。我在病床边守了三个多月，一言难尽。

老威：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李明凯：爸爸他活了 56 岁，在这 56 年中，大约只有这 3 个月，才算父子有了真正的精神交流。我们这代人都这样，自我中心，不屑于了解父辈的内心世界，却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艺术家”。

妹妹告诉我，自从出了事，家里就一直提心吊胆，父母更是吃不香，睡不着。他们在天祝那样的穷县，教书育人几十年，除了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奉献给社会了。我考上大学，父母高兴坏

了，以为这下子苦出头了，却没想到……

当地观念保守，这种事还不敢张扬，爸爸肯定积忧成病。因为以前他的身体一向健康，为供我上学，他甚至背着母亲，悄悄去卖过几次血。在老家，由于地薄人穷，四周的农民都卖血成风，但中学教师卖血，就不是啥光彩的事。

老威：我似乎读过有关卖血村的报道，据说从 60 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种卖血传统。

李明凯：对，没有其它挣钱法子，不仅农民，连县城里的一些居民也卖。人长到 18 岁没卖过血，在乡下会招人笑话。也许在内地，人们认为卖血养家或供学是多么凄惨，可在天祝县，稀松平常，一星期卖两三次，只要不把人抽得爬不起来，就稀松平常。

老威：一次能得多少钱？

李明凯：抽 400—600 毫升，得 150—200 元，除了给疏通关系的血头百分之十的劳务费，统统归己。另外，卖血当时还能混免费午餐，得一包白糖、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所以农民觉得划算，甚至下馆子吃酒也付血钱。小时候，爸爸为了激励我发奋苦读，总是说：“没出息，将来就只有卖血糊口。”

孩子能回报父母的，只有“学而优则仕”，我的高考成绩在县上名列前三位，却仕不成，爱上了不中用的观念艺术。幸好挣了几个钱，能够体面地为父送终。

老威：你父亲的医疗费该报销吧？

李明凯：无论啥病，一年至多只能报 5000 元，对于癌症，这只够十几天的费用。父亲只拖了三个月，也算他老人家生前修来的善果。假如拖一年，莫说 8 万元，就是 18 万也不够用。医院太黑了，爸爸整夜呻吟，杜冷丁、吗啡，什么毒品都用了，每次只能管一小会儿。后来，他比划着，拍床，盲目地在半空指指点点。我知道他想回家，他心疼钱，我对他说：“我有的是钱。”他不以

为然地摇头，含混不清地说：“用一个少一个。”

老威你看，是我害了爸爸，我不出事，不刺激他，怎么会得绝症呢？爸爸他虽出生苦寒之地，但家族中没有癌症基因。他不抽烟喝酒，更没有不良嗜好，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医院一心整钱，明明所有的药都没用了，还一瓶接一瓶往身体里灌。手背扎不进针，就改脚脖子。脚上也倒流了，就直插大腿根的股动脉。爸爸他一次次扑腾，要拔管子，扯氧气面罩，我都抱住他。他给我的遗言就一个字：“忍。”我大声回答：“爸爸，我会忍了，我不会出事了！”就泣不成声。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筑路人刘世昌

采访缘起：2003年10月27日，因迫于某种现实压力，我从成都出走到云南丽江，一下子被古城的明媚阳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惑，安顿下来，不觉在此逗留了40天。

我于万古楼旁找了一家纳西族的民居，客房高高在上，既能鸟瞰波涛一般无尽起伏的古城瓦脊，又能遥望纯银一般永远闪耀的玉龙雪山。依着习惯，我天天在仙境中与房东夫妇东拉西扯，混得烂熟。我不仅了解到房东的阙姓祖先于清朝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之际，从江西吉安迁入此地，并且数代单传，至今人丁不旺；而且搞清了今日花30元才得入内参观的木姓土司府邸，文革之前还是公安局和看守所，高墙电网，不少人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11月28日下午，阙家大嫂读完了《底层》，向我慎重引见一个“很惨很惨”的老人，他就是本文的主角，修过滇缅铁路、公路以及太多路的老工程师刘世昌。

从古城绕到新城刘家，大约要走20多分钟。太好的阳光，太多的游客，令人觉得这世界不存在一丝丑恶。但是一扇门开了，我看见枯坐在阳台边的老者，他生于1914年5月，几十天前中过风，半边身子已不能动了。

这是一部转瞬即逝的道路史，它穿过了两个朝代及无数现实和精神的战乱，伴着泥泞和血，渐渐湮灭在永恒的昏暗之中……

在随后的数天里，我贴在老人的耳畔，边听边笔记这最后的气若游丝的诉说。我不禁在阳光下哆嗦，我一再颤抖着噪

音，感谢老人对我的信任。

“路有阶级性么？”刘世昌一再用云南话问，“国民党的车跑得，共产党的车就跑不得？”

我用四川话答非所问：“天老爷晓得。”

老威：刘爷爷您好。

刘世昌：嗯。

老威：我是写过许多底层人物的老威，从四川成都来古城丽江，已在万古楼旁边住了一个多月。

刘世昌：你是新闻记者？

老威：新闻记者有体制，有单位，而我啥都没有。另外，记者以追踪当下各种热点为业，比如纳西古乐队又有某个老艺人去世，宣科先生与崔健的摇滚较上劲，丽江妈妈胡曼丽侵吞孤儿捐款，等等。他们可能没功夫光顾您这样的旧闻人物，而我感兴趣的正是旧闻，是随着旧闻被淡忘掉的寻常人的命运。

刘世昌：哦，你是作家。

老威：一个写书匠，当不起家，也没权势改变您的处境。但我的长处是用心听，用心记录您的话，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两天不行，就耗它个七八天，直到把这一点一滴汇集、整理成一篇比较完整的东西……90年，这不容易呀！如果再过90年，人们能通过查阅我的书，知道“刘世昌”这个名字；并通过这个人物索引，了解一点滇西北的道路史，我也就十分知足了。

刘世昌：我90岁了，没两天活头了。原想人太老了不死，就学点养生之道，尽可能健康一点，不拖累别人，但没办法，心静不下来。于是我每天早起，慢跑，跑跑走走歇歇，一两个钟头。运动的好处，就是转移注意力，逐渐平息往事在心里搅起的波澜。

唉，这台机械不听话了，三个多月前，我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中风了，行人把我抬起来。送医院，抢救，结果就这样，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你已看见了一个修了一辈子路的人，一个四海为家好动成性的人，却只能坐着，从早到晚，吃饭要人端碗，屙屎要人解裤带，想看一眼太阳，还得憋足劲儿，把这发硬的颈项拧过去。

老威：您的头脑还很清楚。

刘世昌：儿子、儿媳都孝顺，我拖累了他们，心里不好受。有时候，我挣扎半天，终于把住窗台，站起来，坚持一会儿，浑身汗水。我太老了，您看这桌子上全是我的各种荣誉证书，还有十几年前的剪报，称我为元老，新中国的开路先锋。可顶屁用。冤没伸，反没平，工资一分没补，好话说得再多，也顶屁用。

老威：慢慢说，从头说，刘爷爷，您千万莫动气。

刘世昌：1914年5月，我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老海地村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刘永臣，母亲刘李氏，子女十个，我排行老七。那时我父亲种大烟和三七，兼做贩运生意，逐渐发财，成为当地有些影响的大户。记得我家还被土匪抢过，最小的妹妹被匪帮开枪打死。我父亲没啥文化，但家底殷实后，他就从外头请来万世师表孔夫子的牌位，供上神龛，让家里的男娃都读私塾。按封建习俗，男读女不读，所以我的母亲和五个姐妹都是文盲。我入私塾念到九岁，有了一定旧学基础，家里就选送我去县城，直接上小学三年级。三年后小学毕业，我顺利地考取了刚成立的云南省立开化师范学校，地址在文山，离老家西畴县几十公里。我在文山读书四年，虽然为父母长了脸，但花钱太多，成了家里的沉重包袱，于是父亲反对我继续深造。当时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感到父亲目光短浅，一赌气，就自己逃到昆明，进补习学校。稍后考取了云南省高级职工学校，这在乡巴佬看来，相当

于中举了。乡邻们敲锣打鼓吹喇叭，往家里送红贴，讨喜酒喝。父母见木已成舟，只好召开家庭会议，让在家的子女分工，除了加紧耕作、做生意，还纺纱织布，日以继夜，如此才勉强应付上省城高昂的学费。

老威：一大家子就您一个跳农门，不简单。

刘世昌：还有四哥。不过他当兵拿饷，不拖累家里。后来他考取了化学兵团，随部队从昆明开拔，抗战初期时抵达南京。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立过功，接着就泥牛入海了。直到云南解放前夕，某一天，兄弟俩突然在大街上碰面了。可又能怎样呢？兵荒马乱，前途渺茫，只能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听说他大半年后就落网了，进了劳改队。刑满释放后，孤苦一人发配到蒙自，没多久就病死了。

我父亲也于1950年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大地主，挨打挨斗，受尽摧残，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彻底解脱了。

老威：在1949年之前，家庭是您求学求知的经济支撑……转眼之间，它就成为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

刘世昌：解放了，像我这类旧时代甩过来的旧技术人员，思想改造是头等大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提高了。我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都公开表态，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坚持拥护共产党镇压恶霸父亲；我为自己吸贫下中农的血汗而真诚悔罪，我流着泪发誓永不回家。果然，后半辈子，直到现在，我再没回过西畴县。至于父亲死后，家产的去向，母亲及兄弟姐妹的命运，我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老威：那就搁下这话题，接着讲求学？

刘世昌：没啥好讲的。1938年职校毕业后，我被对口分配到在云南的滇缅铁路局十四总段当练习生，中间又去西祥公路工程处实习，经过两年的野外考核，我于1941年11月就任滇缅铁路

第一工程处工务佐理员。

从此我的全部人生就与公路、铁路、飞机场缠上了，穿山越岭，东奔西颠，至1949年，我逐渐从普通员工提升为工务段总工程师兼代理段长。我亲自参与了滇缅、川滇、滇黔等铁路，和云南境内百分之九十的公路、大型河桥，以及昆明、保山、思茅和四川成都凤凰山等军用机场的勘测、设计与施工。八年抗战，我作为政府工程队中一员，赴印度参加铺设由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战时输油管道。滇缅铁路最初也是美国人投资，中方动员了十几万人力，日夜抢修。我们技术人员也受爱国热情的鼓舞，天当被地当床，几十天不刮胡子，不换衣衫，连吃饭也数秒，终于历尽艰辛把路基铺入缅甸。不料小日本还是比我们抢先登陆。他们以密支那为大本营，几天就扩散到缅甸全境。蒋介石急了，冒死飞临祥云视察鼓劲，没用，铁路工人不是军队。滇缅铁路被修了炸，炸了修，几年下来，铁轨七零八落，终于半途而废了。

我们在印缅边界拉锯一般撤退，日本飞机每天在头上盘旋，一旦盯准目标，就一个俯冲，机关炮在人群中射出一条槽。工程队被打散了，在滇缅公路上，逃难的败兵如洪水一般，路旁随时有浓烟腾起，带不走的战备物资就这样被烧掉，令人心痛。唉，战争，无可奈何的浪费！如果把这些浪费兑换成钱，恐怕够上百万饥民吃几年吧。

开头技术人员还受优待，乘了一段汽车，后来就没油了。加上日本飞机日夜追撵，汽车目标大，只好放火烧毁。不晓得步行了多久，挠了腕叮，边防哨拦住盘查，有意刁难。我们只好掏腰包行贿，才入了关，汇入了滇缅公路上一望无际的伤兵队伍。我们也“入乡随俗”，捡些血纱布把自己裹成伤兵，一拐一拐向前挪动，许多人的脚都拐变形了。

老威：何必如此？

刘世昌：不如此，肯定会被乱兵轰抢。有个同事叫瞧出破绽，乱兵就拿枪逼着，搜光了他身上的钱财，甚至连制服上的镀银扣子都扭下。当时的逃难人流中，还混入了一些汉奸，他们都藏着一面小圆镜，窝在手心，乘乱就向上瞄太阳，把光点往人密处晃。日机有了靶子，就怪叫着栽下来扫射、投弹，眼睁睁地把人打飞起来，那胳膊，那腿，那喊爹叫娘声，不晓得谁是谁。一轮炸过后，人们站起来拍土，冲天大骂，心里却暗自庆幸肉和骨头还在身上。

经过畹町到祥云，这一个月多的地狱之旅，整个工程局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 20 多个残兵败将，受命搞完铁路决算，就暂时集中在蒋介石的军事工程委员会名下。

老威：滇缅铁路也泡汤了。

刘世昌：日寇投降后，它的战略价值就不大了。内战时期也修修停停，解放后就干脆放弃了。

老威：请继续讲。

刘世昌：我们在祥云休整了两三个月，我就被派往下辖云贵桂三省的第四公路局（当时全国划分为五个公路局），一直干到 1949 年 7 月。

老威：您没想过逃跑？

刘世昌：我是总工程师兼段长，若要逃，从芒市一伸腿就入缅甸，可技术人员嘛，哪个朝代都能发挥作用。况且，我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一种崭新生活。

老威：所以您就留下来了。

刘世昌：不是被动留下，而是起义。7 月份，时局凶险莫测，先是云南边纵第七支队和平解放丽江，派代表朱家碧与我接头。稍后，接第四公路局集体起义的电报，称：共产党中央命令段内一切物资要严加妥善保管，违者重处。而在边境一面，由土匪、

败兵、少数民族武装纠集起来的保山共革盟，上万之众，攻破龙陵县，杀人放火，搅得天昏地暗。芒市与保山近在咫尺，种种屠城谣言甚嚣尘上，闹得人们纷纷弃城逃难。我夹在两股势力之间，审时度势，决定弃暗投明。

段里几十人，有不少国民党骨干，他们主张把库存的汽油、钢铁、水泥、经纬仪、水平仪及电台偷运到缅甸卖钱，然后分赃，各奔前程。我断然回绝，并严令追查已分散偷运的物资，发动下属一件件地找回来。我怀着对新政府有个交待的心理，熬到12月，卢汉宣布云南全境起义，芒市的土司衙门仓皇出逃。我终于完成任务，把物资库顺利移交给惠通桥抢修队，然后敲锣打鼓，去迎接解放军。

老威：您算是为党为国立了一功。

刘世昌：在护厂护库斗争中有突出表现的人都受到奖励，我也于1951年被省交通厅授予三等劳模。

老威：日子有盼头了？

刘世昌：那时人人都觉得有盼头。特别是我们这类搞技术的，打心眼里想以一技之长为新生政权服务。因为路是没有阶级性的，同一条路，国民党的车跑过，共产党的车也跑，同一个工程师，国民党能用，共产党为啥就不能用？

老威：您的底气挺足的。

刘世昌：党的确在用我一技之长。我的人生就好比一把铁锹，不断在碎石路上磨损，直到废掉，被丢弃在一边。

老威：我看过您申请退休的简历，从50年1月直到文革前，您一直在计统股长的任上。

刘世昌：对，股长兼总工程师，负责过南大、丽中、中乡、中德、德盐等几十条公路的测量、预算和具体施工。一年中，我恐怕有265天在路段现场，这同民国时期没啥区别；而另外100

天，我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运动现场，要么写认罪检查，要么挨斗。可总的说来。斗争方式还比较文明，低头站台上，不管群众情绪有多激烈，逆来顺受就过去了。况且，革命要搞，路也要修，一派往工地上，我的气就顺了。与工人一道，泥里滚，风里穿，长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直至累倒，一觉到天亮。拍拍脑袋，还好好在那儿呢。

老威：您挺乐观。

刘世昌：是麻木。但文革爆发了，想麻木也不行了。我爱人比我先受到冲击，她被戴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

老威：岂有此理！土改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有“漏划”一说？刘爷爷，您的老伴是什么样的人？

刘世昌：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招谁惹谁，却与我同命，这辈子写了数不清的检讨。我背一下她的简历：初升嫔，彝族，原籍云南楚雄迤拉么村，家庭成分地主。1936年以前在家乡读小学，1936年以后在姚安县城读简易师范学校，1939年又回家乡当小学教师。1940年结婚后，一直做机关家属，随丈夫东奔西颠，充当临时杂工。1960年的饥荒中因“盗窃托儿所食物”判刑10年，送往宾川农场改造，后经查证系冤案，法院于1962年裁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回家后，更加死心塌地随夫，公路修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直到1966年8月26日。

老威：8月26日？有纪念意义吗？

刘世昌：这一天上午，工作队副队长王书基把我叫去说：“大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通知，要你爱人回去一转，证实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丈夫，你有意见吗？”我哪敢有意见！只好回答：“组织上的决定，我没二话。”接着又请示该带多少粮票，需要多长时间？王队长笑着说：“多少都可以嘛，不过最好多带些，吃不完再揣回来。”

我急匆匆地通知了初升嫔，她有顾虑，我就安慰说：“可能就是解放初你偷跑回去看你的地主妈，并领她到祥云工地住了十几天的事儿。多少年的旧帐，你去理清楚，表示个立场就完。”

当时下暴雨，没买到车票。工作队老是催着上路，我只好冒雨跑了几趟车站，好不容易买到30号的票，段上又派医生赵宁极陪初升嫔“出差”，明为“顺道”，暗为“押送”。三天后，总段开会，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初升嫔是万恶的逃亡漏划地主”，已被公安人员押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老威：您在现场有何反应？

刘世昌：我被喊出去接工作电话，刚放下话筒，“打倒漏网地主初升嫔”的口号已震天响了。我一下子懵了，浑身筛糠一般发抖。而在迤拉么，我爱人一拢家就叫武装民兵接管了，没让证实历史问题，也没宣布新的罪状，只命令她与地主妹妹同挤一屋，并立即下地，每天劳动十几小时，夜里还和地、富、反、坏一道，接受批斗。可怜我爱人，为了与剥削家庭决裂，多年不回老家，这次昏头昏脑被骗回去，受累挨斗，还不敢追问原因。这头称是丽江公路总段发配回去的坏分子，那头道是公社党组织要过来的地主婆，把我俩口夹在中间，不沾天，不沾地。为了破镜重圆，我们两头都打报告，请组织核查。于是工作队队长王书基又叫我去，提醒说：“37年，你老婆收过租、逼过债；还虐待过长工，牵走佃农的耕牛；还私设黑牢，关押贫农。50年土改期间，公然潜回家带地主母亲，携金银首饰出逃，躲避阶级斗争。”

我两眼一抹黑，只能喊天哪，因为初升嫔1937年还没满18岁，况且她在师范学校，受的是西式教育，讲的是人人平等，咋可能与如此罪状挂上钩？我们为此写了上百份申诉材料。但没用，只要组织上口头一宣布，就成铁案。

到了1968年，一场有预谋的迫害开始了。先是派往公路十团

（文革中丽江公路运输总段的改称——老威注）的军代表刘政委宣布，根据群众意见和政审结果，决定给初升嫻平反。于是我喜出望外地拿着平反通知，风尘仆仆地往返几天，接回爱人，不料却上不了户口。原因是我单位领导又打电话告知公安局，要入户，光有大姚县人武部支左委员会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不行，还得凭公路系统的《平反证》。那年头，黑人黑户的待遇和逃犯差不多。初升嫻去也不是，留也不能。一直熬到11月13号晚上，一伙造反派把她五花大绑揪进团机关，挂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20多斤重的黑铁牌，游行批斗，并锁入单人囚室。

与此同时，我也被揪出来，三次定为“罪恶累累的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防奸组骨干，历史反革命。”斗争每天都在升级，直到12月份，我两口子被宣布为“工农民主党”的首恶，而初升嫻被团司法部第二次戴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第二次押送回原籍“管制改造”。

老威：这人玩人的游戏太残酷了……

刘世昌：我连十分之一的残酷都没讲出来，人老了，脑子乱了。

老威：莫急，刘爷爷，记不起来没关系，晚上想一想，明天再接着讲。

刘世昌：万一睡过去醒不了呢？

老威：您肯定醒得了。

刘世昌：难说。

老威：这历史也是一条路，再艰难，您也要修完。这样吧，您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推……

刘世昌：我想一想。

老威：您在文革中被抄过家么？

刘世昌：数不清了。第一次是1968年11月15日晚上，造反

派头头宋某某以监视地主婆为名，命令初升姻高举双手，走出家门立正，不准动。姓宋的满嘴酒气，晃着电筒，撞入我家乱翻，书架、桌子、壁橱全砸倒不说，还挺着匕首，像演练格斗，狂戳墙壁，撬开许多大洞。他打手电往洞内照射，检查夹壁里藏没藏变天帐和金砖之类，结果只有老鼠窜出来。姓宋的还砸散了床，甚至用竿子顶了瓦缝，方提着两大包“罪证”扬长而去。

我俩口子被分开关押在机关宿舍受审。5天后，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我和爱人又被造反派绑回家，站在门口，举手投降，引来几百人围观。他们当众翻箱倒柜，大抄特抄，将我财产装走一大车。次日，又在囚牢里勒令我交出家中所有钥匙，大约有几十把，声称要“打扫战场。”后来听说，他们查抄家产后，就押送到总段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办“无产阶级专政成果展览。”

直到1971年9月20号，工宣队落实政策，才把我从猪圈带到家门外，扯掉封条，拿出一串钥匙塞给我说：“物归原主了。”我急性摇手说：“我是专政对象，老婆孩子还下落不明，这钥匙这房不能接。”

“什么，你不接？！”工宣队见牛鬼蛇神居然耍态度，就日妈操娘地吼开了，“反了你个妈屁的国民党！给脸不要脸。老子们代表人民群众，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勒令你立即收下钥匙，滚蛋！”

围观的几百群众，也一起为工宣队呐喊助威，我只好捡起钥匙，折腾半天才打开已封了三年多的家。臭气满屋，那股子霉味几乎要把人冲昏。仔细翻捡，没有一件东西可用，连早年的书籍、图纸、照片也被虫蛀了，被浸起来的地下水污给糟蹋了。我一下子软在门坎上，抱头痛哭失声，我好歹还算个知识分子，一辈子的家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就这么毁了。但铁蹄之下，遭此劫难的又不止我一人。只好强咽悲愤，把一屋子垃圾统统扫出去，

留出一片空荡荡。

老威：您有被抄走的物品清单么？

刘世昌：除掉被砸被腐蚀的家具、书刊，我凭记忆整理了一份清单，分文件、文具、衣物、金银首饰、药品和食品几大类。其中有《历代宗亲家史》、《历代祖先画像》、《道路测量学》、《铁路手册》、《铁路、公路、桥梁计算式》、《吊桥设计》、《公路手册》、《铁路测量学》、《铁路、公路标准图》《民国时期云南省公路局半圆、全圆拱桥图》、《本草纲目》25 卷等等；还有德国造绘图仪、计算尺、不同半径曲线板、三角板；美国造指南针、三圆罗盘、有柄放大镜等等；存折和现金几千元、粮票几十斤也“失踪”，金银首饰“失踪”的大略有金银手镯、宝石戒指、玉片玉坠、金银耳环、项链、金锭、银元（含唐圆 30 枚、龙圆 20 枚、袁大头 25 枚、孙头 30 枚）等等。

老威：您可以持清单去要。

刘世昌：文革后，我已要了 20 几年，如今 90 岁了，还叫儿子接着去要。大约永远讨不回来了。

老威：您对抄家这种事没有预感？

刘世昌：啥意思？

老威：前几天，我曾访问了白地东巴（祭司）第十二代传人和利军，据他讲，文革也波及到他家所在的不通公路的村庄，这么个骑大半天马才进得去的偏僻之地，也有贫下中农造反派。他们责令和利军的爷爷交出“搞封建迷信”所用的东巴文经书，可这位老东巴连夜在屋里挖个深坑，埋手抄经书近一千卷，盖土后，在上面垒个火塘，并叫齐一家数口，架柴围塘烤火，等着造反派来搜。当然，搜了一整天，墙都被掀倒了，谁也没发现这些从古到今传抄下来的“四旧”的下落。

刘世昌：农村山高皇帝远，岂能和城里相比？况且，抄家之

前，我和爱人都被控制起来。连我几岁的儿子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要回家拿点柴米油盐、旧衣雨具等等，也要打领条，请求专案组批准，然后才在专案人员的监护下前往。

我和爱人每天都被吊在房梁上，审问一句，抽几下，一天要打折好几捆竹条。晚上放下来。让四肢回一回血，吃口饭，再接着吊审。直至深夜，放回囚室睡觉，又经常被发神经的看守一把提起，喝令脱光衣裤，在床上出操，喊一二一。棉被、垫褥、枕头叫刺刀捅得稀烂，连我本能地用手遮下身都不准。

1968年11月的一天，我爱人被专政人员罗某某、周某某押出牢房，剥光衣裤，强迫沿着台阶上下跳了十几个来回；然后又在灯光球场上，一丝不挂地高跳了十几分钟，那帮牲口弓着腰，前后左右地跟着我爱人围观检查，看阴道内有没有珠宝漏出来……这一次，他们有了收获，从我爱人的内裤缝里搜出粮票40斤，人民币120元整。

老威：讲不下去就别讲了……

刘世昌：我要讲！过一天就少一天，万一我一会儿气不来，就没人知道了！这些王八蛋，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当官做生意，摇身一变，又成正人君子，好像从来没有干过缺德事。

老威：刘爷爷！

刘世昌：他们掰着她的下身看，他们一寸一寸捏她的内裤，他们一次次对我俩口棍棒相加，打得我们到处乱跑，群众追着围观。初升娴几乎是被抬上车押回老家的。伤势太重了，长期不能下地劳动，最后不得已，进了赵家店医院。公社医院条件有限，治不了，就出具证明，逼初升娴出院，回丽江找丈夫治病……

老威：这几年，您的儿女咋生活的？

刘世昌：不知道。儿子大了，怕我难受，始终不肯说。儿女是娘的心头肉，有一次，初升娴在难中感到自己熬不了多久，就

悄悄告诉儿子和女儿，老床的草垫子枕心里，夹着一个宝石戒指，两点药（大烟土），如果你们爸妈被整死了，你们就拿去变卖了，走得远远的。可俩孩子害怕，为了“立功赎罪”，竟向专案组报告，领着人去取出上交了。

老威：后来呢？

刘世昌：我爱人在老家硬撑了两年，感觉不行了，才拖着病体回到丽江。当时我每月只发给 30 元的生活费。莫提治病，连吃饭也勉强。可人落到这地步，还招人忌恨。1971 年 12 月 10 日，造反派宋某某、解某某率十几人闯进我家，质问初升娴何时回来的？请了多长的假？为何长住不走？是否想永远赖在丽江当黑人黑户？我爱人一时答不上来，宋某某就迎面一拳头，同时起脚踢去。一伙人蜂拥而上，把我爱人打得满地乱抓乱爬，口喷鲜血，下身也流血不止，连几层裤子都浸透了。他们还抄起凳子打砸，把家里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宋的老婆揪住初升娴的头发，往地下磕，还骂：“你个女流氓，敢扯我男人的下身！”眼看出人命，我只好大喊“打死人”，惊动四邻。共产党员朱尚珍分开观众，进屋制止，并叫人把一伙凶手劝出门外。围观者还在呼口号：“打倒地主婆！”叫公安局整死她。朱尚珍是个坚持原则的好同志，他始终挡在门口，隔开人群。

当晚，我向公路十团党委书记汇报，我爱人由儿子搀扶进医院，仍吐血不止。接下来的几年，我一边寻求民间偏方，为初升娴治内伤，一边打报告，请求解决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这期间，她又被抬回老家几次，但对方不接手，说：“人都整瘫了，万一死在乡下咋办？”就这样，她在黑人黑户和漏划地主的双重帽子下，伤病一天天恶化，拖到 1977 年 10 月 29 号，竟含冤去世！

老威：1977 年？文革不是结束了么？她还没摘帽平反？

刘世昌：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党组织解决问题，写了上百份报

告，可直到1976年2月，总段落实政策办公室才给了个《审查结论》：“经复查核实，亲自收租、打骂长工、分散财，贫下中农有意见，一致要求应划为地主分子。但根据政务院划分阶级成分之规定，初升嫔1940年至1949解放时止，跟刘世昌居住、生活，不应划为地主分子，本人成分审定为学生。”

老威：留了一条剥削尾巴。

刘世昌：初升嫔把结论翻来覆去地看，大颗大颗地掉泪，当晚她又写了上万字的《申诉》，吐血数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说：“刘世昌啊刘世昌！我这辈子为啥要嫁给你啊？”我也哭了，使劲抽自己耳光，骂自己是个只晓得修路的窝囊废。

老威：可叹可叹。

刘世昌：她没有撑到摘帽那一天。

老威：您呢？

刘世昌：我被专政了五年，除了审查、关押、挨打、坐喷气式飞机，就是养猪放牛牧马，挑粪种地。后来降级留用，设计公路和大研镇的街道。三中全会后，省交通厅发文件恢复为公路工程师，79年1月23日，总段党委出具《残废证明书》，承认我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打伤致残，成“颈椎压缩性病性改变”。1984年，我申请退休，被国家授予“少数民族地区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的称号。

老威：工资补发了吗？

刘世昌：工资没补，抄走的家产没退，我是公路局的起义人员，本该算离休，也一笔抹煞了。解放前，我每月领180块现大洋，解放后调整为一百多万新币（相当于后来的109元人民币）；1956年，套成技术八级工程师，拿110元；后来除了改革开放全国普调一级，再也没涨过。

老威：您被搞得家破人亡，应该通过法律索赔的。

刘世昌：我写了 20 多年的告状材料，直到中风前还在写。材料都由中央、省、地区一级级批示，然后转下来，又落到原单位的头头手里。这些头头，不少是文革造反派，如今摇身一变，又做了官，给我平反补钱，就等于戳了他们的旧伤疤。党委书记某某曾到家中，送 200 元钱，并劝我：“忘掉过去，放眼未来。”200 元钱就要买我的记忆？太廉价了吧。

美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采访缘起：2002年8月下旬，我80高龄的老父因肺癌晚期住进了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11楼，直到驾鹤西逝，前后一个半月，我尽孝榻旁，饱尝生离死别之痛。

75岁的于东山就住父亲的病房隔壁，且与父亲的体形（偏胖）、某些习惯（收听美国之音）、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相似，在这层三天两头死人的癌症楼里，我与他几乎日日相见，成为短暂的忘年交。

因此有了9月13号和17号的访谈，再以后，老人家的病症也和我父一样，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其中细节方面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父亲逝于2002年10月7日凌晨，于老先生在7天后相随而去。当时我正忙于料理家丧之头七，所以不知他的遗容是否安祥。但我焚烧纸钱时也想着他，并祈祷这个被不同的时代所误伤的灵魂安息。

于东山：老威先生，我有话对你讲。

老威：直呼其名吧，老伯您千万别客气。

于东山：我没有客气的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个通宵，打了三针杜冷丁，痛啊，你没得癌，不晓得这种滋味！白天要好过些，所以叫你来，想讲讲自己的经历，否则……我看了你送的《底层访谈录》，很不错，只是不明白，别人怎么会把这么多属于隐私的东西告诉你？

老威：我在江湖上厮混得太久，太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家的种种经历也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现在，我望着你的眼睛，内心有一种震颤，因为我父亲就在隔壁，我守了他一两个月，您们是同代人，目前又在相似的处境中……

于东山：上午我去拜访你父亲，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老威：一个星期前，他还对我说，要把这辈子的主要事情大致理一下，或者他讲，我记。当时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不及了！当他睁圆双眼，直楞楞地盯住我，我就把耳朵贴上去；他的喉管咕隆了半晌，那种声音，很深很含混，我辨识不了，他的手就下意识地拍床……

所以，老人家您千万别对我客气，生死大关，俗套的安慰话我说不出口，但是，在这层楼里，您只认得我这么个写字的人，天意乎？而我父亲此时这种状态，也是天意乎？

于东山：你会怀疑我的话吗？

老威：也许会，但我会尽量完整地记录您的意思。

于东山：我今年 75 岁，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为了自由，我把自己弄成了肺癌……

老威：什么？

于东山：我的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想到啊。在大墙内，自由和女人都让人疯狂，为了得到这两样，逃跑，自残，要么就变态，就变老，成为废人，总之，你得选择。当然，大多数犯人不会选择，关几十年，重新做人吧，注定要被社会淘汰。我不行，就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老威：请您从头讲起。

于东山：1947 年，国共开始内战，地方上征兵征税，按战时三丁抽一的政策，我们家刚好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娶了亲，有了儿女牵挂，不便上前线打仗；只有老三我，刚满 20 岁，就被拉

到乡里凑了壮丁的数。那一年秋天，光我们于家坪一个乡，就招募了21个壮丁，由保长、乡长和三青团乡党部的人领着，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彭山县城集中。父亲、大哥、二哥都陪着送行，一长串壮丁家属队伍，上百人，一直送到募兵处，已是傍晚了。各乡送来的壮丁好几百，热闹非凡。第二天，领了二尺半军服和两个银元，我就趁着告别，把银元揣进父亲口袋，因为从此吃公家粮，花不着钱。

这就是我和亲人的最后一见，周围爹啊娘啊的震天响，父亲和哥哥们也扯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舍不得的样子。而我呢，血气方刚，胸前戴朵大红花，一心要报效国家，奔个好前程。一声哨子响，新兵们就列队上敞蓬汽车，沿着颠簸的公路离乡去了成都，现在一小时的路程，那时要折腾一整天。进了成都，有路灯了，大伙还挺好奇地东张西望。这是我头次看见电灯，彭山县城没电灯，路灯都是灌煤油的风灯，天黑尽了才撑个长竿子往上挂，一条几十米长的街，只挂十来盏玻璃风灯。

我们在成都北校场（现在的成都军区后门）的中央军新兵训练队进行训练，出操、打枪、拼刺刀、投弹，每天早晚还要升降青天白日旗，背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那阵势，也跟新社会升降五星红旗，唱国歌差不多。三个月后上前线，坐火车出汉中，编入新2军第4师381团2营3连，这是宋希濂的部队。后来又过了黄河，与解放军打运动仗，每天都在跑路。记得第一次与解放军打阵地战是在陕北榆林，我闭着眼睛放枪，待我睁眼时，左右两边的同乡都一脸鲜血歪倒了。

共产党待的地方又穷又荒凉，解放军士气高，会打仗，虽然武器落后，但枪法准，在战壕里不小心脑袋冒高了，就要吃子弹；而国军派系多，壮丁抓了一批又一批，草草训练，就上前线充数，

所以经不起打。新兵怕死，一门心思开小差，我也不例外，结果于1948年底在徐州外围的永城地区的一次遭遇战中躺下装死，被解放军三野12兵团28军84师俘虏。

解放军很宽大，开罢忆苦思甜、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后，师首长讲话宣布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就遣散，发放路费回家。我前思后想，就投诚当了解放军，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国统区，回去没好日子过，再说种田也没意思。

1949年5月的渡江战役后，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三野奉命进军东南，负责解放福建的是第12兵团，司令员为著名战将叶飞。大概9月份，除了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境内的国军主力都垮了，省主席汤恩伯逃到了台湾，接着厦门失守。我所在的28军84师接到兵团下达的攻打金门的命令：“肃清沿海残敌，建立尔后解放台湾的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以及金门守敌防御部署混乱之时，以28军第84加强师为主，29军85师配合，即日发起对金门的攻击。”

当时全军上下很乐观，因为厦门岛大兵重，厦门都拿下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金门肯定弹指可下。我还以为打完这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和许多以前连海都没见过的“解放战士”一样，向党表决心，一定不怕牺牲，争取立功赎罪。1949年10月24日晚上，解放军的244、251、253三个团，8700多人，加上船工350多人，乘紧急征用的各式渔船，从大山登岛、厦门、澳头东北海湾出发，渡海攻金门。午夜三点多钟登上北岸海滩，因地雷爆炸，国共两军开始激烈交火。此后，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在国军兵力5倍于我的劣势下，解放军困兽犹斗，终致全军覆灭，三个整团加第二梯队增援的246团，1万多人，无一生还。

27日上午10点左右，金门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阵亡5000多人，被俘5000多人，剩余的残兵败将，由古宁头突围，转移至

岛东南山区。我们3营2连1班，就剩我和副班长刘永禄，汇合251团其他残余，共47人，在团政委田志春的带领下，东躲西藏了半个月。无奈金门岛太窄小，几万国军从滩头到山区，从民房到山洞，像篦虱子一般，一寸一寸，反反复复地梳。我们弹尽粮绝，军装碎成些布片，披挂在身上，犹如野人，连下身都暴露着。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我只伤了胳膊，饿得不行了，就趁下半夜，从岩洞里跑出来，到几百米外的农田掏番薯吃。等不及抹泥，就边跑边朝嘴里塞，探照灯隔五分钟来回扫一次，动作慢了，子弹就风一样刮过来，把人打成蜂窝。

为了偷番薯，牺牲了6名战友，岛上的居民都是渔民和华侨，除了“共产共妻”，对解放军没啥了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告密，还主动带兵来搜人。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番薯地拉了铁丝网，不敢去了。重伤员全部活活拖死，而我们也半死不活。水源卡断了，国军就在山洞上头筑工事，扎营，明明晓得我们在脚下，故意不打扰，看你扛到啥时候。我们都渴恍惚了，喝自己的尿，后来尿比海水还咸还涩，奇臭无比强咽下去，喉管更干更疼更辣，犹如吞火。终于，团政委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然后对大伙宣布出洞缴械求生。

大伙互相抱着干嚎，人都消耗得跟鬼一样，还不理解团政委的命令，认为有损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2连刘排长是陕甘宁老区来的兵，打惯了胜仗，很倔，他跳起来用枪托砸政委，还连骂：“叛徒！”政委一脚踹翻他，含着热泪，也不解释，就头一个摇着拴白布条的树枝钻出岩洞。我们跟在后面，一长串，20多人，洞里还留着十几具战友的尸体，已有臭味了。投降以后，国军允许我们先埋葬战友，我们在里圈，他们围了好几层，下葬时，国军还一齐朝天鸣枪三次，表示敬意。

我曾目睹251团刘天祥团长阵亡的情景，当时他正与28军前

敌指挥部通话。掩体已塌了，话务员倒在一边，刘团长一手搂电台，一手握话机趴在瓦砾里叫：“报告首长，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有二话说！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话没落音，敌阵地就射来一堆炮弹，前后左右地开花，刘团长一下子飞起来，他原来趴的地方炸出磨盘大的一个深坑。一瞬间，警卫班全报销了，没有全尸，我钻进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金门的几千战俘押回台湾，又从基隆港转乘闷罐火车，运至台东，入战俘营。稍后又转到对岸著名的火烧岛，开荒，筑监狱，兼学文化和政治，进行反共洗脑。几年里，那儿陆续进来许多共军战俘，有朝鲜战场的，有沿海各岛的，1952年，国军突袭南日岛，一次就抓回上千名共军俘虏。

老威：国共两军没有交换过俘虏吗？

于东山：据说朝鲜战场交换过，可我们当时完全与外界隔绝，除了《中央日报》和蒋总统训示，啥也不晓得。大约关了6个月，训导处主任找我谈话，他们根据我提供的个人情况和部队番号，确认了我的原国军下士身份，准备开释。主任试探性地问：愿意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么？我干脆回答：不愿意，因为共产党饶不了我。后来知道，不仅我，连众多正宗的共军俘虏也害怕回去——在红色中国，俘虏是叛徒的同义词。

老威：你又改换门庭了？

于东山：那时我才20多岁。再次“新生”后，又编入17师49团六零炮连服役，一年后，送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接受预备军官训练，每月剃一次光头。由于在射击、肉搏训练中的出色表现，改制后的调查局到学校物色人选时，看中了我。在局属台北站工作了5年，转调国防部特别军事情报室，军衔为上尉——这一时期，我算春风得意了，讨了老婆，她姓余，祖籍河南新乡，49年随父母迁台，在新竹做水果生意。我们经人

介绍，按传统习俗，三媒六证。我们育有一儿一女。

50年代，光复大陆是国策，蒋总统经常发布训示，勉励全军将士“勿忘国耻”。朝鲜战争之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海陆空配合的模拟登陆战。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台湾报纸都尽情渲染；三年大饥荒时期，更是天天有逃荒要饭，饿殍遍野的纪实报道和巨幅图片，惨不忍睹。勘乱之际，宣传声势一边倒，连我老婆以及街坊邻里都相信“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中共政权人吃人”。我至今还记得1960年×月×日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与其饿死，不如造反——大陆民众的心声。”

1963年元旦，蒋总统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国军军政战士的团拜典礼，1月5日，又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主编迈克尔的采访，他说：“反攻战争是革命战争，就数字上说，共匪军队的人数诚然较多，然而我军有旺盛的士气，有充足的武器用于出击登陆。”

蒋总统还说：“大陆民众渴盼着革命军队回来摧毁灭绝人性的共产制度。”

老威：在上一辈人的回忆中，63年的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此前还有较大规模的中印边界战争），为配合国际大气候，国内风向再次左转，大搞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我访问过一位盗窃犯，叫杨继年，11岁被判刑，坐了34年牢。1963年，他因“反标罪”被加刑，起诉书里的罪证是：“坚持反动立场，于63年6月蒋匪窜犯大陆时，三次书写反动词句……‘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

资料证明，城乡都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监管。著名右派流沙河先生认为，当中共内部狗咬狗相持不下而趋于白热化时，老毛的惯用伎俩就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于东山：啥意思？

老威：59-62年，国内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天灾是人祸，更确切地说，是老毛想当然的“共产试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铁案。在党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老毛言不由衷地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引咎放权，由较务实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纠正政治和经济中的“失误”，宣告共产风破产。62年底，因政策调整，粮食丰收，饥荒得以遏制，刘少奇的威信借此提高，最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与老毛平起平坐，连标准像也在百姓家中并肩而挂了。这是老毛不能容忍的。为了防止刘少奇等人借“几千万饿殍该谁负责”逼宫，维护其绝对的权力垄断，就“金蝉脱壳”，借台海局势突围。应该说，蒋总统帮了毛主席的大忙，使他赢得喘息之机，并把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进行到底，直至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对头一个个置于死地。

于东山：掰指头一算，整个63年“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有十来路，每路六、七或十几个人，全部加起来不足百把人，一个连的兵力都不到，“光复”个屁，开国际玩笑嘛。

老威：这百把名特务是老毛的救命稻草，是“蒋匪全面进犯”的铁证，你说国共两党合作得默契么？

于东山：1963年6月，我被编入“反共救国军第××支队”，抵达大金门，然后由军舰送至福建漳浦境内，转驾汽艇，一行十几个人，在支队长的率领下，从将军澳（地名）登陆。我们携着电台和武器，准备按上峰指令深入到福建武夷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没想到，上岸不过40多分钟，就被民兵发现包围了。随着三颗信号弹射上夜空，周围的海滩和礁石突然长满了人，一齐吼：“缴枪不杀！”我们惊呆了，忙背靠背地端起枪，做出抵抗的架式。子弹嗖嗖地飞过来，有两个弟兄倒下了。可我们面对这密密匝匝的人，不晓得该咋还击。终于，支队长带头扔枪，高举双手走到明处。数不清的手电乱晃，马灯更像八卦阵，从远处渐

渐游拢来。支队长高喊：“我们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一副吓坏了的嘴脸，其他弟兄也跟着叫：“投诚！投诚！”我这是第三次当俘虏，要镇定些，双手投降时心里还在想：该咋交待？要不要把三次被俘的经历全坦白？

老威：您真够倒霉的。

于东山：这叫身不由己。回来才知道，国民党的宣传也同共产党一样，只强调“形势大好”，结果正好相反，老百姓并没有在水深火热之中夹道迎解放，反而杀声震天。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太可怕，无冤无仇的，渔村里一听说抓特务，男女老少全出动，有枪拿枪，没枪就提鱼叉和棍子。我们十几个弟兄，一半是当地人，有两个还是49年抓过海的壮丁，很快被辨认出来。于是渔民们冲我们拳打脚踢，还扔石块，婆娘也上阵，撕衣服抓脸。弟兄们边躲边用闽南语叫：“我们是苦出身啦！是蒋匪帮抓去的啦！”大伙回骂：“渔霸、土匪、地主、爪牙！没一个好东西！”弟兄们又辩解：“不是事实啦，我是张叫化的儿子，在村里吃了五年的百家饭啦。”大伙气愤说：“还嘴硬充好人？揍这个美蒋特务！”

幸好有边防军出面阻止，我们才没变成肉酱。临出发前，台湾特别军情室还认为当地人熟悉闽南话和地形、民情，容易长期潜伏于民众之中；可落网后，大陆的报纸却说：“当年的渔霸和匪徒，被他们的主子送回来投案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老威：后来呢？

于东山：我们都被当作“美蒋派遣特务”判了刑。由于我的情况特别，就与其他同案犯分开关押，单独审讯了6个月，重判15年，被转到内地，在四川省达县专区的××监狱服刑。有关部门曾找我谈话，令我不准泄露解放军战俘的那段经历，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所以在狱中我只能装聋作哑地苦熬。1978年6月，我本该刑满释放，狱方却接到上级指示，将我强留下来，在狱内

当工人，这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并永不减刑。我与劳改犯唯一的区别就是每月领取 26 元人民币的工资。

老威：工人与犯人还是有区别吧？

于东山：监狱分内外圈，有三道岗哨，还不算巡逻哨，其它留场工人有《出入证》，通行无阻，并可以利用这点特权替犯人买书、买熟食品，偶尔还捎封信，赚不少外快；而我的名分虽为工人，但仍住在监区内，没有任何自由。我气疯了，就吞钉子自杀，狱方还算人道，马上弄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开刀取出钉子。政委亲自到病房来探望，他说：“于东山，你在劳改期间，踏实肯干，不多言多语，监狱上下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就我个人来讲，巴不得尽早放你回社会，自食其力，但是上级有安排，我们只能服从。”我说：“我没有在任何场面谈论自己的过去，今后也不会，请政府放心。”他说：“我很放心。”我说：“过去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太冤了。”政委瞪了我一眼，想批评我，又不忍心，就说：“想开些，退后一步自然宽，说不定留监比回社会还好些，在这儿，只要好好工作，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就没人敢歧视你，结婚生子，养老送终，我们都会管到底；而在社会上，劳改身份就低人一等，难哪。”

老威：这官僚挺会做思想工作。

于东山：这是人家的基本功，天天都练着。所以，话到这份上，我只有死心了。政委给一大队打招呼，我就从集体监房里搬出来，单独住楼梯下面的小屋，有五个平方米，进门得低头弓腰。大队卫生员刑满，我就接任，这就算政委恩赐的特权了。在狱内，这非同小可，我有单独的卧室，周围有两个破药柜，我平时不用上班，只在犯人去车间改造时，才检查监舍的卫生，被子叠得要棱角分明，我随身带卷尺，拉一拉，看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床底有杂物要扣分，门框有灰也要扣分。天天如此，这活儿我一干又

是20年。除此之外，就是给头疼脑热的犯人发药，领他们去监狱医院看病。日子久了，分队长的权利下放，我甚至能批一天以内的病假。

老威：您已经适应了做个模范囚徒？

于东山：都认为是这样，一般犯人惹不起我，因为我通了天，能直接找政委汇报工作情况。我整天绷着脸，像只老耗子，已习惯了在阴暗、潮湿的楼梯底活动，我的腰一天比一天塌。但我死心了么？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一个人能这样死心么？我有妻子，有儿女，有生之年，难道就像梦一样，永无相见之日？不，我等待着，盼望着邓小平的政策能放得更开，两岸尽早三通。我养成贴剪报的习惯，近20年，我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俗分类，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上，每天剪贴些文字，一年做一本，20年20本，这可是一笔财富。如果有一天牢门为我而开，凭它我就能糊口。

老威：是么？

于东山：我99年初出狱，直到得病前，都同时向全国30多家文摘杂志投稿，每个月要寄几十份。由于资料丰富，命中率极高，除开日常开支，我三年存了7万元钱的稿费。

老威：您太有远见了。

于东山：20年，加上原判15年，我迎送了多少批犯人，可自己却没有动静。我见识过几代反革命分子，哥老会，会道门，文革造反派，破坏计划生育的农民，还有89年六四进来的学生和教师。我不和他们往来，在背后，犯人都把我叫“特务”。我甚至有了个收音机，夜深人静时可以收短波，偶尔，能听到美国之音。犯人成分很复杂，收听敌台的事很快就传到政府耳朵里，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回答：“我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不是劳改犯。”指导员惊讶得眼睛瞪大了，追问说：“你咋不是劳改犯？”

真叫人哭笑不得，新来的指导员竟忘了我的身份！还开玩笑说：“于老头，你不愧为特务嘛。”后来真正的特务叫我撞上了，一个案子五个被告，首犯关在我隔壁，叫周××，潜伏在重庆20多年，三年前通过收音机短波与台湾取得联系，领受任务和经费，发展了四个特务成员，代号叫“沙漠变绿洲计划”。据说他们在八九学潮当中，曾四处散发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单，被游行反腐败的学生拾起来，马上报告了公安局。

老威：政府方面一直没开释您的意思？

于东山：我被遗忘在牢里，监狱的领导已换了几届，每一届都没接到有关我的指示。绝望之中，我只能孤注一掷。9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躺在被窝里，像往常一样瞪着楼梯底想心事，渐渐，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老鼠的吱吱惨叫。我爬起身，从药柜下面拉出鼠夹，那小东西的肚皮已被压开膛了，可还龇牙咧嘴地乱动。我把它放在小桌上，慢慢欣赏，心里突然觉得开了锅：坐了一辈子牢，逆来顺受的，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人还不如老鼠！它都知道折腾，宁死也不守规矩，我70岁的老头，风烛残年，有啥怕的？太窝囊了！太窝囊了！我不停地咒骂自己，比老鼠惨一百倍。

老鼠挣扎了几分钟，就死了。我没有摘下它吃肉，而是拽下一条后腿，鬼使神差地找出一把小刀，仔细地剥皮。光光的耗子腿，半透明的肉，我咽了几口唾沫，就将它丢在酒精里浸泡。接着，我把刀子消毒，点燃酒精灯，让刀锋在上面烧。准备工作就绪，我最后一次用药棉涂抹右胸，就自己给自己开刀。

没有麻药，第一刀横着戳下去，浑身疼得触电一般哆嗦。我急忙止血，稳住神，把刀尖深入上下搅，扩大刀口。最后为了结束剧痛，一不做二不休，我猛拉了几下，感觉到胸皮和肌肉分离了。我扔下刀，在冷汗淋漓中夹出耗子腿，切下脚爪，把豆瓣大的一块精肉朝伤口里塞，我用棉签充填了约五分钟，眼前一片浓

雾，看不清，也忘了自己在干啥。缝合伤口就没咋痛了，已经麻木了，耳朵里一片呱呱的青蛙叫，我缝了五针，然后包扎止血。

我吃了十来天消炎药，自己拆了线，又涂了一段时间的疤痕灵，窄窄的伤痕就变得很淡。但耗子腿在肉里隐隐作痛，折腾得我整天整夜睡不着。白天提不起精神，脸色蜡黄，这正好装病。我在警察跟前缩着脖子，拼命地咳嗽，喉咙不痒也咳，到后来，气管拉破了，口水里带血丝，严重时，就是血砒，这是肺癌的显著征兆。如此硬撑了三个月，终于，我感冒了，低烧长久不退。这是肺癌的征兆之二。我天天观察右胸的伤口，直到确认凭肉眼看不出什么，才老谋深算地报告政府，要求到监狱医院体检。这一去，命运改变了。

老威：我听过许多犯人自残的事，例如挑手筋、吞烧碱，还有长期每天吞服少量砒霜，直到脱发烂肉，显出麻疯病的特征。但最终，还是被识破，因为狱警见多识广。您居然能瞒过去，算是奇闻吧。

于东山：我不吭不哼地忍了 30 多年，把监狱当家，警察早麻痹了。狱内的 CT 机太旧，清晰度差，院长和狱政科长就亲自带我到重庆一家大的医院复查。等了 20 多分钟，医生从机房露头，盯我一眼，然后把院长叫进去。我心理有数，片肯定出来了，右胸肺显示出肿瘤阴影，只是医生做梦都没想到，那叠在肺上的阴影是鼠腿！

很快，我被当作癌症晚期病人释放了，监狱发给我 2000 元钱，并与有关方面联系，将我安置回彭山老家。父母和两位哥哥已去世，侄儿侄女根本不认识我，于家坪待不住，我就乘车到成都，先租房安顿下来。

我按 30 多年前的地址，先给台湾的家人写信，虽然那边变化大，很渺茫，也得试一试。接着我就开始搜集全国的文摘报刊和

开有文摘专栏的杂志，真是多如牛毛，较有名的也有 30 多家。分门别类的投稿生涯从此进行到我生病住院前。

老威：您的耗子肿瘤取出来了？

于东山：出狱没几天，我就趁夜到一家小医院开刀取瘤，一路鬼鬼祟祟，生怕有人跟踪。鼠肉在里面已成溃疡，打了麻药，一刀下去，一股很臭的黄脓就喷了出来。医生小心翼翼用镊子捞出鼠肉渣，还又刮又清又消毒，忙活了两个钟头，胸上被刨出一个核桃大的洞。人老了，免疫能力下降，伤口愈合了两三个月，我心里却去了一块大石头，以为苦了一辈子，老天爷有眼，让我得个善终。家人没回信，可能是地址已变了，或者老婆已改嫁？于是我又按查找来的地址，给《中国时报》等几家台湾报纸寄过《寻亲启事》，后果咋样不晓得，就当“老夫聊发少年狂”。

老威：我真替您高兴啊！

于东山：当头一盆冷水，不，一盆血！一个月前，我查出了肺癌，就在右胸，在我塞耗子腿的原地，CT 照出有肿瘤阴影，胡豆大。可过了十几天，再照，胡豆就长成了胡桃！这次取不出来了，扩散得太快，连淋巴结支气管都出现了葡萄串。昨天刚抽了腹水，医生晓得我开过刀，却不晓得为啥开刀，留下这么宽的感染区域。没料到鼠肉这么毒，会一滴滴地渗透进内脏，变成瘤子。

老威：如果晓得鼠肉最终会引出这种后果，您还会干么？

于东山：我不后悔，烂在监狱，活一百岁也冤，毕竟我自由了三年多。最近，我到底盼来了台湾家人的回信，是我儿子。我老伴已去世多年，儿女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能撑到见面那一刻算运气，不见面也没啥，免得给后代心里留下阴暗面。

偏三轮胡小松

采访缘起：偏三轮又叫“爬耳朵”，起源于文革中后期。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既破旧又拖沓，所以大家习惯骑自行车上下班。大约是为了方便家中妇孺长辈出行，有聪明人就利用工厂里的材料，在自行车后架右侧焊接一个座位，使两轮变成了三轮。

偏三轮省钱省时，很快在底层民众中流行开来，到了 80 年代，此车外型不断改进，一度成为家庭客货混用车。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偏三轮开始活跃于大街小巷，逐渐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偏三轮小巧、灵活，适宜短途客运，老年人出门，骑自行车不安全，打的不划算，因此张口就叫“爬耳朵”。例如我父亲，年已 80，仍然坚持去两里之外的牙科诊所上班。老人家每天的交通工具就是偏三轮。父亲说，偏三轮的主力军是进城农民和下岗工人，“工农联盟”沦落到如此朝不保夕的境地，恐怕毛主席在阴曹地府也闭不了眼。

2002 年 8 月 9 日晚，天气暴热已久，我经人介绍，在成都骡马市附近拜访了 28 岁的胡小松。他虽然只拉过一回偏三轮，却因为“咬警察”的事件，上过报纸，一度成为这个行业中的新闻人物。

看来，阶级斗争仍旧尖锐、激烈。

老威：我读了你的判决书，仿佛又回到文革时期，那时的大

字报就这种文风，什么“狗急跳墙”，什么“气焰嚣张”，看来这法官是红卫兵出身。

胡小松：我早就瞅着不顺眼，你一点，我就醒豁了，法律咋能骂人呢！

老威：不过，你真的咬伤了警察？

胡小松：逼急了，就捞住跟前的一条膀子下口，当时我的脸已被捶变形了，眼睛根本睁不开，就一条缝，一些影子在缝外晃来晃去。我捞住一条膀子咬下去，接着就倒了，昏了，我被判了三年，天啦，我胡小松不抢不偷，不嫖不赌，从小到大，还没跟谁红过脸，却成了劳改犯！

老威：咬一口，判三年，太不值了。

胡小松：我真急了，如果手里有把刀，我就砍他个狗日的，你不让我活，那就都活不成。我们村上的牛三妹，平常从荷花池批发些小百货，拿到五块石去卖，结果被城管踩了地摊子。牛三妹一向温顺，不知咋的突然疯了，从一家饭馆抢了把大片菜刀，出街砍人。附近诊所的医生来拦，脖子挨了一下，血蓬地射出几丈远，几个病人见了血，吓得满地乱钻。牛三妹又闯进里间，把床底的一个拖出来，照准那背梁几十刀，人都晕了，尿壶大的一个洞。没人敢进屋，防暴警察围了几层，磨了个把钟头，直到牛三妹把自己给劈了，才敢踹门进去。骨灰没留，捎信回村，家里也没人来，可能走得动的全出门了，老的讨口小的打工，总之都比守着那几分地捱饿强。

老威：咋乱砍人呢？

胡小松：她没捞着城管，当然就乱砍。这是凶兆，就在牛三妹出事的第二天，我就倒邪霉了。一大早，我从中间贩子手中接了辆新车，花了300元。一般的偏三轮都是旧的，刷回漆，只值百多元，我考虑要换行当了，图个吉利，就狠心出血。

老威：此话咋讲？

胡小松：现在市面上转动的偏三轮，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交警和城管随时采取行动搜缴上来，集中运到××市场，以几十元钱一辆的低价甩卖给有关部门的。二道贩子定期去××市场收购，再批给三道贩子，价格也在转手中一次次攀升，最后，兜一大圈……

老威：又卖回给拉车的人。他妈的，难怪每次沿街搜缴偏三轮的行动都兴师动众，有时还十几辆摩托车四下出击，城管车警灯闪烁，大卡车压阵，不弄个满载而归绝不罢休，原来这是几级部门的固定财源啊。

胡小松：所以，我要进入这行道，就不想要兜圈子倒卖过几次、几十次的破烂。我检查了轮胎，链条和轴，还把车杠的漆皮刮点下来查看，钢材是新的。其他人都笑我瓜，因为久走夜路必撞鬼，你天天在道上跑，鬼更是说来就来。哪怕你路再熟，胆再小，一年也要损失几辆车。我隔壁的张大爷，70岁，拉了近十年偏三轮，他扳着指头算，平均一年被缴四辆。他说：“最倒霉的一个月就赔四辆，一般倒霉的一季度差不多赔四辆，我是本地居民，运气好，就当赔车给国家交税吧。”

老威：这位张大爷是人精，你该重视他的话。

胡小松：可我年轻气盛，一心要凭力气挣大钱。一环路内风险太大，我就跑二环路以外。地方敞，新开发的小区多，公共汽车的线路一时半刻又规划不过去。有的地段正修路，挖得乱七八糟。拉车得小心，提防陷坑里。我考察过，除了自行车，偏三轮是这些小区主要的交通工具，很受欢迎。那天下午，我下了一斤面条，撑得饱饱的才出门，穿小巷小街，一路倒风平浪静，只是过二环路口子时，突然有一拨偏三轮飞叉叉地从西延线方向过来，沿途叫唤：“牛蚊子来了！牛蚊子来了！”这是暗号，大伙一听，

只恨少长了两条腿，有辆车正逃着，龙头咋地失灵，撞了街沿，前轮扁了，那瘦儿一个饿狗抢屎翻上人行道，再也爬不起来。我是新车，关键时刻显神威，当然比众人都溜得快，拐进一个菜市场就脱险了。后来听说，交警缴了车，还把拉车的老头扔进了臭水沟，激起公愤，交通堵塞了几个钟头。

府南新区正在开发，战旗这边人住满了，菜市场从小区里面摆出来，好大一片；而另一边的楼盘建到一半，从“清水绿苑”到摸底河，两里多长，全是工棚。那是民工社区，城里人这么叫，工棚下除了住人，还开饭店、录像和茶馆。当然，最大的露天厕所是摸底河，晚上从那儿过，老远就一股股比大粪恶心几倍的河风吹来。

老威：你做过民工？

胡小松：我啥都做过，在建筑工地干得最长，三年，从挖土方、砌砖到外墙装修。说不定，你住的楼房都是我建的。我用工钱买了新车，大小是个老板，不必受资本家剥削了。前年5月份，我们本土的一个包工头招了30多名工人到××高尚社区装修外墙，那栋大楼有15层，我们悬在上头没日没夜地贴瓷砖，刷涂料，每天干20个小时，屎尿胀了都夹着。原来讲好每月500元，可我们连干3个月，没拿到一分钱。包工头也不露面了，大家见势头不妙，就停工四处找人，终于在另一个建筑工地揪住包工头。可狗日的狡辩说，他没钱，因为承包给他活路的建筑公司转眼蒸发了，连办公地点都是假地址。大家顿时瓜了，气急攻心，于是30多名工人扭住一个包工头一起上了十五层顶，小朋友一样排排坐在楼沿，准备朝下跳。脚下万丈深渊，车辆和行人比眼屎还小，包工头埋头瞅了一眼，一身冷汗，就忙招呼大家说：“莫乱来，我先给110报个警。”旁边的张大鸟也是个怕死鬼，就帮腔说：“再给××报、××××报打电话，招些新闻记者来，搞点社会效果！”

我问：“万一真不给钱呢，还跳不跳？”包工头说：“一定跳，只要下面消防队把网绳拉开，我就跳！为自己的工人兄弟争利益嘛。”我说：“恐怕到时由不得你。记者上来又拍照又采访咋办？”同村的五娃子说：“对，不给钱就一起跳，否则太没面子。”张大鸟说：“人都摔成肉酱了，还要鸡巴面子。”大家意见不统一，包工头借打手机，想趁机溜，却被我们挟持住，大伙一横心，就手挽手挤在沿边上，大喊：“不拿钱就拿命！”胆子果然壮了。恰好楼底的警报响了，110、119，还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都到了。再朝下看，黑压压的群众，扎断了大街，都仰着白花花的脸。不过几分钟，110和抢险人员都上了顶，记者一大群，扛着摄像机、照相机。一个当官的戴着安全帽，举着电喇叭冲我们喊：“赶快下来吧，工人同志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不开的烦恼，都可以商量，千万别开这种玩笑！”包工头说：“我们不开玩笑！不给工钱就跳楼！”电喇叭又喊：“没有命，拿钱干啥子，莫冲动呵！”包工头说：“没有钱，就没法活命！您看见了，我们手挽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不给钱就一起跳！”电喇叭迟疑了半秒问：“为了啥事？请您现在告诉我，要相信党和政府。”于是大伙你一言我一语，鼻涕眼泪地诉苦。抢险人员摊开手，微笑着，企图借机靠近，马黑娃忙喊：“跳啰！”就向前挪屁股，左右的人被他牵得身体直晃，惊爪爪地叫起来。虽是夏天，烈日当头，但在几十米的高空，一阵阵风仍把头发吹竖了。电喇叭立即命令抢险人员后撤。我说：“不见票子就见棺材！”这话经典，大伙一起喝彩，可惜手挽着，没法鼓掌。热劲头上，只有怕死鬼张大鸟叹气说：“现在哪来棺材？做你妈的春秋美梦！”我回骂：“做你妈的发财梦！跳楼死哪点不痛快？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死鬼才让人瞧不起。”张大鸟反问：“跳楼就让人瞧得起了？”马黑娃说：“至少动静大。”包工头也上了情绪，说：“这回出名了，比无响无臭强

他妈一百倍。”我们和抢险人员对峙了三个钟头，又渴又饿，脑壳开始嗡嗡响。太阳偏西了，我们再没力气斗嘴。此时若有人带头跳，我们真的会一个个往下掉，因为都被晒得软绵绵，像快融化的硬糖。110 毕竟神通广大，一边在楼下拉网、铺垫子，一边根据包工头提供的线索全城追查蒸发了的建筑公司，终于在一家馆子里找到已喝得醉醺醺的总经理。有政府出面，不给工钱就抵押财产，总经理一听，平时逆来顺受的民工居然闹出这么轰动的乱子，只能出血。天黑时，一叠钞票由民警带上来，大伙见了，才木偶一般松手，转身，溜下顶沿。四肢酸痛，大伙牵成一线，残兵败将似地由抢险武警押着，下楼，被送进附近的派出所。群众像满河的鸭子，议论纷纷地撵着我们看，记者不停地拍照，再加上街两旁的灯箱广告和明星彩照，我们顿时觉得也过了盘出名的瘾。挨个讯问，填表，手续过到半夜，我们才领钱出来。本来每人 1000 元，可包工头摸出合同，闹着扣除了他那份，每人就只得了 600。包工头太黑了，可白纸黑字，你拿他没办法。我们在路边鬼饮食吃面，人多好讨价，结果三元五一碗的面只收两元。划得来，也不敢多吃，连手最散的马黑娃也没超过三碗。回到住处又饿了，我说：“还是自己做饭实惠，一斤面才一元多钱，加菜，加点佐料，就冒尖尖的一盆。”大伙表示赞成。

老威：你们算跳楼讨债的先驱了。据我所知，你们后继有人，阵营一天天庞大。据《成都×报》载，本市本月就发生过 8 起跳楼被解救的事件。请听相关点评：“跳楼不是正常渠道——如今的蓉城高楼林立，这些大厦的设计建设者们想不到，凝聚着他们心血的建筑居然成了一些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经常有那么一幕两幕跳楼秀上演，或讨要工钱，或为情所困，稍不满意就爬上高楼，向解救人员讨价还价。拿跳楼作秀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跳楼者得到的只能是人们的不齿。”

胡小松：咱们也是活不下去才跳楼，啥秀不秀的，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老威：你们该找报社讨工钱去。

胡小松：开玩笑！

老威：也算作秀嘛。

胡小松：只有女人才秀得起来，男人也秀，不成了鸭子？嘿，你莫诳我，鸭子比鸡贵，有钱人的奢玩意，我这号的玩不起。

老威：扯远了，还是回到拉车的话题吧。你买偏三轮的钱是跳楼换来的？

胡小松：对，所以头一盘就招凶。我从战旗菜市场出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提着菜，招呼搭车，我拉了两站路，收两元钱，算开张。老太太是退休教师，下放过，很同情劳动人民，她沿途和我聊天，担心农民都跑进城，地没人种。我说近几年讲环保，退耕还林，已没多少地可种，况且捐税太多，即使有地也没法种。老太太叹口气，我把她搀下车，问要不要帮她提菜进屋？我晓得她不肯，但言语要拿得顺。接着又拉了三个客，不知不觉快到九点半钟，按规律，过了十点，二环路以外就是偏三轮的天下，虽然客源稀少些，但大热天，回房憋着难受，不如敞地凉快。我这样想着，警惕就放松了，望见几个同乡，歇在“铁旅”门口摆龙门阵，我绕开了，负担重，没闲功夫磨牙啊。十点多钟出的事，抠破脑壳也料不到，交警这么晚还出动，并且深入到黄忠小区，这旮旯离二环路好几站，连路灯都没装。摩托从几个方向围追堵截，偏三轮又下河鸭子一样嘎嘎嘎地逃开了，我奔的是绝地，去金沙的路两头都在修，中间挖了个大坑，所以摩托不着急，一左一右慢慢跟在后头，亮大灯罩住目标，看你这跛脚鸭子能不能扇翅飞上天去。我在坑边咋地刹车，钢圈都擦出火花来，轮胎肯定瘪了。我转过车头又跑，摩托见我这么疯狂，就闪开道，继续

依旧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整个人都绷直了，嗷嗷吼着，居然迎头撞向城管大卡车。看来狗日的已收获不小，车厢上垒成一匹山不说，车屁股还重重叠叠挂了二十几辆偏三轮。我跌翻在地，又一根头爬起，死死抱住车。几十个交警把我团团围住，戴着头盔，套着几道黄杠的亮背心。一个高个子过来掰我的手，我抵死不放，他就叫：“放开！”我不晓得哪来的胆量，就把整个身体扑上去。他气坏了，就挥警棍敲我的手背，下雨一般，手背都整血浸浸的了，我仍不觉痛。有几双手从背后拿住我的膀子，使劲扭。你晓得，农村人的蛮劲一上来，九头牛也搬不弯。他们吼，我也吼，吼的啥，我也忘了。因为所有的想法都挨扁了。我一根筋抱住偏三轮，直到怀里偏三轮没有了，我还抱住交警的腿不放。我被拖了几十米远，眼睛睁不开，但感觉得到周围人山人海，群众都在议论：“太过分了！”“没偷没抢的，何必把人打成这样！”城管车拉了几遍警报开道，群众不让，有个声音还骂：“拉警报值个鸡巴，今天不给个说法走不脱！”有群众撑腰，我忍不住哭了。交警说：“车都缴了，你抱我的腿有啥意思？”我一个劲地叫“车”，比死个亲妈还惨。有好心人劝说：“把车还他嘛，人家也是凭力气吃饭。”交警说：“缴偏三轮是市政府的规定，消除交通隐患。”好心人反驳说：“有这个功夫就去抓贼，消除治安隐患。”交警说：“这是两回事。”好心人说：“一回事，你们这样乱来，偏三轮走投无路，就去抢去偷去傍黑社会，交通隐患不就转化成治安隐患？”交警说不赢，就威胁说：“我奉劝大家还是各回各家，莫在这儿聚众闹事，抗拒执法。”群众立即喝倒彩，驳斥说：“也奉劝你们莫执法犯法，伤天害理。”交警又冲着对讲机鸡鸡歪歪了一阵，就弯腰掰我的手，不知咋的，我突然气急攻心，就丢开腿，扯住他的膀子咬了一口。交警叫了声哎哟，接着我的嘴被卡住，腮帮子挨了一拳。我在许多裤裆下钻来钻去躲，结果还是被拖住

双腿，扔上面包警车。群众还在后头追撵，终于，防暴大队也出动了，一个当官的坐在副驾位说：“偏三轮居然敢咬警察，抗拒执法，造反了么。”我两手反铐着趴在后厢，汗背心稀烂，刷把一般绕在腰上，下半身光着，鞋和短裤不知啥时候丢的。进了××派出所，当官的让把一条油抹布裤衩给我套上，接着是连夜审问，盖手印，第二天，我就被转送市中区的××看守所。

老威：这么快？

胡小松：警察说，性质一转眼就变了，咬人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口就是敌我矛盾。

老威：就为了一辆偏三轮。

胡小松：你觉得我没出息？也许吧。如果不是新车；如果不是跳楼钱买的；如果不是翻本的愿望太迫切；如果我是你这样的城里人……唉，世上没后悔药可吃。

老威：这不是城市人和乡下人的问题。

胡小松：城市人有工资，钱总要来得容易点。

老威：不见得，许多下岗职工和街道居民一个月才拿两百来元，还要养家糊口，根本买不起 300 元一辆的偏三轮。6 月初，通用汽车公司的几百老职工在武侯商场门口请愿，把闹市区的街扎断了一上午，他们举着××的遗像，要求增加待遇。我刚骑自行车经过现场，见挽着盾牌的防暴警察与老头老太太们对峙着，却不忍下手打。我向围观群众了解，原来该公司的女工××下岗好几年，凭每月两三百的工资养家糊口，可最近，公司不景气，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的几岁女儿不谙人事，仍嚷着向妈妈要 10 元钱过六一儿童节，××回答：“没有。”女儿降价说：“那就要 5 元。”××回答：“没有。”女儿眼泪汪汪地再降：“两元，妈妈，给我两元过节，别的小朋友都过儿童节啊！”××不出声，她身上只剩下 5 毛钱了。女儿伤心地跑开了，××把自己关在房

内，想了一下午，终于找了一根绳，上吊自尽。

胡小松：太惨了！

老威：你以为呢。

胡小松：这么说来，我就增加了熬下去的信心。流动人口，三无人员，名称虽不好听，可总比在一个地方穷死没有退路强。

老威：到底是坐过牢的人，容易看开。

破产企业家吕钰

采访缘起：宪政学者王怡的同学秦少华，现任律师，经常上网，是我搞《冤案录》的热情鼓励者。“太多了，你把全身的毛都写白了也写不完。”他说。并许愿向我提供线索。

2003年9月15日下午，他果然领着他的当事人找上门来。天色有点阴，偶尔滴几颗雨，我们三人去了楼下围墙外的农家茶园，边呷一元钱一杯的劣茶，边开始交谈。

57岁的吕钰超出常规的瘦，但嗓子浑厚，情绪渐渐激昂。当他摘下眼镜时，独眼里有一股逼人的光放出来，可见其人虽蒙冤狱，身体和心智尚属正常，这大约与他打过20年的石头有关。

几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在芭蕉树下，天色愈加昏沉。一阵风吹得众茶客瑟缩不已，有人打个喷嚏骂道：“成都的天气好日怪！”

我握着吕钰的手，站起来，相视一笑。我弄不清为什么要笑？一个千万富翁，转眼就一文不名，这种戏剧，从古至今都上演过，而且还要继续往下演……

“孙大午的事，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秦少华说。“老吕算得上四川的孙大午。”

吕钰：2002年8月15日零点15分，哗啦一声牢门响，我从江油市看守所被释放。当时，天正飘着毛毛细雨。照班房的传统惯例，我把包括被褥、换洗衣裤、毛巾、缸碗、牙膏牙刷、食物，

甚至裤带等生活用品全留下，分给大家。我又拍又抖，如果有可能，我连一粒灰尘和风癣都不要带出去。但是，我却死死搂着 5 年多在牢里所写的十几公斤重的伸冤材料——我就剩下这些了。刚被打进大牢时，只有一个事可做，就是写，白天晚上，写写写，反正号子里不熄灯。大约过了一两年，速度才不得不慢下来，因为左眼的角膜写坏了，流泪，看不清字，刺痛，98 年就瞎了。你凑拢点，仔细瞧瞧，这只右眼，看东西也有问题。

那晚，一个残废的光棍，带着他的材料，跟在干警的后面，穿过深监重地，几道岗哨。看守所的许多犯人都起来，耳朵贴在墙上听，而和我同号的犯人几乎没睡，大家光着膀子聊天，等着送行。要在平时，警察早就提着电棍露面，来烙个满堂红，可当时，因为我的人缘好，就睁只眼闭只眼。

我把大伙儿的口信一一牢记，准备出去后捎给他们家里；死刑犯的口信没法捎，我就许愿周年之际，把军事画报上的冲锋枪、机枪多剪几支下来，喊着他的姓名烧给他，愿他把阴间的银行多抢几个，把阎王爷的官太太搞几盘。乐得死犯合不拢嘴，连称：“还是吕大哥理解我。”

老威：深更半夜放人，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吕钰：我是深更半夜被抓的，要熬够法定时辰。

老威：你的四份判决书，两份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以及起诉书和四川省高院的再审决定书，我都浏览了一遍，像这样反复判决，反复发回重审，直到当事人的刑期已坐满，还没有个最终结论的案子，的确罕见。吕兄啊，你能忍辱负重撑到今日，还保持着这么一股不服输、不认命的劲头，真不容易。

吕钰：没啥，如果你也碰上这么大的冤屈，这么大的人生起伏……

老威：我不是律师，我们还是绕开冷冰冰的法律环节，从头

说起吧。

吕钰：1993年6月23日，《江油报》曾整版发表了我在宏威工程奠基仪式上的讲话，叫《艰难的历程》，这个标题，恰好是我这一生的写照。我是四川中江人，与抗美援朝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是同乡，然而没沾任何光。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尝够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说，在进单位之前，我就从来没有吃过白米干饭。每天两顿，全是红苕稀饭。一大锅水，丢一两把米，加上红苕一熬，全家七八口就长年累月靠这个吊命。

我才几岁，父亲就死了。母亲真不容易啊，穷得连裤子都没有多余的，还送我上学。村小的下课铃一响，一拨乡下孩子就背着书包，呼啦呼啦地朝刚收过麦子的地里赶，大家争抢着捡拾遗落的麦穗，装进书包带回家——这就是我的中午饭，让妈妈搓了，放锅里炒了，再煮来吃。如果啥都没捡到，午饭就免了。

后来我考上了乐至蚕校，毕业分配到中江县蚕种场当技术员，不幸又撞上“三年自然灾害”，我每月19斤口粮。人民币也贬值得厉害，30元钱的月工资仅够买两只小鸭子。我被饿得一把骨头几根筋，加上走路摇摇摆摆，人们常撵着我叫“鸭儿技术员”。再后来，蚕种场垮了，因为人都吃不饱，哪还有蚕吃的？只好卷铺盖回农村。唉，农民嘛，从早累到黑，一辈子，不管你如何勤劳，就这穷得生虱子的命。我不服这个命，就走了几百里路，去投奔在罗江县修铁路的姐姐。姐夫是个石匠，我二话不说，就要跟他学打石头。因为打石头有干饭吃，叮叮当当地整疲了，就有冒尖尖的海碗干饭端。

老威：提起白米干饭，你是特别带劲。

吕钰：对，我打了20年的石头，从罗江到马角坝，铁路、遂道、桥梁、水库的建筑工地都走遍了，渐渐，从实践中摸出了些计划、施工、用料方面的巧门，想法也成熟了，懂得要致富，就

得依靠一个集体。我终于成了包工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之前，我的思想已经走在时代前面了。

80年代初，我投资两万多元，在绵阳办“涪成商行”。那时，只能挂靠在“国营”的名下，可仍然发展较快，不到半年，涪成商行就有了四个分行。84年，我回到八一乡，投资20来万，承包了八一机砖厂，与此同时，我又做酒、煤炭、建筑材料的批发生意，很快发家致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已成定局，我打消了种种顾虑，借八一乡党委和政府名义，合并乡内的几家经营不善的厂，组建了江油市八一工矿企业开发公司，我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93年初，为了适应形势，与外界接轨，我取消了原公司，打出“江油市工矿企业”的牌子，个人注册资金500万元。

接着，江油历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掀开了。我和香港项旭国际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本地的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老威：以你自己命名的公司？

吕钰：对，从谈判到投资，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老威：万一有风险呢？

吕钰：我是法人代表，任何风险都由我顶着。不过，我至今认为，我姓吕的对得起江油的父老乡亲。合资公司开业那天，港方邀请了香港性感巨星叶子楣、曾楚倩到奠基现场演唱；国家时装队，四川电视台最红的主持人卓蕾，成都军区管乐队，省歌舞团都被我请来了。整整一天一夜，江油城可谓万人空巷，比西方的狂欢节还热闹十倍。特别是波霸叶子楣出场，男女老幼都疯了，几十万颗脑袋向舞台那边倾，不仅掌声如雷，而且还伴有口哨和鲜花。当然，省、地、市几级领导都出席了，我和港方总经理伍女士也讲了话。

老威：你真是风光透了。八一乡政府讲话了没？

吕钰：没人晓得乡政府为何物，因为他们既没出一分钱，也没参与过管理。国内外媒体大肆报道，除了娱乐方面，就是“东南亚几十位商家密聚李白故里，共商投资”大计之类，这次活动耗了几百万，港方给了 31 万，剩下的全由我承担。

老威：银子花得水淌嘛。

吕钰：江油是个不发达的小城，一下子要接待这么多贵宾，当然得花钱了。江油宾馆以前连空调都没有，得改造；另外，轿车的档次也得上去，所以我花了 200 多万，买了“皇冠”和“公爵王”……

老威：行啦，想过你的石匠生涯吗？

吕钰：我是不会忘本的。不过。人有了钱有了名，再找钱找名就更容易。奠基之后，我们就以合资名义搞房地产，开发旭钰小区。因为江油是九寨沟、黄龙的中转之地，本身又有“李白故里”的文化含金量，所以选中此地搞与旅游黄金线配套的开发，前景看涨。通过实地考察，我相中了郊区的一块大坝子，一丈量，有 30 亩。这片垃圾丛生的荒坝，过去是验明正身，枪毙犯人的地方，风水当然很差，可由于我先选了，就突然冒出四、五家单位要竞争，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都是国家出钱，这不值钱的死人地皮一下子就抬高了数倍。我是私营企业老板，石匠，从来不肯输这口气，就找到了市委书记说：“你们说要多少钱吧？”书记回答：“底价 600 万，现在有人已出 650 万，并且还在涨。”我问：“多少钱封顶？”书记回答：“市委研究了，750 万。”我倒抽了一口冷气，30 亩，750 万，这在 93 年的江油，无疑是天价。但是骑手已上马了，只能往前跑，于是拍板成交。书记在签字仪式上当众声称：“一口价，绝不反悔。”

我先给国土局交了 200 万的定金，然后成立办事处，破土动

工。我们准备陆续投资一个多亿，建一栋 33 层高的核心建筑，集商贸、娱乐、宾馆、住宅为一体，创本地新时代历史之最。

老威：“你那来这么多钱？”

吕钰：除了个人资本的投入，还得以公司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本地银行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通过同行担保，从山西太原人民银行拆借 170 万到绵阳人民银行；绵阳人行加点利，做成利差，又贷给江油人行，我再从江油人行贷出。由于我为地方财政融资有功，作为奖励，我从江油人行贷到了 300 万。并且利息非常低。我还从川投公司贷款 300 万。

老威：你的本领不小啊！

吕钰：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贪官和奸商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吃肥的，贷款到期，还不了，要么人跑国外；要么把一个掏空了的公司外壳交给银行，拍卖吧，一筐破烂能拍多少？但是我吕钰，是一心要把事儿办成的人，我起早贪黑，忙这忙那，应付各种关系。老虎看起来威风，可明的暗的，不知多少小人来拔毛。

老威：诚成集团的董事长刘波是我 20 年的朋友，他辉煌时，高朋满座，上至中央政治局的要员、娱乐界的大腕、企业界的巨头，下至我这样的布衣旧友都在其府中出没。他东窗事发，出逃日本前的一个月，还来成都看过我。夜深人静，两人频频碰杯，他感叹道：“你不晓得，人生到我这种地步，就好比一匹块头特别大的狼在前面奔，后面却跟着狼群，一旦步子稍微慢了，或者分心了，放松警惕了，狼群就会一拥而上，把我撕得粉碎……这种事谁也不会有丝毫惋惜，因为头狼永远会有的。”

吕钰：不错。我虽然做得没刘波那么大，但处境有些相似。当时向我借钱的家伙太多，并且都有头有脸。市政法书记，至今差我 30 万。政法委变相办公司，也要我担保注册资金，于是我只好书面证明他们有人民币 200 万。不久，这政法委的公司骗了两

家民间公司 130 万，人家起诉，我也连带成了被告。由于我资产雄厚，政法委没资产，我只好先替他们垫付 100 万。唉，这 100 万，成了彼此的心病，我肯定不服气，要通过打官司要回自己的钱，而他们却一直躲，怕我讨债。另外，八一厂党委书记见我做大了，心里不平衡。不出一分钱，却想入干股，我不答应，他就忌恨。

老威：你摆不平人际关系，生意再大，结局也注定了。

吕钰：我只有一身肉，不可能把每匹狼都喂肥。当今，做生意跟搞政治差不多，能爬上金字塔尖的毕竟凤毛麟角，并且都是口蜜腹剑，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

如果市场环境像报纸上吹的那么正常，按数年来的投资回报率，我现在起码也身价几个亿了。因为刚过一年，开发区的土地就由 30 亩 750 万暴涨到每亩 50 万。川投公司眼红了，就找到市委，以催贷为名，想吃地，想依样画葫芦搞房地产。此时我已先后付出 500 万，但我的关系和路子都不如川投野，人家毕竟是上市公司。

听说市委为此专门开会，书记力主毁约，划地给川投；而国土局长说：“老马已经按时付了 500 万，至少该给他等值的地，否则就违约了。”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结果书记一拍桌子，就把局长的职给撤了。我还蒙在鼓里，天天舞着“签字生效”的废纸去国土局闹，结果国土局“强制执行”，把 17 亩地硬划给川投。

强权就是经济，我没人家财大气粗，只得认栽。况且旭钰小区一期动工已久，半途而废就血本无归。我不晓得一个陷阱已围绕自己设下了，就像你讲的，狼群已经包抄了头狼，等着分肉了。川投假惺惺地找我和解，承诺再贷给我 1000 万，年利率百分之三十。由于资金吃紧，我接受了。到了 97 年初，工程接近尾声，狼群就联合下手了。

97年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让我提防手下的副总。并说在3月份，他就参与了针对我的“昌明茶楼麻将会”，在场的还有川投、纪委、三个投资商、一个地商，以及八一乡党委书记。我没在意，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可没过几日，6月16号，兰某竟主使四个黑社会的打手从大街上劫持了我。第一天，蒙眼关进长钢厂区的长庚宾馆；第二天又转到离城几十里的通口盘江宾馆；第三天，拉到邮电宾馆；第四天，再拽入另一方向的石油宾馆。在兜了若干个大圈子后，第五天，他们把我送进了看守所。

老威：公安局没出面吗？

吕钰：检察院在宾馆门口接的人。

老威：那些劫持你的人到底是谁？

吕钰：不晓得。我只晓得刚入狱三天，八一乡书记兰××就以公司是“社队企业”为名，指控我犯“侵占罪”，并将我的全部资产折价变卖掉。本来按程序，评估两个大公司，约6000万的财产，至少也得花十天半个月，可狼群等不及了，连法院、协议等过场也不走，就要分脏了。

“检察院查抄旭钰”引起了轰动，所有的合法执照都没收了，还威胁我儿子，不要犯窝藏罪。我的工程也被川投接收。剩下来的，就是如何活动法院，判我个十年八年，好让分到肉的慢嚼细咽。待生米煮成熟饭，我这个被遗忘的老泥鳅就再也翻不起浪。

老威：你有四份“判决”，两份“裁定”，一份“再审”，几乎创下法律之最了。

吕钰：这是黑箱操作嘛。后来合资方——香港项旭公司得知，非常愤怒地向省高院作证：“如果说吕钰犯有‘侵占罪’，到底谁被侵占了？如果说吕钰犯有刑事罪，到底谁是受害者？如果说吕钰是被告，到底谁是合法的原告？”

老威：问得好。

吕钰：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终审判决”这样写道：“工矿公司是江油市八一乡政府以集体名义申办的，而不是吕钰个人投资开办的。吕钰只是乡政府聘请的管理人员，人事任免权在乡政府。乡政府未实际投入资金，这是追究乡政府注册资金不到位的问题，而并非以此划分企业性质的问题……”

关于“挂靠企业”，国家文件早有明文规定，就是“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我从93年到97年，把自己数年积累的老本全投入公司运作，连觉都睡不踏实，累出了一身的病，才使企业如滚雪球一般，由小到大，最后达到产值5000多万，利税超1000万。给国家上交了几百万的税费，到头来却犯“侵占罪”！什么“视公司财产为己有”，包括买车、贷款、转账、日常开支等等，所有我“利用企业法人和总经理职务”的生意行为，都成了罪证。

老威：我明白了，乡政府的意思是，只要老子给你一个名份，你就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当个不拿工资，反而给所有员工发工资的总经理，还要承担“法人代表”的全部风险。一旦赚了，就必须给不出一分钱的“老子”分肉。碗里不够分锅里，锅里不够只好把自己煮烂了再分——这是共产主义嘛，牺牲你一个，肥了大家伙。

吕钰：我垮了，皆大欢喜，仅一个星期，价值6000万的全部财产就以4000余万的超低价变卖一空，款项被马上分流。乡政府、市政法委、国土局、投资公司及其它房地产商都利益均沾。我公司的副总，用分到的赃款，移师成都开公司，现已有3000多万资产。几十位欠债的也不还钱了，害得我在狱中还与川投打官司，要求返还多收的土地款270多万，结果胜诉了，却至今无法执行。

老威：除了欠债的，你的债主也不少吧？

吕钰：对呀，经济秩序完全搅乱了。这届乡政府捞肥了，拍

屁股走人，下届可惨了，我的债主们揪住不放，要求还钱。三台县花园镇油厂厂长杨××，就率领当地好几百工人、农民，浩浩荡荡到江油，围攻市、乡政府和人大，吼着索还连本带利 140 万的借款。轰动一时，连防暴警察都出动了。

乡政府招架不住，也向法院作证，承认上一届政府负责人“认定错误”，为我伸冤。但肉已下肚，吐不回来了。入狱一年半后，我被重判十年，中院打回；改判 6 年，再打回；再判。眼看上下级搞僵了，有人出面活动，施压，中院只好通过终审，判 6 年。当时我已蹲了 4 年多，沦为家破人亡的穷光蛋。

老威：从千万富翁到一文不名，老兄可谓“黄粱一梦啊！”

吕钰：刚入班房，心情恶劣，像头狮子被关进铁笼，见人就破口大骂，弄得公检法的承办人都怕来见我。有一次，把审讯官骂毛了，就拍桌子，说要喊几个黑社会来捶你个狗日的，拿针线把臭嘴给你缝了。稍后，我狂写申诉，一天好几万字；也搞创作，如《我与恶狼打交道》、《阳光下的肮脏》、《审后悲哀》、《告江油全市人民书》等等。直到左眼瞎了，心情才慢慢平息了些。觉得自己的命硬，只要整不死，就能还魂。

另外，我在号子里是老大，受到尊重。看见那么多人比我惨，都是一条命，就怕人和人比，我一个饿过饭的石匠，能折腾成这样，也没白活。

老威：我晓得，看守所很恐怖，比劳改惨多了。

吕钰：无论判多少，只要转去劳改，就踏实了。而看守所关犯重罪的未决犯，脑袋悬着，情绪不稳定。我送走过 30 多个死囚，有人还留下遗书，要把器官捐献给我。

死犯一宣判，就锁在铁床上，两根铁链连着两副手铐，另有两副脚铐是固定的。这样，人躺上面，除了锁着铐链的手能哗啦哗啦地抬一下，其它部分都动不了，屙屎屙尿要人在下头接。

死犯的案情，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所以判了后，上诉、复核期有长有短。所以刑床上的人，有锁1年多的，10个月的，但至少也得等半年，活受罪嘛。其他犯人轮流值班，昼夜24小时有人负责，喂水喂饭接屎尿擦背。特别是夏天，皮肉粘在铁床上，印出条条槽，屁股都坐烂了，血啊脓啊，直往地下滴……

老威：不洗澡么？

吕钰：一星期解下来洗一次，再锁上去时，许多死犯还连叫爽。唉，人的需求其实很低，有时，能洗个澡，自己反手抠个背也满足了。死犯执行前夜，我一定要给他们买肉吃；其他人也不太睡，围在铁床边看他写遗书，说说笑笑，稳他的心。早晨7点钟，开锁洗澡，尽量收拾得干干净净，政府8点30分左右到场，让劳改犯抬出去。这时，我就会追着法警打招呼：“兄弟几个，打准点，莫让他多受痛苦。”

老威：吕兄还真有一套。

吕钰：毕竟做过公司经理，晓得怎样做人的工作。我经常给死犯的承诺是：“兄弟你去吧，做个爽快鬼！今晚12点我给你烧一挺机枪。”

老威：如果人家不喜欢枪呢？

吕钰：喜欢啥烧啥，爱下棋搓麻将的，就烧象棋、麻将，好色的就剪画报上的光屁股明星烧去。

老威：死犯都罪有应得吗？

吕钰：几乎都罪有应得，但也有没判就冤死在牢里的。有个20多岁的娃娃，犯了偷案，派出所去抓他，进门就喊：“不许动！”他慌了，仗着有把蛮劲儿，扑过去夺过一支枪，像香港匪警片里演的那样，连比划了五、六下，吓得警察抱头鼠窜，却半天不闻枪响。回过神才发现那娃娃没抠扳机，不会开枪。于是，气极了的警察转过来，一顿暴揍，然后扔进班房。唉，可怜啊，一直蜷

在旮旯里叫，五六天屙不出屎尿，一检查，肠子被踢断了。出去住院要市局批，所以只能捱着。拖了十来天就死在牢里。

还有个娃儿，江油后坝人，婆娘与邻居口角，抓扯起来。他见架从外面打到自家房内，就抄起洋铲，砍了对方一下，造成轻微伤。派出所出面调解，判他出 500 元，就划句号。他家穷，出不起，派出所就关他；还不出，派出所就以寻衅滋事为由，升级送看守所。几个月后提起公诉，恰遇严打，竟判了无期。他一下子气懵了，成天喊冤叫屈，“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地吼了个把星期，又用私藏的打火机钢片割腕自杀，未遂，继续吼“毛主席万岁！”半个晚上都不停。突然，他没声了，直挺挺地倒在炕板上，气只进不出。急忙报告，随后送医院。政府特准把老婆、孩子唤来服侍，不料已来不及了。凌晨 5 点，他气绝而死，嘴边还有血丝。

不说了，我能活着出来，也算天照应。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产生幻觉，疑心有人会在食物里下毒。但我已尝过生不如死的味道，百毒不浸了。无论如何要翻案，否则这班房就白坐了。

采购员霍海仲

采访缘起：75岁的擦鞋老人霍海仲称得上四川省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前的一道持久不变的风景，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他都在那象征司法公正的招牌下坚守鞋摊，且忙碌不停。

2003年3月28日，我花了一下午功夫泡在对街茶馆里窥视，却只见到3位匆匆过客坐下来擦鞋。清冷如斯，我动了恻隐之心，就现身趋前“照顾生意”。不料老人横乸一眼，将我和我的鞋均晾在一边，却转脸招呼两位风尘仆仆的外地上访者，并滔滔不绝地介绍与之相关的法律过场及熬磨经验，其中包括附近几家旅馆和小食店的最低价格，俨然是高院的编外咨询接待人员。

与老人交谈片刻，其冤情平淡无奇，一目了然。我追究久拖未决的原因，老人回答：“当年的案卷丢失了。”

我哭笑不得。老人又叹道：“我的一生可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总结。这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把我毁彻底了。”

老威：您是霍老先生么？我在某报记者武田那里看过您的材料。

霍海仲：武记者一年前找过我，写了稿子，还拿给我看，但以后就没下文了。

老威：没下文？很正常。因为报纸是党办的，武田再同情您，他的胳膊也拗不过党的大腿。

霍海仲：我懂，武记者头上有主编，主编头上还有宣传部。

老威：宣传部养了一大批离退休的老革命，组成读报委员会，每天上班唯一的头等大事，就是扛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串读本地几家主要报纸，挑毛病，上网上线。正面的各种阳光新闻必须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所谓“阴暗面”只能有选择地刊登，还要留点“光明的尾巴”。

霍海仲：可上访人士登报的也有，比如老陆。

老威：老陆告赢了公安局，至少从司法上，他的事已有定论，所以媒体能够有条件地炒作。而您的案子好像还没有个定论……

霍海仲：我冤枉，这是明摆着的。

老威：您讲讲看。

霍海仲：我今年 75 岁了，还坐在这儿擦皮鞋，还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诉说内心的冤屈，想起来，跟做梦似的。前一晌开两会，公安局清理省高院周围的三无人员，把上访的撵得鸡飞狗跳，腿稍慢，就抓进收容所。我风烛残年，不在乎这些，但也被警察打了，腰和腿挨了警棍，趴在街沿，半天起不来。鞋摊也被踩平了，他们说我是老反革命，是特务，故意把个破鞋摊摆在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口，打反面广告，损害国家形象。我争辩说，上访没钱，我一个孤老，不偷不摸，不叫化要饭，而是擦鞋自食其力，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他们说，那你到别处去，莫在这儿碍眼睛。我说就要日夜钉在这些官僚的眼皮底下，直到死。

老威：没用。冤案见得太多，人心就成了铁打的。

霍海仲：但一个人冤死在高院门口，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一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消耗了他一辈子。坐牢、留队劳动、申诉、上访，除此之外，他无儿无女，无家无室。

老威：我很难过。

霍海仲：我是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 7 村 4 社人，年轻时，

被国民党抓壮丁，草草训练，连枪都没打顺，就被送上前线。新兵嘛，一听排枪响，就鸭群一般嘎嘎后撤，被督阵官赶回，就干脆埋头装死。到了解放那年，壮丁更是抓得多跑得多，长官开枪止不住，自己也被挟裹下战场。有一次，我们遇上解放军，照例丢枪就跑，因为是开阔地，我跑得急，方向偏了，竟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我立马举手投降，成了俘虏，稍后成了解放战士。抗美援朝时，我23岁，刚跨过鸭绿江，准备上前线，却突然怕死，装病脱离了部队。

老威：你这段经历挺复杂的。

霍海仲：够写一部书了，但我只能三言两语，作为开场白，让你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壮丁出生，贪生怕死，希望能回老家，平平顺顺地过日子。总之，思想开了小差。部队领导还算宽大，没有过多地追究。复员回四川，我转到了江油钢铁厂当工人。1956年，厂领导根据我喜欢跑腿，好交际的特长，分派我做采购员，直到六几年。这期间，我经常回三台老家，与乡亲们混得火热，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大伙叫我“霍采购”，八竿子打不着的也瞅准机会来散烟敬茶，搭关系。说媒的更是接二连三，在家里寻不着，就揣着姑娘的照片在车站等。没料到，好景不长啊。

老威：我是58年大跃进出生的，三年大饥荒，我因营养不良得了黄肿病，差点就夭折了。你能在那种全国性的水深火热中活得春风得意，不简单。

霍海仲：社会主义初级目标就是缩小三大差别，我嘛，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中穿针引线，沾些油水，活命的空间自然就大。我经常受组织安排，为厂里采购农副产品；而农民也乐意通过我，把在集市上赚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成批卖给国营企业，既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个人也能得些油盐钱。

老威：供销对路，您也算改革开放的先驱了。

霍海仲：由于工作过分积极，我累出了病，经厂领导批准，我于1960年回家休养。在此期间，厂里派给我新任务：为江钢采购箩筐、蓑衣、斗笠等农副业加工物品。由于需求量大，我就专门找到长乐四村四社队长，与之签定加工合约。当时，社员们还挺感动，叫我大善人，因为我在普遍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为大家引了一条生产自救的路。1961年春，四社按和约交货，可我手里没现钱。为啥？因为按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的工资，所有支出，上了30元就必须由银行转帐，而四社却没有在银行立户头（那年月，恐怕大队干部也不懂“户头”）。

众乡亲嚷着要现钱，我一时又从帐户中提不出，只好凭多年的关系，四处借贷，自筹资金，先垫付了这笔1978.40元的货款。我不能失信于生养我的故土，大家都在等米下锅呢。

完成任务回到厂里，正逢社教运动，冻结了江钢的帐务。经过相当漫长和细致的逐项审核，确认没问题，社教领导小组才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签字，将我的垫款作兑现处理。1964年，厂方按规定将1978.40元等额货款直接汇到我的老家——三台县长乐七村四社霍海仲收，并且注明是三年前的蓑衣、斗笠、箩筐钱。在60年代，私人收到这么一笔巨款，肯定引人注目，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人们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长乐信用社收到钱后，马上作为重大“敌情”汇报给公社。据原分管民政和治安的副社长，现已80高龄的涂国华讲，当时公社连夜召开由几个部门参加的分析会，一致认为来路不明，应立案侦察。

老威：信用社没有通知您本人？

霍海仲：没有。他们直接扣下钱，就派专案人员按收款地址去我老家调查，都说从未做过箩筐、蓑衣的买卖，这刚好证实了先前“来路不明”的猜测，于是冻结了款项。稍后，我“落入法

网”，严刑逼供，最终便认定我勾结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江油钢铁厂巨额现金。1965年10月3日，三台县法院“依法判处”我有期徒刑7年。

老威：您与四村四社做买卖，咋会去七村四社调查呢？况且，您为公家办事，前后应该有不少证人，他们都没有站出来？

霍海仲：这些我都说了，包括与谁签的约，谁验收的垫款，帐本在谁的手里等等。但整我的人都红了眼，宁左勿右，根本不顾我的申辩。

老威：这笔“冻结款”现在何处？

霍海仲：我打了18年的官司，倾家荡产，孤独无依，所以一再要求法院在平反冤狱的同时，助我讨回本属于我的财产，可那笔钱却蒸发了。

老威：不会的，既然认定您“骗领公款”，按法律就该退回原处，以“挽回损失”。

霍海仲：我都坐牢了，江钢还不知道自家的采购出事。直到30多年后，长乐合作信用社才在律师跟前查旧帐，证实此款经主管副社长涂国华签字，转给了永安电厂集资部。涂国华也承认，并称这是当时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的，可具体经办人不清楚。

然而，当年任永安电站财会股长兼主办会计的刘洪党却说“并无此事”，因为60年代根本没有集资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什么“永安电厂集资部”。如果长乐信用社确需要转款，也只能按那时的管理规定，通过电站所在的芦溪营业所，最后方转到电站指挥部财会部门。所以长乐方面提供的转款手续有“伪造之嫌”。

老威：这也算一桩案中案了。

霍海仲：我怀疑有人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黑吃这钱，可60年代搞阶级斗争，谁有这么大的豹子胆？唉，30多年了，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一团乱麻，只有老天爷去解了。

老威：您就稀里糊涂劳改去了。

霍海仲：刚结婚的老婆也在组织的感召下，“大义灭亲”，与我断绝关系。喊冤、撞墙都没用，只能在劳改农场抬石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由于我不服判，坚持申诉，不但没减一天刑，而且在1971年11月18号刑满之际，被强行宣布“留队就业”。

老威：这和劳改有啥区别？

霍海仲：挣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在农场内有一定活动空间，偶尔还能近距离地看女人。从外地来探监的家属，都要带些吃的用的给犯人，警察懒，只动嘴支使，搜查这一关就由我们手上过。

老威：这也算特权？

霍海仲：当然。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为了顺利过关，总要讨好我们，对我们笑，身子凑过来，近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你想，都是憋了若干年的老光棍汉，嗅着香水味，瞟着那衣领里的白肉，能不起化学反应么？没办法，一走神，藏在袜子、肥皂和食品里的纸条、现金就放过去了。而一回队，几圈骚哄哄的劳改犯就围着你，咽着唾沫让你谈感觉。谈就谈，添油加醋过过瘾，但内心那个酸！那个痛！刚娶的老婆飞了，如果不坐牢，恐怕我已是几个娃儿的爹了。都怪我太要面子，对故土乡亲太有感情，垫啥货款呢？付不了现金，拖一拖又能咋样？唉，罢了，不能往下想，成天卖后悔药，这牢就坐不出头。

老威：我能理解，您壮年蒙冤，把大好的时光都废了。

霍海仲：我留队14年，农场只批准回过一次家；加上前面7年，我总共21年没有出过监狱大门。我在高墙、电网和警察的监管下干了21年的重体力活！1985年，我57岁，老了，干不动了，农场才按照党的政策“清放”我回原籍。

老威：按字面理解，“留队就业”既不是服刑，就应该算参

加工作，有退休金的。

霍海仲：从未听说过。我只记得一条老光棍被踢出农场时，浑身皮包骨头，一根筋，连走路也晃晃悠悠的。没家没地没钱，我往哪儿去？但我晓得，冤还没伸，气还没出，天子都换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我突然有个感觉：当年所以把我强制留队，肯定是某些人怕我在外面到处申诉、上访，制造麻烦。

老威：老先生，您这案子若要放现在，不仅判不了刑，您还能反过去告他们侵吞私人财产。但在 64 年的社教运动中，比您冤的大有人在。我曾经看过一则《人民日报》的老新闻：某个地主婆为了讨好新上任的贫农生产队长，私下送去几个粽子，并提出义务替队长妻子照顾小孩。不料，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暗中监视她的人发现，立即上纲上线。于是，倒霉的地主婆成了“腐蚀、拉拢革命干部”的罪犯，被判刑劳改。

在为此而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老贫农这样帮助差点失足的队长：“我们一眼就看透了 X X 的鬼胎，可是你还蒙在鼓里。原因是大家脑子里有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

霍海仲：在老毛时期，啥都朝政治上靠，所以不奇怪。

老威：您呢？

霍海仲：我不同，所以我上访了 18 年，从老毛，到老邓，再到老江老胡。像你刚说的地主、贫农以及阶级、成分，一转眼全没有了，取消了，平反了。如今回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几百年前。可我呢，还在老江老胡手里为老毛手里搞出的冤情奔波。

老威：这么简单的案子，这么多年就没进展？

霍海仲：1990 年，三台县法院复查过一次，“维持原判”。1997 年，两位大好人仗义免费替我打官司，他们是三台县齐民律

师事务所邹光新律师和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两位恩人不辞劳苦，下乡走访了大量知情的干部、群众，进行取证，并将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上交有关部门。

老威：咋样？

霍海仲：杳无音讯。邓院长和邹律师多次找县法院交涉，催促尽快办理，但他们总是踢皮球。

老威：一个屁大的县法院还踢皮球？

霍海仲：当年判案的卷宗找不到了，所以就失去平反的依据。

老威：那 1990 年“维持原判”的依据又从何而来？

霍海仲：啥时有案卷，啥时没案卷，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跟变魔术一样。为此，邓院长于 1998 年 2 月 23 日电话联系省高院，经系统内查询，才知道相关资料已转至绵阳市中院；而中院则回答说，早在 94 年 2 月 20 日就已退回去存档了。无奈，邓院长又亲自去县法院，利用老关系查阅 94 年和 95 年的全部案卷，均无收获。

老威：这是渎职，您可以据《行政诉讼法》告他们。不过，这案子也够蹊跷；先是以“骗领公款”的罪名判您的刑，接着这公款又以集资修电厂的名义“不知去向”，具体经办人“都不清楚”。而几十年后，连案卷都不翼而飞，似乎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霍海仲：邓院长曾对某报记者公开表示：按照中央纠正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当年判我的主罪是“骗领公款”，而后来的事实却否定了；主罪都不成立，我当然该平反，获得赔偿。

老威：又过去好几年了。

霍海仲：75 岁了，耗不了多久。我在这省高院门前擦鞋，也是不得已。许多上访的还年轻，路还长，我可是黄泉路近。冷、饿、挨骂，甚至受点皮肉伤都没啥，可最近这次，警察也打得太狠了，尽朝腰和腿上踢。我只有一双手，护得了脑袋抱不了腰，

我直喊：“腰腿整不得，本钱收不得嘛。”我怀疑，他们动手了，不让我活了。因为我不在人世，就不用平反了。

老威：他们是谁？

霍海仲：不晓得。这辈子，我没惹过谁，没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但明里暗里，总有人和我过不去。眼看平反有望，可又一直拖着。

老威：所以您要尽可能地保重自己，开朗些，就算赌一条老命吧。

霍海仲：争取吧，努力吧，我现在最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两眼一闭，不完也完了。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采访缘起：2003年5月22日，《中国底层》之法译本在彼国南部蒙佩利耶书展上举行首发式，我因没拿到护照和非典型肺炎的双重因素，不能前往出风头，难免心气浮躁，拍遍栏杆。

是夜辗转难眠，照旧坐回桌边，翻检种种原始材料，竟发现这篇谈话稿已搁置了将近一年，几乎淡忘了。

犹如梦中惊醒，我一点一点回想在上访旅馆初遇老人的情景。那是个太阳天，羊老租张小茶桌，摆放在旅馆门口，自己却长髯飘飘，手捧“代写书信、诉状”之纸招牌，端坐一旁。

穿梭在那条陋巷中的上访专业户极多，所谓谋生手段大致为乞讨、拾荒、擦皮鞋、钟点清洁工或小偷小摸，而77岁的羊定清却选择了如此与世风格格不入的清雅古业，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于是交往，进而长谈，方知此老颇有来历：他曾向国民党官办之《扫荡报》和《中央日报》投稿数次，为我辈“自由撰稿人”之祖师，因逢改朝换代，其旧社会的言论被新社会治罪，九死一生，并殃及家族。

唏嘘未了，我父随之病重入院，不久撒手尘寰，接着是祭七、择墓、入土。再接着，中共交班，伊拉克战争，非典。家事国事，一桩又一桩，在走马灯一般地旋转中，双鬓依稀添白。

而羊老先生今在何方？前几日，我才骑车重游过旧地。因非典，旅馆配合公安机关将所有“外来人员”扫地出门，剩

一片白地。我在那儿站了一刻钟，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别的——我的脑子也只剩一片白地……

老威：老先生，在这上访堆里，您的岁数最大吧？

羊定清：今年虚岁 77，和在高院门口擦皮鞋的霍老头同庚。

老威：可您的名字、资历相比老霍，一个天，一个地。

羊定清：啥意思？

老威：人家老霍虽满腹冤屈，但阅历单纯，哪像您这鼎鼎大名的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羊定清：大风大浪是经历过，可“记者”算不上。

老威：大伙背地给您取的绰号就叫“扫荡报”。

羊定清：看来这个黑锅我得背到死。

老威：不想自己澄清一下？

羊定清：我对许多人当面澄清过，可说来话长，人家不耐烦听。唉，一个人没有社会地位，说啥都顶个屁。

老威：我喜欢“说来话长”，我相信您的故事。

羊定清：不是故事。好吧，您当作故事也没啥。我是宜宾高县云河乡人，生于民国 15 年（1926）正月初八，头上两个哥哥，脚底三个妹妹，据我老母亲讲，羊家的香火原来很鼎盛，自晚清到民国，在当地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姓氏，出过好几位秀才，还出过举人。可到了我这“定”字辈，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乃，家道就有些中落了。民国 25 年，二妹、幺妹死于天花，民国 28 年，大哥、二哥又累死在背盐途中。旧社会，川盐很值钱，特别是自贡自流井的盐，一贩运出川境，价格顿时涨一两倍。所以，老家许多青壮劳力都相约去自流井打工，熬盐或背盐。那时山川阻隔，如今半天的路程，要走十几天，而且都是崎岖小路。我的两个哥

哥据说死在贵州安顺场附近，可噩耗让同村人捎回来时，已过了一月余。我还小，正读私塾，还依稀记得父母在祖坟地里为哥哥们垒了两座空坟包，埋了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衣裳。丧事不久，被伤痛弄懵了的父母就商量着要我辍学，因为家中太缺人手，我虽年幼，也可放猪放牛，干些杂活。可祖母溺爱我，老人家把父母叫到膝下训斥，并令其诅咒：哪怕拆房卖瓦也要让清娃念书、进取，待来日飞黄腾达，为列祖列宗争光。

长话短说，民国33年（1944）夏天，我18岁，高县中学初中毕业。家里张灯结彩，遍请亲戚后，父母就卖掉20亩水旱田，一头牛，凑足一大笔银元，助我去重庆求学。当时，父母要求我读工商，将来做个生意人，中兴已衰败不堪的家道。而我身处抗战胜利前夕，同所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知识青年一样，心系国是，渴望投笔从戎。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秋天，我于家中稍事休整，准备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时，竟在高县郊外被绑了壮丁！其时晴天白日，我刚走上公路，就从路边树林里窜出一彪人马。一条麻袋自脑壳罩到脚，我还以为撞上棒老二（土匪）了，就在麻袋里大喊救命。外头捣来几枪托，痛得我一下子耷在地下，只听得有人拉枪栓骂道：“喊个屁！一枪毙了个狗日的。”

我骇出一裤子尿，就低声求饶：“大爷们放我学生娃娃一条生路，身上的钱财都孝敬。”

麻袋外应答：“老子们不是大爷，是国军！而今打抗战，前方兵员缺乏，对不住了！”

就这样，我昏天黑地栽进驻县城的壮丁部队——叙泸师管区当了壮丁。随后辗转宜宾、泸州、自流井、贵州安顺、遵义、毕节等地背盐，作牛作马。

老威：当兵咋做苦力呢？

羊定清：国民政府的战时壮丁法令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一到地方，就乱套了。有钱人家不愿出壮丁，就出一大笔钱，空缺的壮丁名额，就四处抓人顶替。到了管区内，不发枪，不操练，先白做几个月的苦工，累不死的，才交给正规部队。这之前的军饷、粮饷，以及壮丁们背盐挣来的辛苦钱，统统落入各级长官的腰包。

老威：他妈这壮丁部队就是人贩子团伙。

羊定清：跟共产党贪官一样，国民党贪官也在政策法规的保护下，无法无天。短短两个月，我所在的连队就因害红白痢疾、闷头摆子不治身亡、逃跑、累成肺病等原由，减员过半。剩下的30多个骨瘦如柴的弱丁，缩编成一个排，由排长和班长押着，继续背盐。为了怕我们逃跑，每人都刮光头，却在脑顶盖留一撮毛作为标记，屙屎屙尿也喊报告。最后，干脆5人一组，一条绳串起来，在路上就谁也跑不了。

抗战胜利时我仍在贵州山路上背盐，直到某一天，上峰要到叙泸师管区视察，营里才急了。为了应付，就由连排长带上人枪，挨家挨户抓县城老百姓，临时套上军装充数。我记得已是民国34年（1945）双十节，站在操场上接受视察的壮丁不足200人，而抓来的假壮丁却超过300。谁也不敢吭声，因为长官言明：应付了场合就放人，出了纰漏谁都走不脱。

那天来的是省城大员，屁股后还跟了大拨本地贤达士绅，没想到，我的同窗沈云山居然也在其中！我老远就认出他了，却忍住不吭声，直到沈兄随显贵们来到跟前，我方突然伸出手，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轻声叫道：“云山！”

场里所有的人都楞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过来，瞪我一眼，却又转脸笑对显贵们。我已豁出去了，死揪住同窗的胳膊继续叫道：“我是羊定清！云山，认不出了？”

此时，连过去了十几米远的省城大员都回头来。沈兄见状，急忙拍拍我的肩，耳语道：“我会救你。”随后大声说：“莫激动，莫激动。”就抹下我的手闪开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以为完蛋了。不料当日下午，沈云山就亲自到壮丁营接我出去。犹如囚犯出狱，我当即大哭一场。沈兄温言劝慰，原来一两年不见，他进了国民党高县党部，任通讯秘书，所以能够很快打通关节，救我于水火。

回到家，父母一见皮包骨头的儿子，以为大白天见鬼，傻了一阵，才互相抱头痛哭。经历这场变故，我本已心灰意冷，不料在家没歇多久，国共内战又开场，好歹是读书人，总不甘心这辈子在庄稼地里混。正郁闷着，就接到沈云山来信，一番叙旧，赞我志向高远，才华出众，为诸学兄中之翘楚。接着，就引出替《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之地方时政版约稿的正题。我受宠若惊，免不了回函谦辞；沈兄再次来信恳请，并寄来样报若干，他说：“拙弟不才，滥竽充数为扫荡诸报之特约通讯，当竭尽犬马，举存兄之高文，幸勿推辞。”

两番知遇，沈兄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于是从命动笔，在一年内，通过沈兄向《扫荡报》投稿8次，刊登4篇；向《中央日报》投稿6次，刊登两篇。内容均为地方见闻，穡稼之辛，兵役之乱。我还评论了所谓壮丁法令，以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道：“抓丁者如匪类，贩丁者视国家律令如废纸，长此以往，则将贪兵疲，官强民弱，共产魔道乘虚而入，社稷危矣。”

老威：内战结果还真被你言中了。

羊定清：《扫荡报》稿酬不错，发表一次能挣一个银元，在乡下就算一笔大钱了。所以父母很高兴，就起早贪黑，承担全部农活，让我潜心撰文。四邻也羡慕，都说羊家祖上显灵，风水要转了，只这定清一人，就抵过几任秀才。因为在整个县境，能在

国家大报上发文的，也凤毛麟角。

老威：您是我辈的祖师爷，因为本人目前就以卖文为生。

羊定清：现在的稿酬如何？

老威：比您挣银元差远了。

羊定清：我也就挣了一年。48年夏天，沈云山调升重庆，断了联系，我的投稿生涯就告一段落。捱至49年，国民党败象已显。经济滑坡，军事吃紧，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父母还捏住这银元不肯用，而金元券和法币又贬得太快，揣几大卷去赶集，只能买回两斤盐巴。

转眼岁末，四川全境解放。接着，工作组下乡来，按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家十几亩薄田，本来划阶级成分只够上中农，却被贫协一致推选为地主，为啥？就因为我“落入了法网”。

老威：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

羊定清：本人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老威：那为啥“落入法网”？

羊定清：因为发表文章。朝代一变，《扫荡报》就成了反动喉舌，我当然罪不可赦。父亲年纪大，想不开，几场批斗下来，就“畏罪自杀”了。我挣的银元一文没用，连同房子、耕牛、田地和祖传的首饰，统统充公。我被关押在乡公所的黑屋内，白天黑夜都点着煤油灯，写交待材料，向人民缴械投降。

老威：这同我爸在文革中的状况差不多，大约是1971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几百个臭老九一起，集中关押在盐亭县城关小学内，天天写材料，背靠背检举他人。有人受不了，在厕所所用剃胡刀片抹脖子，死了，还抬出来，放在水泥乒乓台上曝尸示众。而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出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羊定清：文革和土改不一样，在土改中，工作组就是法律，枪毙、管制、关押、批斗、用刑，全凭一句话。幸好我在土改初期就被揪了出来，当时正“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组的作风还较温和，主张说理斗争。划清阶级后，工作组领导由南下的外省干部换成了本县的复员军人，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镇压“坏蛋”。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毙人，只要有三个以上的贫下中农检举某个不法地主的复辟言行，马上就把地主抓起来批斗，当场就枪毙。杀人上瘾了，后来，连贫协组长、民兵连长都随时提着枪，找借口消灭了敌人，方先斩后奏，向工作组补充汇报。

老威：您没被毙掉？

羊定清：如果我留在村里，十颗脑袋都不够崩，因为几十年后，出狱还乡，才晓得方圆十里的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已被消灭了大半。有的地主，全家老小被斩尽杀绝，连看门狗也没逃脱。幸好我被早早定性为反革命敌报记者，问题步步升级，在村里关几天，就转乡公所，接着又进县监狱，才得以公审公判，走完法律过场，保住脑壳。

老威：谢天谢地。

羊定清：是该谢天谢地。因为当时不比现在，要经过侦察、预审、正式逮捕、检察院动检、请律师、开庭，人犯在接到《起诉书》时，就能大致猜到自己要判啥子刑。当时全懵，只要被抓起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背景，聪不聪明，全懵。你不晓得这颗头明天还在不在脖子上，甚至开万人大会，你被五花大绑架出去公审，仍然不明白最终结果。法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判，书记员在旁边龙飞凤舞地手写《判决书》，这一场走下来，灵魂早就出窍了。你居然还活着！感觉好奇怪嘛，那些呼口号的胳膊好像在另一个世界起起落落。回到监房，松了绑，掐一把自己，那一阵痛，来得又缓慢又遥远。

当局者迷，记得 1951 年初春，我得知沈云山在重庆郊区歌乐山农村落网时，还暗暗叫苦。果然，沈兄熬不过，屈打成招，承认是我的“上级”，并交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本县向敌报投稿的记录，一共 18 人。稍后，这 18 人悉数落网，除了在土改中被当地群众枪毙 6 名外，其余 12 人均被判刑，而我因发表次数多而名列 18 人之首。

形势所迫，我连叫声冤枉都不敢，只整日心惊肉跳地怕“升级”，年纪轻轻，头发就急白了。连做梦都是脑浆、血和拼命地逃。民兵提着枪，满山遍野地撵。累醒吓醒了，还喘，腿肚子还抽，还妈呀妈呀地乱叫。同监关了 20 多个人犯，恶霸地主、袍哥、土皇帝、特务、一贯道、破坏分子，可谓货色齐全。

枪毙沈云山是我陪的杀场，土改中我已陪了好几盘杀场，本来已习惯了。其大致程序是，在开会崩人的头天下午，狱警就从监房挨次点名，提出一批囚犯，转交给候在监外的武装民兵，然后被押往城郊某个地方（一般是山脚下或河边斜坡）挖坑。这坑有锅台大，半人深，大伙用铁铲和锄头拼命挖刨，稍有迟缓，背后的民兵一枪托捣来，你就一跟斗栽进自己挖的坑。说实话，这活儿又累又紧张，但犯人乐意干，甚至越干越兴奋，因为挖坑就意味着吃了暂时不掉脑袋的定心丸。

睡我旁边的目不识丁的千年平安国土皇帝就死在我挖的坑中，他姓李，罪名是搞封建迷信，串通信徒围攻工作组。结果在“案发”两个钟头后，就被闻警赶去的剿匪小分队制服。我跪在一旁，一见枪管抵住土皇帝的后脑勺，赶紧扭头闭眼。执行民兵见状，骂我一声龟孙子，影响他的情绪。于是押解民兵就把我的头掰回去，命令不准闭眼。我只好眼睁睁地瞪着土皇帝开瓢，脑浆子卜地向前射出一股，两尺远，白白地溅落在坑那边；然后才是血，咕嘟咕嘟从那泉眼往外冒。土皇帝的桩子太稳了，好几秒

钟都不倒，刽子手蹬一脚，轻了，他身子晃了两晃，居然要后翻。刽子手赶紧补上一枪一脚，狗日的才栽进坑中。

我哇地一下呕了，幸好早上没吃东西，只呕出一滩绿茵茵的汤水。刽子手毙人不顺，就骂骂咧咧地过来，踩住我的后背，起劲揩擦鞋底。我死了一样趴着，感到土皇帝的魂附体了。

老威：这刽子手不会做恶梦吧。

羊定清：亲不亲，阶级分。那时，这种“杀敌”的光荣任务，只有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才有资格担当。而我，杀场多陪几次，就麻木了，不扭头不眨眼，哪怕脑浆子溅上脸颊，也不闪不避。手反绑着，又擦不了，只得让铜钱大的脑浆晾干在那儿。

老威：沈云山是你的恩人，毙他你也麻木么？

羊定清：我还以为会结伴走上黄泉路，因为头天挖坑没有我。次日凌晨，我被提出监房，解手铐换绳子，不是五花大绑，而是下巴以下，膝盖以上，一圈圈绕着捆紧，连裤腿也扎了。据说这是典型的死人捆法，人直通通栽地上，要么向前跳，要么一寸一寸移。扎裤腿则为防大小便失禁。

我晓得不妙，但万念俱灰，任由狱警架过长长的走廊，扔出监狱大门。一辆苏式嘎斯车早停在那儿，我和另外3名犯人被解放军战士接过，拽上车，顶着满天星斗驶向宜宾。

公审大会在宜宾中学操场举行，我们被押到时，天已大亮。操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专员、书记讲过话，法院××庭长就一个挨一个地通过高音喇叭喊“把反革命恶霸地主×××带上来”之类，一共喊了三十多遍。整个场子沸腾了，解放军战士两人一组，一手持枪，一手架起坏蛋们飞快穿过人海正中的小道，跃上临时搭的木台子。

沈云山就站在我旁边，好几年不见了，神采奕奕的他已皮包

骨头，形同厉鬼。几轮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后，开始宣判。有19个死刑，沈兄在其中，罪状是特务、颠覆、破坏等等。

宣判我时，刚好接了一轮口号，我竖起耳朵，不知咋的，竟误听成死刑了。沈云山瘫在台上，又被拽起，我没瘫，却骇出尿了。接着天蓝地白，云里雾里就去了法场。解放军比民兵专业多了，一声口令，各就各位。射击前，战士自己检查了不算数，带队军官还过去一一拉枪栓，确认无漏洞。子弹也在皮鞋帮上摩擦几遍，方咔嚓上膛。接着分两轮执行，即甲组上前三步，一齐平端起步枪，啪啪射击完，马上后退，再由乙组重复补枪。沈云山不经打，一枪就进坑，那解放军后撤时，还吹了吹枪口的青烟，歪头对战友笑了笑，很得意。

我跟前也有一坑，但枪口只在我背心点了点，就迈过去了。我几乎死了，直到周围响过枪，又平息了一阵，才慢慢活转来。松绑换铐时，我接到了判决书，原来是无期徒刑！

我先在宜宾监狱服刑，62年转到新疆塔里木××农场，65年又转回重庆弹子石的省二监。如此煎熬了大半辈子，还总是梦见沈云山。虽然我没害过他，但感觉对不住他。这叫啥子阶级斗争？不分青红皂白，错杀了多少好人！

老威：是啊，没有沈云山，您恐怕早累死病死在壮丁营里了。

羊定清：直到改革开放后，监狱不那么左了，我才敢在申诉书里讲讲当壮丁的悲惨遭遇，说一点沈兄的好话。可惜死无对证，没人相信我会受国民党欺压。

老威：您是《扫荡报》记者嘛。

羊定清：可笑可叹！

老威：老先生冤狱几十年，也不知咋过来的？

羊定清：千头万绪，理不清。

老威：您是读书人，曾经有过抱负，总不至于像普通犯人那

样浑浑噩噩地混吧。

羊定清：我对国共两党均无好感，生不逢时，岂能言他。

老威：但您仍然申诉了 20 多年，不甘心嘛。

羊定清：我能苟活至今日，全凭母亲的教诲。年轻时，父母含辛茹苦供我念书明理，等不及回报，就逢改朝换代。家破人亡，劫后余生，曾是当地大户的羊氏就剩下孤儿寡母。我身陷囹圄，母亲四处打听，终于在 1953 年的春节亲自到监狱墙外，给儿子送进她亲手缝制的冬衣！从高县乡下到宜宾，上百里水路，有时船工同情她，愿意捎带一程；但更多的时候，她老人家拄根棍子，拖着小脚，走五、六天才到。母亲初识几个字，见不着儿子，就寄简单的信进来，她总是写：“儿呀，有妈在，你千万别想不开，你想不开，妈也要想不开了。”

1954 年端午节，母子终于通过接待窗口见面，她递给我两个青鸭蛋，就边摸我的脸边流泪，说不了一句话。连旁边的张管教都看不下去，转过脸，叫里面的人打开门，放母亲进去。

母子俩坐在一条板凳上，老人家就抖着手剥蛋，喂给我吃，我推开，反过去喂她。接见时间结束了，张管教才开口劝说：“羊定清，好好改造，莫惹你母亲难过。”

在我发配新疆以前，母亲每三个月必来探监。也不晓得她一个人在外面咋活的，可总给我送来一点吃穿：两个饼、三个馒头、两个蛋或一两件衣裤。那时我还年轻，总盼望着某一天出狱，能守在母亲身旁尽孝。我们这辈人，受的传统文化熏陶，孔夫子的忠孝仁义已入骨髓，所以，将来为母尽孝也作为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

母亲第一次探监才 50 多岁，满头青丝，身板硬朗，直到 1983 年，她探了 30 年的监。新疆太远，她没法去，只好仍去宜宾，在监狱大门口哭诉了三年，狱方多次出面解释，但她下次还去宜宾

探监。也许是母子情感动了劳改系统，我三年后又破例转回四川，重庆虽比宜宾远，但见面总要容易些。

老威：您的母亲太伟大了。

羊定清：谈不上，因为血缘无法选择。在牢里，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扛不过两三年；上了五年不离婚，就算世界奇迹。所以犯人刚进来时，探监送东西的几乎都是老婆孩子；过一段时间，老婆孩子来得稀了，你如果在外头人缘不错，还有三朋四友探望；再过些日子，朋友也不来了，只剩下母亲，年复一年地惦记你，探望你，只要她还能走得动。所以牢里的长刑犯都明白“娃儿是娘心头肉”这句话。

老威：您母亲还健在么？

羊定清：如果健在，我就守在家中，再冤也不上访。我出狱的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她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如果日子安乐，老人家可能要活 90 岁以上。可惜我在重庆坐牢时，她每探一次监，就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还被收容遣送过几次，受了惊吓，脑子出了毛病。她活了 84 岁，死前还放心不下她快 60 的老儿子，怪自己没福气看见儿媳妇。

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采访缘起：杨成舍先生今年（2002）62岁，是和我父亲一起收听、交流“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同道。大约1999年的一个夏日，杨先生兴致勃勃地敲门拜访，向我父通报其儿子在电台朗诵“十分油爆的屠杀诗歌”。

刚巧我在，投缘之际，两代人各自谈起生活遭遇，竟相对唏嘘不已。比如我的户口自80年代迁出成都后，经历了调动、结婚、坐牢、离异，至今人户分离已近十年，给本人带来了无尽头的麻烦；而杨先生为我辈先驱，60年代就被当作“问题学生”踢出故乡，发配到边远山区接受改造，一波三折，逆来顺受，如今做“黑人黑户”已经二十余年矣。

据杨先生考证，户籍制度应追溯到2000年前东汉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在战火绵延之后恢复生产，把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捆回土地，就发明了“编户齐民”，即按登记在册的户主名字分配土地。“新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我提醒道。

2002年7月23日傍晚，我乘杨先生还书之机，企图做个采访，不料他摇头道：“不算冤，因为像我这种屡屡碰壁的黑人黑户，全国起码几十万；如果把从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也算上，就是一个填满各个城市的浩浩荡荡的流民大军了。”

我只好鼓动口舌，诱供不止。

杨成舍：老威先生，您这本《沉沦的圣殿》我慢慢翻了大半年，今天总算完璧归赵了。

老威：您若喜欢，就留下吧。

杨成舍：岂有借书不还之理？况且里面有收藏价值的文章，我已托人复印下来，比如第一章这篇《书的轨迹》，重点评述了文革前内部出版，供党政军高干当作反面教材去阅读批判的几百种黄皮、灰皮、白皮书（因控制发行，此类书籍没有单本的装帧设计，只笼统选用或黄或白或灰的单色作封皮——老威注），并列举了在高干子弟和知识青年中影响深远的四十多部，都是西方和苏联的文、史、哲名著。

老威：老先生不仅好学，而且勤思，佩服佩服。

杨成舍：您别戴高帽，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40年前，我曾经接触过其中一本灰皮书，叫《白轮船》，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薄薄的一本，前面还附有一篇大批判性质的导读。事隔多年，小说内容几乎忘了，但是那种凄美的描写和情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主角好像是个孩子，对，是用孩子的目光在看那人性和自然一天天毁灭的世界，“白轮船”是个象征。

那是1965年春天，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读四年级。借书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公子，与我同桌，在校期间就以江帆的笔名发表过诗歌和小说，是老师和同学都争相巴结的“贵族才子”。江帆放荡不羁，曾私下借黄皮书给好几个同学，都没出事，偏偏我鬼迷心窍，在上晚自习时看禁书，被班长告了密。

下课铃响，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辅导员和一帮班委给拦住了。《白轮船》从书包里搜出，人赃俱获，我只得招认是江帆主动借的。众人一听，哑了，辅导员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不管谁借的，你在上课时间偷看反动书籍都是犯罪！性质说严重点，这和收听敌台也差不多。”

我被吓得脸色发青，就心虚地辩解说：“江帆看过许多这种

书，他家里还多的是，你们咋不去搜？”

辅导员一楞，答不上话，班长却心直口快：“杨成舍，厕所照，人家是哪一级，你是哪一级，人家的爸爸是领导干部，打过小日本，打过国民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自然就高，能从这种反面教材中吸收反帝反修的政治营养，你呢？”

我嘀咕说：“我咋个？我家也是城市贫民嘛。”

班长嘲笑说：“比革命干部出身差了几个等级。”

我反驳说：“马克思说过，革命就是要消灭等级，消灭三大差别。”

班长不屑一顾：“强词夺理！反正同一个东西，江帆爸爸能看，你不能看，看了就犯法。”

我气坏了，就争吵起来，辅导员厉声制止，并且指出：“你要深刻地检讨，一份不过关，就重写一份，直到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注意，检讨时只谈自己，不要牵涉别人！眼看要毕业分配，希望你不要把污点带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老威：什么意思？

杨成舍：威胁的意思，虽然当时学校没搞运动，但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紧。辅导员把《白轮船》搜去，亲自奉还江帆。从此江帆不再理睬我，他可能猜想我告了密，恶报了他的启蒙善意，而我却为此，一遍又一遍写检讨，最终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被分配到川北穷县盐亭境内的柏梓区（文革时更名为柏梓公社）教乡下中学。

柏梓中学坐落在一个山坳里，闹土改时，没收了当地一个乡绅的地产，包括大小两座四合院、鱼塘、晒坝和周围的田地，并增建了礼堂、教工宿舍和两层教学楼，就成了方圆百里最大的开放式学校。我所指的开放式，一是学校没围墙，与农田农户没界限，课堂外的树荫下常栓着牛羊，操场上常晒着粮食，礼堂的一

半也做了生产队的秸秆、柴禾库，出没着钻来钻去“打游击”的农家小孩；二是柏梓区及相邻的黑坪，安家等数十个公社的生源都集中到这儿。一开学，只见四面八方的山梁子上，一串串学生背着米面红苕豆类，上坡下河、风尘仆仆赶来，真是毛主席“五、七”道路的最好样板；三是这儿离山垭的柏梓场口有五里之遥，并且全是三倒拐的上坡路，还要经过一片较大的荒坟地；四是师资力量在县境内算相当强，1965年秋天我报到时，一打听，暗暗吃惊，原来校内藏龙卧虎，不仅有我好几位校友，还有重大、川大、西南交大、川外、政法学院、川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体院等20多名大学生，占学校教师的70%左右。同是天涯沦落的“臭老九”，大伙见面，都对自己如何发配至此讳莫如深。

老威：这有点像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的“三闾大学”，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方鸿渐、赵辛楣等一帮读书人千里迢迢去了，才发觉这儿“人材济济”什么都有，连“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都有。

杨成舍：现实不是小说，三闾大学虽地处偏远，校风虚伪可笑，但来去自由呀。这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国民党再怎么混蛋，也没有用一个户口本把你死拴在一个地方，不愿伺候了，拍屁股走人，天下大得很，何愁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所以方鸿渐等人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湖南。就是远涉重洋也没啥，战争嘛，国民党想管也管不过来。但是到共产党手里，户口随工作调动而迁移，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市人，祖宗几辈都在川西平原，却突然之间，仅因为看过半本禁书而被发配这么远。可时代就这样，你撞上了，就得逆来顺受。柏梓中学实质上是农业中学，有果园、菜地、鱼塘，师生们一日三餐除了主食，其它都自力更生。那年头，文革一天天临近，升学率早就不是衡量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所以除了上午的正课，下午多半就是劳动，担水挑粪，喷药下塘，

老师都得身先士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名义上我是数学老师，但整天一身泥一身汗，改造资产阶级臭思想。那阵评价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劳动，铁人一般无休无止的劳动。校长是本地人，大学毕业，学邢燕子、董家耕回乡务农，娶了个苦大仇深的雇农后代，生了三个孩子。他三年前走马上任，正逢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他拎着两只亲手打造的大号粪桶走上讲台，提出要把学校建成“革命的花果山和米粮川”的口号。校长总是嫌我的粪桶太小，直到某一天，我被炎炎烈日晒晕在地里，手里还下意识地死抓住扁担。

文革初期，县文教局派工作组下来，指导“校内闹革命”，校长、书记、主任、团委和学生会串通，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开始对出身剥削阶级或有政治把柄的师生进行审查，教师中一大半落马，我的问题也从档案中被抖出来。开罢全校斗争会，就戴高帽游乡，前面有人敲锣，历数罪状，跟电影中斗土豪劣绅一样。

接着就在烈日下围着操场长跑，十多个臭老九排着队，有人手提棍子，站在树荫下喊“一二一”。操场中间，晒着豌豆，脚的落点稍偏就踩着豌豆，人啪地摔得硬梆梆的。跑了一下午，每个人都散架了，鼻青脸肿，幸好那时都年轻，腰腿伤了，内脏还好。

稍后晴天一声霹雳，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工作组转眼成了刘邓路线派来的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手，我们挨过整的这伙人，立即响应号召反攻，组成造反军，把校长、书记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夜揪出来，如法炮制，以反对毛主席的名义，游他们的乡，戴高帽敲锣，也像演电影。

接下来的半个月也是围操场长跑，一整天一整天，不管天晴下雨、刮风打雷，就是不让他们停下来。校长比我们长十多岁，熬不过，累垮了，瘫在雨地里，被揍得遍地打滚都不起身。

老威：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杨成舍：我趁大串连之机回成都待了一个多月，每日去红卫兵接待站免费用餐，如同过节。然而好运不长，当我在“浩荡东风”鼓舞下回校不久，又被造反派认定有散布反动书籍的“历史问题”，开除出组织。

这一来，我又成了走资派校长的狗腿子，陪斗陪跑。我熬不下去，就逃回故乡。不料才一个星期，学校的红卫兵就拿着介绍信，跟踪追击，并会同街道派出所民警，以查户口为名，将我连夜捉拿，押送回户口所在地接受监督改造。

大约是67年2月镇反之后，四川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先并肩打垮保守组织产业军，接着内部又分裂成红成和8·26两派，势均力敌，拉开真刀真枪的武斗序幕。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在几起几伏的欢呼声中，人民的注意力由批斗牛鬼蛇神转到保卫红色政权，柏梓中学也卷入，时常在半夜一声哨响，全体师生摸黑集合，跑步、爬坡，去柏梓场口外挖断公路，设埋伏，企图迎头痛击从邻县梓潼来犯的红成派。

直到71年林彪爆炸前后，我等臭老九都比较逍遥，种蔬菜，打扫卫生，渐渐也排几节课。闲下来，几个人也能凑一块，打电筒去田坝抓青蛙，或星期天沿着水沟摸鱼捉蟹，改善伙食。日子混久了，想法就多，苦闷、无聊，因为转眼间，我们这批大学生都已30岁左右。高学历的光棍在山窝里不好弄，找女生犯法，找女农民，人家还瞧不起，时代风气，臭老九掉价，特别是我这类有历史问题的。

老威：你们不设法在成都解决个人问题？

杨成舍：痴人说梦，大城市户口多值钱，会嫁给山区户口？况且，回家要请假，要开介绍信，否则住在父母家也不保险。70

年暑假，我好不容易被校革委会准假，却把介绍信丢在长途客车上了。搞得我心神不定，在成都找同学借宿，东一晚、西一晚，做贼一般，自卑的心态，搞啥对象呢？

老威：你爱人看上去比您年轻。

杨成舍：她是中学旁边刘家院子的农村姑娘，只读过村小。当时院子进门的过道，安有一架榨面机，桂芝就成天围着榨面机忙碌，做挂面和切面。我们几个人都常去献激情，和面、绞面滚，将刚出的湿面条挂到太阳底。桂芝当时 19 岁，媒婆把她家门坎都踢断了，况且还有成都体院的老贺、西南交大的老李与我竞争。桂芝的脸红扑扑的，眼睛像豌豆角，笑起来好看。我以为她看不上我，还隐瞒了岁数。

桂芝的父母贪图小恩小惠，我就写信让父母省下票证，先后从成都捎来春燕牌纸烟两条，红糖两斤，固体酱油两封，细盐巴三斤，高粱饴软糖和水果糖各两斤，的确良衬衣两件，等等，分期分批贿赂，在物质匮乏的 70 年代初，这些都是根正苗红的当地相亲户所无法办到的。“名声是臭了点，”桂芝爸在面对同村人的质疑时回答说，“但好歹是拿工资的人。”

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这帮怀才不遇的臭老九，恍眼都 30 左右了。故乡回不了，只能削尖脑袋在本地找对象。于是“老师追村姑”成了柏梓区的旷古奇闻，还上了县文教局的内部报纸。老贺比我大两岁，31，却自称 26，逗得农村的老娘们抿嘴笑，因为他教体育，晒得像非洲黑人，谢顶也早，恍眼还以为是两个孩子他爹。

桂芝慎重地接受了一盒雪花膏，算承认与我要朋友了，一个周末傍晚，我俩一前一后地转田坝，遇一水沟，我先跨过去，回手牵桂芝，趁此机会搂了她一下，就被眼尖的贫民代表（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驻管理学校的庄稼汉——老威注）从远处瞅见，

他长声吆喝着赶过来，指责我“耍流氓”，我以“自由恋爱”反驳，老汉气得跳脚。“爱你妈个屁！”不由分说把我拽回校开批斗会。

学校“农家恋”成风，老农要杀一儆百，却没人站起来发言。老农下不了台，就将我隔离反省一星期，命民兵严加看守。老农自己去做桂芝工作，要她揭发我“作风败坏”，桂芝含羞叫冤，桂芝爸却叉腰站门口为女儿撑腰：“败坏你妈屁！你两代贫农，老子还是三代贫农呢。你造反动舆论，搞得我家黄花闺女莫法嫁人，狗日的阴险！”

两个庄稼老汉边骂边从刘家大院揪扯出来，站到学校操场去对阵，终于发展到解裤腰，亮家伙，让对方“啃了”。桂芝在家寻死觅活，被她的妈和弟抱住。事情一闹大，挨了煞威棒的贫农代表就叫人写了检举材料，亲自到区上汇报，要求政府将我“劳改”。不久，文教局派专案组下来调查，所有的人都证实贫农代表的确当众脱裤子，给毛主席抹了黑。

解除隔离恢复上课后的一个星期，我就用三盒春燕烟哄着贫农代表盖章开证明，与桂芝扯了《结婚证》。当时她只有 20 岁，生产队替她虚长了 3 岁。因为在山区农村失节事大，两人“流氓”都要了，就“降价处理”吧。吃喜酒时贫农代表不请自到，与桂芝爹你一杯我一杯，称兄道弟，原来这老汉是个不长记性的炮筒子。

老威：看您的模样还有些得意。

杨成舍：若不是贫农代表横插一杠，婚事还进展不了这么快，要论桂芝的年龄、长相，学校十几个未婚大学生要流口水，他们的对象都不如桂芝。老温的爱人教村小，都 25 了；老顾的婆娘特横，婚后，经常从坡上冲下来找他，与水牛一道立在教室外；倒霉的体育天才老贺，干脆就找了蒙家山上带一孩子的寡妇，就扎根在那儿了。

老威：您好歹回来了。

杨成舍：现在户口还没迁，一晃 30 多年，柏梓中学都撤了，操场、宿舍、教学楼都变农田了，我还没迁。大约是 1972 年，桂芝生了儿子杨都，由于生活较拮据，我就趁暑假，在生产队平价收购些鸡鸭和布票，搭便车回成都变卖，吃些差价。有一次，我在沙湾铁二局外面交易时，被市管会的人抓了。同时被逮的有十几个人，我因下意识舍不得鸡鸭，就闯了大祸，“投机倒把”的帽子稳稳戴在头上。

我被押回盐亭，依法判处三年劳教。掐指一算，我倒卖了两只鸡两只鸭一丈布票（还有四尺被从裤裆里的睾丸下面抠去），赚赃款 200 元左右，扣除成本，得 110 元。

75 年刑满释放，由于劳教属“人民内部矛盾”，公职没开除，教书的资格却取消了。我被降级留用，做学生伙食团的会计，直到 1978 年。

当时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心思动，我再也待不下去了。78 年底，我领着一家三口，逃难一般回到成都父母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住不下，我又找同学故友租房，先是免费住别人的单位宿舍，后来因清查人口，就搬到东郊红瓦寺 23 号，8 平方米，啥都没有。三个人睡地铺，剩下就一张桌子两条凳。

老威：太落魄了！

杨成舍：再苦也不走回头路！我找了个临时工。在东门外背河沙，几毛钱一个立方。一天要干 15 小时；稍后又两口子合拉板车，一分一厘地挣钱，像毛主席说的，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不读书不看报，比摆烟摊的大肚汉还瞧不起文化。

然而，我们在红瓦寺住了半年，还是被赶了出来。因为户主和房产折子是其它的名字，我们是“黑人黑户”。半夜两点多钟，

我和桂芝被查夜民兵带到派出所，在黑屋里冻了一夜。幸好父母还健在，他们接到通知，就揣着罚款和街道办事处的证明来领人。毕竟还是换了天子了。若是从前，又得遣送回原籍。

这些年，我们不知被查过多少次户口。直到 93 年，父亲去世，老屋也拆迁了，我才搬回去，与老母合住一套。我已办了 20 多个《暂住证》。儿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还要在自己家里暂住下去。

老威：您去迁过户口么？

杨成舍：原来很着急，特别是桂芝，还是农业人口，一天到晚埋怨，催我托关系，找门路。七、八十年代，大城市的户口政策是进一出，铁板一块。单位一再来函或托人，要我回去教书，县教育局也来了个科长，说要考虑给我平反涨工资。我啥都不要，那块伤心之地，毁了我一生。我就黑下去，只要不偷不抢不违法，能咋样？

老威：您就一直干体力活儿？

杨成舍：也代过两年课，高考补习班。后来用父母的户口办了个杂货店，桂芝经营，我当采购。经常登货三轮，身体反而比教书匠棒些。

老威：孩子呢？

杨成舍：我有同学在中学里当教务主任，多出点钱，就能升学。杨都小学只读过两三年，发蒙时我亲自买课本教的他。

老威：现在办户口简单多了，您也该叶落归根吧。

杨成舍：一个人要交 15000 元的城市建设费，两个人就是 30000 元，太黑了。这么多年都耗了，一把老骨头，骨油榨干无所谓，我总要熬到自由入户，自由成为成都人的那一天。况且，粮油关系取消了，票证消失了，户口也没过去那么值钱。

人生，人生，咋说呢，连梦都不是。我现在没梦做，想都不敢想这辈子咋混过来的。

戍边女兵之子刘思湘

采访缘起：两年前，我去河北某市的石油公司总部拜访一位旧友，其父在设宴款待我时说：“老威您听说过新疆军垦老兵的故事么？”我摇头，这位出身西北的前副总经理接着说：“有机会，我安排您去南疆看看，那儿还有些王震的兵，50年进疆，就死扎在戈壁滩，如今七、八十岁了，连火车都没见过。”

酒桌上的话不算数，两年中，我与河北旧友通电话数次，可从未听说他的爸爸准备兑现承诺。直到2001年12月18号，我在成都巧遇十多年前的熟人刘思湘，我与他同代同龄且同行，却不晓得他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母亲。

“两年前的话题总算有了个开头，”我感叹。

“几十场悲剧中，也可能有一场喜剧，”刘思湘边在我家喝茶边对我说：“所以我妈的拉郎配结局还算圆满。”

老威：大约两年前，我去河北××市拜访一位老朋友，无意间了解到20万人民解放军西征新疆，并扎根戍边的一些故事，当时说不出啥滋味，嗯，百感交集吧。

刘思湘：您的朋友多大岁数？

老威：你我的同代人，40来岁，也写诗，在石油部门做党务工作。

刘思湘：他能知道什么？

老威：他的父亲是一位厅局级离休干部，80年代中期，从新

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回河北老家。老人家 50 年进疆，一扎就是 36 年，可以称得上是南疆通了，故事一筐接一筐，倒不完。我与他一见如故，在饭桌上聊了一下午，可惜我酒量太小，老人的话匣子才刚刚打开，我已醉得迷迷糊糊了。我感觉他似乎在几丈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说，18 岁投军，一门心思地打日寇，打反动派，入疆时升到副营长，都 25 了，还没讨老婆。清一色的硬梆梆的光棍汉，乘着敞蓬大卡车，浩浩荡荡往西挺进，挺进。戈壁的风像刀子，明晃晃的，哪怕军大衣裹得只剩鼻子尖和嘴，可还是叫割出一道道血口子。后来公路没了，就下车步行，累垮的人骑骆驼。到了焉耆县，部队休整一天，又继续行军，过了库尔勒，沿塔里木河走，还不能停。千里戈壁滩，一浪一浪起伏的沙丘，骆驼偶尔悲鸣一声，撕心裂肺。幸好都是革命军人，有理想，不悲观，依靠铁的纪律终于抵达目的地。白手起家修水库，放下枪杆握锄头，战争军人全部转为农垦军工，多数西征的老战士就永远留在异乡了。行路难，绿洲周围全是漫漫黄沙，他们像劳改犯一样，开荒种地，过几乎与世隔绝的兵营化集体生活。日子一久，人最大的欲望肯定是讨老婆，解决性问题。

刘思湘：你讲的这些，我早就知道，我爸当时就是二军六师的一个营长。大约三年前，我陪他最后一次回南疆，探望农场的老战友、老部下，死了大半，埋在大西海水库周围；剩下的寥寥无几，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几十年没出过百十里地，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真叫人哭笑不得。

有些忠心耿耿的退役老兵，还长期穿戴当年的戎装，胸前挂两三排军功章，走不动了，就拄着拐，坐在门坎上边晒太阳，边等候着某一天王震将军突然降临，安排他们回故乡，或回延安，回 359 旅垦过荒的南泥湾看一眼。他们唱了一辈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我爸爸和他

们灌了一夜酒，唱了一夜，心脏病都闹翻了。他们的妻室儿女看上去有当地蒙古族牧民血统，脸蛋红朴朴的，小孩连汉语都不利落，却一律会唱“向前！向前！向前！”

老威：王震将军接见过他们么？

刘思湘：王震已去世了，报纸也登了，但这些老兵，没啥文化，活得稀里糊涂。我爸爸也不忍心提醒他们，人没盼头，就像庄稼没阳光，蔫巴巴的。我想即使有人告诉王震死了，他们也不信，惹翻了，非提着棍子追着打你个报丧星。

老威：你有牧民血统？

刘思湘：没有，我妈妈是湖南人。

老威：湖南人？作战部队里有女兵？

刘思湘：说来话就长了，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在那个年代，只有党组织才有这个能力。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将来准备写个长篇。王震在解放军中以垦荒将军著称，抗日战争，就在南泥湾开荒，南疆比南泥湾大几百倍，需要往里填多少人？光男人不行，光棍对光棍，环境又恶劣，长此下去非撞出火来，兵就会变成匪，变成狼。王震当年肯定也是这样想的，怎么办？革命军队纪律严明，当然不可能有随军妓女，于是王震作为镇守边关的统军司令，亲自充当头号红娘，给他的老战友——湖南省省长王首道、省委书记黄克诚、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副省长袁任远等人写信，并派出二军六师政委熊晃作为“军婚特使”，先赴京拜望朱德总司令，借汇报新疆军区的工作，取得了尚方宝剑，然后下湖南遍访各军政高层码头，商定操办细节。

王震在致王首道、黄克诚的信中写道：“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紧接着，一场国家性质的骗婚案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新

疆军区招聘团”抵湘期间，长沙所有的报纸天天出特大号外：解放军征招女兵！参军去新疆！那儿紧邻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到处是俄文学校。新兵们可以选择学俄文，去苏联深造；也可以选择进工厂学技术，进文工队当文艺兵；还可以选择进苏式集体农庄，在绿油油的广阔田野上驾驶拖拉机……总之，按照人间天堂的构想，吹得天花乱坠。那时全国刚解放，人们渴望新生活，对苏联更是心驰神往。整个 50 年代，学苏联都是潮流，它的政治、经济模式，它的文学和歌曲，它的服装、交谊舞，深入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它的语言，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外语。所以，这场骗局可谓是对症下药，女孩子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哪儿痒痒，我就下手搔哪儿。于是，全社会迅速达成了共识：名额有限，得抓住机会！只要当上兵，去了新疆，所有的理想瞬间就成现实，出国也指日可待。

老威：太离谱了吧，人们还真相信？

刘思湘：你不知道那时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威信有多高！你是党员干部，你是军人，那么你的言行、衣着，甚至发型和眼神，都是年轻人效仿的对象，这相当于目前新新人类对明星的崇拜。特别是地主、资本家、旧军阀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找工作受歧视，在人前头也不敢抬，却突然间听说可以参军，学俄文，去苏联！脱胎换骨的良机啊！

老威：你的感触这么深？

刘思湘：我妈妈讲的。她出身于小资本家，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念书。她们班上有 30 多人报名，结果只录取了 5 人，大伙还挺羡慕。妈妈只有 17 岁，就虚报了 1 岁。她说我外公连续半个月天天起早，走两里路，去报馆抢购各种报纸，稍晚一点，“征兵号外”就卖光了。街坊邻里三五成群，袖着手，聚在街沿上议论纷纷。她怕家里反对，就先报名，后通报，谁知父母都很支持。

我外公还摸着她的脑袋，心疼地责备：“挤坏了吧？我已去过招聘团办事处，人山人海，排队报名的女娃儿拐了一里多路呢！你怎么不先给家里打个招呼？”我妈说：“新社会讲民主，自己的事自己办。”我外公叹气说：“我的成分不好，帮不上忙，但替你排个队总还行嘛。”

妈妈她虽报了名，也没抱太大希望，可过了十来天，学校接到通知，她被录取了！接着是非常简单的体检，她就算正式入伍了。临行前夜，一家四口都舍不得睡觉，就围着火炉扯家常。我外婆不断线地掉眼泪，外公却高兴地用小锡壶烫酒喝，还让年仅几岁的舅舅呷了两口。外公说：“珍儿光荣入伍，我家就成革命军属了，看来，新社会男女平等，共产党、毛主席说话算数。我这样的小资本，只要加紧思想改造，出路会越走越宽。”我妈妈忙点头称是，又安慰外婆说：“过一晌，我会请假回来看你。”外公严肃地叮嘱：“当了兵，就要守纪律，有志向！刻苦学习俄语，力争出类拔萃，早成大器，切莫重小家之情而轻国家大义！”

老威：你外公像个党的政工干部。

刘思湘：向组织靠拢是时代风气，所有家庭都一个样。你的父母还能例外？

老威：开个玩笑。请你继续讲吧。

刘思湘：1951年3月，经过两个月集训的3600多名湖南女孩子穿戴着崭新的军装，在父老乡亲的依依惜别中，在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中，从长沙登火车西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风尚，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都习惯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而女孩命中注定走不出故乡水土。“打破了封建传统，妇女彻底解放了！”各报纸都借此大做文章。

而一向门庭冷落的外公家转瞬热闹非常，贺客进进出出，宛如出了新科状元。大家天不见亮就到火车站送行。妈妈她胸戴大红

花，与同班的其它小女生一道挤出窗口，拼命挥手告别。车轮启动了，不过分把钟，她们这辈子就再也望不见自己的亲人。

抵达西安后就没有火车了，女兵们换乘敞蓬大卡车，继续向西；过了兰州，再向西，在一派荒凉中颠簸。一辆车坐40多人，都把背包垫在自己的屁股下。那灰头土脸的情景，与今日离开乡村外出谋生的打工妹没啥区别。

老威：这些女孩子没感觉到不对劲？

刘思湘：过了兰州就感觉到了，因为沿途停车休整时，地方部队首长都出面接待，并讲话，大谈革命和恋爱、婚姻的辩证关系，还一反惯常地严肃，扯些男女关系的笑话。开头女孩们懵懵懂懂，红红脸就过去了。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就对组织产生了怀疑。妈妈说，到了新疆后，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这时她们才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悟：为什么一个大军区的招聘团只收女兵？为什么征兵号外中反复渲染的“俄文学校”、“苏式农场”、“工厂”、“拖拉机”等等连影子也没有？越想越可怕，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周围全是荒漠，没有退路。即使有退路，你也不能当逃兵。部队有纪律，逃兵一律视为敌人，就地正法。

女兵们找到领队，有的还提出要面见招聘团团长熊晃政委。谁知领队铁板着脸，一口一个军事秘密。女兵们直截了当地问：“组织上会强迫我们嫁人吗？”领队回答：“不会。”又问：“去哪儿？苏联吗？”答：“不知道。”再问：“去干什么？”答：“军事秘密。”

在乌鲁木齐稍事休整，不准上街，不准单独行动。紧接着，一头雾水的女兵们就在组织上的精心安排下各奔东西，分散到天山南北，进入清一色的男性聚居的农场。据我了解，这是按部队连以上未婚干部的人数平均分配的。我妈妈所在的塔里木××场，离焉耆还有好几百里，是塔里木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一个整团扎

在这里，光棍汉少说有 1000 以上，而按名额分配去的女兵不足 20 个。

老威：这咋分啊？

刘思湘：妈妈她们被接到场部后，被安置在一排平房里，暂不与普通官兵见面。与此同时，新疆军区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有十年军龄，八年党龄的才能谈恋爱”，没这个条件，不准擅自找对象，否则就犯错误，不但不批准结婚，还要受到纪律处分。这个文件在全体官兵大会上公开传达了两次，就把绝大多数与妈妈她们年纪相当、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卡在了门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由恋爱是绝对行不通的，否则一个场 200 个女的也不够分。

老威：可是有《婚姻法》啊，我记得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就公布了有关“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法律。

刘思湘：在新疆，部队是个特殊的环境，与地方区别很大。比如生产建设兵团与自治区政府是同级的，都直接受中央管辖，互不干涉。那么地方讲法律，而在部队，命令高于法律，只能执行。你想想，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落入男人堆里，都按自己的心愿去自由恋爱，那不乱套了。所以，还得组织出面。

一开头，个别懵懂女兵还等待着分配革命工作，很快，局势就明朗化，她们唯一的革命工作就是见男人。先是座谈会，连、营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参加，师参谋长讲话，向姑娘们介绍手下的爱将：“王××！”立即有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从前排座位啪地起立答“到”。“脱衣服！”是！”

转瞬间，半尊铜塔凸现，累累弹痕触目惊心。参谋长大踏步走下来，把住王××的肩头旋了一圈，详细介绍了每处弹痕的来历，“这就是你们的团长！共和国的功臣！如果按封建社会那一套，论功行赏，他早就该衣锦还乡，回到湖南老家。不知道有多

少湘妹子会爱上这样的男子汉……是啊是啊，我们这样的戍边军人，如果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话，早就个个有老婆喽！但是，”参谋长提高嗓门强调，“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建设新疆，我们的青春被战火一次次洗礼，脸变黑了，心却明亮，在坐有许多像王团长这样的革命英雄，恋爱和婚姻都被耽搁和拖延了。姑娘们，你们爱这样的人吗？”

几十对喷着烈火的眼睛一齐转向蜷缩一块的女兵们，据妈妈讲，她们全被镇住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旁边的曼云埋着脑袋，泪水一个劲往下掉。首长再一次发问：“你们爱这样的人吗？”

在虎视眈眈中，女兵们轻声回答：“爱。”

“大点声！”

“爱！”

参谋长哈哈大笑说：“我们这农场好久没听说过这么甜的声音！吓破胆啦，姑娘们！虽然在座的个个都是战场上的虎将，可你们跟前温顺得像小猫似的，不信就试一试嘛。”

一场哄堂大笑中，新疆维吾尔舞曲响起了，参谋长亲自走到一个叫方菲的漂亮女孩跟前，两手一摊。方菲红着脸站起来，与首长一进一退舞了两回，王团长见大伙都楞着，就挥手发命令：

“同志们，上啊！”于是哗啦一声响，在荒原上焦渴坏了的狼们瞄准事先瞅定的小羊，扑了过去。女孩们来不及躲避，已落入壮汉们的怀中。军官们多数出身农村，文化低，在战场之外，见的世面太少，所以对跳舞这种新鲜玩意，过去一直认为是“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有首长领头，大伙就磕磕绊绊地跟进。聪明点的，就搂着姑娘依样画瓢，互相踩几回脚，也能跳出个模样来；狠一点的，就箍着女的不吭声，直到都气喘如牛；还有的干脆把人家兜屁股抱起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碰撞。我妈妈说，爸爸算是最笨的，他把住妈妈的腰，腿动不了，脖子却拧过去喊：“报告首长！怎

么跳啊？”

首长把方菲让给团长，就过来做示范，然后猛拍爸爸的背：“想咋跳就咋跳，总之要先动起来！”

舞跳到夜里十点，军官们还搂住姑娘不放。参谋长却停了舞曲，宣布散会。团部警卫员进来取下汽灯，并护送女兵回房间。走过空地时，她们能感觉到周围营房内众多热辣辣的目光，不禁加快脚步。洗漱躺下后，她们就头碰头地埋在被窝里，拉起了悄悄话。曼云是妈妈同班同学，生性活泼，喜欢梦想，所以她先开口：“不行，一点浪漫都没有！跟我跳舞的刘连长，都26岁了！我才18岁哩。”妈妈说：“对，我们参军来新疆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找叔叔伯伯辈的。再说这么早就谈恋爱，家里也不会同意。”邻床的李小宛附和说：“对，要找也要找个年龄相当，懂点礼貌的，哪能上手就死抱着？”曼云说：“我们要向组织反映，培养感情有个过程，不能刚到就谈婚论嫁。”妈妈说：“那我们一起要求上俄文学校。”方菲噘着嘴说：“别做梦啦，党叫嫁就嫁吧。”曼云说：“英雄团长看上了你嘛，虽然他已一大把岁数，能做你的爸爸了。”方菲哇地气哭了。妈妈说：“大家都是落难姐妹，曼云你咋这样说话？”曼云也哭了，大家蒙头哭成一团，还不敢声张，只好各自咬着手背。方菲抽着气说：“革命就是这样干的？还不如死了干净。”李小宛说：“你死了，我们咋办？你在长沙的男朋友李××咋办？”方菲说：“现在自身难保，哪里顾得上他？”曼云机灵，立即截断说：“我们都千万别在组织跟前提男朋友的事！免得害了自己，还连累别人。”而不开窍的李小宛却坚持说：“怎能对组织撒谎？我一定找领导说说内心话，结婚是终身大事，只有双方中意才行。”

她们说着哭着，天就朦朦亮了，兵营的晨号咣咣一吹响，临时班长蒋碧春就敲门唤起大家。早餐毕，又到礼堂开座谈会。团

政委简单讲了几句话，就让大家“自由交往”。由于是大白天，军官们拘束了许多，只是嘿嘿傻笑，没人主动到姑娘堆里来。又不能再跳舞，怕动静闹大了，引起战士们的反感。所以，不管领导如何动员，场子依旧冷清。有一次，×营长挑头走到姑娘这边，人家却挤得紧紧的，连针也插不进。×营长是东北人，臊得骂了句“妈那个巴子”，就在大家的起哄中败下阵。

自由交往行不通，一对一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全面开展了。军官们先把相中的对象汇报给组织，然后按级别，师长给团长找，团长给营长找，以此类推。如果几个人同时看中一个，那就下级服从上级，同级则比军龄和党龄，绝不含糊。

弱女子们被“包办”下来。所谓谈心，就是熟悉未来丈夫的情况，媒人们全捡光明面，吹得天花乱坠。一天两天，五天七天地磨，一些姑娘的耳根子终于软下来，叹口气，提出与对象见面。也有心眼死的，车轮战术也攻不下来，就干脆下“最后通牒”——这是革命的需要，不嫁，就是阶级立场、感情问题！可怕的是对象年龄太大，或相貌偏丑，怕你见着不乐意，就干脆躲着，直到组织上代办了《结婚证》，布置好新房，把两个人朝里一推，反锁房门。一拨汉子挤在窗外听动静，乒乒乓乓，坛坛罐罐全砸稀烂，还有哭闹、叫骂、寻死觅活，直到呼哧呼哧地干出响来，大伙方捂着嘴笑，知道生米已煮成熟饭啦。

老威：这叫强暴啊。

刘思湘：这叫“先结婚，后恋爱”，或“党叫干啥就干啥”。时间长了，在荒漠里待久了，新婚之夜这点创伤不知不觉就弥合了，特别是生了几个孩子，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老威：没弄出点意外来？

刘思湘：3600多个女的，不可能个个都顺利。也有逃婚，被追回来，关几天，到头来还得嫁人。在××农场，还有新郎把枪

亮出来，搁桌上吓唬人的事。可新娘子不信邪，还闹，枪啪地就响了，把窗外的人吓了一跳，急忙开锁进屋，见新娘子傻在那儿，下身光溜溜的，地上一滩尿。新郎还张牙舞爪的，团长命令缴了他的械，押回禁闭室反省清楚了再成亲。还好，只擦破了新娘的耳朵，没出大事。

老威：后来呢？

刘思湘：后来新娘的脑子出了点问题，一见新郎就筛糠，就小便失禁，不过，都是一时的，过一年半载，肚皮整出了怀，记忆就淡了。

最不幸的要数妈妈的同窗李小宛，对象是营长，骑兵出身。新婚之夜，她才发现新郎的脸上和胸上都有刀疤，一激动，就鲜红鲜红的，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狰狞。李小宛万念俱灰，听凭他吹灯上床。新郎凑过来接吻，她一偏头，那边嘴落空，就火了，竟卡住她脖子一顿乱咬！李小宛逃不了，躲不开，大喊救命！新郎却使枕头盖住灭口，用力过猛，她就昏死了。

还好没出人命，第二天，她从新房跳窗逃出，找团政委汇报情况，营长因此被降级留用。而李小宛在农场也待不下去了，只好转到别处，草草嫁人了事。

老威：你妈妈还顺吧？

刘思湘：她的运气不坏，遇上了我爸，人老实，没有强迫她。新婚之夜，爸爸坐了半宿，让妈妈考虑能否跟他过一辈子？接着，爸爸又扛了两三晚上，妈妈的心肠就软了，觉得他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所以吵架时总能让着她。文革期间，农场也造反，妈妈被查出家庭成分不好，就挨斗。还是爸爸把她从黑屋里救出来，连夜驾车去库尔勒，躲进军区老战友的家里，才免了一劫。

老威：现在他们还好吗？

刘思湘：爸爸去年已去世了，剩下妈妈和妹妹一家住在乌鲁木齐。妹妹是学医的，从军区医院出来后，自己开了家门诊，生意还不错。我写东西，最受妈妈疼爱，总给我唠叨些过去的事。本来我以为人老了会落叶归根，就陪妈妈回了趟长沙。可老家已经没人了，四处打听，也没结果。我估计已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或因出身不好，死于文革。街道也变了样，老地方彻底蒸发了。不知道妈妈 50 年代回去过没有？那时我还小，没记忆。

老威：你的哥哥姐姐呢？

刘思湘：他们一个在自治区当官，一个去了深圳，估计都失忆了。妈妈说，连个熟人都找不到，故乡就成了虚幻。当年一道进疆的姐妹，都退休了，大半留在乌鲁木齐。妈妈在那儿熟人多，关系网宽，不那么孤独。

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采访缘起：74 岁的曾氏是我早年文学上的引导者之一，为人正直，长于理性思索，她练上法轮功，实在令人震惊。

于是在 2000 年 3 月 8 日，妇女节的下午，有了这次谈话。曾氏说，我是练功同行之外唯一的登门拜访者。她还提醒我出门当心长“尾巴”。

真是风雨飘摇，世事难料。

老威：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

曾氏：97 年底。那时你方伯伯刚刚去世，他活了 70 多岁，没过几天舒心日子，临终还摊上个肺癌。你想象不出一个人竟会受这种罪！一米七五的个头，就剩下一堆骨头架，轻飘飘的，连我这个虾米老太婆都抱得动。喘气要忍，咳嗽要忍，忍不了，轰轰出声，血就一口接一口朝上翻，手脚抽搐，把我都弄成血人了。唉，反右、四清、整风、文革，老方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风浪，已习惯了在厄运中苦撑苦熬，可这次，他几十年炼就的意志力彻底垮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拔氧气管自杀。后来连护士都害怕，只有我死死死死掰住他。注射大剂量吗啡，他会安静两小时。我感觉在似睡非睡之间，他眼缝里的红眼珠还在瞪我，瞪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的心在痛，老泪纵横，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还以为泪都干了呢。咋会这种结果？清高、正直的老方咋会是这种结果呢？

50 年代到现在，文学界一直是一潭浑水，几代文人都在里面

搅，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原来还指望“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可后来，或左或右的运动多了，你才发觉，世道千年，甚至万年不变，总是风派人物吃香，吹牛拍马，卖友打小报告的吃香，管他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余任何党，中国人天生就喜欢这个。老方要做正人君子，没人拦，但渐渐就落得孤家寡人。平反恢复工作没几年，原来一起挨整的老朋友也疏远了。掌权的永远是掌权的，老方认了，只能成天待在家，钻研《二十四史》。出差开会也躲，他不花国家的那种钱，大鱼大肉使他便秘。

终于熬到头了。我守了他半个月，偶尔女儿也进病房探望，她是诗人、作家，支过边，原来的作品还有真情实感，可现在，生活压力大，就埋名隐姓写烂电视剧，一集七千元，钱挣疯了，对临终父亲的安慰话也不地道，听起来像流行的台词。这不能怪孩子，我们这代人艰苦朴素，认死理，从物质上，没给下辈留下什么，所以她们就实用一些。过去整她爸的那批人，现在都在台上，照样拉帮结伙，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因为在台上，所以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朋友，一起搓通宵麻将，一起上电视谈些鸡零狗碎的休闲话题，这就叫“文化优势”，或叫“赢家通吃”。

老方去了，他坚守了一辈子个人道德，可最后连女儿也失去了。我空落落的，一个人在这大房子里转。墙上挂着老方的遗像，床头摆着年轻时代的相册，隆冬将至，就添几枝老方生前喜欢的腊梅花。这就是一个老编辑的退休生活：总是回忆、回忆；总是生病、生病；吃药、吃药。

大概有好几个月，我在家像幽灵一样，煮一锅饭吃好几天。老方的骨灰葬在龙泉驿他的老家。我老是梦见那公墓，像儿时的台阶，我坐在台阶上，感觉到处都是老方。楼下的老白，过去与我同一编辑部，退休了，渴望出名的年轻人也不登门拜访了，他就养花养猫，还写诗感叹“人不如猫”。这也叫一代老人的精神生

活。

我的病越来越多，腰、腿、颈椎、心脏、血管、肾脏，轮番折腾。这台老机器，医院有啥办法呢？换换这儿，补补那儿，维持下去：这就叫科学！老方就死于这种修理身体的科学。快崩溃了，修理不了，就打吗啡，那时医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止痛。我怕病，我不能像老方一样。在文化界没朋友，我就经常出门走走，街头巷尾，卖报补锅的，都凑过去谈几句话。

老威：你女儿与您住同一座大院，来去挺方便嘛。

曾氏：她与我楼对楼，可十天半月见不着面。几分钟的路，也打电话，给人感觉比北京还远。她在电话里总是说：“妈，请个保姆嘛。”这不是请不请保姆的问题，我还能动呢。

老威：于是您就练上法轮功了？

曾氏：有一天傍晚，我到《四川日报》后面散步，正好碰见几十个法轮功练习者，整整齐齐的几行，在一面墙前打坐。当时寒风刺骨，我身上穿毛衣、棉袄，外头还裹了件羽绒服，可仍把脖子朝里缩。练功的人中，中老年居多，他们居然都是运动服，脸色也比我红润多了。我曾经练过气功与太极剑，你方伯伯在世时，还嘲笑我，这么没耐性的一个人，咋能练成气功？果然，我练了半个多月，就坐不下去。不是没耐性，而是心不静。你想想，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自由、民主、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这些东西像变戏法，东一阵，西一阵，牵着我们的鼻子在时间里赛跑，最后，没人牵了，我们反而迷失了方向。真是见鬼了。不想则已，一想，或多想，就心烦意乱。而气功要求什么都不想，只靠一个意念，强制性收摄心神。这不行，至少我不行。幸好我没继续练气功，否则走火入魔，就糟了。说不定会跳起来，给自己一刀。太极剑的原理与气功大同小异，我练了一阵子，眼睛就动白内障手术，把剑带进病房，瞎头瞎脑

地练，剑头差点刺着邻床病友的鼻子。不行不行，我与这些东西没缘分。

法轮功不一样，我不知不觉站了半个多小时，被一种氛围罩住了。这时，有位中年妇女从坐垫上站起，笑着招呼我“大姐”。我说我女儿和你一般大。她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亲姐妹，我早就在注意你了。我说练功不能有杂念，你这样当心走邪。她说大姐你是练过功的？却不晓得这法轮功与传统的任何气功都不一样，它不以消灭人的意念为目的，你尽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事练功。我原来也与你差不多，死了丈夫，丢了饭碗，前途渺茫，心智一堵塞，就害病，下半身麻痹，几乎就起不来床。自从练上这功，老师就在我的下腹装了一个法轮，你看墙上那张图，那就是法轮静止的模样，它一旦转动，就24小时不停，哪怕你因为杂事缠身，没功夫来这儿，法轮一样带动着你，达到“法练人”。你看我，两年多没吃一颗药，病全好了。业力消了。

我问何为“业力”？她说是前世带给你的病根。消除病根，就叫“消业”。佛教你“恶业”，又有“孽障”之说。法轮功吸取了佛教的循环论，也吸取了道与儒的优点，但去掉其被动的因素，达到真正的“普渡众生”。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业力在你体内，像许多虫子渐渐长大，分爬开去，啃嚼你的各个器官。再加上现实社会、环境污染、空气浑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尘土飞扬的环境更加糟糕。某一天，你突然病了，进医院，花了大把的钱，却不一定找得准病根。医院根据人体的表象，划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男性病科，五花八门，就像一群总是在外表忙碌的汽车修理工，油路、电路、方向盘、刹车、发动机，还有类似皮肤科的汽车美容。每个医生只负责把一部分弄得暂时不出问题就行了，他们不懂他们只解决了病的诱因，而诱因下面，是业力。外部环境每时每刻都在诱发业力，比如食物：洗衣粉馒头，

工业油炸的麻花、油条，激素饲料催肥的猪，过量化肥弄出来的大米。我们的每一节肠子都是毒，早晨伸个懒腰，吸毒就开始了——空气中的粉尘。再比如电视：官僚假惺惺的笑脸，你无动于衷地听每天的谎言，也是毒。再比如车祸：发生得太频繁，只要没撞着自己，你就习惯性地围观一阵，然后走开。这种种日常生活都在增加你的业力，积累到一定的量，突然爆发，您的身体被摧垮了。没有医生明白，这是一个比他们有限的医疗知识漫长的演变过程。

老威：老人家，您的记忆力真惊人！

曾氏：练功之后，我把背了十多年的药罐子砸了，有点小病小灾，也从不吃药，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了。睡眠也足，饭量也增加。以前总想自己如何，业力缠身。现在总想着别人，想着一道练功时的和睦场景。只要一声通知，哪怕凌晨五点钟，大家也随叫随到，从来没有一人迟到早退。

老威：自从 99 年 5 月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之后，法轮功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有组织的邪教”，您置身其中，是否认为李洪志在国外遥控这一事件？

曾氏：您这种口吻有问题，法轮功注重自身的修练，讲究“真、善、忍”，会“围攻”谁？一个围字，一个攻字，都违背了法轮功的起码准则。因为某市公安局抓了四十多名无辜的法轮功练习者，交涉无效，我们只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上访。虽然大家聚到一块，人数成千上万，但并没有闹事，只是边练功边等待上面的答复。我们找的是中央信访办，难道法律规定了“上访不超过多少人”吗？当然，如果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大家也犯不着上北京找衙门。可是，诺大的中国，除了共产党官方的信口雌黄，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轮功评理的地方，上街游行犯法，贴大字报犯法，想来想去，除了“上访”，其它营救被捕者的行为都

犯法。

我不明白法轮功到底邪在哪儿？它威胁了共产党么？它提出了颠覆政府的纲领么？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参与。我一把老骨头，没几天活头，一心想的就是远离政治，消业，健康起来。尽天年，无疾而终就是福，这一点，同其它练习者没啥区别。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世俗社会有用，在“法轮”的世界却无用。

人类的老龄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经济条件、人文环境、社会福利都跟得上，所以老年人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而在中国的现阶段，信仰崩溃，风雨飘摇，弱肉强食，人人都没安全感，老年人就更没安全感。在家里，与儿女有代沟，在社会上，被视为累赘和废物；病了，没有照顾不说，还看不起病。像我还能公费报销，而许多人，病了就拖，拖得不行，一查就是绝症。大病别提了，感冒稍微严重一点，进医院就是几百元。多如牛毛的医药公司派代表驻在各大医院，直接与医生、药剂师勾兑，让他们多给病人开病方，报销又贵又劣的产品，从中吃回扣。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法轮功以“功”代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侵蚀脆弱肌体的百病，当然对中老年人很有感召力。法轮功练习者的年龄大都在 50 岁以上，大家共同练功，同在一种“场”内，发生心灵感应，这不仅是老师的力量，更是同一法轮之下的互助的力量。

“真、善、忍”是人性中的三个点，互相呼应，形成稳定个人道德的三角形。个人道德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从国家经济利益看，还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共产党的错误就是把不以任何东西为敌的法轮功树为敌人，把弱者视为敌人，他们只看见了练功者惊人地增加，几年之间，达数千万之众。他们被这个数字吓住了，因为他们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信奉“团结就是力量”。于是，除了在专制的旗帜下，

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强制性的“民族大团结”外，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群，都必须是离心的，勾心斗角的，否则就是图谋不轨。这种丧失理性的唯我独尊恰好是邪教最显著的特点。

这已经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从毛泽东开始，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依靠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可实质上，他们除了强权什么也不相信。这也是中国传统，“抢得了江山是王，抢不了江山是贼”，所以失败者、弱者，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应该被利用、抛弃、践踏与蔑视，他们忘了在几千年前，圣哲老子就在《道德经》里讲，弱如水，弱如婴儿，婴儿是能最终强健的，而水无处不在，再厉害的拳头打下去，也伤不着水。

法轮功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水与拳头的关系。年轻力壮的警察，小伙子们，你们可以打我，把我这个弱不经风的老年人推倒在地。我没事，我爬起来，法轮还在小腹里暖暖地转，我还在练，感谢你用拳头帮我消业、增功。你可以把我抓进监狱。世界就是大监狱，对于老年人，墙内墙外都一样，练功不择场地。你把我从北京遣送回来？感谢你，累着您啦——老师八岁时眼角多了点东西，是他师傅加在那儿的，叫“真、善、忍”，老师过了很久才悟出来。我70多岁了，却从警察的身形里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真、善、忍”。

强者替弱者树立起了信仰，法轮功由一种消业的过程被外力超拔成具有世界性的弱者之道，也算是宿命吧。

老威：宿命？那您承认法轮功是一种宗教了？

曾氏：法轮功是老师创立的，老师没这样宣称，我也不敢乱说。

老威：您这么崇拜李洪志？

曾氏：老师是开了天眼的，在他的身上，凝聚了宇宙万物的

精华。

老威：老人家您是怎么啦？您们这代人，经历过反右、文革以及其它的政治运动，应该深知个人迷信给中国造成的灾难。

曾氏：老师是大慈大悲，老毛是大奸大恶。

老威：但就个人神化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请别打断我，在中国，一种绝对权威一旦树起来，就不容任何置疑，像“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像“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之类，都是一种形式或包装，它完全可以根据时代背景，转换成“凝聚了宇宙万物精华”的李洪志先生。在李氏自撰的著作《转法轮》里，作者追溯了“法轮功”的来历，声称从四岁开始，就接受了佛家独传大法第一代传人全觉法师的亲自传功，修练“真、善、忍”最高特性，这明显是一种文学创作。接着的创作就是他先后跟着“隐形”和“显形”的佛家、道家、大道的师傅学上乘大法，具大神通。等到他决心“改编”法轮功时，十方世界里各门各派的二十多位上师全回来，参与了对法轮功每招每式的推敲、演练，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法考证的，我只能说，这是李洪志先生的痴人说梦。老人家，您也相信梦话么？

曾氏：梦比现实更可信，这是一种超验。你是诗人，应该相信法轮功基本信条就是不打妄语，否则要遭天谴。共产党的无神论灭掉了“天”，灭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茫茫的宇宙，使人除了怕俗世的权威、权势者，就啥都不怕。唯物主义使人心堕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为教条、灭人欲”。而法轮功没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攻击性，没有“阶级斗争”，它的最高信条，就是“真、善、忍”，人类做到了，天下不就永远太平么？你不要问它的来历，我活了70多岁，回头去看，没有任何现实是摸得着抓得住的，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每一天都在重复。

老威：我也有同感。

曾氏：80年代，许多人读不懂你的《死城》，当时你说《死城》来源于儿时的经验，是一部个人精神史，没人能破译得了。例如“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我还与你争论，我说：“你夜夜都在惨笑么？你疯了么？”你回答：“是的。”我说：“你妻子受得了？”现在看起来，我那时对你的误解同你此刻对老师的误解一样幼稚可笑。你是认真的，在《死城》里破译自我生命的密码；老师更是认真的，他破译了，却用平直的语言说出。

老毛的个人神化引发全民狂热，万众成了同一台战斗机器，而法轮功人数再多，也没有狂热，大家只是通过练习演绎老师的生命密码，去病消炎。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比如“达摩面壁”，比如耶稣作为一个木匠，怎么能发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再比如摩西一个人圣山朝觐上帝，然后下山宣布“十诫”，等等。无神论者自己做不到，没经历过，就统统排斥，岂知天外有天，人的认识能力很有限。

西藏人朝圣，一步一个长头，磕上千里路，途经传统的神山，还要加磕几倍的头。在他们看来，天是有灵魂的，具有法律的威力。他们的心灵匍匐在地，倾听神的声音。好的宗教，对人类是一种提升。我承认我在练习法轮功时，也企及了众多好的宗教，历史悠久的宗教。它们在演化发展中扬弃了血腥的、征服性的东西，保留了接近“真、善、忍”的本质。

老威：各种宗教都具有“超验”成分？那每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都可以成为李洪志，创立某种功法？

曾氏：你能对人类有益，与上千万的人心相通么？如果能，也未尝不可。

老威：老人家，您的确到了“人心皆佛”的境界。不过我还是对“法轮功”包医百病心存疑惑，这一段时间，国内舆论都在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的死伤事件，各地加起来还不少。有的人财两

空，就疯掉了；有的癌症患者，一练上功，就拒服任何药，结果很快就不行。

曾氏：世界上没一种东西是包医百病的，你本来就病入膏肓，作为补救，练功可以延缓病情，但把所有死、伤、疯事件都归罪于法轮功，却是共产党一贯的宣传手法。比如文革要打倒刘少奇，就把从古到今的所有屎盆子都朝他头上扣。我敢说，医院治死的人绝对比练功死掉的人多得多。

退一万步，就算有人因练功出了问题，但他在练功者中感受到的关怀与爱心绝对比医院，比其它场合要多。过去有练功点，大家在一块息息相通，如今共产党破了这个“场”，一些人心理脆弱，抗不住，但多数会挺过去。

老威：我也纳闷，以中老年为主体的法轮功咋这么顽强？

曾氏：对于我来讲，过去是练功，现在却是招魂。这是一种仪式，不信，你学我的样子，站或坐都可以，把手心向上，双臂抬起来……我不再感到孤独，时间流逝着，从里到外，法轮嗡嗡地转。我就是地老天荒，假如一种来势汹汹的邪教把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摧毁，剩下的就是地老天荒。我站在这儿，为自己，为亲人，为死去的，为我不认识的人叫魂。“你不要到东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回到躯壳里内心里。屈原招魂练过法轮功，不过他不知道，因为两千年后，上天通过老师的喉咙才命名了这种末日的招魂神功。中国人怕强权怕了多少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资和领导。可这群无神的世俗的百姓，一旦做了这个练功的姿式，就什么都不怕，就敢站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是有这个传统的，有个叫孔飞力的美国人写了本书《叫魂》。叙述了乾隆年间，民间流传的剪人毛发，施以符咒的巫术。据说中了这种巫术的人，就“失了魂”，最终将害病死去。这个传说从浙江萧山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引起了全社会的恐

慌，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叫魂”巫术。

我要特别说明：法轮功驱病叫魂，但不是巫术。这个民族“失魂”太久，今天，魂通过法轮功回来了，哪怕监狱，也只关得了身体。魂是自由的，伤不了，你就是砍了我的手，我心里，意念里，还在练功，还在忘我地向天祈祷。

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采访缘起：在四川北部的一座监狱里，集中关押过 20 多名六四良心犯，其罪名都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刑期 2-12 年不等。

35 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敌人”。

1993 年大年初三，大伙闲得无聊，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虽然此前我已对他“了如指掌”。

据传闻，“反革命”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平反”的历史已不复存在。欠账不还，赖账到底。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摩，《人民日报》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懵懵懂懂被关进了进来。

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入狱时未满 18 岁。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社会闲杂”，我看差不多，“人民”是抽象的，“社会闲杂”才是具体的。按理说，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更像文革大字报，“反动”啦，“气焰嚣张”啦，“阴谋推翻”啦，甚至还有“狂吠”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目击”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我是5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伙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

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

声令下，大家都缴枪。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挨了一弹，当场呜呼。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就趴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待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啥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

目击记》。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哪个说得清是非？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大约是8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本能地装糊涂：“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沾政治，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不可能！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而他本人18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毁了人家前途！”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鉴定，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事实胜于雄

辩，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这咋行？”我对审讯员说：“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审讯员说：“你已被开除了党籍。”我说：“还没接到通知。”审讯员说：“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我说：“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审讯员说：“一派胡言。”我说：“当时你又不在于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审讯员气坏了，说：“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我说：“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他说：“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我说：“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短命娃儿！”就栽倒了。中了风，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

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 57 年宝成铁路通车时，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照组织说的办。”

我激动地大声说：“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诚实犯法么？”

爸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我说：“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爸爸说：“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我反问：“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爸爸说：“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

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这不合法律程序。”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捏造事实，传播谣言”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造谣罪”，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我又没说“血流成河”。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政治犯”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多数人对政治的认识还停留在《红岩》阶段，写诗、写文章，不自觉悲壮起来。举一个例子，这儿曾集中关过 20 多个六四反革命，刑期 2 年到 12 年不等，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90 年初的一天早晨，天上突然坠下一只鸽子。是我最先发现的，它上面就有些摇摇晃晃，醉酒似地，拉了几秒钟弧线，然后从一大群鸽子中栽下来，在墙上弹了一下，才落到院子里，大伙从号中一涌而出，小心翼翼地拾起。幸好昨夜下了一场雪，这小东西才没被摔死，但腿和翅膀都折了。这下有事做了，20 多个政治犯的爱心轮番奉献，削了极小的竹片，给它上夹板，还裹了一层药棉。小杨到伙房去弄米，嚼了喂，鸽子咕咕摇头不吃，小杨一急，就与老侯一起，把竹棍横拦着嘴壳，一点一点地灌。我与老雷还在墙角挖蚯蚓，捏烂了喂。到最后，鸽子粮应有尽有，碎玉米、绿豆、炒黄豆，小东西吃不完，就给耗子做了好事。大伙排了号，两人一组当鸽护士，一天一换。平时上工，鸽子就藏在上铺蚊帐

里，垫几张报纸，散点食，它就吃喝拉撒都在铺里。因为六四政治犯待遇要特殊些，所以狱方一般不查号。如此养了一周多，鸽子伤愈了，咕咕冲大伙叫，完全是要告别的意思。大家心里挺酸的，羡慕鸽子，每个人都对它说了不少祝福的话。

鸽子在地上兜着圈扇翅膀，谁咕咕两声，它就冲到谁的面前，真是太有灵性了。小杨把它捧起来，再也舍不得放手。老雷说：“让它自由吧。”多数人不吭声，老雷又说：“我想利用这只鸽子，把我们追求自由的心声传递出去。”

这说到大伙心坎上去了。于是我就执笔写了张字条：“我们是四川某某监狱的 23 名六四政治犯，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是我们的信念，希望外界予以关注。谢谢。”

我们把字条绑在鸽腿上，全体人员在院里肃立，举行告别礼。老雷从怀中捧出那东西，手微微地颤动。这一刻，再平凡的东西也升华了。革命鸽，信念鸽，大家用心血浇出来的远方民主鸽，被一双手抛向天空。它在我们头上低低地盘旋了一圈，然后陡地拔高，向两重高墙外俯冲下去了。

当时大家忘乎所以，谁也没觉得鸽子俯冲得不对。晚上躺在床上，还七嘴八舌，开起信鸽讨论会。我根据方向，觉得它是朝东飞的，“天空是直线，现在它可能到了十堰或襄阳。”小杨说：“湖北佬养的东西不会这么通人性，我觉得是台湾信鸽协会托这边的人放的。”老李说：“你干脆说是台湾李登辉托放的吧。”小杨说：“哪有啥不可能？！”老雷边说：“此为天意，为啥它别的地方不栽，独独栽到政治犯的院子里？可见是希望的信使。”我说：“关在这倒霉的地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点盼头，牢也好坐些。”大伙见我沮丧，立即群起安慰我：“老万，坚强些。坐牢是我们的光荣，付出的代价今后都要专制政权偿还！”

老威：这鸽子被赋予的意义太多了，可惜海天茫茫，谁知道

它会咋样？

万宝成：也许它会飞回来吧。

老威：痴人说梦。你们这群人，唉，真有点像小说里的人物。

万宝成：梦还没说完呢。第二天大早，我们院子就被占领了，一个班的武警荷枪实弹冲进号子，挨铺搜查，抄了个底朝天。所有带字的东西，包括诗歌、政论、家信、读书心得、散文全被一网打尽。监狱政委亲自出面训话，追查“鸽子事件”的来龙去脉……

老威：什么？！鸽子被武警打下来了？你们小心一点嘛。

万宝成：鸽子是监狱里一位警察鸽迷养的，已经失踪很久，主人还以为……唉，不料死而复生，鸽子不但突然回家，而且还立了一功。

老威：原来是一只告密的贼鸽子。

万宝成：希望破灭得太意外了。我们几个人都被关了小间。从这以后，集体被强制解散，我们被分别插入刑事犯小组里，实行十几比一的监视改造，真是度日如年啊。

老威：您出去后准备干啥呢？

万宝成：经济工作是干不了了，况且，政府也不乐意我这种人发财。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今后只有投身民运事业，不懂，我就学习，就多向老民运战士请教。虽然讲出来，我的反革命历史也与“鸽子事件”一样荒诞，但是，我是被我党一步一步逼到死角的。命中该我做铺路石，就豁出去了。

被抄家者廖亦武

采访缘起：这是一篇自访。

我原以为借用谈话的体裁会使千头万绪的记忆得到梳理，可没想到，仍然遗漏了许多东西，例如 1968 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妈曾被查户口的街道民兵当作逃亡地主带走，还顺便抄了家。当时我们在成都没有落脚之地，只好暂时租借九眼桥外红瓦寺的一处熟人房屋，仅九平方米。

旧事重提有何意义呢？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别出血与血的差别么？刀从伤口里抽出来，你能辨别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凶手面孔么？

混淆了，生锈了，在此之上，新一轮的国家强暴理所当然地拉开幕布……

老威：最近又被抄家了？

廖亦武：12 月 18 日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漆黑一团，我刚入睡两个多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不间断地响了四、五分钟，接着，插门声大作。宋玉惊得一弹而起，而我也相随着边提裤子边出卧室。这很像某部恐怖片里的镜头，电话铃和插门声交织着，而室内主角如无头苍蝇乱转。

老威：你老婆没吓着？

廖亦武：她还算镇定。跟着我这种人，就得习惯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场景。推而广之，宋玉见识过其中几种：例如回门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间蒸发掉，

只剩强装欢颜的新娘款待满座宾客；例如我明明与朋友相约烫火锅去了，却整夜不归；还有不胜枚举的神秘失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相关友人打电话探询丈夫下落，然后等待。所以，这次她很快恢复平静，对镜梳妆，准备上班。直到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从带队的科长手里要过《传唤证》和《搜查令》，仔细验收，还笑眯眯地说：“《搜查令》也应该一式两份吧？”科长答：“就一份。”她质疑说：“咋会呢？商场买东西的凭条都一式两份，出了问题我好找你。”科长声色俱厉地说：“搜查不是逛商场，扣押的所有物证，我们都会依法给清单。”宋玉还要犟嘴，我急忙拦住，让她快去上班。临出门，她还把两颗感冒药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忘了吃。警察对她的评语是：“小小年纪这么厉害！”

下午5点多钟，由于没弄到他们需要的证据，我被释放了。宋玉说，她作为家属准备在明早去《传唤证》标明的“抚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后几天，我们多次探讨平常无暇涉及的大问题，如“这辈子咋办”？如康正果、刘晓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品味，而我只是个啥都谈不上饮食菩萨，等等。我竭力狡赖，于是，曾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家主妇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虑的结论：“你这种人根本不适合结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来。

廖亦武：生存如此艰辛，再不笑口常开，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时时挂脸上。小时候，你我围观过多起死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群众场面，过一阵，啥都忘了，可某个刀下鬼的当众粲然一笑往往会留下来，并长期成为街头巷尾小民的谈资。所以，抄就抄吧，八个便衣，分两批闯进来，又能怎样，我还得笑。电脑被抱走，里面存有几百万字的文稿，而我心里想，他妈的，不管情不情愿，我都是中国唯一的专门为警察而写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们拥有了80年代至今的我的所

有作品，包括情书、便条、获奖证书、老照片，甚至有从便纸篓里翻出的臭哄哄的废稿。这一回，他们又荣幸地成为小说《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读者，并且破译了《底层》和《冤案》的艰苦的成稿过程，重温了《死城》《安魂》《屠杀》和《古拉格情歌》，还能系统地研读相关的评论和新闻。

在这 6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搜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3 个多小时，阳台、客厅、书房、卧室及不少卫生死角，都细细地梳理过了。有两个小伙子待在书房迟迟不露面，我心怀鬼胎地赶去充任书架向导：“这是我姐姐，88 年死于车祸。”我客气地介绍完毕，就从他们手里抽回像框和其它照片。“我们不会要，”小伙子温柔地解释，并且补充一句：“其实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势重点介绍照片、字画、洞箫及部分名著，有意无意地干扰便衣的视线，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旧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杂志《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徐文立、魏京生、刘宾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若干文字资料。黄翔的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国同胞书》，他们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来源。“寄来的？”他们激动地问，“信封在哪儿？”

我多年以来，就丧失了收藏信封的兴趣，所以感到对不住人民政府。我只好用不断的赞美来变相表达由衷的歉疚，我说时代变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几年前凶神恶煞的传统造型，变得平易、细致而有耐心，这从抄家中能看出来；我主动把大叠的违禁资料往虎口里送，盼望能从牙缝里剩些零星。当他们提出替我收拾一下满地狼籍的东西时，我连说“谢谢”，其实是担心再翻出什么来。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吹捧：警察比我这种害人虫更适合成家，如果同志们把工作中的体贴入微用在家庭，天底下没有女人不为之倾倒。

警察大概被我感动了，出门前还叮嘱我锁好房门，谨防小偷。我点点头，并且建议：我这种不爱国不爱家还总是制造麻烦的野狗最好是放出去咬外国人。

一伙好汉浩浩荡荡地下七楼，上了三辆警车，小区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儿。好在这年头，刑事案件太多，人们不会大惊小怪。进派出所后，警察就兵分两路，审人脑和电脑，结果电脑比人脑的问题大，各方面的专家要会诊、定罪。目前，我暂时是《中国冤案》网上连载和系列政治签名的嫌疑人，至于到底有多少网站转我的文章或“签名”，我一个网络盲哪里晓得？

老威：你刚才说时代变了，抄家的传统手法也有所变化是吗？

廖亦武：说来话就长了，古籍上记载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产”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单就说“新社会”这几十年，在大小数百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过。巴金先生曾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以为范围过于狭窄，有那么一天，这块土地上会耸起一座政治运动博物馆，而文革只是它的一个分馆；人们还将树起一座“思想犯罪纪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诞生于未来的新的纪念碑上，将镌刻几千万个思想罪犯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泪包裹，远远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恒泪珠堆垒起来的寒光闪射的山丘。但愿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着没关系，他已融化在那段历史中了。

我还认定，在几十年后的政治运动博物馆里，抄家、监禁、批斗都该列为单独的学科，至少要有专门的课题，例如“抄家学”，如此浩若烟海的工程，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别和研究，就将动用上千名教授及勤杂人员，其学术规模不会亚于北大。

老威：你这是由专制机器压榨出来的诗人想象，落不到实处。因为以此类推，中国将来会凭空竖起各种名目的博物馆和纪念碑，

如“土改纪念碑”，“三反五反纪念碑”，“胡风案纪念碑”，反右、四清、大跃进、大饥荒纪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纪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间冤案，是否也要弄个中国底层或冤案纪念碑？当然，法轮功、民主党、藏独、疆独，碑馆都不能缺。总之，欠一笔帐立一座碑，我党目前已一屁股烂帐，那要立多少碑？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碑林中还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还有想象力，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没两天，案还没了结，却已经嬉皮笑脸与你站在这儿了。人们讨厌诉苦，同样的苦水多倒几遍，人家心里就暗暗骂你是“祥林嫂”，老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过家，我爷爷是个老地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啬。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80多岁，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乡村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爸爸说，50年土改，爷爷这倒霉蛋刚累死累活地挣够了40亩田产，上了政策线，就被工作组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地主。而同根同脉的三爷因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却光荣地成为贫农。还领着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都充公，并重新分配给穷人；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还捏着笔记本

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蓝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20多年前死于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他们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地契烧了，《土地证》重新颁发，妈妈当时刚生了姐姐飞飞，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四舅又逃到这儿，找到了妈妈。我不明白这一切如何收的场，只知道妈妈从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乡——盐亭，他们俩吵了一辈子，每一次，妈妈的开场白总是：“狗日的盐亭乡巴佬，害了我一辈子。”

1999年，我结婚没多久，四舅因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后来改嫁的四舅母陈挽礼于1980年4月9日写给他的信，称：“50年5月前后，新都派出所侯所长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从我这里取走金壳手表一只，黄金四两，这几样东西系你

送我的，表是在重庆用 100 块银元买的。取走以上物品的事，当时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时日长远，也没有什么证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难追查吧。我仅提供以上情况，可以为你作证。”

老威：你四舅的家也被抄过了？

廖亦武：以他的身份，被抄家是必然的，但抄去的东西看来并没入库，而是落入私人腰包。30 年后，四舅母仍愿出面为作为释放战犯的四舅作证，可见对查抄家产的印象已深入骨髓。现在，我家老一辈子中，只剩下妈妈，我曾好多次提起早年抄家的话题，她都不搭理。

老威：一笔令人颤栗的糊涂帐。

廖亦武：廖家幸好出了我这么个文人，能够在文字中捕捉些蛛丝马迹。到了文革，我七、八岁，就能记住事了。文革是精神革命，蔑视财产，所以查抄的主要对象，除了臭老九，就是古今中外的书。我爸爸被抄家是因为他教书教得太好，特别是讲授刘邓路线的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堪称一绝。于是，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挨批斗，天天写认罪材料。爸爸当时月薪 50 多元，要养 4 个孩子，所以没有任何积蓄，红卫兵抄家时，的确比解放初期的穷人和警察都廉洁，他们把家里搅了个底朝天，却只将爸爸的书本成筐成筐地朝外抬，其中包括大量教案和备课本。他们在学校操场上，集中销毁封、资、修，一把火烧了近一个小时。接着，趁热打铁召开批判大会，爸爸被揪上台，与校长、主任和其它牛鬼蛇神一道，挂黑牌，弯腰九十度。而我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木木地站在家门口，边吃指头边看几个红卫兵在墙上刷“打倒×××”的巨幅标语。

老威：类似的抄家在文革中相当普遍，毛泽东和鲁迅之外的东西，大约有 90% 属于禁书。在你编的《沉沦的圣殿》里，叙述

了残疾收藏家赵一凡被逮捕并抄家的经过：“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包围了赵家，并从‘罪犯’家中搜出大批‘文学罪证’，据若干当事者证明，这批‘罪证’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包括解放前后的多种报刊；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资料；文革大字报、标语、红卫兵战报、演讲稿及各类文献；思想、文学通信；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作为地下读物流传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其数量之巨，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为世所罕见。”

“目击者称，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辆130型国产货车将那堆积如山的‘社会资料库’满载，然后远去。”

廖亦武：在这一厚本挖掘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人的书中，最令我心动的却是不写诗的赵一凡，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收藏家，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一个残疾人，一点一滴搜集了那么多地下读物，他死之后，这一脉单传的香火就断了，没人再继续默默搜集这个时代的地下文化史料。可惜，这本书仍有缺憾，第一，最后一校没来得及，错别字多；第二，一些当事人的采访没有做。1998年9月8日，十几名警车突袭了我在北京的暂住地，抄家之后，将我带到西城公安分局审问了一夜，并勒令我次日离京。

蒙赵一凡在天之灵保佑，我事先有预感，转移了编书的大量资料和采访录音，因此除了几本违禁书籍，几乎没受损失。我与赵一凡的罪名都是反革命，区别是他“传播禁书”，我“传播反动录音带”；他参加莫须有的反动组织“第四国际”，我拼凑了“《安魂》剧组”。

老威：还是回到你自己经历的抄家吧，否则几天几夜都谈不出结果。

廖亦武：其实在89之前，四川许多地下诗人的家都被抄过，

那时地下诗刊发行渠道畅通，影响很广，因此，公安机关专门建立了地下诗人档案，像周伦右、石光华、万夏、宋炜等均列其中。87年我在涪陵地区艺术馆当创作员，曾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把馆办刊物《巴国文风》弄成《巴蜀现代诗群》。我忙碌了两个月，天天跑印刷厂，亲自动手捡铅字、搬字盘，可在刊物出笼的当天，几十名警察突袭印刷厂。当时我正在二楼喜孜孜地审阅样书、监督装订，楼下警报呜呜响开了。眼看无路可逃，我急中生智，抓起一本还没装订的诗刊，推开窗就跳楼。幸好楼下是条土巷，我摔得浑身稀泥，却没受伤。我没命地狂奔，到了码头，才回头侦察有无追兵。

我乘船转车，一路颠簸逃到重庆北碚周忠陵家，他是当地打字作坊的老板，所以很轻松地把唯一的母本复印装订了几十套，快速分寄全国各地诗码头，内夹我十万火急的亲笔鸡毛信。结果，每位得到子本的黑道诗友均如获至宝，满怀悲壮地再掏腰包复印——于是更多的“孙子本”投寄出去，并呈几何数字无休无止地增长、传播，直到字迹模糊，众多诗歌高热分子仍不肯罢手。

我传奇英雄一般在外混吃混喝几个月，回到单位时，政治风向已转。但得知：印刷厂于案发日被公安局踩平，厂长下课，两千本诗刊被拉回文化局，永远封存。我家也象征性地搜过，前妻说：领头的警官爱诗写诗，正暗地追我的星，因此带几个新警察入门在几间屋晃悠了一圈，就回去交差。

老威：虽然你的跳楼动作生猛，但只是虚惊一场，不算抄家吧。

廖亦武：我讲的这一段，跟我后来的东窗事发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屠杀》写作和朗诵的现场证人，我的加拿大同案犯戴迈河正是偶然在刘晓波家里得到那本孙子代复印诗刊，才给我写信，并且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此后两年，他经常在我家免费吃住，

直到六日凌晨，我用他的录音机配乐，进行了声泪俱下的“犯罪”。

《大屠杀》的母带有两盘，我和他各一盘，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传播着。90年3月，我和一批同行拍摄了它的姐妹篇《安魂》，我是主演和原著者，16日，国家安全部门袭击了我们，整个《安魂》剧组全军覆灭。

至此我方见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威力，长达十几年的诗歌梦转眼破产。上午十点多钟，我背着《大屠杀》《安魂》等罪证，从重庆沙坪坝搭公共汽车至牛角沱，正要横穿马路，转车去火车站，却听见有人叫“廖亦武”。我本能地回头张望，却见一群穿军用雨衣的人从四面八方扑过来。

背包拿走了，我被反剪双臂上铐，然后塞进警车后座，一个特务在旁边咬牙切齿地揩鼻血，我下意识地挥拳击中了他。“你敢反抗！”他咆哮了几声，就抓住我的背铐狠捏，直到带齿的钢圈箍入我的肉里。前排副驾坐着个胖子，正用步话机喊道：“一号落网，押往松山。”

接下来的场景我在纪实作品《证词》里写过，这一回，所有同案犯的家都被抄了。摄像曾磊是上尉军官，上过老山前线，时为三军医大电教中心的负责人。16号凌晨，他与导演万夏共同剪辑完成《安魂》，并让我审看了一遍，确定再无修改，方定稿，分配母带，熄灯睡觉。

像工兵探雷，几十名警察将电教中心和曾磊宿舍来回地筛。据说，临上车前，曾磊和万夏都用带铐的双手捧着一摞录像带和书，任摄影特务拍“犯罪照”。两人目光呆滞，嘴角还有几星牙膏沫子。罪证装了满满一面包车，曾磊所有的摄像作品、资料带、书刊、信件、照片、化装油彩、服装道具在其中。

刘太亨、万夏、周忠陵、巴铁、苟明军、李亚伟、石光华等20余人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家都先后被抄，不计其数的文学艺术类

私人物品都充公，进了罪犯档案。周忠陵家藏书丰富，警察把两米多高的大书柜稀里哗啦掏空，搜查时就在几尺厚的书籍上踩来踩去。诗评家巴铁损失了多年搜集的所有先锋诗歌资料、笔记、书刊和文人通信，在关押两年出狱后，遂心灰意冷，逃离了自己钟情了半辈子的文字。

我家和岳父母家都光顾过了。三天之内，我在地区艺术馆内的住宅被搜了三次，磁带、相册、阿霞日记、钢笔画、书籍、录音机、手稿均统统搬走，衣柜、书柜、沙发、床、桌子全被掀翻，用铁棍捅出窟窿。阿霞当时已身孕三个月，却被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达40多天，日日提讯，逼她揭发自己的丈夫。保释回家之际，她患上较严重的肺病，再也无法在家里待下去。因为据邻居讲，毛贼已经翻墙入室多次，把警察挑剩的东西都卷走了——首饰、衣物、各种摆设与电器等等。穿衣镜和床砸得稀烂，还在卧室拉了一泡尿——这大概是贼嫌在我家收入不丰，泄愤所致。

老威：真是世态炎凉，你家邻居也不起来喊抓贼？

廖亦武：白天警察进进出出，晚上家中仍灯火通明，邻居们还以为有人在继续执行公务。阿霞吓坏了——这埋下了日后婚姻破裂的种子。四年后，我刑满开释，企图重操文字旧业，而阿霞一见我摸出小说草稿就惊悚不已，我试图解释几句，她竟双手抱住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老威：当年抄家时进行了登记么？有《扣押物品清单》么？

廖亦武：阿霞没提，并且说永远不要提起这事。出狱后不久我们就离婚了。刘太亨也离婚了。他出狱当天就急于破镜重圆，结果被他老婆严辞拒绝。

老威：你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

廖亦武：也是一笔无头帐。我随身携带着80年代的全部手稿，

多种录音录像带，袖珍录音机，相册，地下诗集，还有 1400 多元人民币，都没收了；接着押至歌乐山中的松山收审所，这是离白公馆不远的老牌囚笼，一进去，五个如狼似虎的劳改犯人就扑上来，把我浑身剥得精光。阳历三月的阴雨天，我妓女般赤条条地站在二楼过道里，双手捂着胯间，达好几分钟。而众犯熟练地又抖又捏，将兜里缝里所有的异物搜尽，并抽去腰带，用老虎钳夹掉金属衣扣和裤裆拉链。

接下来，我被众犯踩在地上剃光头。然后受命翘起臀部，为首的犯人用一支竹筷捅进去掏我的屁眼，还装模作样用手电照了照，确定没藏违禁品。

说实话，当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诗人的尊严被彻底摧毁。当我麻木地罩上衣裤，被锁进监舍时，我已经和里面多个刑事犯没啥区别：塌肩缩头，破鞋套赤脚，倒吸冷气，两手提着无法固定的裤腰。我想自己完蛋了，无可救药了。

老威：毕竟活了下来。

廖亦武：是啊，有时从梦中醒来，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居然还有脸活着！坐牢四年，查监、搜身是家常便饭，被侵犯的次数多了，就像妓女看待嫖客一样，认为人民警察的一切变态要求都挺正常，都属执法的一部分。终于熬到出狱，家破人亡，只能用一根箫挑一个空包回成都，与父母相依为命。但作为打上了烙印的政治犯，只要在国内一天，就无法摆脱传唤和抄家。95 年 6 月，因卷入刘晓波牵头的为六四讨说法的 56 人签名活动，被关押了 5 天，查抄了我在父母家的几平方的窝；95 年 10 月，因企图传递狱中政治犯致国际大赦的呼吁书，被拘留一天，监视居住 24 天，小说《活下去》的几十万字原稿，《底层》的原始资料以及大量书籍、信件被搜走；97 年 6 月，因创办民刊《知识分子》，被拘传留置一夜，抄家前，有不明身份的人通风报信，我的所有文字

被老父亲转移，致使警察无功而返；98年9月，因主编《沉沦的圣殿》，从事了“非法采访”，我在北京的暂住地被抄，次日，我被迫离京；99年2月，因从事《底层访谈录》的资料搜集，惊动国安当局，我在回门婚宴举行的前两小时落入法网，与一位摘除了右肾的江油当地诗人一起，被羁押突审了24小时，随身携带的《底层》原始稿件40余篇和通讯录等被扣。

在若干回抄家和搜查事件中，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警察的语言和动作一次比一次文明。其实我晓得，在一个思想犯罪的国家里，一个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试图表达更大范围的真实，那么，写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证。我的罪证已经多达几百万字，四川的几代警察都研读过它们。

迄今为止，除了12封私人信件，警察没有退给我任何东西。当大群起起武夫闯进门，以法律的名义制服你，并把你的私人空间当作免费超级市场，随意乱钻乱翻，挑挑捡捡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较完整的司法程序，开列扣押清单必须详细，虽然带走的一切几乎回不来了。

老威：那清单有何价值？

廖亦武：作为物证留下，提醒自己，将来也提醒别人。另外，我喜欢在警察上门时向他们提要求，以取得一种语气上的优势。90年入狱，那个叫“廖亦武”的诗人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一个证人站在这里，你搜查我，剥光我，掏我的屁眼，都没关系，我比你们任何警察都有脸面，因为我写着，记录着，反过去搜查着那些肮脏畸形的灵魂。如果有一天，我被剥夺得没法写了，我就吹箫、卖艺，直着嗓门哭和吼。从我的声音里，人们能听出对这个可耻时代的记录、诅咒和全部愤怒。当然，也包含孤独、自恋和忘我的爱——这是我活下去的最好的借口。

附录一 冤死者杨继年

1. ××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法判字第 017 号

公诉人：××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顺富

被告人：杨继连，又名杨志远，男 11 岁，内江县人，初识字，贫农家庭成分，盗窃出身，住高粱区奉天乡二联社，汉族。

案由：偷窃及偷盖公章

本院于 1956 年 2 月 24 日由代理审判员樊敦让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袁府之、黄云祥组成审判庭，书记员赵桂华担任记录，对本案进行了公社审理。

案经审终结，现查明：

被告杨继连不从事生产、以盗窃为业，曾专门向惯盗杨玉明学习偷窃技术，历年以来，多次行窃，并提屡多次，属屡教不改，从 1951 年起，经常在内江市内江县所辖高粱、新店、田家、大佛、奉天等地以及安岳县所属南薰周礼、文峰等地多次伙同杨玉明或单独行窃，51 年至 55 年先后在以上地区偷窃人民币 140 多元、火柴一大包、草帽 12 顶、锄头 15 把。米一斤、豆粉一斤、花生两斤、猪肉、香肠、心肺等六斤多、鸡肠带两把、镰刀 12 把等，以上各物余与杨玉明共同偷窃。其兄杨继利，偷李家冲羊子一只，另外偷碗豆一斤，锄头一把和人民币等。

被告偷窃行为曾多次教育，仍然不改，56 年在内江又偷兔儿皮六张、被条等东西。尤其恶劣的是，56 年 4 月插秋苗时，被告又潜入高粱区供销社把锁扭烂偷走人民币 17 元锦币 5 斤多，并将

锦币四处分别出卖，长期潜伏活动，57年正月又潜入新店乡供销社合作社，企图进行偷盗，被发觉未遂。

其次，1956年被告曾经利用与太平乡干部李学文认识关系偷盖爱国乡人民委员会公章，(盖了5张空白条子纸)伪造入伍军人的证明，跑到兵役局吵闹、行骗。同年又利用一张盖有乡政府印的籍贯证明，裁去前面有字部份，留下空白地方，又伪造证明，跑到兵役局吵闹。

56年在新店乡仓库卖黄谷12斤，有意将码单文字改为72斤，企图骗钱用，经仓库抓着未遂，令其写检讨时，乘机逃跑。

根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杨继连，不从事生产，一贯行窃，危害群众，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经多次捉获教育，仍然不改邪归正，继续进行偷窃，甚至竟敢偷窃供销社的公共财产。偷盖乡人民委员会公章，伪造证明，冒充入伍军人进行诈骗，情节属实恶劣，特依法判决如下：

被告杨继连被处有期徒刑拾年(刑期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樊敦让

陪审员：桌府之，黄云祥

1958年2月25日完成

书记员：赵国华

1958年4月8日发出

2.广元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3) 检诉字第 76 号

被告杨继年，又名杨志年。男，现年 18 岁。四川内江县人，家庭贫民，本人惯窃，小学文化程度。58 年因盗窃、偷盖公章，经××县人民法院判刑 10 年。因抗拒改造，加刑叁年，合并原判为 13 年，现在荣山煤矿劳改。

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 62 年 6 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 62 年 3 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7 月 14 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62 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二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人犯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62 年 2 月至 63 年 2 月先后在劳改队偷有毛衣、衬衣、胶鞋、红糖等衣物，价值 300 余元。

根据上述事实，罪犯杨继年，在劳改期间，一贯抗拒改造，书写反动词句，大肆进行盗窃活动，煽动犯人抗拒改造。其情节严重恶劣，已构成重新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改条例 71 条之规定，为此，特移请你院依法惩处。

此致！

广元县人民法院

检察长：苏崇坤

1963 年 9 月 11 日（盖章）

3. 最 高 指 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

☆

☆

四川省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绵阳专区公检法军管会

刑 事 判 决 书

军公管（69）刑字第 32 号

罪犯：杨继年，又名杨志年，男，现年 21 岁，贫农出身。本人系惯偷，小学文化程度，汉族。四川省内江县人。1958 年因偷窃偷盖公章犯罪，经××县人民法院判刑 10 年，在劳改中抗拒改造，加刑三年。1963 年又因书写反标，经广元县人民法院加刑二年，连同原判合并十五年。现押荣山劳改队。

罪犯杨继年，在劳改期中，一贯不认罪服法，多次无理申诉，均被驳回，因而对我党和政府极为仇恨，一贯抗拒改造，曾先后两次受到加刑惩处，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被集训从严关押改造。在集训中，杨犯坚持反动立场，与罪犯华超群（另案处理）相互勾结，竟胆敢于 1966 年指使华犯在集训队饭堂处写了内容极为反动的反革命标语。尤其恶劣的是，杨犯于同年 9 月以其狡猾的手段，收集不同字迹，采用各种卑劣手法，组成发动标语，又于 1968 年 5 月 15 日再次投入集训队一号禁闭室外，妄图达到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更为严重的是，杨犯在作案后，

还积极准备了铡刀等凶器，企图杀害我审讯干部。情节实属恶劣，罪行严重。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之精神，依法加处罪犯杨继年有期徒刑七年，连同原判徒刑合并执行为二十二年。（刑期从原判决1957年11月5日起算）

四川省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绵阳专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70年元月25日（盖章）

附录二 上善若水：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

外面又开始下雪了，很大！这一夜，我无法入眠，雪给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却也给很多人带了很多的痛苦（包括现在的我），我为自己的无能而痛苦，一种我失去亲人时才有过的痛苦，我总觉的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初入上访村

“他们”就是北京南站那些露天睡在野地、桥洞、路边的上访群众。这样的寒夜，他们又将如何度过？

2003年11月22日，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的四位同志，在“刘老板”的指引下，走进了繁华都市的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一到，便被一群衣衫褴褛、满面倦容，或提或背着破包的信访群众簇拥进了一排拥挤昏暗的小屋。屋外的过道其窄无比，再加上堆满了几十号人吃饭用的锅碗瓢盆，更显得杂乱无章和拥挤不堪，地面非常潮湿，稍微不小心便会滑倒。侧身挤进屋



北京南站铁道边的棚户区

内，屋里的光线很差，不通风，更没暖气，有些潮，还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在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少说也住了有20多人，全是拥挤的大通铺，而且还在高不到5米的屋子里面搭了两层，全是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安全性能很值得怀疑，在一个不到5米

长的通铺上挤了至少 8、9 人，上面铺着各式各样的垫子、毯子和被子，有些是上访者自己带来的，有的是“刘老板”旅馆里面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破烂不堪，脏且不说，其中夹杂的味道就足以让人窒息，由于人满为患，自己的“行李”只好堆放在床上，吃的、穿的什么都往床上放，天花板上还牵了一根绳子，挂满了换洗的衣服，连屋子里面只剩能容一个人进出的过道里都还放了一张单人床。感觉空间已经到了极限。

这就是“刘老板”开的旅馆，2~3 元钱一个晚上。“刘老板”也是上访的群众之一，一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再则是为了让上访的群众有个住的地方，有时也救济一些确实走到生命边缘的人。

本来我们的打算是在一片上访群众的聚居地四处看看，再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毕竟千里迢迢来北京上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下这个决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等待着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

但是当我们被群众包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交谈，更多的是在听他们的倾诉。对于他们个人的案情，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不可能去一一了解每个上访者。我们一进到屋里，就被重重围住了，在“刘老板”的维持下，“诉状”及厚厚的材料递到了我们手中。有的几年、10 几年下来已经是一大包了，我们根本没法一一细看，大概地了解了一下案情，便和他们交谈起来，倾听他们血和泪的控诉。对于这些厚厚的诉状，我们开始并不打算接受，因为我们的接受对他们的案子没有丝毫帮助，但是上访的材料还是如雪片般飞来。

“孩子们，你们就拿着吧，我们现在是想送出去都没有地方送啊，高检院和法院根本就不看这些。我知道你们能力有限，帮不了我们什么，你们拿去就算是作为你们课堂之外的一个案例分

析分析，我们也心安了。”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大婶如是说。

大部分的案情原本都很简单，罪责也很明显，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因地方公检法或地方政府领导过失、受贿、包庇、纵容罪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并最终使矛盾转化为“官民”矛盾。

“这帮人太坏了，他们对我们家强行断水、断电，非法强制收回全部承包责任田和自留地，他们还报复我，不让我们上访，关押、殴打、威胁，那都不算什么了！他们还把人给送进精神病院，硬是给整疯了，还买通黑社会的人打杀我们！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口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上访十载，亦无着落，仰问苍天，生命几何！”这是一位因抵制村镇干部乱收费而惨遭迫害的农民的血泪控诉。在上访的群众中，绝大部分受过类似的迫害。基层干部和公检法机关人员贪赃枉法、欺下瞒上、一手遮天、胡作非为，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而你想在底下告倒他们，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你有理，我有权，”这是一个地方干部的公理。

“公正？你到哪找公正去！”这是一个地方纪委的答复。

“没钱？没钱你打什么官司啊！”这是一个地方法院的答复。

“自古，民斗不过官。你再有力的证据到了他们那都不顶用，他们利用职权之便，随便给你捏造个罪名，做些伪证，就让你够受了。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什么人民的父母官，简直是比强盗还强盗。”

是啊，你把人家的房子都给拆了，地也给收了，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给人家夺走了，他们怎么办，坐以待毙吗？不，他们不甘心，所以他们不得不踏上了上京告状这条漫漫长征路。

他们信任中央，相信中央会给他们一个说法，还他们一个公道的。然而，他们听到更多的是“回去等着吧，我们会给你解决

的。”他们信了，抱着希望回去，可过了1年、2年，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们不得不再次走上征程。然而，他们得到更多的仍然是“我们已经把你送上来的材料递下去了，放心吧，会给你解决的。”就这要1年、2年、10年、20年，他们头发都等白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有时他们也拿到中央的“批示”，可地方政府应对这些无关痛痒的“批示”简直太容易了。问题大部分都没得到解决，于是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踏上上访的路。这住着很多都是告了10几年，几十、几百次了。大部分头发都白了，大多都有6、70岁了，有个老大娘都80多岁了。

谁愿意远离家人，历尽千辛，来到京城还得受冻挨饿。他们是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真是太苦了。他们没钱只能住这样2~3元一晚上的房子，有的就连这也住不上，只好露宿街头。原本，他们还在铁路边的空地里，搭了些简易的塑料棚，但被以“妨碍建设，有伤市容”的名义给强行拆除了，人也到处被驱赶。他们只好露天睡在野地里、桥洞下、马路边。

极限生存

那天晚上9点左右，一位大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冒着危险带着我们到四处走走，所见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这已经是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寒冬了，我们几个穿着羽绒服还冻得鼻尖通红，而他们只盖着些破塑料布之类的东西，露一个脑袋蜷缩在墙角，就这样度过漫漫的寒夜。来到铁路边的那块野地，那位“向导”告诉我们这里曾住几千上万人，但后来被政府强行拆除、驱散了。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残留的痕迹，以及一些又回来的上访者。墙脚下、野地里、马路边、桥洞下，随处可见那些上访者蜷缩在那里，用身体对抗着严寒，熬过漫漫的长夜。其中一个上访者就

在露天用几块模板和砖头搭了个简易的所谓的“床”，只用一堆塑料破布盖在身上，仅仅露出个头，还有的就在建筑工地旁边随便使用一些垃圾堆成一个小山包，然后就钻进里面躲避寒冷，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垃圾堆，而当有人从里面伸出头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他们的家，更有甚者就在地里挖了土坑睡在里面，用杂草盖在身上。面对寒冷的天气，好多睡在露天的上访群众已经顾不得男女之间的羞涩抱在一起取暖。

回到了旅馆，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生活情况，这里也是很艰苦！屋里很狭窄，不通风，卫生条件很差。“旅馆”仅有两个炉子，一个烧水、一个做饭、一个露天的案板和饭桌，所有人轮流用它们做饭。所以我们3点才吃上中午饭也不奇怪了。到了第二天，我看到一个老者还在吃前一天中午做的菜，这是他吃的第三顿了，就加点热水，也没加油盐，就这样就着馒头吃了。这就是老一代革命者的命运！他还是辽宁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当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被追加“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待遇，可政策到今天也没落实，他就上告，结果后来连房子都被收走了，他不得不走上上访的路，如今已经过了18年了，而他想要的仅仅是讨回公道。他告诉我们，前两天，他还住在大棚里，后来被拆了，他就住进了这里，到市场上捡些大白菜叶子，做菜就着馒头吃。

我们就问他，听说国家已经给上访的群众建了房子，你们怎么不去住呢？

“我们会那么傻，有楼房住，还不去住？我一人傻，也不能全都傻啊？谁愿意在这里受冻挨饿啊？！关键是你住得进去吗？”

那里住不进去，他们又没钱住旅馆，只好露宿街头了。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这我们明白。我们也不是不为国家考虑，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些‘有碍市容’，可我们没办法啊，

我们没钱只能住这啊！要不你帮我们把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就没必要再在这里受冻挨饿，也不会给你‘有损市容’。”

实际上他们这般受冻挨饿、再加上心情的压抑和精神上的折磨，不少人都已经重病缠身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抗过这个寒冬了。可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在，他们还会告下去，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相信中央会给他们一个说法和公道的。

他们对我们这些学生寄予太大的期望了，他们希望我们想方设法把诉状递到中央的领导人手中，或帮他们向众媒体呼吁一下，让他们关注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

可我们仅仅是学生，我们根本没法承担这样的重托，我们能做的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什么也帮不上，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无法承受之重。

雪还在下着，很大！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位大伯沉重的声音：“上次那场大雪，这里死了7个人，如果再下大雪，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仿佛看到了那聚在京城上空久久不能散去的冤魂！

我总觉得，我们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实在太苦了。

怎么没有人关注他们？

一周之后，我们再次走进了上访村，同行的有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研究会的四位同学和几袋她们募捐来的衣物。

经过上周末的初步勘察，我们对那边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上访者的生活状态的确让人很揪心，这样寒冷的冬季对他们而言能够生存下去有时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缺衣少食，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侵袭。他们不愿意去乞讨以获得人们的同情而换来一些生存的保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来京的上访者大多为上访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整日忧心忡

仲，无暇去找份固定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一些常住村子里的老上访户会去外面找点活干，比如，捡些瓶瓶罐罐或者卖些报纸、杂志等赚点小钱。这天，我们在两队聚头的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就碰到一位卖报纸的上访者——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大娘，听说我们是过来送衣服的，立刻把我们带到另一位亟需捐助的上访者身边，也是一个老人。她是今年早些时候来京上访的，以为天气不会很冷，因此也没有带足够的衣服，她没有料到，气温会一下子降了那么多。现在身上穿的一些衣服也都是向别人借的，但还是不足以抵抗凛冽的寒风。老实说，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关注者”待在那里尚觉得有阵阵寒意，何况这些吃穿都成问题的人呢？鬓角有些斑白的她一提到上访的事，泪水就不自觉地流了出来，儿子被杀，家里被抄，土地被抢。丧子之痛对一个母亲来讲永远是最大的痛苦。然而一切还没完，接二连三的磨难使得她对当地村委、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心里怀抱的对中央，对党的希冀支撑着她孤身一人来京上访。但10几年过去了，上访也不计其数，一切还是没有结果。有谁可以体会一位历经沧桑的母亲的绝望和愤慨！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此吧。然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好一群好的听众，倾听她的痛苦与悲惨。大家简单劝慰了一下，留下一件外套，带着无奈、同情的心情与她道别，前往上访村，那里有更多的人们需要这些衣服。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我相信我们的衣服一定能给他们带去一丝暖意，这是他们亟需的东西。

出了车站，沿途的风景是秀丽的，人们是悠闲自在的，生活是美好的。然而这一切将很快消失在另一个世界里。两者虽只一桥之隔，却有着天壤之别。路过那座桥时，我注意到上次来时看到的桥洞附近的那些塑料棚少了许多，整个地面被清理得相当干净，整洁了。当队伍进入那些低矮的平房，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

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迎面吹来的刺骨寒风的刺激下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此行的目的与意义。我们连人带物搬进了上周末留宿于此的“刘老板”开的“小旅馆”。人还没坐定，屋外就聚集了一些闻讯而来的上访者，由于门没关上，马上就有一人“闯”了进来，在放置衣物的床上开始“挑捡需要的衣服。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尽可能把衣服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上访者手里，我们不得不阻止了他的行动。大家好言把他劝走：待会我们会出来发送的，不要着急。

和负责人李老师他们商量了一下之后，我们决定马上就分衣服。经过匆忙地分类整理，两袋衣服被送出屋去。在门外守候的人群马上涌向了它们，狭窄的过道显得更加拥挤不堪。我们拿着衣服，踩着湿漉漉的地面，走进了那些阴暗、拥挤的小房子里。那里边住着很多上访者，每拿出一件衣服，周围便有无无数双渴望的眼睛瞄向了它，谁都不想看到别人把衣服带走，无奈僧多粥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拿到的自然满意，但又有多少充满失望的眼神让我们无法承受、无法心安理得地继续，无力感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好些上访者顾不上要衣服，他们还是像上次那样拿着那些申诉的材料给我们看，希望能给带出去呼吁一下，这是他们的全部希望所在，温饱在他们眼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今天只是来送衣服的，但还是有一些执着的人们不断地要求我们一定要帮助递送材料，让人不忍拒绝。

很快，周边的几间屋子都发遍了。衣服被一批批地送出去，聚集的上访者越来越多。整个上访村范围比较大，住着几万人，有些人得知消息后从附近赶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最需要衣服的应该是那些在野地、桥洞、铁路沿线住着的人们。他们忍受的折磨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据说现在冷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大家是

抱在一起取暖的，都不分男女了。想起刚才过桥时看到的情景，我问了一下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前几天那边又遭清理了，住在桥洞里的上访者被赶走很多，只剩下一些了。其实，不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附近的治安环境也极其恶劣。上次那位带我们夜探上访村的老伯告诉我们，铁路沿线那片地里，有黑社会组织存在，特别是夜晚，经常有人遭劫财而被杀，当时就听得毛骨悚然。在附近转悠时候还可以看到一堆堆的新土，这里面又是一个个从人间蒸发的冤魂！考虑到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到那里去送衣服。

由于这次募捐的衣服数量不够大，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捐完最后一件衣服后，人数还在增多，门口挤满了人，大家都争着向我们诉说，他们要衣服，要被子。此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真的，我们的捐助实在太有限了，许多正在经受严寒考验的人们满心以为能得到帮助，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好意思，衣物已经发完了，下次会再来的。一些负责人介绍的“贫困户”也没能够得到衣服，只能继续在寒冬风雪的淫威下等待着下一次的帮助。没有国家政府的帮助，无依无靠，忍饥挨饿，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

此时的我们也在冷风中瑟瑟发抖，表达着言不由衷的意思。希望能够尽快“逃离”这个地方。再多的感谢声也不能唤起心里任何的欣喜和成就感，我们所做的一点事情只是为了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如果这都需要感谢，那说明这个世界缺乏良心和责任感。一个人，一所学校的力量何其有限，短短一个多小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的遗憾和茫然。我们大学生也是弱势群体，也需要关注，既然这个社会需要一个弱势群体去关注另一弱势群体，那是不是说明它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呢？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其他阶层，触摸自己的良

心，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后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路的对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环境优雅，与此对比完全是两个世界！如今，北京已算得上是繁华的大都市了，然而正如丁玲在《曼哈顿的街头》描述的，繁华掩盖了许多上不得台面的事物。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不要忘了还有许多值得去关注的问题。上访村的形成不是一时的，北京是中华民族史上许多朝代的都城，历史上各朝的上访者们就曾聚集于此。现在中国的高院，高检，人大也设在附近，来京上访的人们就聚集在这里，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村落。

在没来上访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如此让人不堪的悲惨，若非亲眼所见，亲身体验，实难接受这种事实；来考察之前也作了适当的心理准备，但当活生生的事例放在面前时，我还是不愿意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生活的压力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大，生存的成本原来可以如此之高！这几天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久久不能散去……真的很心寒，很害怕，假如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与毅力去承担？！

勇敢的上访村人民，祝愿你们能够捱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还能见到你们！

附录三 反革命分子刘德

1.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85)法刑字第 28 号

公诉人：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文勇、代理检察员程 波。

被告人：刘德，曾名刘秀兵。男。二十九岁。汉族。大学文化。安岳县南薰乡人。原系绵阳市文化局《剑南》文艺编辑部干部。现在押。

辩护人：四川省绵阳市法律顾问处律师王剑。

被告人刘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公诉人、辩护人参加下，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刘德追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自由”。对我国现行制度不满。参加工作后，认为被屈才。更加怨恨我党。经常散布不满言论。屡经教育，不听告诫。特别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晚，刘应邀到绵阳工业学校讲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面对百余名听众。刘采用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借题发挥、以偏盖全等卑劣手法，用极其刻毒、淫秽的语言，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所作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经济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清理精神污染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进行攻击、污蔑、丑化；对我党领导人肆意侮辱、谩骂；为蒋介石、黎笋这些历史罪人开脱罪责。当其反动宣传被制止时，

刘更加露骨地煽动说：“再过十五年至二十年，将有一个新的主义出现，有一个新的政府代替共产党。”并叫嚣：“我要亲眼看着共产党垮台！”被告刘德的反动宣传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该校的教育秩序。

上述事实。有数十名证人证言证实。被告对所散布的反动言论亦作了供述。

本庭认为：被告刘德身为宣传干部，竟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利用讲课之机，大肆散布反动言论，蛊惑人心、煽动群众，企望变天，情节恶劣、罪恶重大、影响极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严惩反革命犯罪、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二）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一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德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写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德才
审 判 员	全显能
代理审判员	彭兴保

1985 年 11 月 6 日

书 记 员	杨 华
-------	-----

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85)川法刑一字第 417 号

上诉人(即被告)刘德, 曾名刘秀兵。男, 现年二十九岁, 汉族。大学文化, 四川省安岳县人, 原系绵阳市文化局《剑南》文艺编辑部干部。现在押。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85)法刑字第 28 号刑事判决, 认定被告人刘德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后。刘德不服。以部分事实有出入和量刑过重为由, 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现查明: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晚, 被告人刘德在绵阳工业学校借文学讲座之机, 采取捏造事实、颠倒黑白等手法, 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对中国共产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出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经济体制改革、干部制度和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 面对百余名听众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时间长达两小时之久。叫嚣: “我要亲眼看着共产党垮台!”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上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本庭认为: 被告人刘德, 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 利用社会主义讲台, 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 进行反革命煽动, 罪恶重大, 应依法惩处。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的上诉理由, 经查不实, 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

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

二、维持四川省中级人民法院（85）法刑字第 28 号判处被告人刘德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 守 清
审 判 员	黄 家 宝
审 判 员	周 兴 玉

1985 年 11 月 19 日

书 记 员	鄢 智 敏
-------	-------

附录四 上书者蒋朝才

1. 求助书

我叫李玉英，现年 76 岁，系四川省南充市原新街 2 号城镇农民。

94 年 12 月我的私房被当地开发商侵权，致使我和我的子女停业、租房、告状长达八年之久，被整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无家可归。目前，不但无生活来源，且无栖身之处，祖孙三代逼迫流落街头捡垃圾糊口。不幸还未解除，又遭飞来横祸。

2000 年 9 月 27 日零时，我正在南充市大北街正阳火锅店门前街沿上的垃圾堆里捡垃圾时，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巡警队长李华平（一行五人）吃完火锅后（无警官证和执勤证）驾驶一辆无牌照小车将我碾压在垃圾堆里，连压两次，我紧急呼救，惊动街邻群众百余人，追住肇事车，扣住李华平的身份证，才阻止他继续逃离现场，强迫他将我送到南充市中心医院抢救后，李又将车开出现场不报案。

经医院确诊：（1）胸部双侧 7 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并形成畸形，（2）胸部双侧内胸腔积液并广泛粘连，（3）冠状动脉有钙化，（4）胸腰尾椎骨压缩性骨折并形成畸形，（5）手肱骨骨折并肩关节脱位。住院当夜输血 3000 余克，发病危通知书三次，不通大小便，无法进食，靠输液输氧维持生命。住院 11 个月中，停药 9 个多月，医院确诊我已终身残废。因我及家属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肇事者李华平又对此置之不理，我的伤得不到正常医治。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肇事者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于

2001年3月29日替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其手续至今还在李华平手中！由于李华平将我遗弃在医院，医院于2001年7月20日将我（李玉英）送入交警一大队，后却被顺庆公安局和肇事者李华平将我拖进收容站，再次摧残我。

2000年10月12日顺庆公安局交警一大队事故处理中心以第（2000）927号下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中载明：“经本机关调查取证后，作如下认定：当事人李华平在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案，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李华平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2001年7月31日顺庆公安局做出了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

我被压伤后，前后共花去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达9万余元，至今我尾椎骨骨折未愈，不能行走，而且大小便失控，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李华平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进行威胁，我及亲属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子女、亲属要求肇事者李华平支付医疗费，却被关、被抓、被打，并抢走大量医疗票据（金额1万多元），逼得我大女蔡素碧割腕自尽。我弟李光成和大女蔡素珍家为了医治、护理、照顾我的生活，家中口粮卖尽，农村庄稼停种，无法生活。现我无法起动，无法行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大小便失控，需专人护理，现我无生活来源，又无经济收入。我女蔡素碧及亲属代我找遍了南充市及顺庆区公、检、法、政协、人大、党委，政府都相互推诿，上访到北京、四川省有关单位都没有解决问题。找到新闻媒体、报刊社、电视台都只表示同情而不敢接受我的求助！

苍天啊！你怎么不长眼啊！救救我这个老太婆，救救我这个老太婆的子女们吧！

求助人（受害人）李玉英

2001年11月26日

2. 支付令申请书

顺庆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玉英，女，现年 76 岁，汉族，住南充市大北街 79 号。

申请人因 2000 年 9 月 27 日零时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巡警队长李华平肇事压成终身残废，大小便失控，不能行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现仍在医治之中。申请人无经济来源，如不预先支付，会严重影响申请人医治、生活及护理。南充顺庆区法院已于 2002 年元月 8 日裁定先支付壹万元的医治费，可二被告至今未付，严重影响和威胁申请人生命、生存权利。为此，特向顺庆区人民法院再次提出申请，责令二被告支付人民币壹万元为其医治、生活保障费。

此致

申请人：李玉英

2002 年 2 月 22 日

附录五 村民谢明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1999)南中法刑终字第29号

原公诉机关：蓬安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男，生于1952年4月27日，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五组。现押于蓬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冯开熙，南充市金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蓬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蓬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阙定明犯聚众扰乱秩序罪一案，于1998年12月24日作出“(1998)蓬刑初字第9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96年下半年以来，被告人阙定明为了搞垮中坝村村级组织，利用群众关心的提留等问题，先后书写大字报张贴，打起锣走村窜户煽动，私自确定社员代表进行活动。特别是在1998年2月20日上午，被告人阙定明组织带领数十名群众到长梁乡政府提帐。先后将副乡长唐杰超、农经站长代文平围住进行推搡，当乡长彭会昌出面制止时也遭到阙定明等推、打，致使三人受伤住院，经法医鉴定，唐杰超为轻伤，代文平、彭会昌为轻微伤，用去医药费近六千元，致使长梁乡机关、单位当天无法正常工作。同时阙定明的行为使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中坝村提留款项无法收缴。原审认定被告人阙定明的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罪，且系首要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被告人阙定明不服，以其是受迫害且查帐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辩称该案为人为的假案，应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1998年2月初，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到长梁乡政府找到乡长彭会昌要求由自己对本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彭给阙等人作了解释并当即决定由乡政府出面组织对该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随后乡上召开了有关会议进行安排布置，决定成立查帐小组由乡武装部副部长刘国福带队。2月13日查帐小组到中坝村准备召开动员大会，后因逢场、下暴雨等原因，未开；第二天查帐小组找到中坝村文书谢建国准备查帐，但因谢要抢修被风吹垮的西瓜蓬，致使查帐工作暂停。同月20日上午9时许，上诉人阙定明便组织中坝村由其个人确定的所谓社员代表等人共计数十名，来到长梁乡政府所在地，上诉人阙定明首先对副乡长唐杰超说：“今天我们是来提帐的，不提帐就提人”。同时用手推了唐一掌，唐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拒绝了上诉人阙定明的无理要求，上诉人阙定明等人便抓住唐的手和衣服进行推、搽，部分人员还对唐进行拳打，唐被迫到厕所躲藏，上诉人阙定明强迫唐在其事先写好的提帐申请上签字，随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又找到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要代交出有关财会凭证，遭到代的拒绝，上诉人阙定明称“是代在装怪”并打了代一掌，随后其他人员将代围住进行拳打和推、搽，代文平被迫同意交帐。此时长梁乡乡长彭会昌闻讯赶到予以制止，上诉人阙定明冲去打彭背部一掌，其他人员围住彭进行拳打，并将彭的手提电话天线折断，彭被迫离开现场。当日下午二点左右，上诉人阙定明便安排社员回家吃饭后再来；一个多小时以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为了壮大声势先后聚积了几百人到乡政府，直到晚上经有关人员疏导才得以离开，当日乡政府工

作陷于严重瘫痪。乡长彭会昌、副乡长唐杰超、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被打后均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五千余元；后经法医鉴定唐杰超所受损伤属轻伤，彭会昌、代文平所受损伤属轻微伤。认定上诉事实有阚定明及其他参与者的供述并与受害人唐杰超等人的证实相映证；围观群众及乡政府有关部门均证实当日乡政府部门工作处于瘫痪；蓬安县委、县政府 1997 年 8 月 15 日作出的蓬委字（1997）57 号《关于全面开展农村财务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财务清理方法和步骤，要求由党委、政府牵头组织，社员代表参加，有序地进行；这进一步证实了阚定明等人是无组织的非法活动。

本院认为：上诉人阚定明无视政府有关规定，私立社员代表，并以其为首聚众到乡农经站准备强行提走有关财会凭证，当遭到拒绝时又致伤多人，情节严重，致使乡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并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阚定明在上诉人中辩称其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理由，经查与政府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辩称这是一起假案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文明
审判员	袁 彪
审判员	陈登科

1999 年 7 月 27 日

书记员	罗勤阳
-----	-----

附录六 筑路人刘世昌

1. 毛主席语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报 告

我出生于万恶旧社会的地主家庭。国民党时期整整参加伪修建测设工作十一年。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本着对旧知识分子给出路的政策，给予宽大仁怀，在边改造的过程中，用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正当党和人民政府给我进行自我改造的良好机会的那一天起，我就向党和人民政府交待了我在旧社会的全部生活的历史情况，在历次运动中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历史既往不咎，这一切的一切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宽大仁怀的！自 1968 年我单位对我实行专政的那一天起，几年来我一直在深思自省，深思我自从得到自我改造的机会的那一天起，工作与生活中是不是有新的越轨行动以及破坏行为？但几年的深思自省中，我无法知觉我有什么重新犯罪的行为！望请我单位领导能够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能够指出我的犯罪事实，以便我进一步做出应有的交代补充材料。这是我在继续接受审查的过程中应抱的态度。

1968 年我被划为专政对象——三次定为“罪恶累累的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党员，防奸组骨干，历史反革命”，为此接受专政五年，于 72 年 3 月 22 日在五七农牧场宣布自 3 月 15 日起解除群众专政，继续审查。

我在专政期间，先后为我的历史写过若干书面交代材料，特别是 70 年 12 月 28 日，71 年元月 2 日，2 月 28 日及 3 月 5 日写过的我的“检查认罪”书几份，那是为了满足和配合而达到最高限度的认罪表现，以及力争做到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我即在我的坦白认罪的书面交代里，作了比较深刻的高度艺术化的形势认识，一心从坦白从宽的角度出发，在认罪材料里提供了不少可以追查我犯罪历史的线索，指望通过我的彻底的检查认罪的书面材料，能够把我的反动技术权威以及历史反革命的实质弄清楚。岂不知专政五年解除后继续审查！这是完全应该的。可是我年纪已经六十岁了，和我从旧社会一起生活过来的人，已经不多了，连我在内，恐怕再也活不了几个五年的了。

作为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既是历史反革命，可以到省交通厅、昆明铁路局敌伪档案里查证的。在那里是可以找到我历史反革命线索的。我请求丽江地区领导，给予重视和落实。

我从被专政以来，为了满足配合而达到最高限度的认罪表现以及力争做到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的前提下，我给公路十团所写过的书面材料，一直到现在，我认为都有着相当的历史意义和它的参考价值，所以请求公路养护团继续给我保存，它方便于后来的工作人员，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可以作为材料分析的依据。

我爱人初升娴的两次被我原公路十团“司法部”划为并戴上逃亡漏划地主分子，被我单位派人二次押回原籍监督生产劳动改造的问题，已多次呈文给刘世泽政委，至今听候处理。

1966 年 9 月 2 日晚上我团宣布给初升娴戴上逃亡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送还回籍监督生产劳动改造。68 年 5 月，团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根据 68 年 1 月刘政委在团座谈会后宣布，群众通过给初升娴平反决定的通知。于是大姚县人武部支左委员会将她的户口粮食迁移至丽江给予平反。她来到丽江后，由于团的个别人利

用职权，打电话通知丽江县公安局要凭单位平反证才准入户，因为没有发给平反证，所以没有上户口；为此到了 68 年 11 月 13 日晚上又将她揪进团机关，挂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罪名的牌子，批斗、拘留、关锁在我团机关宿舍里，直关到 12 月份在斗争大会宣布我夫妇是“工农民主党”的首魁……于是由团的“司法部”第二次带上逃亡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押送大姚县江头大队管制生产劳动改造。

初升娴 1940 年 2 月出嫁离开家庭，我们在永仁县城结婚，从 1940 年到 1949 年这十年中间，共回家探亲四次：第一次，1940 年 6 月，我们回家认亲住了十天。第二次，1942 年 9 月我从滇缅铁路遣散失业，由祥云去永仁川滇西路找工作，路过家门，她与我回家住了四五天。第三次，我由保山飞机场 27 工程处调思茅测量队，因交通不便，不准带家属，于 1945 年 2 月回去住到 6 月，共住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第四次，1946 年我失业，在昆明候职期间与她回去，从 11 月回去住到 12 月份，住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四次探视合计在家里住过七个月零十五天的时间。1947 年 1 月起至 1949 年 12 月解放时止，就是说解放前三年她一直没有回去过。虽然初升娴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但其从她与我结婚的时就随我外出搞家务劳动，鉴于上述实施情况，按照国家阶级划分条例，不知是否应该由原公路十团“司法部”两次确定为逃亡漏划地主分子！不知是否符合党的政策规定？由于我对党的具体条例不大理解，向上级机关提出询问，大概我不属于这是重新犯罪的行为吧？！

现在又一次通知，若初升娴再不离开丽江，又要派人押送回原籍。特此我请求地区革委会按照党的政策给予重视初升娴的问题。并请求公路养护团给予正视，解决初升娴的户口粮食问题。我请求能够早日批准给初升娴把户口粮食前来丽江，所以我才给

上级呈此报告。

此呈

报告人：刘世昌 上

1972 年 11 月 16 日

2. 关于初升嫔在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中问题的申请报告书

我是省公路管理局丽江公路养护总段干部刘世昌的爱人，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中，在丽江县城镇分团汽车运输总站公路养护总段工作队作随队家属，1966年8月26日总段工作队负责人口头通知刘世昌叫我回原籍证实问题，实际派总段医生赵宁极以到禄丰开会为名，暗中监视我到江头公社，没有斗争、批判，工作队也没有给予教育、批评、谈话，等我走后，才宣布“地主分子初升嫔，现年48岁，现住大姚县江头公社拉么第二生产队”。

我1936年以前在家乡迤的么及老怀少读小学，1936年7月到1938年12月在姚安县城读简易师范学校当学生，1939年1月到12月在迤的么小学校当教员。1940年和刘世昌结婚后，一直到1960年7月随着刘世昌工作的机关转移，当随队家属做家务劳动，1960年8月到1962年7月被控侦审，在宾川农场劳动（附抄呈卷）。1962年8月到1966年8月30日又跟刘世昌工作机关转移当随居家属做家务劳动。62年到65年这段时间在中甸总段、丽江总段，没有组织学习，虽向组织领导反映，由于他们忙没有给我们组织。到65年10月四清运动开始两个月后，工作队叫家属学习，家属中叫我当学习小组长，因居住分散，经常学不起来，讨论也无人发言，有一段时间，工作队同志罗维光领导我们学习，由于会上无人发言，经常学不起来，罗来向我了解一些总段领导间的不团结意见的看法问题，最初我不敢说，经过他几次的动员说服，以我所知道的和我自己的看法说了一些，他笔记去了，经过他整理后还叫我签名盖章，由于我的学习差，认识不清，所以错误是很多的。我自66年8月30日离开丽江，来到大姚江头公社迤拉么第二生产队，公社和生产队没有叫我证实什么问题，也没有宣布我犯的什么罪，只指示叫我和我的地主妹妹暂时居住，

并参加地富开会。我到队的第三天就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66年9月13日马腾芳对我说：“你是在你们单位上犯了很多严重错误，这次才派公安局的人送你来交到公社，只是不给你晓得，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地劳动。”66年10月5日队上开群众会统计人口分配粮食，有的群众提意见说，我们山区队人多地少，初升娴已经出门几十年了，现在硬把人家整回来，不分给粮食又不行，看她已多年不参加农业劳动，体力弱，干一年还不够她的粮食工分，把她整回去算求。马腾芳对群众说：“她自小轻闲，没有苦过，尤其和刘世昌结婚后，在外面东走西游，拿工资吃饭，生活好过，我和老初（指初升明）俩个几年来动了多少脑筋，想了多少办法，千方百计费了多少心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他两口子整回来当丫头娃团使用，现在才碰上文化大革命把婆娘整回来了，可是男人一直没有整回来，粮食算什么，多有一个丫头不好吗？你们还想不要她！还说体弱干不够粮食工分，磨也要磨她几年，粮食算什么。”所以现在我还有些情况模糊认识不清，既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四清运动，凡属我的错误罪恶问题，都应给我统统说清楚，以免再继续糊涂下去错上加错。要求把我的犯罪和错误文字明确指示，给我加深认识，我自己更能深刻地接受监督生产改造。这样的说法是我的不对，是我的错误，请求给予教育批评。

自65年66年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学习以来，关于我自八岁到现在的简历，以及我的自我检查交待，在小组会上口头说过，又写成书面文字报给工作队，没有给我指出不够或有错误地方，而且机关领导及工作对任何人都没有对我个别谈话或在会上宣布给我指出罪恶，指出缺点，指明方向，教育批评帮助过。突然66年8月26日下午7时左右工作队副队长王书基叫刘世昌去说：“大姚四清工作团党委通知，要初升娴回去一转，有些问题证实一下再回来，你有什么意见？”刘世昌答复，组织上叫她

回去，当然就回去。刘问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带多少粮票？王说“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最好多带一点，吃不完反正还是带回来的，最好明后天就走。”当时雨水大，公路水毁不通车，没有买到车票，29日下午五点多钟，总段医生赵宁极对刘世昌说：“我要去下关、祥云，明天有下关车票，赶快给你爱人买一张车票，我们一起走。”刘世昌拿钱请赵宁极买了车票，乘车行程中，赵宁极在南华对我说：“可能就是为你母亲和你出去到祥云的问题，交代清楚就行了，其他不会有什么。”又说“我是去禄丰开亦工亦农会议的，9月15日开始，万段长叫我顺便结伴和你去一下。”我认为王书基、赵宁极都对人不诚恳，不负责，采用哄、诈、欺骗，把人整走送出门就万事大吉。8月30日把我整走，9月2日宣布我的犯罪错误结论，不当我的面宣布，在我走了的背后宣布，我眼不见耳不闻，对我起什么教育作用？赵宁极既奉组织领导之命监视送我到公社完成任务，在路上不说，到公社后就应该把我犯的罪证宣布交待清楚，所以特别送我回队监督劳动生产改造的，这样才能给我起到直接教育作用。由于对我不直接教育，这里说是总段机关送来的，丽江总段机关又说是公社党组织要回来的，所以使我昏头昏脑，不知究竟，使我来到这里，住处吃处感到困难，因为我将近三十年不回家，现在和妹妹住在一起，他们房屋很窄，没办法。

刘世昌来信说：“66年9月2日下午工作队王书基队长叫我去问：‘初升嫔37年39年收过租逼过债你知道吗？38年对杨志学一石谷子逼还十石，一次逼清，还把耕牛抢走，你知道不知道？还虐待过长工李开文，张启书，罗仕荣，李宝成？初升嫔50年从祥云回去组织过反革命活动，把贫农马腾芳、杨春华关了三天一夜她是主谋，在混不下去的时候，以到江底河上香为名，带着她母亲跑到祥云，还带走东西，金桃子，金戒指等。’”

9月2日晚上在总段职工群众大会上宣布我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当宣布时刘世昌在接昆明公路管理局打来的电话，等电话打完后，只听到一贯挑拨干群关系，在下关贪污被劳改释放，其他都没有听到。9月9日晚上总段职工大会时，王队长给刘世昌看了人字第029号介绍地主分子初升嫫到大姚县江头公社监督生产的通知单，9月10日王队长回宿舍睡觉时，刘世昌向他要求：“宣布初升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时，刘因和昆明打电话，没有听到宣布的犯罪事实，请求把文件念给我听一下。”王不答可否，只说：“她的犯罪事实，是经过几次调查落实的，是那边党委介绍来的，材料很多，一大本。宣布时只提了个重点，调查落实的材料是经过两个公社，几个生产队群众盖章证明，章盖得一张纸红红的，她的犯罪事实，她会写信告诉你的。刘世昌又说：“她的罪行，这些问题我一点都不晓得。”王队长说：“她当然不会把这些罪恶活动告诉你的。”并说江头公社的检举材料，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来到丽江派出所了。

我离开丽江时，工作队王队长和刘世昌说叫我来一转，把问题证实一下就行了。但我已来到这里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叫我证实甚么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中，我是学习中的一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男女平权，我犯罪，我的问题自有我承担。王队长硬叫刘世昌在中间转说一道，不明不白，实在令人难解，难道女人无权和王队长说话吗？我在丽江时不正面对我宣布罪证，我走后两三天才宣布，是何用意，对我又能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呢？在运动中，我认识到的问题，都已经向工作队坦白交待，正因为我没有觉悟，没有认识到问题而没有进行坦白交待，群众指出是我的错误，所以是我的罪恶。但应当向我指明白，给我在思想上得到清楚，而王队长不是这样做，毛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认为这是工作队和王队长的不负责任，现在我的请求

是：

要求把我的犯罪宣布结论发给一份，使我以经常检查对照，作为我争取改造成为一个新人的努力方向，因为只凭刘世昌听得不全的片断文字，我始终还是思想不清，因为党和上级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在两清开始就宣布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我做过没有交待的，而群众给我指明的，是属于抗拒，给我处分是应得的。而我在坦白交待时，觉悟不到，因为没有做过的事，确实也是没有回忆到这些问题，因为 37 年，38 年我在姚安县读简易师范当学生，是我母亲当家，管理家务，39 年我又在迤拉么小学校任教员，教小学，对收租逼债我没有做过，所以确实是不晓得。对于说我的罪恶活动是：

我 50 年回家的事，不是 50 年是 51 年 2 月份，我由祥云回到迤拉么，只住了七、八天时间，刘世昌信上说“组织反革命活动我是主谋”。这个问题当时我不但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敢想过。据说，当时情况是李宝成在楚雄专区学习清匪反霸政策不在迤拉么，（我当时也没有见过李宝成的面）我离开迤拉么返祥云后，51 年 4 月份李宝成学习结束，调到五区参加清匪反霸工作，因为他当过多年伪保长，到乡上反省了三个月，他家是富农，人民对他宽大，给他回家生产，到 61 年病死。罗仕荣他家离迤拉么几十公里，51 年 2 月我回到迤拉么村，不知他的情况，我们虽有些亲戚关系，也没有打听过的情况。这次回来才听说，罗仕荣当过多年伪乡长，压迫人民罪恶深重，被捕劳动改造，58 年释放后一年多病死了。贫农马腾芳、杨春华被关三天一夜，为的什么，我也不清楚，现在回来也没有听见谈及这一问题，杨春华不是贫农是富裕中农。51 年 2 月我带着母亲逃跑去到祥云，不是以到江底河上香为名走的，是我妇道人家，在解放初期，学习认识差，不知利害，没有向农会报告请假，夜间由房背后梁子上走。现在还

有初升培、罗维高、李中和、李永吉等送我走的人为证。我母亲当时带走的東西有我在四川成都市买的大綢絲棉縫成的衣服一套（准备死时装老用），紗帕一块。另外金鏈子、金桃子（我們叫鸡心）、金戒指，还有玉手鐲一只，45 年我回家戴着和我母亲姨妈等人照过一张相片，这四样东西一直是我隨身携带，没有放在家里过。这些东西，我错误认为是我丈夫刘世昌的工资收入，节约买的，所以没有坦白交待过，是我的错误，现在坚决交还群众，交还人民。其中：金鏈子，金桃子，金戒指在刘世昌处，請决定在丽江交工作队抑或带回大姚江头公社交群众，請指示照办。絲棉衣服一套，其中衣服因我母亲死后，就郵寄西畴县給老婆婆穿掉了，請作价赔还，絲棉褲子，玉手鐲，紗帕三样东西在我处，交公社或生产队？請指示照办。其他东西我没有拿出去，因当时我們不行，还背着刘淑芳——一个女孩走路，再因解放初期沿途农民群众到处守哨检查，我也不敢带东西。我母亲在祥云住了 20 多天后，我們請人送回，还写了一封信給农会，报告出来又回去的情况。此信已交到农会，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們也知道我的流转情况，但农会和群众都没有做任何指示和追究。

虐待长工李开文、张启书问题，不是李开文是李文开，我一直没有回忆起他什么时间在我家当过长工，因为我回家时，没有看見过他在我家当长工。据我二妹说，可能是 1942 年，也可能是 1947 年（因时间长了记不清楚）。我 1941 年 11 月到 1942 年 8 月在滇緬铁路秋馬县南走河桥工所工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滇緬，我們逃到祥云办理南走河桥工所结束工作。1942 年 9 月到 10 月，滇緬铁路压缩机构，我們夫妇被遣散失业，到川滇西路永仁总段找工作。总段长孙元楷，局长周奉九，川滇西路局委刘世昌为公務员，被派破坏祥云到永仁公路，没有到职。10 月间去昆明，我住华山南路楚姚鎮巷 13 号。只是 9 月间由祥云到永仁路过在家住

了四、五天，因为时间很短，我没有见到他，也没有虐待过。1947年元月到4月，刘世昌在昆明盐务管理局做临时雇员，我住在楚姚镇巷10号。5月到12月刘世昌在昆明第四区公路局昆明及曲靖总段工作，我住昆明路工新村及曲靖北门外总段上做家务劳动，一直到1949年解放，我没有回过家。张启书没有在我家当过长工，是他的妹妹，1943年在我家当长工。1943年1月到3月刘世昌因被遣散失业，生活无着，东北人王立刚将刘世昌介绍给巫家坝（昆明）飞机场工程司梁达做工程师，我住楚姚镇巷13号做家务工作。4月到12月刘世昌在滇黔铁路测量总队第一分队做测量工作，8月间我由昆明迁到宣威居住，做家务工作，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没有虐待过任何人。

38年向杨志学逼债抢走耕牛问题，不是38年，是46年8、9月间初升培、鲁向勤、李永吉向杨志学收债牵走耕牛的。这头牛牵回来，是杨永芝家喂养。1945年6月到10月，刘世昌在35工程处昆明巫家坝飞机场工作，我跟他住在昆明大绿水河，1945年11月被遣散失业，我跟他到西畴婆家住了8个月。1946年11月转回迤拉么，在家住到12月底，又去昆明，所以逼杨志学的债，抢走耕牛，我没有做也没有参与过。

一贯挑拨干群关系，在中甸总段，家属和机关住在一个院里，家属只有我和任小旦爱人杨舜英，64年增加了万必贵爱人辛作英，搬到丽江后又增加刘连禄爱人张杨景，我们住在一个院里，（其他丽江交通局调来干部家属分散另居经常不碰面），我和杨舜英由于辛作英在其中说东家长西家短，过话加盐加醋，引起杨与我一段时间有意见。在运动学习中，领导上和工作队对家属中的闲话故事、闹不团结，进行过启发教育，提意见互相帮助，自我教育，互相对证谁是谁非，闹清问题，要求大家今后团结一致，不要互相猜疑。由于闲言淡语，表面看互相没什么意见，好像团结很好，

实际不是真团结。四清中没有解决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道小话说是非，没有受到深刻教育，思想上没有得到清楚认识，我本人错误缺点非常多，对罗维光说了一些家属不团结的原因和问题，女人家的闲话故事我也说得不少。不过辛作英、杨舜英、张麟瑞、邹阔等，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说了些什么？有必要三面对证，弄清是非，得到教育，共同提高，对挑拨干群关系我自己检查没有做过，由于罗维光的启发动员，我是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但领导没有对我指出错的地方，而在档案结论中作为一个错误，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40年和刘世昌在永仁县城结婚后，刘因没有见过我母亲及亲朋之面，40年5、6月间，刘世昌和我回到我家认亲戚，在家住了十天左右，又返永仁准备前往滇缅铁路南走河桥工所。当时我母亲和亲戚都认为我出去就不会回来了，所以我大舅罗彩萍主张，与其把姑娘养大了给人带走，不如把她在老怀少梁子一枪敲死掉还干脆。第二次是1942年9月由祥云到永仁，路过在家住了四、五天不到一个礼拜。第三次是1945年2月刘世昌去思茅工作，因交通不便，我回家住了5个月左右，又到昆明。第四次是1945年刘世昌被遣散失业，到西畴婆家居住，1946年11月到12月回家住了两个月左右。第五次是1951年2月份回家住了七、八天。所以自从1940年到1951年的十多年中我共回家五次，合计时间不到一年，当然这些时间里，我母亲在家对贫苦农民的剥削是非常残酷的，我的错误也是很多的，但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我没有依靠家庭剥削为生，是靠刘世昌当旧职员的工资为生。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第11页（7）点指出：“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另外还有第31页（2）点和第32页的说明。因为我对文件精神领会不深透，认识不全面。

我错误地认为，建议上级机关领导人派工作组或者调查人，进行了解调查情况时，不要局限于在少数几个人中进行调查了解，要求把调查了解的对象群众面扩大一些，要求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了解，山区彝族地方，还要注意权威人士压制封群众的口，不准说，群众不敢说心里话。我离开迤拉么将近三十年，对我的实际情况，年青的人大多知道的不太多，即使知道也是听说的，所以现在我回来，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不知道了。我的要求，请多向四、五十岁以上的人调查了解我的反动剥削情况。江头和迤拉么村现在 39 岁以上到 70 岁的人都有，我认为，这些事没有什么保密的，不要如上次调查时那样，关着人还拴着门。权威人士向个别人调查了解，可以公开的，就公开进行调查。还有迤拉么村过去一贯属于永仁县管辖。自 58 年后划归大姚。有些问题请向迤的么、老怀少、老普拉等地群众进行了解。我的说法和见解错误很多，请予批评教育。

总之我由于学习认识很差，对党的政策领会不深，认识模糊，没有很好遵守改造，所以产生以上的糊涂思想，是我的错误。为了通过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进一步在思想上得到明确清楚，加强自我改造，重新做人，所以特呈上此申请报告，请求给予教育、批评、指示为祷。

此上

大姚县江头公社迤拉么第二生产队

申请报告人： 初升嫫

1967 年×月×日 上

3. 初升嫔的自我检查

我出身地主剥削家庭，从小就过着资产阶级不劳而食剥削的寄生生活。1940年离开地主家庭后，仍然过的是旧职员家庭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由于一贯过着这样的生活，就不知道劳动人民的苦，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图享受、损人利己的只管自己有吃有穿就不管其他问题的腐朽生活思想。解放后，还自认为在国民党反动时代万恶的旧社会里，没有作过什么恶，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翻了身，吃饭、穿衣、生命有了保障，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工农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天天向上，大跃进实现了。人民公社发展了，农村也有了电灯，从农村到城市汽车马车四通八达。但是我一贯过的是家庭妇女生活，解放后十七年来，由于学习不够，接受党的教育改造也很差，通过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学习，认识到我虽然是在无产阶级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实际所作所为都是和党不是走在一条路上，是离心离德的。我们党的家属应该做好家务工作，使职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做好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但是我对这一点没有做到，如爱人出差买东西回来，带炭回来，特别严重的是在四清运动中今年三月份，还在华坪永胜买米和猪油回来。这是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应当诚恳接受群众的教育，请求党给予应得的处分，现将我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分别检查：

思想意识方面：

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支配，认为自己没有小孩子，47年在曲靖总段郑少华的爱人连生了四个女孩，在生下第四个的时候，他不要，经李芝爱人介绍，我收养了，就是现在我的大女孩刘淑芳，现年19岁，在丽江农业学校读书。当时互相都没有送什么东西。

1948……1)，2)，3)，4) 缺。

5) 63 年—64 年我帮助职工同志代打毛线衣不收费用后，任星照同志送给香肠腊肉 1.5 斤左右。杜锟同志送给饵块 2 斤左右。美如皋爱人送给麦芽糖约 2 斤。我出钱请钟淑芝同志代买了 100 多只鸡蛋。

6) 65 年公家汽车由华坪运回焦煤，不经分配我拿了 285 市斤（已由爱人退赔）。

7) 今年 3 月份爱人去华坪永胜出差，不以党的工作为重，运动中买大米 120 市斤，猪油 4 斤多，用公家汽车运回。这种破坏运动的行为卑鄙毒辣，是坚决走资产阶级道路的行为，请求给予应得的处分。

8) 拿了公家短方板 8 块。

9) 玉龙桥施工期间，贪图便宜，叫孩子捡木碴回来烧。

10) 请王茂林同志在中甸代买炒面 10 市斤，我也给他在丽江买食米粉 10 市斤。

11) 刘刚同志送给一瓶麻油，我送他一双灯芯绒女鞋。

12) 59 年卓文安同志送给遮放特米 30 斤。

13) 60 年 3 月份祥云郑惠兰同志送给腊肉香肠 7 斤，我送他小孩水笔一枝。

从以上这些资产阶级的言语行动来看，完全是我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本质的反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无产阶级味道，现在党和人民帮助我认识过去的错误，不使我再继续坏下去，丢掉资产阶级的坏东西，树立无产阶级新思想，跟人民走在一条道路上。在运动中我也有所认识，有所提高，这是共产党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爱护。从今以后我一定听党的话，跟着人民群众走，好好学习，改造自己，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纪律，让党在今后实际行动中考验我。

66-7-14 交

附录七 破产企业家吕钰

1. 关于吕钰一案的情况汇报

92年初根据江油市府有关文件规定，吕钰回来挂靠我企业办，主要经办人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双方约定，企业办不出钱，不出人，不出场地，只收管理费。吕钰自行负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当时全国普遍如此）。

吕钰从92年至97年公司活动正常，经营良好，企业已创产值5000余万元。由于我乡上届党委会负责人，对该企业的性质未按真实情况认定，错误认定该企业是集团企业，因此出现了党委个别领导以行政手段对该企业的借资，进行非法干预和审核，以吕钰借款投入该企业的经营中资金不平衡为由，认定吕钰侵占集体巨额款项，投诉江油检察院，并将吕钰关押审查，继而一个星期内就将吕钰价值5000余万元的财产以4000余万元的低价变卖一空。并将款项在近短期内分流一空，致使原公司前期起动资金借款无法偿还（如三台县长东植物油厂巨额借款无法偿还）。

97年6月16日江油市检察院对吕钰实行人身自由的控制，并将其关进看守所。98年10月检察院对吕钰提请公诉（以吕钰公司为集体企业法人代表，侵占集体巨额财产为名起诉）。99年1月江游市法院判吕钰侵占公司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吕钰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请上诉。认为“原判认定江油市工矿企业开发公司及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为江油市八一乡集体企业不实；其二公司实质是私营企业，本人有权支配和使用公司财产，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几个月的周密调

查，于 99 年 8 月 14 日终审裁定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吕钰担任法人的两个企业即江油市工矿企业开发公司，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性质的事实认定不清，作出了撤消江油市人民法院（1998）法刑初字第 68 号形式判决，发回江油市人民法院重新判决。然而 8 月 14 日至今已有两个月。江油法院毫无重审的意向。

依据《刑法》、《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期限已超越很多，加之吕钰长期被关押，致使公司债主经常纠缠，哄闹党委、政府，尤其是企业办，曾一度时期致使党委、政府无法正常工作，本该吕钰私营企业所承担的债务，反而落到了八一乡党委、政府和企业办。本届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钱贤贵书记，李晓燕乡长，企业办主任杨荣于 99 年 9 月 23 日应二审法院通知，前往如实汇报，向中院刑二庭进一步阐明了该企业名为集体，实为私营的理由和依据。（详情见中院二审材料）

根据《刑诉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敬请市政法委督促两级法院迅速解除对吕钰的无罪关押。使吕钰尽快获得自由。恢复公司正常工作，解脱我乡党委、政府。企业办被公司债权人的长期纠缠，使政府工作得以正常开展，以免再次造成不安定的局面及不良后果。

此致
敬礼

汇报单位：江油市八一乡企业办
1999 年 10 月 13 日

2. 对于吕钰所谓“侵占”罪一案的证词及要求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公司《香港项旭国际有限公司》原与吕钰任法人的四川省江油市工矿企业开发公司曾签合作协议，就共同开发江油市体育场 30 亩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进行合作。成立“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最近惊悉吕钰以所谓“侵占集体财产”的罪名被判刑，受多年牢狱之灾，我们十分震惊！我方认为不仅使吕钰本人蒙受巨大冤屈，同时也使合资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直接侵害了合资双方的合法权益。现就有关事实真相作说明，提请贵法院再审查此案认真考虑。

（一）我方与吕钰作法人代表的公司（简称“工矿公司”），合资开办的“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是完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的“有限责任公司”。所筹资金没有国家、集体任何投资，完全是双方法人自筹解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互惠及投资受益的原则，吕钰作为合资企业的法人，他未侵占公司的利益，也未侵吞合资公司的资产。如果他有“侵占”行为，作为合资方，我香港项旭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首当其冲应是第一原告，事实上，不是吕钰“侵占”了所谓“集体财产”，而是某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把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的数千万房产成果一块一块地吞掉，以颠倒是非，混淆是非的手法，生拉活扯判吕钰有罪。如果说吕钰有罪，到底谁受害者？如果说吕钰该成为被告，到底谁是合法的原告？

（二）我方与吕钰任法人代表的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经过法人及法人授权人在成都多次谈判，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意见后，按有关法律程序申报注册了“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的

合资企业。这当中，并未与兰友明代表的官方有任何实质性洽谈，更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只有和吕钰签定了合资协议。吕钰任董事长的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三）吕钰被关进牢房后，多方申诉、抗辩。一直本着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政策的坚定信念，在牢房里忍受了五年多，一千八百多个日夜夜的煎熬，自信没有犯罪，总算坚强地活到今天。吕钰一案，在中国的司法界确是少有的，我们提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深层次的思考和查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

（四）作为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的合资方，由于吕钰蒙冤一案，不仅吕钰本人个人财产、精神身体遭受巨大损失，而且直接使合资企业无端倒闭（特别说明，该企业并非亏损企业，而是上交了数百万税费的盈利企业），也使我方的合法权益遭到无理侵害，蒙受数百万元的损失。我们向有关责任方提起强烈抗议，并要求赔偿相应损失。请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给予公正的裁决。

顺致

敬礼

谢谢合作！

香港项旭国际有限公司

2002年8月

3.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02) 绵刑一执字第 177 号

罪犯吕钰，男，生于 1946 年 3 月 6 日，汉族，四川省中江县人，高中文化，原系四川省江油市工矿企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及（中外合资）四川旭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住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小区 10 栋 1 单元 4 楼 7 号。现服刑于江油市看守所。

江油市人民法院于 1999 年 1 月 25 日作出了（1998）江法刑初字第 68 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吕钰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吕钰不服，提出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99 年 8 月 24 日以（1999）绵刑终字第 40 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江油市人民法院于 2000 年 7 月 25 日又作出了（1999）江法刑初字第 99 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吕钰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吕钰不服，提出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0 年 12 月 21 日又以（2000）绵刑二终字第 71 号裁定，再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1 年 3 月 22 日江油市人民法院再次作出（2001）江法刑初字第 65 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吕钰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吕钰不服，再次提出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1 年 9 月 12 日作出了（2001）绵刑二终字第 23 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被告人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执行机关江油市公安局于 2002 年 6 月 27 日提出对犯罪吕钰的减刑建议书，并报送本院审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江油市公安局提出罪犯吕钰服刑以来，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并提供了证人证言、该犯的表现情况证明及罪犯

的自我改造总结等证明材料。经审理查明，罪犯吕钰在服刑期间，能认真学习法律、法规，遵守监规所纪，服管服教，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做为舍内召集人，不仅能组织好在押人员的学习、劳动，较好的完成各项劳动改造任务，而且能主动协助管教干部抓好舍内在押人员的管理和教育。特别是在监护重刑犯工作中，能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给予重刑犯多方面的帮助和关心，对稳定重刑犯的情绪，确保安全监护顺利交付执行起了一定的作用。五年来，安全监护重刑犯 36 名，已保证交付执行 31 名，先后获看守所嘉奖 22 次，记功 6 个。

上述事实分别有执行机关的减刑建议书、审批表、看守所干警对该犯的改造情况鉴定，同监同犯罪犯胡 x x 、王 x x 、谢 x x 、的证言，江油市看守所服刑犯嘉奖、立功审批表及该犯的自我总结材料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罪犯吕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法定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一）项、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罪犯吕钰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的刑罚执行（刑期自本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即自 2002 年 7 月 9 日起至 2002 年 8 月 15 日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魏宗久
审 判 员 兰大波
代理审判员 魏继军
2002 年 7 月 9 日

书 记 员 何义国

附录八 采购员霍海仲

关于请求重新复查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的报告

霍海仲，男，生于1928年2月6日，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现住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七村四社，原系四川省江油钢铁厂（现长城钢厂）职工。

1965年10月3日，三台县人民法院第1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霍海仲于1963年11月，勾结长乐七村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了江油钢铁厂货款1978.40元，判决霍海仲有期徒刑7年。1971年11月18日，霍海仲服刑期满被留队就业，1985年放其回到长乐七村四队。此后，霍海仲以没有骗领公款为由向各级人民法院不断申诉。三台县人民法院于1990年8月9日作出刑事通知书，该通知书在认定霍海仲任江油钢铁厂采购员期间，确实为江油钢铁厂购进了价值1978.40元钱的箩筐、蓑衣等的同时，但又驳回霍海仲的申诉。霍海仲仍然不服，坚持申诉。1997年6月，我们接受霍海仲的非诉讼委托代其申诉。我们认真听取了霍海仲的申诉意见，审查了霍海仲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深入实际走访了知情的干部群众，对霍海仲一案的事实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先将案件的有关事实报告如下：

认定霍海仲骗领江油钢铁厂的货款1978.40元的事实确不成立。

据霍海仲陈诉，他于50年代初参加江油钢铁厂工作，任采购

员职务。1960 年至 1961 年期间在家养病时，受组织的安排为江油钢铁厂采购箩筐、蓑衣、斗笠。我们调查知情人刘宗进、刘宗易等人证实，1960 年霍海仲确实在中太四村村办企业加工了箩筐、蓑衣，并且是支付现金。三台县人民法院给霍海仲的刑事通知书认定：“案经复查查明，你于 1960 年至 1961 年在江油钢铁厂任采购员期间，经手调进箩筐二百余担，蓑衣六百余件，计价值 1978.40 元，因货源来路不明未付款。事实证明，江油钢铁厂收了霍海仲采购的价值 1978.40 元的箩筐、蓑衣未付款是事实，霍海仲在中太四村采购时支付了现金同样是事实。霍海仲收取江钢支付的货款完全是收取自己事先垫支的货款。交货结算后才由江钢财务科将应付款汇到霍海仲原籍长乐公社（现为办事处）七大队四生产队，霍海仲收回垫支款是合法行为，认定霍海仲骗领公款显然不能成立。

错案形成的原因。

据霍海仲讲根据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工资之外的开支，上了 30 元必须转帐，而中太四村当时坚持要收现金（刘宗进、刘宗易证实），他就只好垫付现金 1978.40 元。当时江油钢铁厂搞社教运动，冻结了江钢的帐务，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社教运动领导小组才签字将他这笔垫付货款作兑现处理。1964 年以霍海仲购长乐七村四队箩筐、蓑衣款汇至长乐信用社。据涂国华（1964 年任原长乐公社副社长，分管民政和治保工作）讲，江钢给长乐七村四队汇来一千多元钱，发到信用社。当时公社讨论认为，这笔钱来路不明，说是箩筐、蓑衣款，他们就到霍海仲家那个生产队去调查（没有到四村去调查），都说没有做箩筐、蓑衣等。于是公社就认定这笔钱硬是来路不明，就冻结了此款。尔后便认

定霍海仲勾结了长乐七村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了江油钢铁厂现金 1978.40 元，判处霍海仲有期徒刑 7 年。

综上所述：江油钢铁厂收到了霍海仲采购的价值 1978.40 元的箩筐、蓑衣未付款的事实已为法院查明。霍海仲在中太四村采购这批货物时给付了现金是事实。霍海仲收回垫支的货款完全合法！根据犯罪构成的四个必要条件，霍海仲一案没有被侵害的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霍海仲收回垫支货款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希望人民法院本着实事求是，对公民负责的精神，遵循有错必纠的司法原则，对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再次认真复查，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此案因未查及法院原档案，无法核对原判证据。

附：书证×页

报告人：邓烈文 邹光新

1998 年 11 月 3 日

附录九： 1970 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

最高指示

坚决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70)军刑字第 29 号

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

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1960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62年改判无期徒刑。

徐犯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誓与人民为敌。1966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自封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封官委职，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在禁闭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该犯1958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经济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十五年。

王犯与徐关增狼狈为奸，同恶相济。1966年8月亲自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科学共产主义”（简称“科共”），1967年3月和徐犯合并，成立“共联”，系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泡制反革命纲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二十个问题”和反动文章八篇、诗词

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反动透顶，罪恶昭彰，实属死心塌地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 1949 年逃往台湾。该犯 1960 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无期徒刑。

任犯 1967 年 4 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山东昌邑县人。该犯 1958 年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社会党”被判处十三年。

刘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亲自书写“梅花论纲”等反动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该犯是“科共”、“共联”发起人之一，两个反革命组织合并的策划者，积极扩充实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主犯鲍明，男，二十八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分，天主教徒，重庆市人。其父鲍克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犯 1958 年组织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被判刑二十年。

鲍犯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

成员，在监内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多次提出抢夺枪枝进行武装暴乱，上大青山为匪，与苏修里应外合，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岁，职员出身，学生成分，河北省抚宁县人。1962年因策划抢劫枪枝、银行、向英帝驻华代办处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贪污盗窃罪被判刑十年。

常犯积极献策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暴乱，担任三人突击小组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份，制定“组织纪律十一条”，提出从监狱突围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苏修里应外合，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还准备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药品。禁闭后与主犯任大熊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固到底，并将伪造领章帽徽烧掉，毁证灭据。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江苏省丰县人。土改时其家被斗，其祖母被判刑。该犯在1958年组织反革命集团“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被判无期徒刑。

任犯是反革命组织“共联”的发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扩充反革命实力。准备便衣预谋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八、主犯白微录，男，四十三岁，地主出身，旧职员成分，贵阳市人，其父被我镇压，该犯曾充当蒋匪军政要职。1951年两次混入革命队伍，被开除、劳教。1961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

图叛国投敌，判刑十五年。

白犯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亲自拟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党。传递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九、主犯陈威权，男，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沈阳市人。该犯曾因搞流氓活动，被开除学籍。1960年向南修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信件和到该使馆叛国投修，判刑十五年。

陈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共联”发起人之一，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并亲自观察地形、路线、规定逃跑暗号，预谋武装暴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江苏省武进县人。1958年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

曹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准备便衣预谋反革命暴乱，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一、主犯吴国延，男，二十八岁，伪职员出身，学生成分，辽宁省宽甸县人，1962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被判刑七年。

吴犯首先和徐犯关增合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武装暴乱，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当守犯王汝强被禁闭，其还向同犯打气：“坚定信心斗争到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二、主犯汤福玺，男，三十岁，商人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蓬莱县人，1958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卫国军筹备会”判刑十二年。

汤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首都支部”成员，为“黑流水”地区负责人。曾观察地形，岗哨、制作领章、帽徽、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武装暴乱，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三、主犯关焕章，男，四十五岁，小业主出身，伪职员成分，北京市人，1948年曾受蒋匪河北省特务外围组织“干训团”训练，1960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民主自由保卫同盟”被判刑十三年。

关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搞反革命串联，预谋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认罪态度极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同案犯马日新，男，二十七岁，城市平民出身，学生成分，天津市人。1963年因企图抢夺武器，投修叛国判刑八年。马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三人突击小组成员，私藏军衣，伪造帽徽、领章、观察地形和预谋反革命暴乱，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判处无期徒刑。

十五、同案犯鲁少山，男，三十三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房山县人。1957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全民党”被判刑十七年。

鲁犯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小组长，系三人突击小组成员。预谋杀害我管教干部，武装暴乱，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

首，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罪行严重，判处无期徒刑。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岁，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山西省清徐县人。1963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投敌叛国被判刑十二年。

孟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进行反革命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气焰嚣张，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七年）。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河南省尉氏县人。1962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复中会”被判刑十年。

王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年）。

十八、同案犯张久常，男，三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分，河北省兴隆县人。1963年因企图杀害我公安战士被判刑十五年。

张犯坚持反动立场，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预谋越狱暴乱，观察地形、岗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五年）。

十九、同案犯杨喜法，男，三十岁，中农出身，店员成分，河北省行唐县人。1963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年。

杨犯在服刑中，不接受改造，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小组长。罪行严重。加刑七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七年）。

二十、同案犯郝祥龙，男，四十六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北京市人。1962年因书写散发反革命传单被判刑八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为反革命暴乱集团献策，举办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统一反革命思想，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

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一、同案犯赵志强，男，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山东省蓬莱县人。1961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三年。

赵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观察地形、岗哨，预谋暴乱，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八年）。

二十二、同案犯毕复英，男，三十一岁，小业主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威海市人。1960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民主自由党”被判刑十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加刑三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三、同案犯马辛未、万维钧、章鸥、吴淦修，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一般成员；尚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有悔过表现，不予加刑。

对查获罪犯实物（见附表）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此判

1970年3月28日

劳改基金会出版书目

《黑色文库》系列

《我以我血荐轩辕》	2001 年	徐文立著
《沧桑岁月》	2002 年	陈文立著
《凄风苦雨四十年》	2002 年	成中和著
《雪山下的火焰》	2003 年	班丹加措著/廖天琪译
《苦难的历程》	2003 年	文彻赫恩著
一个人的两个故事：（上册）		
《昨夜雨骤风狂》	2003 年	吴弘达著
《永远的北大荒》	2004 年	黄 湛著
《从诗人到囚徒》	2004 年	尚建国著
《红尘白浪》	2004 年	叶少华著
《中国冤案录》第一卷（2001-2003）	2005 年	廖亦武著

人权书目（中、英文）

Communist Charity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the Executed Prison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 年

《共产党的慈善事业》

——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 2001 年

《国策下的国难》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评析 2003 年

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2004 年

China's Systemic Use of Coercion to Meet Population Quotas

《劳改手册》2003-2004 2004 年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 2004 年

订购请联络：laogai@laogai.org 202-833-8770

网上浏览地址：www.laogai.org

中国冤案录

第一卷（2001-2003）

黑色文库 第十集

作者/廖亦武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 作者 廖亦武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Tortured Souls: Stories of Lost Happiness

Vol. 1 (2001-2003)

By Liao Yiwu

Black Series Volume 10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5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04-2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18.00

神州透视

中国冤案录

(第一卷 2001-2003)

廖亦武 著

作者简介

廖亦武，1958年生于中国四川。经历过大饥荒、失学、政治批斗等磨难。中学毕业后当过司机，从事过多种工作。1982年涉足文坛，以叛逆诗歌见长。1990年因政治入罪被判刑四年，出狱后以卖艺为生。由于对底层百姓生活有深度了解，他随后写出了《中国底层访谈录》、《证词》、《沉沦的圣殿》、《漂泊——边缘人采访录》等具有震撼力的作品，部分被海外译为多种文字发行。廖亦武可谓中国大陆“黑色纪实文学”的先驱。

黑色文库 第十集
劳改基金会

Tortured Souls: Stories of Lost Happiness

Vol.1 (2001-2003)

By Liao Yiwu

Black Series, Volume 10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5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04-2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8.00

